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 理论与模式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数据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丛书)

7 - 80109 - 202 - 3

. 当...

. 中...

. 社会主义- 概况- 世界- 文集

. 0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数据核字(97) 第21939 号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 号(100032)

电 话 66171396 66163377 - 618,61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 北京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50×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2 .875

版 次 1998 年3 月第1 版第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0 .50 元

编辑委员会

主编: 胡文建 王学东

郑异凡 殷叙彝

前 言

1994 年我们翻译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国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领导人和学者撰写的论文集《未来的社会主义》，供我国研究和关心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现状的学者和读者分析研究。该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并一再重印。

读者欢迎这类书籍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关心世界社会主义，关心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就不能不了解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研究它们，对它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由此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今后每隔一两年或两三年编译出版一本国外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学者和代表人物论述当代社会主义的文集，供我国读者研究。这是我们编译这本《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由来。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流派，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本书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各种倾向、各种流派、各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它们当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非马克思主

义的,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希望本书的读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它们进行批判性分析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吸取正确的、有益的东西,批判错误的、有害的东西。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东西,我们也应当了解它,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它,通过批判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战斗力,更坚定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坚定地坚持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书中有一部分文章是我们约请国外学者撰写或提供的(其中有些因已在其他中文书上发表,没有再收入本书),其他文章是我们从国外书刊选译的。排在前面的文章主要涉及各种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后面的文章主要涉及对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编译的这本文集不可能反映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全貌,希读者见谅,并予以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今后编译出版这类文集时改进。

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1997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俄〕鲍·斯拉温
14	社会主义的前景〔德〕特·贝格曼
29	为祖国,为人民〔俄〕根·久加诺夫
59	共产党人论社会进步的前景〔俄〕亚·弗罗洛夫
74	从后工业社会看社会主义〔俄〕叶·萨马尔斯卡娅
90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 保守主义〔乌克兰〕弗·希洛夫
107	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 比较分析〔俄〕.纳夫罗茨基

118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原因的结论以及 由此引发的问题 [希腊]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36	走向新的国际主义 [英] 劳·魏尔德
159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前景 [俄] 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
165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 ... [俄] 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
186	社会主义的当代观或当代的社会主义观 [俄] 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
215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 [俄] 米·戈尔巴乔夫
228	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 [德]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基本价值委员会
239	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 [德] 霍·海曼
266	社会主义失败后, 未来将是什么? [法] 让·罗日金
278	社会主义的未来 [巴西] 弗·维夫特
291	未来的社会主义 [美] 约·罗默

-
- 310 告别社会主义模式〔卢森堡〕安·霍夫曼
- 323 市场的社会化〔英〕迪·艾尔逊
- 345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与民主主义问题
——论新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日〕碓井敏正
- 364 明天的社会主义〔法〕托·安德烈阿尼
- 380 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可以实现的
社会主义〔美〕戴·施韦卡特

社会主义理论的 若干争论问题

[俄] 鲍·斯拉温

不久前所有的官方报刊还在断言, 社会主义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 寿终正寝了。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崩溃产生出来的看法, 其反响至今存在着。但是这一看法越来越同现实不符, 同共产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复兴的事实相左。众所周知, 群众情绪左倾这一情况不只出现在俄罗斯。左翼政党在波兰和匈牙利的选举中获胜表明, 历史的钟摆重新摆向社会主义方面, 人们对东欧各国强制实行的资本主义化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后果感到厌恶。群众将根据在资本主义中生活的体验学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著名思想, 在俄罗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这样, 俄罗斯的政治形势重新把社会主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是简单地回到八·一九前的时代吗? 我认为不是。整个左翼运动由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危机, 迫使我们全面思考危机的原因和作出关于这些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思想

鲍里斯·斯拉温: 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 莫斯科师范大学教授。

的前景的正确结论。必须重新向自己提出下面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何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垮台了,而在中国却继续蓬勃发展?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面经验中应当吸取什么教训?在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中,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可以吸取,有什么东西应当避免?这些以及其他等等问题要求活跃马克思主义思想,抛弃以前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观点。

这里只谈谈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

首先,我们一般地回答一下:应该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一词。19世纪初法国圣西门派学者皮·勒鲁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表达与私人利益相对的“共同利益”概念。勒鲁当时就警告说要防止在理解社会主义时可能出现的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分夸大共同的原则,束缚人的自由;另一种是过分夸大私人原则,发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后来,马克思在说明共产主义理想时这样表述这一理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大家知道,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概念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进步和现实的社会化生产联系在一起,同克服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同工人阶级的解放使命和群众的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联系在一起。他给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把社会主义同关于未来社会的“空想的”观点和“官僚主义的”观点区分开来。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涵义不仅被社会主义公开的敌人,而且被其所谓的朋友以各种方式加以篡改和歪曲了。可惜,社会主义实践本身给这些歪曲提供了论据。在实践中,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被达到这一目标的不恰当手段——暴力的绝对化、官僚主义、否定群众的创造——暗中取代了。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压制个性,

使个性完全屈从国家和屈从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全面计划。从这种观点出发,奥地利学者弗·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一公式今天被广泛用于诋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

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从不认为压制个性或全面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按照他们的意见,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在人类面前开辟的不是一条通向奴役的道路,而是一条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在“自由王国”里,人剥削人的现象完全消失,多少世纪以来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劳动、政权和文化相分离的状况完全消失,取代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是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获得保证的社会。

细心的读者可能反驳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而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如果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种不随时间发展的僵化状态,那是可以同意这种意见的。但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形态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劳动人民持续不断地摆脱社会奴役和异化。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过程是相当长的、充满矛盾的和非单一涵义的。尽管如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社会主义开始沿着增加人的自由,全面发挥人的才能和潜力的方向前进。

人们可能说,人的解放这一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以同意这一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并不是首创者,但他们在另一点上是首创者,这就是:对“自由”概念提出新的解释。首先,他们同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不是仅仅把自由的实现同单独的个人,即通常所说的私人所有者联系起来,而是同全社会,首先是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联系起来。第二,他们与唯心主义的自由观划清界限,这种自由观把自由仅仅看作是认识了必然(比如斯宾诺莎、黑格尔)。他们给自由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和解释。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自由是随着劳动、物质生产和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增长的。自由不仅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而且是在这

一认识的基础上被认识了的人、阶级、社会 对环境和关系”的 权力”(“ 统治”)。

自由不只是我们认识的事实,而且是实际行动的结果。在这方面,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由是“克服障碍”。认识了奴役的不堪忍受的奴隶还不是自由的,他只有奋起与奴役作斗争才能获得自由。无产阶级只有在他掌握政权,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时候才获得自由。正因为如此,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政治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坦率地说,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获得政治权力的时候和地方,社会主义才开始存在。在国家政权脱离劳动人民和被资产阶级或官僚主义者的政权所取代的地方,社会主义就遭背弃,或发生变形,成了所谓的“伪社会主义”。这两种情况俄罗斯都有。后一种情况为前一种情况的实际发生作了准备。正因为如此,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官僚主义扼杀了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消灭了群众的自由,用“来自上面”的指示偷换了群众的自由。

政治权力是经济权力的集中表现。这里我们认真地来谈谈所有权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所有权是人的自由的物质基础。人丧失了所有权就不自由了。在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私人所有者是主人,其财产的多寡成了其经济自由的尺度。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深刻分裂的源泉所在,应该向今天热心捍卫私有化的人们提醒这一点。国有和全民财产私有化,给俄罗斯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对新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的奴隶般依附。

只有社会主义才会消除私人占有者的统治,实行公有制。这样,社会主义将为劳动人民的解放创造经济前提。为什么说只是前提?这是因为在这里,有两个危险随时都会降临到劳动人民头上。第一个危险是在私有制尚适宜存在的地方过早地实行公有

制；第二个危险是把公有财产的监督转交给国家的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借助于公有财产对社会进行不受监督的统治。无论在这两种场合的哪一个场合，劳动人民都成了输家，他们实际解放的进程也就停止了。让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

只有当私有制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种发展形式完全耗尽自己的作用的时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必要性才会产生。在原子能、铁路运输、航天等领域，私有制显然是不需要的，国有制却是适宜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农业等等领域，私有制比国有制有效得多，在这些领域就没有必要过早地取消私有制。这将会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而实践也表明了这一点。这里不应当以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主要标准，而应当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主要标准。如果私有制比国有制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私有制就有权利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国家和劳动人民只保留对私有制的监督。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发展经验表明，过早取消私有制严重地减缓了经济建设的速度。俄罗斯在30年代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就导致饥饿和农业生产下降。中国在“大跃进”年代也有类似的情况。

可惜，某些“左”的理论家有时不正确地解释《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党人的理论的实质是“消灭私有制”这一论点。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不确切的译文。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的不是简单地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他们用的词不是 7 92 (消灭)，而是 9 92 (扬弃)。扬弃的意思是利用私有制中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和舍弃其剥削、利己主义等等负面的东西。只有当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取代私有制有较好的效果的时候，取消私有制才是适宜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并不排除利用私有制。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不能占统治地位。私

有制占统治地位,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私有制是一回事,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这是解决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算不算社会主义国家这一争论问题的钥匙。这些国家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同时,国有制占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劳动人民自动地摆脱任何经济依附。整个问题在于劳动人民是否成为国有制的完全的主人。决定性的一点只在于劳动人民能否支配公有财产,即国家是否处于劳动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在这里,经济又转入了政治,因为这里必须有劳动人民对国家的经济监督这一前提条件。劳动人民的监督和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列宁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自由思想的实际实现。劳动人民的政权、自由、实际的民主,这些只是社会主义界定的不同表述。

这样,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的哲学涵义是:劳动人民通过完全掌握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摆脱剥削和异化。这一过程在哪里进行着,哪里就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效果”;这一过程在哪里中断,哪里就出现社会主义的变形和社会主义的完结。

在前苏联恰恰发生了这种情况。由于共产党脱离群众,脱离工人阶级,起先是社会主义发生了官僚主义的变形,随后是社会主义垮台。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官僚化。结果,诸如建立更有效率的经济,创造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群众广泛的经验和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等等这些社会主义的真正标准遭到了忽视。因此,在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后年代,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人民生活恶化,社会中党的经济方面的上层人物的特权膨胀起来,出现了双重道德:对社会的“上层”奉行一种道德,对社会的“下层”奉行另一种道德。所有这一切,导致国家脱离人民,助长社会出现资产阶级的蜕变,并最终

导致社会主义的崩溃。

现实社会主义的变形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一起开始的。这两种情况都是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如果说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教条主义盛行的话,那么在其最后年代,苏共领导开始疏远马克思主义,并用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偷换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是建立在一种独特的相对主义基础上的,这种相对主义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概念是“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没有科学意义;理论中根本不应当有任何“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会妨碍理解生活,等等。今天,普通人和理论家们身处俄罗斯社会野蛮的资本主义化的条件下已经开始明白,所有这些议论无非是一种遮掩新资产阶级政权掠夺和剥削劳动人民过程的意识形态装饰而已。今天,人们又按新的方式来定义社会主义了。

这里,避免两种极端非常重要。正如上面已经指出过的,第一个极端力图证明,讨论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第二个极端是把社会主义的定义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一些个别特征。实际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标准是相当多的。20世纪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制定的“社会主义”概念作出自己的一些修正。同时,这一概念继续保留着自己出生时的特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明白,从哲学和历史观点看,社会主义是逐渐克服一切形式的剥削和社会异化、确立真正民主、劳动人民自治和个性自由的一个阶段。从经济观点看,社会主义是生产实际社会化、公有制和其他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所有制的结果。从社会政治观点看,社会主义是劳动人民的和为了劳动人民的政权,是人民的活生生的创造。

我不大愿意像一些理论家那样,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公有比私有占首要地位。他们在斯巴达城邦中或者甚至在原始社会中已经看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相当形式主义的定义,虽然这种定义

也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时刻相符合。马克思并没有在斯巴达城邦和原始共产主义中看到社会主义,他把社会主义的成熟首先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物质前提联系起来,同劳动的社会化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社会主义不是看作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世界文明积累起来的一切优秀的东西。

我想在这里谈谈一个有意思的方法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问题,阶级和全人类的关系问题。这里有斯大林学派的许多混乱的东西。这一学派认为资本主义仅仅是反社会主义。但任何社会现象都具有双重性质。在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找到全人类的、一般文明的特征,也可以找到具体历史的、阶级的特征。如果从这一视角去考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问题,我们就会看到,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了一切具有全人类的、一般文明的属性的东西。如果考察一下诸如交易所、销售学、所谓的“资本主义簿记”、订购等等,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并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所专有的。这些机制具有一般文明的性质。如果我们不想死抱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类机制绝对也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运行,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其工艺技术基础的。而如果有相同的工艺技术基础,那也就应该有相同的经济生活形式。社会主义不能没有这一基础。

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全盘继承一切,尤其不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那些具体的历史现象或阶级特征继承下来。在这一点上我想引用列宁的一个著名公式。这个公式很少被人引用,但我觉得,以前之所以很少被人引用只是出于一味高喊乌拉的爱国的社会主义心情。我指的是苏维埃政权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成果这一社会主义定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准备材料中写道:“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

= 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观今天仍保留着其现实意义,它毫无教条主义的东西。这一理论见解使我们将来能够摆脱俄罗斯资产阶级改革造成的危机。

还有一系列争论问题是我要密切关注的,不弄清这些问题就很难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理论。我指的是社会主义定义的价值观问题和社会主义作为历史趋势发展的结果问题。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问题,今天基本上是由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探讨的。我想,这种社会主义观,首先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卓有成效的活动中有其重大根据。

但还有另外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学派框架内的社会主义观,这种社会主义观绝对没有过时。这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观,它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趋势的结果,这些趋势同生产的实际上的而不是形式上的社会化,同有效的民主的发展,同反对官僚主义畸形政权的政治文化斗争相联系。

今天已经很清楚,民主型的社会主义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它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竭力要实现的模式,他们力图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使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的、全然伦理学的理解。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则要克服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变形和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教条主义观点。这一模式依靠今天在中国存在着的和在我国社会新经济政策时期、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以及改革初期曾经有过的那些实际的社会主义趋势。

我想就“社会主义和市场”问题说几句话。市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还是一种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的社会进行交换和分配的一般文明的机制呢?我认为,市场当然是一般文明的机制。既然

这样,它还是要受调控的,包括受国家有意识的调控。有人向我们推荐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私有制完全占统治地位的范围内才会有真正的市场。然而,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市场是一回事,在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市场又是另一回事。这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要知道,任何一般文明的机制,不管是市场、营销学还是交易所,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可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也可以为数万个“上层人物”的利益服务。那么,这些理论家们讲到市场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要首先满足数万个“上层人物”的利益,还是要满足全社会或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利益呢?我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并无矛盾,而且社会主义并不是恢复19世纪的市场,即毫无调控的自发市场的条件。这样的市场今天在发达国家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改革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是“市场和计划”问题。人们说怀胎不能怀半个胎,应当或者是计划经济,或者是市场经济。这是什么好主意吗?从纯理论的观点看,“或者是……或者是”似乎应当是合乎逻辑的。但生活从不给予我们形式上纯粹的现象。生活总是把各种各样的矛盾结合在一起。在这一场合,生活要求的不是“或者是……或者是”,而是“是……是”,即它要求的是市场和计划的相互关系的度。应当找出这个度——这是中国改革的全部智慧所在。我认为,我国人民一旦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将要找出这个度。计划经济的反对者也许要说:在苏联,计划不是已经使自己名誉扫地了吗?官僚主义的指令性计划形式不是已经使自己名誉扫地了吗?当时在我国,简直是所有的一切,直至钉子和茶勺都由上面来计划。当然,这种计划形式我们应当抛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拒绝一切计划工作呢?社会主义的经验表明,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活动根本站不住脚,而在于要实现民主的计划工作,把计划的原则和市场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看待社会主义方面,解决一般文明立场和社会形态立场的相互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白点”。许多理论家认为,形态立场是直线解释历史过程的过时的“斯大林的说教”。与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相联系的历史进步这一思想本身也遭到怀疑。从这一立场出发,社会主义不再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异化得到克服,人和社会解放的理想得到实现)道路上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成了非历史的现象,成了一般文明的某些抽象特征的体现:灵活的技术、市场、交易所、营销学(计划的别称)、支票服务等等。从社会观点看这些特征是中性的,因而是可以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的。问题只是它们为谁的利益“工作”,是为少数人发财致富还是为全体人类的福利。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社会将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超越阶级差别和矛盾的第三种状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但事情是这样的吗?改良主义者认为是这样的。他们依据的事实是:在科技革命条件下,工人阶级似乎“消失”了,中等阶级增长到占资本主义社会2/3的人数等等。《未来的社会主义》杂志的作者之一欧内斯特·芒德尔用自己掌握的数字反驳了这些论据。根据他的意见,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中依然存在,甚至在加强。对这个问题应当作全面的客观的研究。

在方法论上很难理解一些作者的这样的观点,他们否定历史进步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更迭,是从低级向高级的上升过程。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并没有把社会进步归结为单线性的发展。在这方面,螺旋式的发展的说法较为恰当。只要注意这样一点就够了:马克思曾把历史的进步同喝被杀者颅骨里的琼浆的神像作比较。一般文明观和社会形态观是根本对立的吗?如果我们用前者取代后者,世界历史不就丧失质的规定性和多样性了吗?列宁(而不是斯大林)是把“形态”概念同一般的科学社会学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稍微谈谈“极权主义”思想。我认为,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从西方苏维埃学者那里借用了这一思想,而并没有完全持批判的态度。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纲领性声明都曾经谈到社会极权主义模式,把它当作一种制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极权主义不是制度,而是政权的体制。同一种制度,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可以有各种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如极权模式和民主模式。

在西方,甚至像 . 柯恩和 . 塔克尔这样一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不主张把极权主义视为制度的特征。根据他们的意见,这种思想关闭了进入充满矛盾的历史现实的通道,妨碍人们的视线,使人们看不到社会各种力量的斗争。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无法明白自己历史的辩证法。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列宁的传统和斯大林的传统、民主的传统和极权的传统、成就和悲剧交织在一起。揭示这部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包括现实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是当前正在痛苦地克服着自己内部残存的教条主义、趋炎附势和主观主义的社会科学的使命。

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其通向更高更进步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发展道路上要经历什么样的改革。我认为,我们还根本没有研究过那种既与官僚主义对立,也与资本主义对立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据说理论家们不承认“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因为这条道路从来没有过。但我认为,这一逻辑并没有给悲观主义提供论据。要知道许多东西都是从无到有产生出来的。

在我看来,历史在20世纪总共有过4种历史发展模式,这些模式都只部分地说明了自己的合理性。一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它在实践上提供一定的社会公平和民主,但没有提供经济效率;二是自由社会模式,它靠消灭社会公平和本来就残缺不全的民主而提供经济效率;三是国家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它提供一定

的效率和社会公平,但没有劳动人民广泛的民主和自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将成为现实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既提供最大限度的效率,又提供社会公平和劳动人民的广泛民主。这第四种模式的萌芽,我们可以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发现。这一模式基本上同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的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社会主义概念相一致。

(1994年7月写于莫斯科。 胡文建 译)

社会主义的前景

[德] 特·贝格曼

毫无疑问,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我们正处在一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深刻危机之中。这是一场关系到理论和实践、战略和策略的危机。它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发展进程和现象:(1) 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尝试的终结和苏联在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崩溃之后解体;(2) 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均向资本主义倒退;(3) 在许多国家出现国际性的右翼势力崛起;(4) 德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扩张及其在欧洲占据优势地位;(5) 局部战争和地区战争增多,更多的国家瓦解成越来越小的单位;(6) 在工会未进行有效抵抗和社会民主党屈膝投降的情况下,资本为克服双重经济危机而在许多国家发起进攻。

我们的自称是多元化的传播媒介成百次地一致宣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在终于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被现实所驳倒,它们已经完蛋了,只有(社会)市场经济,通俗地说就是资本主义才能创造面包、工作、社会福利、民主、旅行自由和人权。制度

间的竞争似乎由此而有了定论。美籍日本人福山甚至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妄谈什么“历史的终结”。

对于其视野越不出自己盛满食物的盘子边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说,这可能是受欢迎的消息。这样的历史“理解”也同样恰到好处地适合德国和美国当权者的骄傲自满和被胜利所陶醉的心态。这些当权者不想让自己的视野越出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的七国集团的盘子边,而宁愿把其余的世界——人类的八分之七——从自己的意识中排挤出去。

这里我想先作一个政治性的总结,然后再探讨社会主义替代选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很明显,任何总结都只反映当时的情况,都要受时间和地点的制约。

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总结

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早在斯大林和各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因此它们与斯大林这个人不是同义的概念——由此就揭穿了某些“历史学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号历史谎言。这个运动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了,而且即使到了斯大林早已被人遗忘之时,这个运动也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工会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运动。它们教育劳动者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体,使劳动者意识到自己劳动的价值和自身在社会中的作用,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和阶级觉悟。在迄今已持续一个半世纪的斗争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统治者的抵抗,争得了较人道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较高的工资、四个主要门类的社会保险、年度休假、较短的工作时间、得到改

善的公立学校。统治者由此也受到教育,学会了——也许并非在所有国家中都很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价值。在这种(日常)斗争中,长远目标,即对一个没有统治和剥削的无阶级社会,对全体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的伟大憧憬,被推延、背离、更改,甚至被某些社会主义者完全抛弃。早在1898年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曾断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鉴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所取得的成就,这种说法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造成了可怕的后果: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文主义和积极的战争宣传;反对1918年革命;1933年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刻分裂。

当然这里应当有所区别,因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分裂后,还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政党、个人和流派,其中既有以奥托·鲍威尔为中心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有富有战斗精神的瑞典社会党人和挪威社会党人,也有顺从资本主义的德国人,如古斯塔夫·诺斯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谢德曼、特奥多尔·莱帕特等等,这些人“如同憎恨死罪那样憎恨革命”。

对工人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的一翼就总结到这里。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派有什么成就呢?对此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地扼要列举。尽管资产阶级的传媒大肆吹嘘胜利,我们还是要列举俄国十月革命和以它为基础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尝试所取得的若干历史性成就:结束了沙皇的专制统治;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解放了农民和完成了土地改革;对不识字的居民进行扫盲;实现了一个农业国的工业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做出了首要贡献。特别是最后这一点,德国资产阶级现在想忘掉。对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人们也能列举出类似的成就。

列宁和其他国家最初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未把苏联看成是在其

他国家甚至在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而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苏联的成就及其道路的特殊性。他们把苏联所做的工作理解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第一个尝试,理解为在反革命干涉面前保卫被剥削者,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相抗衡的制衡力量。

这一伟大尝试在78年后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削弱了苏维埃民主;取消了党内民主和党内争论;剥夺了工会的权力,摧毁了抗衡国家机关和计划官僚的社会制衡力量;官僚主义化和过分的集中化;扼杀了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和党内的恐怖统治(理由是:社会主义胜利后阶级斗争更趋尖锐化),其高潮是1936—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案;非民主的、过分中央集权的计划;操之过急的、片面的工业发展;强制集体化;实际上是摧毁苏联以外的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这些消极后果是在苏联共产党斯大林化的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对这一过程还应进行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谢弗(1991年)认为,“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都屈从于一个国家官僚政治的最高当局及其领袖”,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

欧洲的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瓦解方式表明,这种社会形态早已失去了群众基础,至少在劳动群众中看来是如此。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中不再有矛盾,发展几乎是自动进行的观点,大大助长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脱离群众。千百年来的家长制统治传统、对少数派的蔑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在社会主义中蔓延。最终结果是,人们不去同各个领域的社会弊端作斗争,而去反对公开讨论这些弊端的尝试。

根据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两个主要流派完全是功过参半的成果总结,我们要问,如果没有150年的斗争,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资本家对革命的恐惧,没有迄今为止的制度间的竞争,那么资本主义

会是什么样子, 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这 150 年的斗争, 没有罢工、群众示威游行、流血战斗、革命尝试和革命, 会有统治者们如此自豪地炫耀的任何成就吗?

畸变和衰亡的原因

斯大林主义为什么能够占据统治地位, 并最终导致摧毁一个伟大的尝试, 毁灭千百万被压迫者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怀的希望? 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本身吗? 斯大林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种畸形吗? 或者原因早在列宁的新型政党思想及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作的宣传鼓动中就已经存在了? 或者原因干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 因为他们为被剥削者提出的目标是一个乌托邦?

罗莎·卢森堡(1917/18 年) 曾批评过列宁的组织原则, 这些批评现在经常被人引证。但是她也曾指出过, 由于有高度阶级觉悟和大工业经验的德国工人阶级没有团结一致支持革命——敌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对此负有历史罪责, 致使俄国革命陷于孤立境地。而这些话现在却几乎无人提起。再加上布尔什维克当时已认识到的社会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 在残暴反动的沙俄帝国中缺乏民主的经验和民主的机制。而在四年国内战争中,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曾进行干涉, 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 白色恐怖肆虐横行, 这不仅导致了针锋相对的红色恐怖, 而且还唤起了对红色恐怖的国际支持。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 党和工人阶级的精华受到惨重损失。

世界政策的隔离(对共产主义瘟疫的防疫线!)、经济封锁和禁止技术转让妨碍了建设。布尔什维克有国际经验的领袖曾期望通

过1918/19年(1923年)西欧和中欧的革命浪潮来摆脱孤立和在建设方面得到帮助。在欧洲的革命浪潮失败后,他们又寄希望于东方的殖民地民族(1920年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这些希望都没有实现,所以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及其在国外的同盟者转而采取大喘息战略,即通过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说服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劳动群众相信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

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着手实行其“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案:只依赖自身极其丰富的资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通过所谓“布尔什维克化”把各个独立的共产党降低为苏联的外交政策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内政策和派别政策的延长了的手臂。

一再被提出的各种替代的发展战略被说成是对唯一正确和不容置疑的总路线的或右或左的偏离,其代表人物被排挤、诽谤、开除、驱逐出境,最终在1936—1938年的莫斯科公审中和在世界其他地方被从肉体上消灭。为了自命为唯一的解释者,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扩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和列宁教条主义化,解释并歪曲这两个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由此就从批判地分析一切社会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南和工具,蜕变成了为一个偶然地和暂时地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提供正统性证明的“科学”。反题被禁止了,向合题的更高发展由此而受到阻碍:马克思主义僵化成为永恒真理的总汇。只有在各种不同的方案和思想都允许存在并向党员们公开的情况下,才会有真正的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人们能够权衡论据和纠正错误。没有所谓的“偏离”,也就不会产生出明智的、具有一定连贯性的总路线,而只会出现无原则的人云亦云,频繁的急转弯,从上面发号施令,不开展讨论,也就是说,不是开动脑筋想问题,而只是一致鼓掌通过,而实际上行得通的和真正被付诸实施的却越来越少。

共产党的蜕变

在向所谓通过布尔什维克化而变得能够胜任革命任务的“钢铁般坚硬的、坚如磐石的党”的转变过程中,各国共产党僵化了。最初,共产党是吸引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富有战斗力和牺牲精神的最优秀分子的磁石。他们表达阶级的利益和目的,取得阶级的信任和领导地位。1921年,总书记斯大林开始向15000名高级领导干部及其60000名家属分配特权,一个新的阶层形成了,尽管这是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出来的。在过于急促的工业化过程中,这个阶层又加进了新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经理。真的如吉拉斯(1976年)所说,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新阶级吗?

随着过分集中的、非民主的计划经济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虽然一直保持,但是新官僚决定着剩余价值的使用,而生产者面对计划官僚却不再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机构。这长期以来导致了生产者疏远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企业——也许对于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制度而言,阶级的概念必须另下定义。

党和国家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党作为思想先驱的监督和领导作用逐步消失。党从先锋队和榜样变成了封官许愿的首领和特权的分配者,逐步脱离了劳动人民。等级制度导致老人政治。当邓小平比现在还年轻15岁的时候,他(1980年)称这种现象为“我们的制度的困扰之一,它的弱点之一”,说这是一个体制上的缺陷。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和米哈伊尔·谢·戈尔巴乔夫分别从

1954年起和从1985年起开始的改革尝试,均未得到特权集团的支持,相反却受其干扰并最终受阻。当苏联共产党面临挑战的时候,它表现出不再具有主动性。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曾致力于使党年轻化和重新焕发活力,但是他的努力始终未见成效。这个所谓坚如磐石的党瓦解成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特权集团的领导层在1991年8月曾试图发动一场蹙脚的政变;鲍里斯·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在反共反民主的波涛上戏水,于1991年12月举行了一场成功的、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的政变。在占据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大国的鼓掌喝彩下,他们未征求人民的意见就解散了苏联并要求引进资本主义,因为据说资本主义能比戈尔巴乔夫的战略快得多地迅速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因公开性和改革而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逃避伟大的任务。党员群众(在退党浪潮开始前有1800万人)或者退党,或者心灰意冷,消极顺从地接受了对党的禁令。

在其他许多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事情的进程也大体类似。但是这一进程却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北朝鲜和古巴出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社会党瓦解了,其中十分之九的人成为退党者、听天由命者、倒戈者和看风使舵者。其余的十分之一又是由几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无法理解这场崩溃的老战士;一部分是无可救药的斯大林主义者;还有一部分是有求知欲的党员,他们愿意参与塑造一个自我更新的社会主义。

暂时只能列举出这一蜕变过程的若干要素和表征,其余的还有待研究。这些要素和表征是:削弱党内民主;共产国际建立时各党力量不平衡,苏联共产党占优势;为捍卫党的统一和维护苏联而制定的过分严厉的党纪正好用来约束提出替代选择方案的思想家;党的偶像化;党和国家的紧密结合;一个物质上享有特权的党的机关的形成和划分为彼此隔绝的不同工作部门;苏联以外的缺乏独立性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屈从与驯服,放弃积极的、有批判意

识的团结。

社会民主党人的以改良为宗旨的方案遭到失败或者挫折的原因何在? 在于放弃一切长远目标, 在于退缩到只做“可行的事情, 能争取到多数同意的事情”, 在于容忍资本主义社会。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时候, 切不可忘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道路的消极后果。

什么仍继续存在

正如开头提到的那样, 资产阶级对世界的新看法是很简单的。它无视共产党执政的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继续存在, 无视越南(6500万人口)、北朝鲜(2100万人口)和古巴(1100万人口)继续存在, 无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在许多国家继续存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譬如意大利、南非、印度的两个邦、菲律宾的共产党。所有的共产党都处在痛苦的转变过程中, 有些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所有那些满怀希望地转向资本主义的国家, 在从“现实社会主义”向现实资本主义过渡时都遗留下一大堆问题。在立陶宛、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前民主德国, 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后社会主义的危机。在这些地方, 反资本主义的政党有的再次接过了政治领导权, 有的重新赢得了较大影响。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的问题继续存在。此外, 人类的绝大多数(八分之七)所居住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还存在。

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先从日常的和眼前的,但又常常被人故意忽视的问题谈起。

人们谈论福利国家和三分之二人的社会,言下之意是说这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得同样好。其余三分之一的人被隐去,被边缘化或者说被排挤到边缘,被尽可能置之不理。然而这个群体却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成长。三分之二人的群体正趋向于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他们中巨大的收入差距和由此造成的生活境况的差别却无人提起甚至根本没人正视。因此,三分之二人社会这个词是一个委婉语,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掩饰。

住房困难现在由于数十万国内移民和国外移民的涌入而加剧了,但它绝不是由这些移民造成的。持续几十年之久的住房困难再次证明,“市场经济”绝没有解决一切问题,哪怕只是一切物质方面的问题。

尽管还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任务尚未解决(住宅建设、护理服务等),但却有数百万人长期失业。这造成可观的潜力闲置,导致自暴自弃、麻木不仁,最终导致道德沦丧。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大城市中的贫困我就略而不谈了,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只提一下生活环境的野蛮化(暴力、刑事犯罪),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是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人被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去,也是由于缺少一个能把被分离者纳入阶级斗争并向他们显示团结的有活力的工人运动。人民群众日益加剧的贫困化、缺乏光明的前景和对未来感到恐惧,这些都是以工人运动及其文化组织的虚弱无

力为条件的,它们使劳动人民如资产阶级所希望的那样分裂涣散,导致了那种首先是在美国的大城市中广泛蔓延的生活条件的野蛮化。统治者及其传播媒体的反攻倒算是针对着一切已实现的和通过斗争赢得的价值和权利。目前他们正在强化对所谓“健全家庭”的宣传,把它说成是克服危机的手段,以此向妇女解放宣战。

如果人们谈论三分之二人的社会,那么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们就不得不谈论十分之一人的社会。在那里,十分之九的人不得不在非人道的环境中生活、工作并且经常乞讨。显然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也没有解决这些社会经济问题。

如果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发达工业国中三分之一的低收入者,那么这个所谓如此卓有成效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创造了一个八分之一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如资源集中,不公平的贸易条件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被积累到了区区几千个百万富翁和区区几百个大跨国公司的银行帐户中。

关于全球性问题我只提以下几点:(1)人类的八分之七处于不发达、饥饿和文盲状态,生活条件方面的鸿沟呈不断加深的趋势;(2)资源以低廉的价格转移到工业国,在发展中国家滥采和滥用资源;(3)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4)人口膨胀;(5)环境污染和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垃圾。

因此,我们远非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和经济井然有序的世界之中。至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在众多国家中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集中营、大规模地消灭德国的和欧洲的犹太人——和“常规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和社会文化后果,我还根本没有谈及。

对所有这些全球性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回答,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多种答案——资本主义的答案和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答案。

社会主义的出路何在？

“现实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和统治模式不是社会主义，这种模式绝不符合发达工业国和自觉的工人阶级的条件，在后来的若干年中也明显地不再符合东欧和苏联的劳动人民的能力、需求、愿望和想法。可是，这些国家的斯大林分子及其追随者却断言——与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者的说法相同——这是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的现实存在的道路和合乎逻辑的结果。他们阻止一切可作为替代选择的社会主义思想。斯特凡·海姆在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之后指出：“现在得到报应了，这些伟大的老人们把每一个有可能接替他们的有才能的人都砍了头。”

然而，还是不断地有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方案出现，我们迄今为止恐怕只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反对斯大林的有布哈林、托洛茨基、柳亭等人，他们在1936—1938年莫斯科“大清洗”的圣巴托罗缪之夜被杀害了；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反对诺沃提尼的有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在德国，1928年反对恩斯特·台尔曼及其极左集团成员的有克拉拉·蔡特金、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海因里希·布兰德勒。这些不断提出的替代选择方案驳斥了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道路是不容置疑的唯一道路的论断。

因此我的论点是：斯大林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不是同义语，而且还是后者的一种畸形和讽刺画。斯大林主义在革命运动中取得暂时优势的理由和原因还应作更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所作的分析不可能十分详细，只能点到为止。

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斯大林模式曾克服了某些初期阶段的

社会经济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尽管有斯大林,而不是由于有斯大林——但是在其他领域却又照搬了资本主义的错误。

迄今为止,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者——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榜样——拒绝描绘社会主义未来的蓝图。但是现在,在斯大林主义被完全敌对的力量宣布为唯一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模式之后,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制定一个既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同时又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草图,不是作为虚无飘渺的乌托邦,而是以现实和历史经验为根据,同时充分考虑到我国既定的起始条件。因此,任何一种模式都必须是适合特殊国情的和不能照抄照搬的。假如没有这种社会主义的对应模式,那么历史恐怕就真的终结了——可那是什么样的终结呀!然而,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开放的进程,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召唤共同参与和塑造这一进程。

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些重要的“基础价值”应当简要地提一下:(1) 通过没收经济的关键性部门来排除资本家及其康采恩寡头的已转化成为政治权力的经济权力。这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他成分和经济部门不实行国有化,而实行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共存。“占据经济的关键性部门”就足够了(布哈林);(2) 以此排除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的私人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3) 在劳动和经济生活中也实行民主——从企业直至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由此将成为这样一个机构,在那里,自动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其中也包括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行协商;(4) 民主的经济和社会计划还应包括对原料和能源的实物结算和设立一个对工艺技术的后果作预测性评估的社会机构;(5) 节约使用一切原料和自然资源。在发达工业国,目标是消除贫困和使一切都过上体面的生活。人不再是单纯追求消费的人,而是承担社会义务和全面发展的人;(6) 通过扩大面向所有人的教育机会、改善社会保险、消除失业、保障劳动权和住房权、扩充和改进社会服务业,实现生活水平质量上的提高;(7) 国家与教

会分离, 国家与政党分离;(8) 对国家机关和管理机构保持强大的制衡力量: 独立的工会、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机构;(9) 保障一切领域的公民自由。也要在而且尤其要在革命政党内实行民主, 并实行多党制;(10) 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团结一致, 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

我们需要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不同的另外一种辩证的历史观。斯大林主义谈论社会的规律性, 声称由于这种规律性, 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将不断成长壮大, 将变得日益强大和巩固。这甚至也导致了“领导们”的自我欺骗。但是社会规律的作用方式与自然规律不同。社会规律是由被组织在社会群体和阶级中的人来实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作用和反作用, 相互斗争, 经历失败, 赢得成功和胜利。我今年79岁, 已经多次经历过德国资本主义如何大肆吹嘘它的所谓最后胜利和吹嘘最终消灭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后来发生的灾难我也都挺过来了。因此, 此类吹嘘完全是装腔作势。

在斯大林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把现实社会主义宣布为唯一可能的模式之后, 目前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很少。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地用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替代选择方案, 用一切离经叛道者和改革者来描述真实的历史。只是通过这些离经叛道者、批判的分析家, 总路线才得到检验, 它的错误才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合理的政治路线才得到保证。没有离经叛道者就没有正确的总路线。

令人自豪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当初千百万被剥削者的希望,

如今瓦解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几乎所有的党都一个接一个地先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策略原则,继而又抛弃了共产主义的许多基本准则。保留下来的是对这一个政府或那一个政府的或多或少的忠诚,而这种忠诚也得到了物质上的回报。保留下来的是执政的共产党内的一个由飞黄腾达者和享有特权者组成的特殊阶层,而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后来却暴露出是看风使舵者和倒戈者。

对能够“彻底改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抱的希望,在20年代(列宁去世后)反对斯大林主义化的斗争中曾鼓舞了许多有批判精神的共产党人,并促使他们尽可能地保持与共产党的亲密关系,现在看来这一希望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为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只是少了一个希望,同时又补充了一些重要的教训。斯大林主义的最终失败既未给德国式的改良主义增光添彩,也未勾销它的历史性失败。至于这个运动在革新之后可能将给自己取什么(新)名字,这不是今天在这里所能决定的。我认为紧迫的理论任务是:(1)公开地、毫不留情地清算斯大林主义,弄清它的原因和后果;(2)阐明替代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和改革意图;(3)对当今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变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4)勾画在发达工业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草图;(5)发展社会主义的群众文化,以此作为在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现在和未来而进行的斗争中开展自我文化教育、废除性别等级制度和提高生活乐趣的媒介;(6)制定现代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

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和一个新的国际不是根据某些先驱思想家的愿望和决定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群众的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劳动者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需要有人指明未来的方向。准备工作现在就能够开始而且必须开始。

为祖国，为人民

〔俄〕根·久加诺夫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95年1月21日)

1

同志们!

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我们——当代俄国共产党人,需要回忆和思考的是: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

我们来自为了人民和祖国,为了祖国的独立,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光大而贡献出优秀儿女生命的党。我们来自粉碎了法西斯并冲向宇宙的党。我们来自在任何命运打击下都不曾屈服,也

根季纳·久加诺夫:俄共中央主席,俄联邦国家杜马共产党党团主席。

永不会屈服的党。在这个党的行列中有过斯达汉诺夫和加加林,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潘菲洛夫和朱可夫,科罗廖夫和库尔恰托夫,有千千万万真诚的共产党人——劳动者和爱国者。

然而还有另一个党——背叛民族的官僚党,托洛茨基和弗拉索夫的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党,始终把俄国看作自己的猎物的党。今天这个党除去了假面具,同犯罪的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摧毁了苏维埃国家,企图大权独揽、不受监督地统治国家。

我们主要的历史错误和历史过失在于我们与这个背叛的党在表面上统一的组织里共处太久,未能及时与之划清界限,给予回击,让它大权独揽,给人民和国家造成如此痛苦的折磨。

今天在尝到轻信、粗心及政治意志薄弱的苦果的时候,共产党人不得不在不容喘息的非常状态下立刻解决多种任务:恢复,而实质上是重建党,思考历史教训并制订未来的纲领,抵抗反人民政权的行动,为了俄国及其各民族的生存展开殊死的斗争。

在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后的两年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走过了漫长的斗争道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俄共克服了遭取缔、禁止阶段中的困难,在短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中央及地方组织机构的活动,壮大了队伍并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在立法机关中,在地方的执行权力机关中俄共拥有众多的代表。

今天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已拥有88个自治共和国、边区、州党组织,2000多个地区及城市党组织,约2万多个党的基层组织,50多万共产党员。

做了不少理论工作。制订了有许多新内容的党纲草案,准备提交代表大会讨论。

党保持了自己的面貌,坚定地捍卫着共产党人在重大的国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党力求成为创建国家爱国力量联盟的联合基础。

党的声音越来越宏亮、坚定。掌权者、国外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开始听取我党的声音。

然而,指出这一切,我们是否可以感到满足呢?当然不能,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完成主要任务——未能哪怕是中止国家滑向今天反人民政体所引向的深渊,未能使政权脱离这个制度。只要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对祖国就负有重大的职责。

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国家所发生的毁灭过程的实质和内容。

我们必须以最宽阔的视野来考察这一问题:今天的问题不仅仅是,甚至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解构问题,而是有目的地破坏俄罗斯精神、整个国家观念的基础的问题。今天甚至不是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建设俄国,相反是,利用利己主义的自发努力去摧毁伟大的欧亚强国,这一强国正以其存在本身阻挠“世界新秩序”计划的实施。

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立足于“三大支柱”:保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人民,保护居民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从这一角度看一看今天的俄国。

领土:国家倒退了400年,退回到16世纪的疆界,丧失了数百年发展的成就,失去了通往国际贸易道路的出口。生命攸关的重要的国际经济联系遭到了破坏。

数千万同胞留在俄罗斯联邦之外,成为二等公民。在从未有过边界并且也不需要边界的地方设置了关卡和海关;而在需要的地方,却又根本没有关卡和海关。

作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机体的俄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其单个的成分,这些成分在法律和组织关系上联结薄弱,行动上互不协调。存在的只是原先充满生机被弄得支离破碎而现在的经济机制的相互脱节的环节。存在的只是众多的领土构成物,它们越来越处在追求自身狭隘利益的地区及部门“精英”的影响之下。

人民:1993年出生率已经降为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3人,而

对于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来说,出生率不应低于2.1人。平均寿命降为65岁,比发达国家低10至15岁。

去年年底最低养老金仅为维持生计所需最低数额的一半。价格令人难以置信地飞涨。只有伏特加酒是个例外——同面包相比跌价八分之一;人们有意把酒精麻醉同精神麻醉结合起来。民族的健康遭到损害。患病率,首先是先天性疾病的患病率大幅度增长。健康儿童只达14%。

过去所有的苏联及俄罗斯公民都享有有保障的劳动权、免费教育及免费医疗权、妇女与儿童的保护权以及很多其他权利,但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使一小撮买办发财致富的牺牲品。

就一般居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而言,最近三年已达到公认的种族灭绝的地步了。

生活方式:自古以来我们的同胞就生活在公社的世界里,生活在同志互助和集体主义的氛围之中。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摧毁人民生存的这一基础,遏制人们相互交往的可能性。

交通费用梦魇般地飞涨,以致人们在安葬亲人时都无法见上一面。

犯罪猖獗——人人缺乏安全感,只好靠铁门和铁栅栏与世隔绝。

发放私有化证券——请坐着并紧紧抓住丘拜斯的两辆伏尔加轿车”,防备对手。

人们丰富多采的交往越来越被唯一的电视机所取代,它告诉大家:俄国历史是由一系列错误和罪行组成的一条无意义的链条,大家白活了这么多年,谎言和欺诈是道德的基础,犹太才是人和公民的理想典范。

为了使国家的崩溃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在国家的地基下安放了无数有巨大破坏力的“地雷”。以下就是其中几种:

社会地雷——按收入计算,10%最富有阶层和10%最贫困阶

层的社会分化达到23:1的比例,这超过社会所能容许的极限的若干倍,随时都会引起爆炸。

法制地雷——今天我国任何一个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无法无天状态再加上实际权力系统的混乱无序,可控制性大大下降,唯一的手段只有专横与暴力。

地缘政治地雷——丧失了自然疆界和通往不冻海的可靠出海口,国家也就丧失了国家的独立性,其各地区,首先是原料产地,早晚将被纳入另一些经济联系体系并分立出去。

工艺技术地雷——工业固定资产的损耗越过了可容许的警戒线。生产衰退随时都会酿成可怕的灾难,甚至还会造成全球性的后果。

粮食地雷——国家实际上损失了自身拥有的保障居民食物所需的后备。农工综合体的破坏使得国家完全依赖进口。

生态地雷——所有国内战争时期的疾病——伤寒、霍乱、白喉、疥疮今天都在俄国死灰复燃。老师们说,没有一个学校没有虱子。与此同时,医疗保健遭到破坏,首先是组织良好的预防及保健服务体系、国家药业基地遭到了破坏。

所有极端重要的社会领域都失去了平衡,实际上面临着崩溃的危险。简而言之,形势是罕见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记载过的。

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这里扮演了第一推动力的角色。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到此为止。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甚至不像原始资本主义。这里需要另一种定义:偷光、卖光、分光、支解国家、分裂人性。

历史类比有助于对形势的思考。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年人们如何把莫斯科周围被条顿人及蒙古人入侵所毁坏的一小块俄罗斯土地集中在一起;16至17世纪混乱时期克服灾难的缙绅会议实践;彼得大帝打开“通向欧洲的窗户”;大臣戈尔恰科夫提出的著名

的 俄罗斯在集中”；1917 年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崩溃后恢复了国家统一，实现了经济上的强盛；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后迅速恢复元气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此类情形尽管存在历史的和社会的差异，但从中仍可看到某种共性：

第一，摆脱危机的出路具有稳定时期的一些特点：采取能动员社会所有潜能的机制，优先关注促使社会健康化及民族复兴的国内问题，尽量合理地减少国家对外部事务的积极性。

第二，把全民的和全国性的利益置于明显的优先地位。每一个时代进步的社会力量都是始终存在的，它们的活动非常充分、彻底地体现了这种利益。其领导作用能够团结多数人民，唤起并把多数人民的能量集中于最主要的着力点上。

至于今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国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同争取民族国家的自我保存的斗争相联系的。而且客观形势是：这种斗争是同共产党人争取真正的人民政权和社会公正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由此我们得出对近期及长远任务的认识。

2

无论按次序，还是就实质而言，首要任务就是唤醒并团结人民及其各社会阶层，建立真正的爱国力量联盟，同民族的、国家的灾难作斗争。

正如我们在纲领草案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在救国事业中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同盟者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中派与具有彻底民主主义色彩的各种政党和运动，工会，工人、农民、妇女、老战士、青

年、企业界、教育界及创作界的各种组织。还有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及各种教派的宗教联盟。

综上所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的总的目标。它简单明了:

——捍卫俄国的国家完整及俄罗斯人民的统一,而这本身又提出了自愿恢复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必要性问题;

——不仅实现经济健康化,而且要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就基础上达到质的突破;

——保护民族的体魄和精神健康,捍卫人民生活方式的传统价值观;

——恢复国家的法制和法律秩序;

——保障社会的国内和平,保障每一个院落的安宁和安全,保障每一个家庭的福利。

实现这些目标的决定性前提是不让目前的反人民政制继续掌权。

现在俄国以及国外任何一个稍微严肃的政治家,都不敢把这种政制叫做反映国家多数公民愿望和意志的“民主”政制。这是个人篡权政制,它依靠的不仅是军队的刺刀,还有专为此建立的强力机构的刺刀。这是一种增强恐惧,强化政治恐怖,压制公民民主权利与自由,消灭社会既有社会成就的制度。

此制度运作的利己主义的主观逻辑很清楚:由于自身在政治方面很虚弱,所以在悄悄进行的国内战争进程中,它企图借助于从肉体上摧毁社会脊梁和取消重要的政治设施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今天的反人民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如果让它在和平的、非暴力发展及法制稳定的条件下运行一段时间,那么它将很快被反对派所扫除。实质上,全国都是它的反对派。

当今的廷臣之所以能够掌权,依靠的只是强化专政。这就需要新的冲突和社会动荡作为这样做的借口。主要的危险在于,

每一轮新的冲突拖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凶残,把越来越多的民众卷进其流血的漩涡。

因此,一切希望避免民族灾难的人们,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应该一致努力,去保障我国人民有一个和平的未来,有一个自由和自觉地解决自身历史命运的机会。

对俄国共产党人来说,早在这种制度产生的时候,就对它的本质及其统治的未来后果有了清楚的认识。他们始终不渝地反对这种制度。

我们当时就曾说过,宣布俄罗斯联邦的主权高于联盟是危险的疯狂行为,它必将导致苏联的解体,然后是俄国的解体。

我们反对实施总统制。我们证明,在多民族的联邦国家中它根本不是稳定的因素,而是无休止冲突和专横的源头,是加剧毁灭过程的因素。

我们曾警告,休克疗法的方针将会导致空前的经济崩溃。

所有这一切都是早在党的二大以前说的,那时共产党刚刚再生,正在为恢复自身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党在总结时期也充分开展了反对反人民方针的斗争。

实际上在整个1993年,刚刚站立起来的党组织都致力于保卫苏维埃。

如果说苏维埃三月份竭尽全力成功地击退了来自总统机构的进攻,那么在流血的十月,最高苏维埃遭到炮轰则是俄国历史上人民政权遭受的最大失败。它表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是最彻底的民主的拥护者和捍卫者。

顺便说一下,早就该恢复民主这一概念的本来意义了,纯结这一概念,消除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及其走狗的肮脏魔掌给其加上的污秽。

可以说,正是1993年10月以后,我们才完全明白,什么是“反对党”。

最近两年我实际上走遍了全国。无论我走到哪里,到处可以看到我们党的同志在忘我地工作。他们在没有机关,甚至没有办公场所,没有组织装备的条件下,诚实地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公民天职和爱国义务。这就是她——真正的人民的党,献身者的党,奋不顾身者的党。参加这个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良心的召唤。在这个大厅里我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衷心感谢你们,同志们!感谢全体党务工作者、普通共产党人、我们的支持者及朋友们!

党在艰难的条件下学习,掌握政治斗争的各种形式和方法。1993年10月党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参加联邦议会选举的异常艰巨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清楚地懂得,在目前政制框架内建立起来的议会实际上是没有权力的。其立法权受到执行权力的双重制约,并且没有用对执法及政府活动的监督的功能予以加强。

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可以确认,参加选举的路线是正确的。在竞选过程中检验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加强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因为拥有超过10%的议席,共产党对议会的工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我们带着恢复法制和消除国家政变后果的明确纲领来到了议会大厦。去年4月召开的全俄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保障国内和平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纲领。我们那时候就曾说过,而今天则可以断定,这是取代所谓“社会和睦协议”的唯一现实的选择,该协议只不过是总统独裁制的遮羞布而已。

甚至在强加于国家的叶利钦宪法的狭小空间里,我们也尽最大可能去恢复和捍卫人民政权。这里指的首先是修改宪法中一系列条款,以加强议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专横和不负责任,尤其在最近几个月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证明全部宪法都应该修改。

正是循着这条路子,我们竭力争取刻不容缓地通过杜马选举

法、联邦议会产生法、总统选举法、全民公决法。其中的三个法律已通过一读。很显然,应该考虑一下再通过一个法律,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对这个法律的需求。这就是关于有权通过新宪法的立宪会议法。

共产党并不仅仅从立法的角度从事自己的议会活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联邦议会还是一个讲坛,还是从培养干部的角度加强党组织的手段,是使党的干部取得治国经验,始终把握国家脉搏的大学城。没有这样的学校,所有关于上台执政的谈论就都是毫无内容的空谈。

共产党议员在各选区、各劳动集体的积极活动及其在群众中的工作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一年来他们的足迹实际上遍及国内每个地区,向人们说明当局执行有害政策的真相,帮助组织群众去对抗现政权。

3

这意味着议会活动与议会外的斗争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缺了议会外的斗争,我们的活动是根本无法设想的。我们党一如既往坚定地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事变的转折关头,当政权转向公开的独裁和镇压的时候,群众的各种行动方式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议会选举的经验被运用并推广到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中。地方选举表明,群众的情绪明显地向左倾。在共产党人行动协调一致,联合了所有的爱国力量,对遵守选举法施行了有效监督的地方,他们几乎总能获得成功。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公开宣布自己的党派的当选代表中,共

共产党人占46%。甚至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今天反对派力量在多数地方杜马和议会中占据了优势。“红色地带”越来越紧地缠绕着莫斯科,从南方延伸开来,越来越向东伸展。

受二大的委托,中央执行委员会一直关注着废除别洛韦日协定及恢复革新后的苏维埃各民族联盟的问题。我们不止一次地在杜马、兄弟党的会议、第一届和第二届苏联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就此发出倡议。

当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恢复统一国家的道路并不平坦。从日益迫近的俄国的解体来看,这就显得更加清楚了。车臣事件是新的高加索战争和波斯尼亚式的斯拉夫—穆斯林对抗的策源地,是破坏全俄统一的又一步骤。

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你们是清楚的。我们坚决要求双方停止战争行动,进行必要的谈判并调查这场罕见的屠杀的原因。

我们承认各民族有选择自己命运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认为瓦解和分裂国家的企图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相信自己同胞的理智。俄国应该成为统一的国家,其中各族人民的利益将得到可靠的保障。

我们认为车臣的冒险行动是反对军队及其他强力机构的又一次挑衅行动。军队再一次处于受打击、遭侮辱的位置。我代表所有共产党人声明:我们相信军人们将会忠实于自己对人民的职责。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捍卫祖国保卫者的荣誉。

帝国主义集团渴望与支离破碎、元气大伤的俄国打交道,这已不是秘密。为此他们准备采取任何冒险行动,直至在“维和”或保护核武器及其他潜在危险品生产的借口下把外国军队开进俄国领土。今天在国外和“第五纵队”中只有这方面的一些迹象,然而明天这些迹象会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爱国主义,使祖国免遭分解与毁灭的思想,今天就不仅是对内政策的,而且也是对外政

策的方针。

为此,我准备较为广泛地谈谈我们对俄国的国际地位及整个世界形势的估价。各社会主义国家危机进程的发展也给国际局势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遭到破坏的不仅有苏联的国家统一,还有四十多年来的国际和平所维系的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平衡。取代国际关系两极体系的不是幼稚的政治幻想家所常常幻想的多极体系,而是意味着美国全球统治的单极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实际上被修改了。关于全欧大厦的神话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叶利钦—科济列夫的对外政策方针不是建立在对当代国际生活的客观实际作冷静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宣传的乌托邦基础之上,而我们的西方“伙伴”自己从来就不曾相信,现在也仍然不相信这种乌托邦。俄国实际上失去了所有的盟友,失去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提请人们关注俄国利益的胆怯尝试被粗暴的呵斥所打断,就如不久前在布达佩斯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另一方面,俄国当局在国内事务方面的冒险主义及其行动难以预言等情况把我们的中、东欧邻国推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怀抱。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提出的国际政策方面的建议有两个根本目标:恢复苏维埃各民族的国家统一和国际关系全球体系的民主化。

新的国家对外政策将是回到捍卫民族利益上去,在世界各地恢复传统的盟友关系,与所有为反对“世界新秩序”政策、捍卫自身国家主权的国家和民族恢复国际主义团结。

最近战争重新成了国际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因素。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与国际合作的理想仍旧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今后仍将致力于把战争从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中永远清除出去。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础,今天仍保存着自身的价值,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同志们!

现制度的反人民方针同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有很大关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声明,叶利钦的政策及其个人行为损害了我们伟大人民的尊严,是对千百万苏联人为人类的解放而付出的牺牲的侮辱!

正因为如此,党不得不发起征集公民签名,要求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不延长现联邦议会的任期。人们响应这一号召。从1994年9月21日至12月21日三个月时间内,有3106000人在这一要求书上签了名。这个数字超过了俄联邦全民公决法规定的必要数字2倍,也超过了关于全民公决法的总统草案所规定的必要数字0.5倍。

这就是真正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向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工人和农民、我们的知识分子、老战士和青年们表示深切的谢意,谢谢你们参加这次民意测验,亲爱的朋友们!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党杜马党团根据这一结果声明,叶利钦无权不考虑居民的意愿,应当下台或提前举行大选。否则,我们将保留要求根据所有国际人权法案所定的规章举行全民公决的权利。

然而假民主派竭力利用极端尖锐的政权危机,特别是车臣战争引起的危机。这很能说明为什么他们表面上奇怪地转过来猛烈抨击其自身的专横的可耻做法。

很多情况表明,执政阵营内部力量重新组合的阶段已临近结束,一批政要人物正准备登台。他们的基本战略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地(包括赶走目前的领导人并动用武力)保持买办阶层所攫取的财产和政权。

执政集团内部派系之争迫使其采取混淆公众视听的措施,例如断言现政府具有联合性质。

为此我们再次重申,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全会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只要保留现今反人民的方针,就谈不上共产党人参加对摧毁我们伟大国家负有罪责的政府。现政府不是联合政府,因为联合是各种政治力量协调的结果,而不是这些或那些人的个人决定。所以当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杜马党团成员、无党派人士·科瓦廖夫同意出任部长时,他就被从共产党党团中除名了。

只有在改变方针并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的前提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在与各党组织及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磋商后才能作出参加组建这种政府的决定。

肆虐国家的体制危机之所以叫做体制危机,是因为它无一例外地摧毁了整个生活领域并且已达到使摧毁过程不可逆转的地步。人民信任的政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使经济健康化。为此首先必须正确地作出判断。

说目前的经济方针具有毁灭性是不够的。应该懂得,这种吃人的方针是合乎逻辑的并且是现实的,它追求一种明确的、有潜力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目前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而这一组织过去和现在从未从事过在受其监管的国家建立有效的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的工作。其真正目的完全相反——建立一种既背着巨额外债,同时又能支付利息的经济。实现这个目标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是不感兴趣的。

为证明这一点,我们暂且停一下去看看另一些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处方经过了“健康化”的全疗程。

例如,委内瑞拉人均收入曾一度为拉丁美洲之首。它在世界石油输出国中曾占重要位置。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后,委内瑞拉的外债从1980年的29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350亿美元。并且十年内仅利息一项国家就不得不支付310亿美元。此外,在此期间资本输出(包括非法资本输出)估计有350亿美元。

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秘鲁。众所周知,一个人所需的食品热量大体在最低量的2400卡与合理量的3500卡之间。1970年秘鲁的此项指数为2300卡,1980年为2000卡左右,1990年则更低。最贫穷的居民阶层1991年仅800卡,比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还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舍利·康德苏对秘鲁的状况发表如下见解:“我们认为,秘鲁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这对全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纲领。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模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纲领不能在‘同贫困斗争’的借口下有所改变”。

这里使人不得不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林顿·拉诺斯针对所有这些弗里德曼们、哈耶克们、萨克斯们及货币主义其他“中坚们”所说的话:“自从经济学领域设立诺贝尔奖金以来,获奖的只有那些在这一领域完全外行的著有‘卓越作品’的人,并且是在由于忠实于该学说而造成的民族灾难证明了其确实外行的时候。”

上述结果是不让公众知道的,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活动家的弟子们——盖达尔们、费奥多罗夫们、丘拜斯们及亚夫林斯基们是不会不知道的,然而他们有意使民众对他们“改革”的实质产生误解。

他们从1992年起所实施的社会经济方针造成了国家的全面崩溃。国民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所有的生产指数、生产效率、俄国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都倒退了几十年。

1995年的预算草案继续执行“紧缩的信贷金融政策”。其实际开支缩减了一半。实际上让农民、矿工、军工企业、军队、科学、教育以及整个社会领域听任命运的摆布。工资和养老金指数一年只审核两次,而且物价上涨的指数高于它1.4倍。商品生产者受到税收的重压,实际上俄国市场在被摧毁。

因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杜马党团投票反对今年的预算草案,同时也表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

据说,除了西方善人给俄国规定的道路外,别无他途。这是谎言!存在着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能保证摆脱危机局势的另一种选择,然而被政府抛弃了。

我们提出什么建议,有哪些要求呢?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而只是遵循常识和最起码的计算。

首先,必须根本改变货币信贷政策,予以大幅度放松。不顾我们的劝导,国内的货币量今天已压缩到难以想像的地步。流通中卢布的不足以俄国经济的全面美元化来弥补,也就是说俄国的经济活动被用于支付美国的内债。据现有估计,市场流通着大约1000 亿美元现金,而这相当于400 万亿卢布,几乎等于3 年的预算。150 万亿卢布是不能支付的。所有这一切都致命地打击了企业的流通资金。正是企业流通资金不足造成了国民经济联系的相互脱节。

第二,要求根本改变税收政策。必须免除或大大降低实际商品生产者的附加成本税,因为附加成本税是激化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从总体上说,今年对生产的税收压力就应该至少降低15—20%,而在最近几年内下降幅度应不低于一半。否则所有国内企业实际上都将崩溃和破产。

第三,应该整顿国家的对外经济活动。根据杜马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核算,这将使预算有可能获得约80 万亿卢布。

第四,应该切实保障国家对酒类产品、烟草及其他某些产品的专卖权。所有这部分收入应该用来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需要,而不是让投机商发财致富。

第五,出发点应当是,认定所谓私有化完全违背公众利益,并且粗暴地破坏了甚至现有的法规。把俄国的全部国家资产评估为相当于3 兆美元,这是个荒唐可笑的数字。

我再说一遍,这是能为稳定创造前提、实行有利于人民的真正的经济改革的最起码的措施。改革是必要的。党相信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决不希望机械地照搬已走过的道路。我们的口号不是后退到社会主义,而是前进到社会主义。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纲领草案的主旋律。

4

制订党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我只讲一下这一过程的某些路标。

党的二大通过的纲领声明是初步接近目标的文件,其中很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被正式提出,而另一些重要的问题也只是用省略号标出。一年后公布了制订纲领的提纲,俄共第二次全俄代表会议通过了此提纲作为继续制订纲领的基础。

下一步是去年10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这次全会上研究了新的方案,其中确定了极端重要的“完善点”。全会认为需要把这一草案提交党组织讨论,同时责成纲领委员会继续文件的制订工作。

因此,纲领的讨论和制订在同步进行。我想满意地指出,讨论进行得异常活跃。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到了数以百计的党的会议、全会和代表会议提交的决议以及个人的书面意见。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看法,草案被作为基础接受了。纲领委员会考虑了共产党员递交的意见和建议,其工作并不局限于对现有文本的编辑加工,而是对文本作了重大的概念及结构性的修改。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就是作了很大更改、在激烈的辩论中形成的文本。

关于纲领委员会及其各工作小组的活动的详细通报将发给大家。我想报告一下作为俄共纲领制订和修改基础的主要的原则和思想。

首先,我们尊重讨论中所发表的各种观点,但我们的出发点是,党的纲领不应是党内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有时还相互对立的观点的某种折衷的东西,而是对严格确定的事实作出科学分析的产物。

其次,要使表述通俗易懂,但不能把考察的问题的实质简单化。有时对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极其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给予简单的、大家能立刻理解的答案。应该仔细地研究纲领。

第三,共产党人的纲领不应该建立在空泛的理想上(不管这些理想是多么诱人),而应该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及共产党人为了劳动者、多数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掌握这一客观趋势的基础上。

例如,关于“什么好一些”,是完整的公有制好还是多种经济成分好的无休止的争论,有时很令人懊丧。因为如果不去分析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什么样的工艺结构要求适合其自身的公有制形式并保证其胜利,这种争论就是经院式的,是不会有结果的。要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新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不仅得到社会认可,而且也得到工艺技术的认可之后才能取胜。

为此,让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进程的方法论的基础原则:

劳动资料不仅是衡量人类劳动力的发展,而且是劳动得以实现的那些社会关系的标志。当人们拥有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就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全部社会关系。手推磨给我们提供的是以封建领主为首的社会,而蒸汽磨提供的则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按照上述原理,对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下述情况

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是以谁为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基础设施已经不是手推磨,甚至也不是流水线生产,而是脑力劳动占很大比重的灵活的自动化生产,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的自动化生产,是依靠信息、通讯和交通进行生产的超级生产加工体系。“经济学家应该永远向前看,向技术进步的方向看,否则他很快就会落伍。”列宁的教导从来没有像今天——生产力发生新的革命性变革的时代显得如此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纲领草案是展望未来的一种尝试,它依据的是对工艺技术进步的趋势,对20世纪所积累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先进成就,对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经验的思考。

草案中没有一个思想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其中的每一个思想都有堆积如山的文献引文,有具体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经验作为后盾。草案力求对新现象和新思想作出概括,给以完整的、系统的解释。

在这方面我们提出稳定发展的观点是非常自然的,对这一提法在讨论中曾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说,这是资产阶级观点。问题在于怎么看。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不能作为全球发展模式,继续仿效这一模式将会把人类引向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从客观的科学观点看,这个出发点是无可厚非的,实际上今天也没有异议。

从这一事实作出而且实际上正在作出不同的社会及政治结论,提出各种各样的全球发展战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正是在力求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符合全球各民族利益的结论。我们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认为合理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应该建立在社会、生产综合体和自然三者统一的基础之上。

经济的作用正是在于保持此三者和谐的互相作用:在高技术、科学预测及科学管理的基础上建立生产、经济机制和管理体系,使

之足以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引起激烈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共产党的活动及纲领目标中必须考虑俄国的历史特点的问题。试问,这里是否存在民族主义,是否背离了阶级方法?假如把阶级方法等同于庸俗的社会学,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党纲草案应当坚决予以摒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从来就不曾教导把国家和民族看作是一张任由无个性的经济规律来书写历史的白纸。因此我们认为,思考俄国道路的特色,揭示这一特色,也就是说揭示“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尝试属于历史分析的科学方法论范畴。

草案首先关注的是思考我们发展的实际经验。我们强调,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挽救了作为伟大强国的俄国,使之免遭经济上、军事上的完全崩溃和国土的沦丧。除了建立工农政权,除了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别的拯救之道。多数人民都懂得这一点。

我们的革命也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有远见的资产阶级集团变得较好说话,对劳动者的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中最凶残的顽固不化的部分聚集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旗帜之下,几乎在整个欧洲建立起血腥的独裁。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也向所有的人提供援助,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粉碎了法西斯。

整个世界,特别是温饱富足的西方,今天都在享受我国革命及我们胜利的果实。而苏联自己却不得不生活在被包围的堡垒之中。苏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为代价创造出这样的历史功勋的。争取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斗争要求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要求极端集中的计划经济、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忘我精神。我们的人民作出了牺牲,因为没有牺牲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军队,就不可能有胜利。

然而胜利后国家仍然在严酷的动员体制中生活和工作,这是

“冷战”的局势所迫使的。结果被迫为生存而斗争的经验及其所固有的国家管理方法被不合理地提升为绝对正确的真理!

国家在这一阶段停留得太久了,因而渐渐失去了包含社会主义主要力量和主要优越性的东西: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性、首创性和独立性。他们没有获得主宰自身命运的充分权利。相反地,对集中制、命令主义、行政方法万能的迷信甚嚣尘上。

人数不多的阶层继续以人民的名义管理国家,他们越来越沉缅于个人私利,越来越脱离生活。

革命后的俄国的某些特点促使了这种脱离。工人阶级是少数。与工人阶级一道反对大资本的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流氓分子。关于这些人列宁是这样说的:“有些野心家、冒险家已在某些地方混进我们的队伍,自称为共产党人,欺骗我们;他们钻进我们队伍来,是因为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是因为比较老实的‘公务’人员由于思想落后没有来我们这里工作,而这班野心家却毫无原则,极不老实。这些只图升迁的人,在地方上采取强迫手段,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而实际上却有时会使农民们说:‘苏维埃政权万岁,但要打倒康姆尼!’(即共产主义)。”

这不是很像“民主派”用以吸引人的口号吗?然而现实生活表明,没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任何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有劳动者的政权,犹如没有真正的人民政权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一样。

我们说社会主义遭到暂时的失败,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未能彻底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导致了社会上坐享其成、无动于衷、消极被动、贪污受贿、盗窃公物、纵酒无度、玩忽职守之风。既然广大劳动阶层失去了实际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可能性,他们也就感受不到自己是所有主和全民财产的共有者。

我想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不是消灭所有主,而是切实地使全体公民变成实际的所有主,全民财产的共有者。这就是共产党人同假民主派的区别,后者以股份化、私有化为幌子从劳动者手中夺走一切。

执掌劳动人民政权之后我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最初步骤在我们的最低纲领中有详细的阐述。

5

同志们!

我们大家非常清楚,任何一种最进步的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最正确的纲领,如果不传播到广大民众中去,如果不以日常的组织工作去予以充实,那是运转不起来的。

根据党章和二大决议,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在集体领导基础上开展自己的活动,吸收党的积极分子、学者和经济领导人参加各种委员会及工作小组的工作。

在总结报告期间召开了两次全俄党代表会议,10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65次主席团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研究了近300个关于战略及战术、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组织和干部政策、参加工人、青年、妇女和老战士运动及其他运动的问题。对市委、区委及基层组织的工作尤为关注。就这些问题召开了19次地区性的研讨会。

党中央机关的工作实践说明,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除了成立主席团外,组建书记处显然是必要的。书记处将指导党活动的具体方针,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及时作出反应。

党执政几十年,垄断出版物和真理本身,这就使得宣传和组织

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和没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是群众脱离共产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因之一。现在我们需要重新掌握这项工作的技巧,因为党的地位和活动条件已经发生根本改变。

无需多言,当初在宣传上搞陈词滥调,后来共产党人被排除在大众传媒手段之外,凡此种种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性后果。今天大众传媒手段几乎变成了破坏国家、破坏健康的社会意识的主要因素,变成了一种制造反对本国人民的信息和心理恐怖的手段。我们竭尽全力与之斗争。

《苏维埃俄罗斯报》、《真理报》、《今日明日报》不断地给我们以支持,对此我们非常感谢。但是,我们利用信息的可能性目前受到限制,至今还没有俄共的全国性报纸,更不用说电台或电视频道了。一些同情我们的中央报纸及近百家不大的地区性出版物——这就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活的语言、同人们的亲身交往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从人到人——这就是目前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法。

已来临的一年为我们开展认真的宣传鼓动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列宁诞辰125周年和苏联人民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到来了。应在各地组织隆重的纪念活动。列宁纪念日那一天将在莫斯科举行学术讨论会。卫国战争胜利日前夕将在伏尔加格勒举行全苏联英雄城市的公众代表聚会。我们还打算举办艺术展览、盛大的伟大卫国战争老战士聚会。积极参加社会军事爱国活动的有大将 . 瓦连尼科夫、海军上将叶戈罗夫、空军上将 . 莫伊谢耶夫、 . 博伊科、 . 拉林、 . 波普科夫、 . 马卡绍夫、 . 涅恰耶夫、陆军中将 . 科斯捷夫、 . 潘克拉托夫、 . 季托夫等人。感谢他们的无私劳动和对我们理想的忠诚。

尽管大型活动意义重大,但党的日常工作的基本重心还是在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要在劳动集体里、在广大群众中扩大影响,扩大队伍,特别是在青年中扩大队伍。基层组织的建设要视具

体情况而定,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行业的、地域的、生产的、混合的都可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首先,对党今天所处的自身形成阶段的理解。党站住了脚跟,实际上到处恢复了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这些组织机构之间令人较为满意地建立起纵向和横向联系。党及其领导和议员团,是全国尽人皆知的。但在地方上情况有所不同。党组织往往与世隔绝,甚至同情我们、想给我们以某种帮助的人们,都很少感觉到我们的存在。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使组织从内部问题扩大到外部问题,面向人民的生活,面向人民的日常负担和疾苦。

第二点,应该立足于认真地研究我们的社会基础及其扩大的可能性。调查表明,俄罗斯左翼政党的基础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不断扩大。但在实际工作中对此还没有予以充分利用。

现在谈谈在我们看来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和党的任务问题。

我们认为,在今天俄国的现实中,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一如既往。与此同时,国家野蛮的资本主义化过程破坏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潜能,而正在形成的雇佣无产阶级目前还很弱小、分散,还没能认识到自己是受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工人中间客观上存在着把自己组织成为劳动所有者阶级的倾向,这个阶级要对生产及生产成果实行监督。复辟分子今天利用劳动者的这种内在需求为自身谋利,以所谓“人民资本主义”、股份化、利润分成等各种形式去引诱劳动者。

应该以党的明确的政治路线去对抗这一阴险的战术,因为它在群众中散播自己同资本主义改革休戚相关的幻想。首先必须加强反对扩大私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斗争,制止这种公开剥夺人民财产的行径。

工人中间对现政制的社会经济方针的反抗在逐步增长。明显

活跃的罢工运动就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目前这种罢工运动带有自发、分散的性质。罢工者提出的几乎都是经济要求,并且没有表现出坚持这些要求的应有的坚定性。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内部统一,缺乏对共同利益的深刻认识。缺少对劳动者的政治教育,工人运动就不能上升到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我们祖国的统一和繁荣而自觉斗争的程度,而进行政治教育的责任完全在共产党人身上。

这个问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七月全会(1994年)及地区党组织全会上专门研究过。在我们的积极参与下举行了两次全俄工人代表大会。共和国、边区和州党委应该积极开展创建工人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的工作,让最积极的共产党员参加这些委员会。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工人阶级政治上自我组织的机关看作是未来人民政权机关的雏型。

为恢复、保存和巩固人民财产,为把劳动者所创造的全部财富归还他们而进行的斗争,应该成为活跃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在我们的党纲草案中谈到,工人阶级目前正经历着深刻的质的和结构的更新阶段。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分子实际上加入了生产工作者的队伍。他们和高度熟练的工人阶层一起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新的先进核心,社会的和技术的突破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核心。执政当局正是通过摧毁科学及基础产业的办法来首先消灭这一核心。

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前景,以建立在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理论基础上的这一得到科学论证的深刻改造国家整个生产技术基础设施的方案去吸引他们。

应该永远记住列宁说过的话,工程师为了接受共产主义而经历的途径将不同于过去的地下宣传员和著作家,他们将通过自己

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接受共产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分析预测中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参加该中心工作的有国内优秀的科学力量。他们当中有沃洛布耶夫、科普秋格、马卡罗夫、舍米亚金、舍韦卢哈等科学院院士。

我们也要向艺术界、人文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展示同样现实的文化复兴的前景。今天他们的文化空间遭到破坏，从而认识到什么叫创作“自由”，他们的创作不得不取决于市场行情及“新俄罗斯人”的偶然施舍。但他们认识得很慢。被抛到生活边缘的知识精英们分散成追逐帮会利益的小团体，目前还无法联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

在困难的岁月里，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以惊人的勇气挺身而出捍卫我国人民的精神和道德的根。他们就是尤里·邦达列夫、瓦连京·拉斯普京、阿纳托利·伊万诺夫、彼得·普罗斯库林、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叶戈尔·伊萨耶夫、拉苏尔·加姆扎托夫、马赫茂德·埃萨姆巴耶夫、瓦连京·西多罗夫、谢尔盖·特卡乔夫、亚历山大·希洛夫、维亚切斯拉夫·克雷科夫、弗拉基米尔·沙因斯基、亚历山德拉·帕赫姆托娃、格奥尔吉·斯维里多夫、吉洪·赫连尼科夫、亚历山大·瓦德尔尼科夫、尤里·博加季科夫、尼古拉·古边科、然娜·博洛托娃、柳德米拉·扎伊采娃、塔季扬娜·多罗尼娜、伊戈尔·戈尔巴乔夫、瓦西里·拉诺沃伊、米哈伊尔·诺日金、伊琳娜·阿尔希波娃、叶连娜·奥布拉兹佐娃、鲍里斯·什托科洛夫、维克多·罗佐夫、尼古拉·加里宁。他们中间很多人作为贵宾参加我们代表大会的工作。我很高兴以所有代表的名义欢迎他们！

在不久前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乡村的劳动者历史地是左翼政党和运动的强大基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不存在农民对土

地的私人所有制的传统,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村社的土地使用制。在很多地区和农庄,所谓土地改革遇到了相当大的反抗。

社会学统计数据表明,乡村对我党的好感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必须使这一势头得到继续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出农村复兴的具体纲领。而我党拥有由农学家制订的这种纲领。我们将和最亲密、最可靠的同盟者——俄罗斯农业党一道努力争取实现这一纲领,要向农民解释,为什么在现政权之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同志们!老战士的坚韧不拔及其思想上的坚定性、丰富的生活经验成了帮助党在最困难、最悲惨的关头站稳脚跟的凝聚力量。今天他们仍在为我们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请允许我代表大家为他们忘我的劳动向他们表示感谢,向他们鞠躬敬礼,祝他们身体健康、精神奋发、思想年轻、豁达乐观!

在给我们的老战士以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一个在青年中间没有足够影响的党是注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客观上我们的口号也就是青年的口号。赋予每个人平等起跑的可能性全都被破坏了!今天用以收买青年人的通过投机轻易发财的机会很快就会失去。青年人只剩下唯一的权利——最先沦为失业者的权利。青年正在成为社会上遭受掠夺最厉害的部分。

这是否意味着到那时青年人会自动地接受我们的思想呢?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真实情况,目前的大量宣传,使青年人在意识中对许多我们完全清楚的观念产生了否定的态度。诸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大公无私这样一些价值观遭到了诋毁,被弄颠倒了。

然而远非所有的青年人都选择“百事可乐”。青年人越来越积极地参加党和爱国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为了不放过这一部分人,并且还要扩大他们的队伍,应该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和正在成长的一代交谈。党同青年的广泛联系只有通过已经站在我们立场上的青年人才能够做好。在前一时期约9000名青年入了党。

党的旗帜捍卫的是劳动者的利益,党始终关注妇女问题,而今天尤为迫切。与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相关的各种辛劳首先落在妇女身上。失业者中有妇女。令她们心痛的是儿童营养不良、健康恶化,而最可怕的是战争夺走了儿子们的生命。女人生来就崇尚爱和善,是天生的创造者和保护神,她们成为捍卫和平和公正的战士。在这方面妇女将是我们的同盟者,假如我们能够理解她们、倾听她们、帮助她们的话。

在共产主义政党中对妇女最有吸引力的是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因为渴望和平和献身于未来历来是女性的本质之所在。

共产党人在社会中的威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调整好自身队伍的各种关系。今天严重妨碍我们的一个因素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散状态。然而在致力于克服这种分散状态的时候,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人误会造成的。在总的战略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中间也存在一些极其重要的策略分歧。

然而在保持独立政治组织的同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准备同俄国和被罪恶分解的苏联各共和国的兄弟共产党就今天的所有问题在阶级利益、政治和社会目标一致、同志关系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保持密切的关系。

我们对共产党联盟,对在苏联领土上创建的各共产党领导人协调委员会寄予巨大的希望,我们同其中的许多领导人都有着个人友谊。只有在为劳动人民事业的共同斗争中才能够锻造出真正的而非形式上统一的形式。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声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欣慰地报告,我党和120多个共产主义的、左翼的、社会主义的政党、运动及组织恢复了联系。

在总结报告期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代表团不止一次地参加了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国际会晤及其他活动。特别想专门

提出出来的是我们在巴黎、维也纳、赫尔辛基、德里、平壤的会议和会晤。去年十一月我们参加支持古巴世界大会,大会期间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左翼政党越来越意识到在反对“世界新秩序”的斗争中需要恢复联系和合作。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党应该积极地一起探寻现代条件下的合作形式,加强与兄弟党和友好党的联系。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将举行的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党代表的国际会晤中,我们将就这一问题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借此机会,我想对我们所有的国外同志给予我们的声援及道义上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同志们!

在结束报告之际,我想就我党在这混乱而艰难的,然而我深信是暂时的时期所处的形势提出如下结论。

也许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弄懂的最主要一点是,共产党人应当与人民共生存,尊重并热爱祖国千年历史所形成的人民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我国的未来只能建立在历史继承性的坚实基础之上,并以俄罗斯的共同性、爱国主义、强国精神和人民性的文化和道德传统为依据。

可以大胆地断定,令西方感到如此神秘、如此不可理解的“俄罗斯思想”,其实质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今天历史再次使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面对1917年与1941年那样的选择:或者是伟大强国和社会主义,或者是国家继续分崩离析并最终沦为殖民地。

我们用什么东西去使人民相信这一点,发动他们投入斗争呢?

我们的纲领——这是我们对俄国和全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看法。这种看法立足于严格的科学分析及对公正和人类兄弟情谊思想具有不可遏止的力量的道义信念之上的。

我们的近期目标——人民政权的胜利;俄国在革新后的各苏

维埃民族联盟中的国家统一；社会的国内和平；家家户户的安宁与安全，每一家庭的丰衣足食。

我们的战略——把进步的国家—爱国主义力量团结在一个有效的联盟之中，这样的联盟能把背叛民族的党赶下台，中止敌对和混乱状态，开始真正的改革。

我们的盟友——所有珍视伟大的俄国，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豪，为国家尊严受损、数代俄国人和苏维埃人的记忆遭到空前嘲弄感到痛心的人们。

我们的潜力——一个国内最大的政治组织，一支得到越来越多劳动者支持的50万共产党人的队伍。

我们的希望——我们伟大人民的健全思想和良心、劳动人民的团结、军人的坚定性和爱国者的荣誉感。

我们的口号——俄国、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

（载久加诺夫：《我信任俄国》）

徐元宫译 夏风 校

共产党人论社会 进步的前景

[俄 亚·弗罗洛夫

今年年初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

题为《跨入21世纪的世界》的党纲序言,即总论部分,试图认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全球性经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对抗的标志下度过的20世纪历史的基本内容。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事变是这种对抗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标志,然而历史性争论远没有结束,因为这种争论所反映的那些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矛盾和问题仍然一如既往没有解决。现有矛盾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即将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这些矛盾具有何种形式?

资本主义今天在地球大部分地区居主导地位,从表面上看它在其生存的5个世纪中已经几乎变得面目全非了,但是它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自己主要的本质性特征。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弗罗洛夫:俄共中央委员,俄共纲领委员会委员,国家杜马代表,哲学副博士。

“生产一般”作为人类生活的永恒的、天然的前提条件一如既往地以价值及剩余价值——资本生产的具体历史形式出现。而后的根本的特点在于,它不具有任何内在的质量尺度,仅仅追求无止境的数量增长。

正是这一关键因素——不同质的人类财富、物质及精神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服从于利润,即交换价值生产的单纯数量规律——由此产生的金钱作为衡量所有事物和关系的占统治地位的尺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业性质,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价值,即经济和社会行为的顺序、目的、动机的整个体系。

它们的内容是:

社会财富首先被等同于“巨大的商品积累”(马克思),商品只有能够采取货币形式,才是有用的。质量只是提高数量的杠杆,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假定的性质。

社会进步相应地被等同于商品数量和多样性的无限的直线式甚至指数式的增长。

无论是在社会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生产首先被看作是对人的体力和脑力及自然资源的全面开发。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是:“在理论上可能的事情,在实践中必定能实现。”

生产效率主要以数量等级来评价,而不考虑事物的质的方面——不考虑现在的社会消耗,也不考虑给周围环境及子孙后代的生活可能造成的后果。

人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原子”,是生存在永恒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下的私有者。

市场——商品、劳动力、资本、思想等的市场,被视为人类生存

· 卡尔·穆尔扎的论文《工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末日》(《俄罗斯—21世纪》1994年第8期)对资本主义这一特性做了有意思的分析。

的天然舞台和前提。

所有这些特性使资本主义与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截然不同。马克思写道：“我们在古代人那里没有看到一部著作是研究下面这个问题的：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等等，是最有生产效能的，是创造最大的财富的……可是财富不是作为生产的目的出现的。经常研究的是这个问题：什么所有制方式保证国家有最好的公民？”就实质而言，马克斯·维贝尔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他认为资本主义把追逐利润作为目的本身与整个时代的道德观相矛盾。”

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目的同人的目的区分开来，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的确立起了绝无仅有的革命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这一领域的每一次新的向前的飞跃，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矛盾同时就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依靠动用及残酷开发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物质、劳动、精神资源而进入了所谓的消费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大众消费的极限化成为不亚于生产极限化的发挥资本职能的重要条件。

在分析所发生的变化实质时，.利夫希茨写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与其他更加受消费目的限制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的特点清楚地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加速发展。现在利润的磁针急切地转向另一个方向，从而导致了工业终端产品结构的某些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在探索尚未耗尽的生命源泉时，要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消费品生产就好了……然而，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卷第194页。

《.维贝尔选集》1990年莫斯科版第91页。

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也谈不上根据目前历史范围内有益于社会的观点,确定人的实际需要,为这种需要进行生产。奇怪的是,在消费领域更加重视自然的、质量的因素的情况下,资本在新的技术阶段面向消费领域时,仍然不关心事物的内容,仍旧像过去一样热衷于无限度地提高价值!即使具有最优良的使用质量,一种物品的有效性也可能完全是虚假的,甚至是否定的量,因为由生意经决定的大量产品总是在驱赶你,并将借助整个生活环境强加于你。”

实际上,这是强制进行超强度劳动的新形式,是资本通过使消费者的爱好固定化和改变寻找利润来源以发挥职能的最新方式。消费(其实,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这样)被盲目崇拜,并从人的机体的自然功能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礼仪,变成了个人的新的“神圣的义务”,热衷于履行这种义务便能得到个人的社会地位。

由此可见,强制劳动是以从未见过的光怪陆离的强制消费的形式出现的,强制消费则是以各种不同的操纵手段实现的。首先就是借助于广告,把各种层出不穷的物质、精神消费强加于人。人为的而往往是扭曲的消费性质在这里已不是例外而是常规,因为“为新而新”正在成为商品的主要消费性能,从而使所有物品的客观价值退居次要地位。

对于一个未被卷入此类关系体系的局外观察家来说,强制消费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东西,至少是比贫穷和消费不足更有吸引力的东西。他的后一种感觉当然是对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次创造了消灭饥饿与贫穷的客观前提。然而,这一切是通过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异化性质更加深化的形式来实现的。一切严肃和正直的思想家,无论他们持有何种政治和哲学观点,都确认这一

点。

例如，· 弗罗姆在自己的著作《希望的革命》的开头写了这样一段很有特色的话：“一个幽灵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见它。这不是过去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幽灵。这个新的幽灵是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生产物质财富并以计算机来控制这些财富的分配。在它形成的过程中，人吃饱了，满足了，然而却是消极的，没有生气，麻木不仁，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机器的部件。随着新社会的胜利，个人主义和个人独处的可能性将会消失；对他人的感情将借助于心理措施和其他措施，甚至借助于麻醉剂才能出现。”

不久前担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的“新贸易体制”最狂热的拥护者之一· 阿塔利预言，人开始从机器的附庸变为信用卡的附庸，信用卡将最终成为日益萎缩的人的个性的真正的义肢。个人自由越来越失去自己的真实内容，退化为在预先设定的死板框架内，在成百上千种不断变化而实际上属于同一种类的商品（总统候选人，电视系列片，大众文化用品等等）中进行选择的可能性。

然而，少数人的这种自由的代用品像过去一样是建立在多数人与日俱增的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生活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十亿”的高消费是建立在地球上大多数人相对和绝对贫困化、长期消费不足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绝对不会丧失自己的剥削天性，绝对无法解决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在变为世界体系后，能够把这种矛盾的两极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大陆去，以民族、信仰之类的冲突为掩饰，从而延缓和阻碍矛盾的解决，使得这种冲突的破坏潜力不断增长并对全世界构成灾难性的威胁。

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所谓人类全球问题：生态问题、人

· 弗罗姆：《心理分析与伦理学》1993年莫斯科版第220页。

口问题及其他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成为整个行星及整个人类的问题,只是就其范围而言,而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它们是直接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消费方式的矛盾中引发出来的,它们证明资产阶级社会进步形式的创造能力已濒临衰竭。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的出发点是目前实际普遍承认的状况,即认为遵循把西方消费社会及其社会体系、日常生活和生产技术基础结构变成全球发展模式的途径,不可能从总体上解决20世纪末人类面临的问题。使社会发展的目的服从资本自我增长的目标,不仅与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及实现社会公正相矛盾,而且也威胁着地球上生活本身的延续。这一点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记载得一清二楚。从这次大会上所提交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面临天然的、自然的极限。

作为例子,只需指出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国家只拥有地球人口的五分之一,却消费着世界燃料、能源及其他资源生产的五分之四。假如以人口平均计算,这比世界其余地区多16倍。因此,把“金十亿”所特有的单位资源及能源消费水平推广到地球上所有的居民,就会加重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使地球变为不适于居住的地方。

然而,即使全球范围内消费社会的工业生产基础在物质上无法再生产的事实是普遍承认的,由此可能得出和正在得出的实际社会结论却完全不同,其中包括完全相反的结论。在权衡和评价现在提供的解决办法时,人类今天正面临着也许是其整个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未来全球发展战略选择。

选择余地并不那么大。如果把康·齐奥尔科夫斯基早已提出

关于这一点详见 . 科普秋格:《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新西伯利亚版。

的人类向宇宙空间扩张——“垂直”进步的外推法观点撇开不谈，而普遍禁欲主义或回归“自然”状态的要求显然是反动的，那么今天实际上只能有两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战略。

第一种战略，实际上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其实质在于中止进步——在保持现有主要技术结构作为生产力自然的、必要的形式的情况下，限制甚至完全冻结现有世界生产水平的提高。在社会经济方面，“历史终结”这一概念适用于维护完全建立在市场关系上的现有不公正的世界交换、分配和消费结构，使人类永远划分为“金十亿”和受其剥削的原料外围；在政治上，通过践踏各国人民的主权、依靠全世界军事警察行动为后盾的“新世界秩序”的形式，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霸权。

第二种可能的战略的方向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不断提高地球全体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必须使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根本上重新审查社会价值和优先体系，相应地重新确定科学和技术发展总向量的方向，在此基础上维持地球的生态平衡。

为了解决这项任务，许多国家正在提出理论观点和进行实际研究，这种观点和研究的总和现在通称稳定发展概念。在工业生产方式范围内已经着手为实现这一概念（首先是在自然保护措施方面）做某些工作。然而，无论稳定发展模式的具体的、今天多半还是假设性的、经济技术的原则及细节是怎样的，俄共把稳定发展模式的社会内容及其世界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纲领从现实社会主义与自己的这一客观使命相一致的视角分析了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形成的主要因素、产生危机的原因及在现代基础上革新的前景。

今天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面临转折关头。早期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原始形式的腐朽的直接回答，是对置人类文明于毁灭边缘的

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物质和道德灾难的直接回答。这些革命以双重方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任务:一方面,导致了世界帝国主义链条的断裂和第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另一方面,引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性改革,加强了劳动人民一系列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自由,加速了向消费社会阶段的过渡。

社会主义革命对俄国来说不是徒劳的“布尔什维克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很多“社会主义前提”不成熟的情况下被迫迈出的一步,是在经济崩溃、国土沦丧、地主—资本家执政集团完全失去社会活动能力的状况下使民族—国家得以生存的唯一现实机遇。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接受并捍卫了十月革命。

然而,在一个处于半瓦解状态的半封建国家必须“完成”实质上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革新,这一点给整个苏维埃社会和国家制度的面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一方面,建立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政权,确立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达到了不容争辩的社会和文化成就,这些成就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仿效的榜样。然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总的社会—工艺技术向量落后了,就实质而言,同资本主义相比并没有变化。在那个时期的具体条件下,这个向量显然不可能从实质上改变方向。

长期笼罩着苏联的外来威胁要求迅速作出“对等的”回答,首先是在军事技术领域,这一领域预先确定了特殊的工业发展类型。这个类型被当作自然的和基本的模式。在当时的形势下唯一可能的口号是“赶超”口号,它实际上超限度地运用了计划动员经济的可能性。大力加速度再加上重复资本原始积累时代所特有的多种因素,国家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它的实现主要靠的是农民的后备,在军事纪律和革命禁欲主义的气氛下广泛使用了强制劳动,包括无偿劳动。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战后国民经济的顺利转型及武装力量的改组,历史地证明了选择这条特殊的道路是正

确的。但是这种要求严格集中、使生活的一切领域统统国家化的被迫性质，被不合理地绝对化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实际上属于亚·波格丹洛夫的观点：“发展的‘理想模式’可以仿效‘在劳动技术方面突出的大资本主义企业’”。列宁的直接警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最终结果是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社会主义主要的物质和道德基础——劳动人民的社会活力和主动精神、人民的自由独立组织——日益枯竭，经济和政治异化因素日益增长。

后来，当国家直接生存的任务顺利解决，在本身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被提出时，又犯了把社会主义理想粗暴地简单化的错误。

“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个原则上正确的口号停留在对人的需要及其与社会生产方式的联系的抽象的和非历史的认识水平上。人们看不到，大多数需要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不是“自然界”给予人的，它们具有社会性质，取决于人的能力的发展水平并为人在周围环境中实现这些需要服务。不作这样的理解，“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就与资产阶级的“超级消费”理想没有区别并完全失去意义。

社会财富及社会进步被等同于“商品大量积累”及其无限增长的资产阶级形式。所以1961年通过的苏共第三个纲领的所有慷

· 波格丹洛夫：《新世界（1904—1905年文集）》1905年莫斯科版第90页。

·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4—205、409、418—419页。

慨激昂的词句,实践上都归结为过去的“赶超”口号,实际上就本质而言是在原有生产技术基础上不加批判地照搬照抄西方的消费社会。这一方面使社会主义经济注定扮演显然要失败的次等角色,另一方面又使纲领中所宣布的另两个任务,即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培育新人失去了相应的经济基础,使之变成纯属“意识形态”的任务,从而变成无法解决的任务。

在经济技术上采取迂回机动的思想,即依靠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和当时所积累的广泛的科技成果,采取在质的方面完全不同的稳定发展的道路——这种思想没有受到重视和提倡。由于走上资本主义已经走过的发展生产力的道路,社会主义失去了历史首创性。

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损失,就是因为无根据地把早期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绝对化。按照这种经验,社会主义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克服所有制和分配的资本主义形式方面,实质上完好无损地保留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和消费的工艺技术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和优先体系。然而,不解决后面这个问题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所要解决的任务:生产的实际上的(区别于形式上和法律上的)社会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较高的创造性劳动的动因及刺激,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为人的自由及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要恢复首创精神,必须基本上把生产力纳入另一条道路,依靠最新科技进步趋势的有计划发展。在俄共纲领中,这条道路被叫做最优化的社会主义发展。

“生产的技术方法”这一概念是分析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特别是在此书的准备材料手稿中对此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然而很久以来几乎都停留在研究者的视野

之外。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在它创造的生产力，创造的劳动工具的发展使其特有的生产关系不仅成为社会真实，而且成为工艺上的真实的时候，才最终确立，也就是找到了适合自身的物质生产技术基础。因此，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将在何种技术基础上发展及今天这种基础是否已经产生。俄共纲领断定，现时代发生的正是后面这种情况。

现代全球形势向人类提出的任务是，保障自己公正和和谐的发展，克服工业文明的浪费性质，从对自然环境、物质资源及劳动的全面开发原则向全面保护原则过渡。发生这种转变的可能性蕴含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之中，蕴含于显然日益迫近的生产力领域的新的革命性转变——从工业的工艺技术向后工业的工艺技术过渡之中。

在科技进步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的科学含量的提高，生产自动化、机器人化及灵活性等的加强，生产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物质财富的创造开始越来越不是取决于直接附加劳动及延长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劳动所组织和使用的物质、能源及信息流量的力度和规模，也就是最终取决于社会和个人科学地掌握自然和技术进程的程度。生产劳动正在变成以智能为主的劳动。

随着这种转变，“社会个体的发展”开始成为生产及财富的主要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产投资的结构相应地发生变化。对人的投资——对培训、教育、科学、文化及社会领域的投资成为主要的投资。因此，社会衡量财富的标准已经不是劳动时间和这个时间内所创造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时间的积累，也就是作为个人不断和全面发展所必需的余地的业余时间。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4—205、409、418—419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7卷第568页。

劳动性质的改变导致劳动的创造性动因及刺激的意义的不不断提高。由于迫不得已的必要性(甚至是出于仍处在“新教伦理”所描绘的资产阶级视野范围内的道德义务),劳动逐渐变成目的本身,具有独立的消费价值,成为一个自然的、更适合人的本性的健康机体的生存方式,个人创造才能发展和实现的过程。

然而,生产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客观变化,人被提到首要位置,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这与资本主义的进步形式发生了深刻的矛盾,要求对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分配、消费形式从质的方面进行变革。应该以人道主义化的消费作为个人全面发展的职能,来代替社会不公正的、毁灭自然的、摧残人性的工业消费竞赛,代替作为资本生产和流通职能的“超级消费”。

另一方面,自然生态限制迫使社会制定合理节约、降低人均物质资源及能源消耗的战略。而这也必然要求强化物质消费的社会性质。这种强化的实质在于,社会有义务保障自己的每一个成员享有稳定的和作为人应有的个体消费和个人舒适水平,同时保障社会和集体生活领域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并从质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为了解决这样的任务,必须深刻改造整个日常生活基础结构——使公共交通、通讯、信息、医疗保健、饮食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建立教育、创作及休息中心,俱乐部、公园、体育场、博物馆、图书馆等等的稠密网络。

根据对现代科技发展趋势的分析,纲领力图描述适合最佳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的后工业技术基础的某些一般轮廓。

生产与自然相互关系中应该出现一个主要的重大进展,以便能够克服很多生态矛盾和限制。这种进展的实质在于把今天分别进行的生产过程(自然改造过程)和自然再生过程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工艺技术过程,把这一过程有机地植入生物界与非生物界之间原有的时间、物质与能量循环(耕作业更接近这一过程)。应该把生产当作无熵功能的生命过程,从而根本改变人的劳动活动的

客观意义。这种改变的含意在于,如果说迄今为止自然界似乎是永恒的和取之不尽的劳动基础(工业型工艺技术),那么现在正相反,劳动应该成为保护和再生自然环境的基础(后工业型工艺技术)。

安全应当是一种把生产的技术、生态、工效、社会心理及文化道德等方面统一起来的人与机器的体系,具有综合特性。它应当成为生产效率的主要标准。

流水线批量生产正在让位于灵活的自动化生产,这就为生产最大限度个性化提供了可能性,能够按照订单,根据具体要求生产产品。

依靠在设计时就已奠定的不断现代化的可能性,技术体系的手段将不断提高,从而有可能解决尖锐的“道德”老化问题,能够大大节约生产消耗。

在完善交通及远距离通讯系统的基础上,生产能力将进行合理的分散化,人类生活环境将实现非都市化。

工艺技术突破的起点将是:

——生产和工艺技术过程自动管理系统和信息积累、加工、传输系统(微电子学、光纤技术、巨大的全球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完善;

——对新能源及其积蓄和输送手段(可控制热核聚变、高温超导性、超高频技术)的掌握;

——对新的原料和材料加工方法(高密度能量相干辐射、低温技术)的掌握;

——对新的自然进程(微生物技术、精细化学)的掌握。

工艺技术进步以其社会经济尺度衡量,符合现实劳动社会化的进程,即符合加强劳动的集体性,增强生产的不同部门和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提高生产的可控制性的进程。劳动社会化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列宁),是根除私有制,在计划调

节生产的基础上克服市场自发力量,使生产服从全民与全球目标,服从社会监督的主要物质基础。

有利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革新,劳动群众的国家政权确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加速了这一进程,使它具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同时,历史经验证明,不平衡与形式多样的工艺技术进步流程和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的工艺技术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留着客观上的经济的多种成份——所有制形式的某种多样性:公有制、个体劳动所有制、不同水平的私有制,以及它们之间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相互竞争。早期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在条件尚不成熟的一些国民经济部门追求几乎毫无例外地实现形式上和法律上的公有化(国有化)。这种作法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亚于在组织和工艺技术上私有制已经过时的部门里保留私有制。

这就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关于向“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具有短暂性质的传统观念。从社会角度看,经济的稳定发展要求生产的法律上的社会化程度总体上同生产的实际的组织和工艺技术的社会化程度相当。它们构成了两个对立的过程,并要求国家维持它们之间合理的相互平衡。

然而,在政权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国家中,由国家有计划调节的高技术及科学含量大的公有化生产部门,在向后工业工艺技术和稳定发展的社会的突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俄共纲领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今天正经历着根本性的质的和结构的革新阶段,它仍然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技术进步的体现者及社会的领袖。

随着生产劳动性质的改变,生产需要低技能工人——拧螺钉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现代先进部门中脑力劳动的比重不断增加,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信息和程序保障成为生产中不可分割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科技知识分子加

入第一线生产工人的队伍。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新的先进核心逐渐形成,他们集脑力和体力生产劳动于一体,他们被生产的科学组织、相应的自觉纪律和现代工艺技术过程联合在一起,而现代工艺技术过程要求高度集中力量和协调劳动活动、不断的创造、高水平的专业培训和全面的文化发展。当然,工人阶级各阶层及其代表要达到自己的先进部队的水平还很遥远,然而正是从这支先进部队的身上可以看到整个工人阶级的真正力量和历史可能性。

这个具有无阶级社会的劳动者特征的主要核心的进一步壮大,越来越多不同类别的劳动者加入它的队伍,它的优秀的基本品质的发扬,这些品质不断向全社会扩展,实质上这就是消灭阶级划分的过程。

共产党人在这个核心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主要社会基础,首先向它传播自己的思想,推动它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在民族和国际范围内实现这种利益。俄共纲领指出,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这支先锋力量的手中不仅掌握着俄罗斯的命运,而且掌握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命运。

(载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9期)

徐元宫 译 顾家庆 校

从后工业社会看社会主义

[俄]叶·萨马尔斯卡娅

现在,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流派的否定态度在俄国舆论界占优势。诚然,我们有时听到人们谈论“正宗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人们更多地是把它当作一种仅仅扎根于西方的异己的东西,认为它不适合于俄国。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民主社会主义过去在俄国没有立足之地。然而,问题在于它将来能否找到立足之地。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危机的实质。

在俄国有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已从总体上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事实上只能说崩溃的是那种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和把对社会主义的某种解释当作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不能不指出,在上面说的那种国家同社会主义思想和这种思想的各式各样的形式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其中许多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同苏联经验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它们的倡导者曾经是苏联体制的最

叶莲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萨马尔斯卡娅: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哲学副博士。

早的不妥协的批评者。卡·考茨基20年代的著作便可作为这样的例子。他在这些著作中证明布尔什维克以放弃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为代价执掌了政权：“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在俄国获得胜利，而社会主义则已经遭到了一次失败。”（卡·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柏林版第196页）因此，以苏联体制崩溃的事实为依据来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作结论是不恰当的。此外，这种看法还意味着把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流派的多样性错误地归结为一种苏联经验，这就会使对现在以整个生活资本主义化为方向的俄国的发展前途的看法变得极端狭窄。

官方的社会经济改造纲领遵循的就是这种精神，正在推行经济自由化，使买卖关系渗入社会领域（医疗服务、教育等）。我不想重复报界不止一次提出的对俄罗斯现领导的有根据的指责，说他们选择了落后的竞争资本主义形式为样板，而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中计划化和集中调控的因素在加强。的确，纯粹的竞争资本主义在西欧大约在19世纪中叶已经实现，然而它的自由竞争现在已经完全让位于有调控的经济。但是，我们应当明白，在本世纪的近几十年里，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新自由化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事实。而自由主义的这种活跃是与完全具体和客观的进程，首先是同技术进程相联系的，是同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即所谓“信息社会”和“服务业社会”过渡相联系的。

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相伴而行的是生产单位和资本的扩大、生产资本同银行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紧密联结、计划调控原则渗入经济。后工业革命的特征则在于，至少在现代向后工业社会过渡阶段它刺激私人企业经营活动和私人首创精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消灭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调控，而是导致调控发生重大变形。

俄国在这方面不是例外。虽然它所经历的过程是极其特殊的（不过，哪个国家不特殊呢？），但是这些过程也表明了世界性过程

的影响。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同样是在世界工业进步的轨道上运行的,尽管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面。但是,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现实是为数众多的工业型社会带来了传统联系的破坏和城市对农村的主宰,两种类型的社会的共同点是对平等的不可抑制的追求。资本主义以市场(通过货币使各种商品和劳动均等)和民主制(所有的人作为选民是平等的)确立了平等。在西欧工业社会初露曙光时出现的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于这样的解决方式,它提出了推广到人们多种生活条件的更深刻的平等方案(这种方案之一就是财产公有化使人们平等)。寻求比自由民主的平等形式更深刻的形式构成工业时代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主流,包括古典马克思主义或后来的多个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俄罗斯共产主义(或称马克思列宁主义)。

必须强调指出阐述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立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都是最适合于工业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因此,这两种形式虽然在政治目标、战略和意识形态上有差别,但它们是相似的。让我们试着论证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乍一看可能被认为是对我国社会意识中老一套看法的挑战,因为它们习惯于把两者对立起来。

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精神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传统也哺育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此外,俄国社会民主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世纪之初也参加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第二国际。而最主要的看来是,上述两种社会主义形式在它们成为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学说之后仍保留着基本的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的长期先决条件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经济情况。而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时代的分析和对未来的预测就是以这个情况作为检验和衡量的标准。无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形式如何各不相同,无论它们的发源地距离西方疆界多么遥远,它们的深刻根源和意向始

终都是与工业化的西方紧密相联的。

西方在世纪之交发生了工业化的巨大飞跃,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出现了生产和财产的最强有力的积聚,产生了股份公司、私人和国有垄断组织。国家积极干预经济领域,有时以直接占有或间接占有公司的经营者的身份,有时实施对民族资本的保护主义政策,甚至进行殖民掠夺。自由市场和经济个人主义的价值似乎已永远成为过去,把位置让给了资本主义式的经济集体主义,按鲁·希法亭确切的说法,出现了“垄断利润的博爱”。在社会领域,工业无产阶级的强大增长成为主导因素,这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两极化前途的思想。

当然,上述趋势并没有囊括那个时代工业进步的全部内容。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现象,与经济中的积聚和集中同时还产生了生产和财产分散化的过程。爱·伯恩斯坦当时向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积聚的方向和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的发展在世纪之交仍是占优势的方向,它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反自由主义意向。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有影响,而且正因为这样,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大多数拥护者设想社会主义是一个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拥有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生产,这样的生产先是在民族范围内,将来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唯一的生产。

对当时的经济实践的粗浅观察确实促使人们得出这种结论。企业股份化造成的印象是,所有主被排挤出生产过程,他已不再需要去发挥他的职能,对企业的领导更多地转移到雇佣职员的身上。在社会主义者中流行一种信念,认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最终将变成“单一畸形的企业”(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1959年莫斯科版第85页)。鲁·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证明道,资本主义本能地向着生产和财产的全球积聚运动,因而也是向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竞争运动,向着实行自

觉的和总体的调控的社会运动。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虽然没有表示过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全面积聚,但他恰恰是以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生产积聚和集中、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形成的事实为根据,论证自己关于社会主义迅速到来的预测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正是沿着这种观念的航道而最终制订出来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长期沿着同样观念的航道前进。至少可以提出上述两种社会主义形式共有的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信仰工业进步,把工业进步理解为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克服社会不平等、贫困、失业的必要条件。越来越多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增加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内,都被看作是走向普遍物质富裕和充分就业等的道路。

第二个特征是把无产阶级看作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阶级,社会进步的体现者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诚然,在本世纪50—6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就已经感到有必要以“白领工人”来扩大自己的选民群,而苏共大致也在同一时期宣布自己为全民党。

第三个特征涉及国家在社会中的作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承认国家在组织与调控生产和分配,实行涉及广大社会阶层的保护主义方面的巨大(后者甚至认为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在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社会福利国家”,而在苏联则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保障体制。

上述特征中的第四个是相信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并同它相对立的特殊社会形态。列宁及后来的几代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家对此深信不疑。更有甚者,现代苏联体制崩溃和“回归世界文明航道”的赞扬者也相信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他们的意识是受控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的命题。而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在前不久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长时间地把自己的改良主义活动看作迫不得已的、暂时的立场,看作仅仅是在同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时刻到来之前采取的立场。直到1959年,哥德斯堡代表大会通过德国社

会民主党新纲领时,德国人才放弃了通过同资本主义决裂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而法国社会党人直到80年代初在实行自己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时还在推行这类思想。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者的上述信仰遭到怀疑的时刻到来之前,西方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后面的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等同)之间残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对立是有某种基础的,但这种对立也掩盖了重大的共同之处,使共同之处未能得到阐述。甚至在整个苏联社会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也可以说存在着类似的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是工业型的社会。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工艺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它们虽然都否定资本主义,但是都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基础紧密相联。

但是,仅仅谈论西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列宁主义的相同之处也是不正确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也证明它们共同的历史基础——资本主义工业化按照不同方式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1917年两次革命时期,上述差别开始表现出来。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大理论家卡·考茨基、鲁·希法亭、爱·伯恩施坦(有些人还早得多)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经济潜力,它能够通过股份公司、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等,适应大工业生产的条件。在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显示了坚定的决心:只有在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条件下才实行生产国有化。列宁的言论同这种立场相对立,它在这个时期经常引证德国,说它是一个已经有条件实行社会主义、实行全面的生产国有化的国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纲领的谨慎和妥协性与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同样谨慎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多党代议制民主是可以在其中为社会主义目标而斗争的制度。

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激进的改造,而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社会保障领域。正如前面指出的,他们自己也

长时间地认为采取这种立场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立场才变成通过建立混合经济、使社会主义政党变成许多欧洲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扩大和深化社会保障措施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觉的社会改造的纲领。

列宁主义的发展则不同。列宁虽然长时间生活在西方,但是他实际上忽略了证明资本主义与大工业生产条件可以相容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列宁继续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谈论竞争和垄断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定律的对抗性,认为竞争起先让位于资本主义垄断,然后让位于社会主义垄断是不可避免的。尼·布哈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尽管列宁在革命前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言论具有某种双重性,但是他更多地是把社会主义设想为国家规模的单一企业。由此可见,关于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全面垄断化的社会主义空想,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薄弱、其可能性不明确的国度里兴旺起来并逐步付诸实施的。

乍一看,在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列宁比西方社会改良主义者更为正统。的确,继马克思之后,列宁与改良主义者不同,他认为经济和政治是以完全否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领域。尽管如此,列宁还不能被看作正统主义者。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因为他决定在俄国这个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具有强大封建残余的、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度里实现正统主义者的纲领。换句话说,他决定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实现不是在资本主义西方条件下简单制订的,而是以这些条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因此,可以把列宁主义看作一种适合农业国条件的、(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的工业社会主义形式。列宁主义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世界落后地区工业化的意识形态;第二,它包含一个按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制订的最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改造方案。列宁主义制订了在后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俄国工业化的方案,它是本世纪初工业进步中

所出现过的最极端的结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主义常常被看作是俄国西方化的意识形态。显然,应该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应该补充一点,俄国的现代化从来都是通过激进的政治改造途经和依靠强有力的国家实现的(例如彼得大帝的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并没有越出俄国传统的范围,它为作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目标实现了。在30—50年代俄国建立了完全可与西方一比高下的强大工业。至于列宁纲领的社会主义成份,它在苏联历史中的命运是非常复杂和非单一含意的。社会主义意图似乎是建立俄国国有生产方式和苏维埃——独特的代议民主形式的基础。然而,国有经济也好,苏维埃也好,都没有给公民带来现实的自由,组成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方向的那种自由。它们导致了对人们进行奴役的新形式,导致了人们对国家的依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它们为人们提供了劳动权、受教育权、保健权等,创造了实际自由的某种条件。但是,仍然可以说,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十年里,俄国工业化的任务比社会生活社会化的任务完成得顺利。

在这方面,可以把现在俄国的改革同1917年以后实行的改造对比一下。国家再次面对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性,而且它着手这顶任务时的方式也同它历史上通常发生的一样: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但是,现在的改革在这方面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布尔什维克及其社会主义口号从来没有忘记俄国经济现代化这一重要的任务。现在的领导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而是醉心于搞俄国资本主义化。但是,如果不会带来经济现代化,谁要搞,为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化呢?改革的唯一结果大概就是建立一个人数极少的富翁阶层。因此可以认为,采取到目前为止所实行的那种形式的改革,没有得到历史的承认,它使俄国长久地中断了经济、政治和精神的现代化。我们认为,为俄国的改造确定方向的不应当是资本主义本身,而应当是技术革命,它将导致后工业社会的建立,它

既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也可以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工业时代已经显示了(诚然,更多地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相互渗透。正在来临的后工业时代预示这种相互渗透将具有更大的规模,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社会实践刚刚触及的新形式。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和意识形态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既向工业资本主义提出了挑战,也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使社会主义形成体系的最一般的原则遭到怀疑(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参看亚·沙夫的文章《我的20世纪》,载于《自由思想》1994年第4、5期。——编者注)。

首先,这涉及关于生产无止境地不断增长,使一切都服从于生产的论点。20世纪下半叶,在工业进步与人的生活利益之间出现了矛盾。工业进步对地球生存本身和地球上的生活看来构成了威胁。必须以质量的发展、对生态绝对命令的考虑、对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的广泛利用,而不是以数量的增长作为生产存在的必要的新形式。但是,工业扩张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在这方面必须革新,人类必须学会在生产和消费上更加节约。

其次,社会领域的变化也向工业社会主义提出了挑战。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缩减,新的生产只需要人数不多的高度熟练的工人。这是新的高收入的工人精英,他们的社会利益往往具有后物质主义的性质(他们更多地倾向于生态要求,维护生产自由,而不是增加工资)。大部分新的工作岗位是服务部门创造的,这个部门的劳动具有较低熟练程度的性质,并且不会提供专业成长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许多别的社会主义者把劳动看作人的生命活动最重要的形式,认为它是创造的开端和开发人的最优秀的能力的条件。

劳动曾是无产阶级追求在生产、政治、社会精神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础。在新的后工业社会里,只有精英劳动才能够成为这类追求的承担者。劳动者的基本群众主要从事服务行业,他们所从事的是非创造性的、低熟练程度的、不稳定的劳动;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既不可能在其中获得自己的社会同一性,也不可能获得领导社会的使命。因此,新工人阶级的特征便是尖锐的分裂,各个不同集团的要求常常相互矛盾。例如,传统工人要求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而新的工人精英感兴趣的则是消灭生态上肮脏的生产部门。所有这一切使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处于困难处境,它们面临的任务是调和自己的选民的相互矛盾的要求。

除此之外,由于向后工业时代过渡,无工作的居民的份额在增长。失业正在成为大规模的现象,成为真正的灾难。况且失业日益具有新型的稳定特征,导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边缘阶层的扩大。由此可见,正在来临的后工业社会将无法摆脱尖锐的社会问题、不平等和所谓的“新贫困”(即使把“第三世界”国家除外,只限于考察发达的西方国家)。

最后,即第三,新的时代使“社会福利”国家遭到有力打击,而且这一过程在西欧国家和俄国都是相同的。苏联是“社会福利”国家,它的崩溃破坏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和休息权被抛弃,免费医疗保健和教育权等受到威胁)。“社会福利”国家遭受的这种危机的原因,可以区分为暂时性的原因和比较长期起作用的原因。看来,技术革命要求对生产进行巨大投资,从而使许多国家压缩社会福利项目,这属于暂时性的原因。以此为根据,西欧和俄罗斯的自由派不厌其烦地指责国家浪费,鼓励社会依赖等等。广泛推行政治和社会管理非集中化和非官僚化的趋势则属于长期的原因。

总之,后工业社会的临近要求深刻改变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则。它使社会主义者关于工业进步是人类走向物质丰富和普遍幸

福的道路,关于社会保障政策,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信仰成为问题。有时人们以此为根据断言,能适应未来的已经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而只能说是后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应该指出,在新的条件下,尽管它的哲学和经济尺度、社会和政治尺度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仍将保留。现在可以更确切地说,新的时代破坏了工业社会主义的价值,而使更一般的、与工业化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范式具有现实意义。

例如,后工业主义的主要意向和基本标志在于,生产应该考虑自然界这个人类生活的基石,否定那种会动摇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自然界——这就是今后生产应当不断地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和质量。从这种观点出发,工业时代是完全相反的,它鼓励生产的抽象增长,鼓励生产向抽象的目标运动:增加资本的利润、规模和运动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或单纯增加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在实践中,无论是工业资本主义,还是工业社会主义,都无非是在抽象的统治下转动着生产和消费的飞轮。但是,如果站在理论的高度上,甚至可以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形式中看到对经济抽象的抗议和追求质量价值的方向。

老社会主义的质量价值还没有包括整个自然界,老社会主义否定的仅仅是市场抽象,维护的是追求质量的劳动(与抽象的劳动相对立)和它所生产的消费价值。社会主义对市场的最一般的形式批判可归结为揭露在市场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屈从于抽象物(金钱、交换价值和利润规律),而质量价值(具体劳动及其具体产品)则处于第二位。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而仅仅通过上述抽象物发生联系,这些抽象物赋予劳动及其产品以生存权。在市场摧毁了自然经济的时代,这种情况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直到现在对这种情况的思考仍然是任何有理论意义的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见,老的工业社会主义已经认识到了经济服从质量标

准的必要性,不过它还没有达到把整个自然界包括进去的地步。此外,老的社会主义按照绝对否定市场经济的精神提出解决办法,这就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接近于“宗法制家庭”和“共产主义部族”(希法亭语)框架内的经济,即从整体上说是带有少量交换因素的自然经济。这种抑制经济关系中的抽象数量方面而把质量方面绝对化的做法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丧失了经济方面的内部活力的静止社会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因素常常会在许多社会主义者主张工业进步主义的议论的背景上显露出来。例如,热情洋溢的进步主义者考茨基曾突然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动力将会降低。以苏联经济为例,它在同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实践中现实地发现了内部活力的欠缺。当然,也不是工业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全都绝对否定市场抽象的意义。例如,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期间就摆脱了这种观念,提出了混合经济的思想。可以设想,后工业主义时代的新社会主义应该以这种思想为出发点,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展开对市场经济与质量的绝对命令的最佳结合的寻求,寻求那包括人类生活、劳动、自然界在内的价值群。

政治领域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各种形式的工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治方案已不再适宜,但是,即使在后工业主义时代,它们的一般方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种方向活跃了反对国家集中化和规章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这方面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方案,但是,社会主义对于国家管理方面现代情况的思考和现代化仍然具有理性潜力。在这里,也许值得重提一下社会主义固有的反国家倾向,这种倾向不仅是无政府主义所特有的,而且也是马克思和列宁所信奉的那种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所特有的。

马克思和列宁不仅相信国家消亡的遥远前景,他们还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正在消亡的国家的思想。他们的思路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主要地不应该是代议制的民主制,而应该是直接民主制,是无产者和全体人民的直接的自我管理,这将导致国家

作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殊机关的消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描述了这种政治进化模式。但是,看来列宁感觉到了在一个大国的条件下人民自我管理形式的政权将没有行为能力,因此他在自己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引入了一个新角色——党,他赋予党以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领导的地位。这样,他就为把苏维埃变成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开辟了道路,这条道路在后来俄国历史中成了现实。社会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对代议制民主持全面否定态度,他们不愿采用这种制度,这种态度令人难以置信地在实践上导致了苏维埃极权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像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家所特有的那样,把社会自我管理的理想发展到极端的形式。在国家体制领域他们批判的主要目标是代议制民主。他们把它看作抽象物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公民被置于千篇一律的选民地位,国家决定根据机械计算选票的结果通过,在那里推行“共同意志”,事实上具体公民同这种意志格格不入。而他们远不是始终力图破坏代议制民主。相反,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适应了它。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人们曾设想不是以全面否定的形式与代议制民主相对抗,而是通过以自我管理机构补充它的机关的途径与之对抗。

我认为,现在是考虑后工业时代到来之际社会问题变异的时候了。在工业时代,社会问题可归结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它确定了把劳动从资本剥削下解放出来的任务。在我们的时代,社会问题没有消失,可能还会更加尖锐。但是,它将发生前面已部分提到的重大变化。在这些变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由于“产品文明”的终结是后工业主义的标志,劳动、生产、无产阶级将逐渐丧失主导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业化和信息技术时代必需的体力劳动减少,不参与生产的人员数量增加,新的工作岗位大批转

入服务部门,完全或部分失业增加。社会主义理论家把整个后工业主义的特征概括为“闲暇文明”(·勒菲弗尔)或“空闲时间文明”(·戈尔茨)。

社会主义者正在相应地重新审查自己关于团结的观念。这不单是工人的团结,而是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所有雇佣劳动者的团结。现在,西欧的社会主义者正在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每日的、每月的、每年的)寻求给更多的人提供工作的可能性。他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割断劳动时间与报酬之间习惯性的联系,还应当支付费用以做到要人干活就有人干活。在社会主义者中广泛流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已经过时的看法。这不应当理解为鼓励游手好闲,这是面对就业方面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的回答。

在社会问题中还有一个重大的新的方面——生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作为自然界消费者的广大居民阶层,另一方面是掌握自然空间的政权、技术官僚结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精英的眼光之外寻求解决居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生态问题。社会主义者今天的口号是:“少消费一些,使生活和工作好一些。”

后工业主义的到来最终使民族问题特别尖锐化,甚至可以说,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民族问题。这涉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本国居民和日益增多的来自东方和南方的移民之间的不平等。欧洲社会主义者反对在富国周围建立新的“铁幕”,他们力图使欧洲联盟内的所有公民,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社会党国际在国际方面坚持的立场是,必须对世界财富进行有利于穷国的重新分配,向穷国提供经济、技术、科学的全面援助。

社会问题的现代变形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变成了一项特别复杂的任务。多种形式的工业社会主义的意图基本上都是使工人阶级获得物质保证和执掌政权。新社会主义的目标更加广泛:即在

减少必要的活劳动的条件下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获得应有的和积极的生活,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和活动的周围环境的清洁,使穷国和富国的生活条件一致。

由此可见,在向后工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价值不会丧失自己的现实性,虽然其具体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最主要的是,后工业主义与工业主义不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鼓励垄断和集中倾向。因此,专横型的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消失,取代它的将是更具自由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它的方向是与市场社会和自由民主国家长期共处。

欧洲社会主义者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是建立具有特殊的经济、特殊的国家制度等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从苏维埃体制崩溃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必须抛弃建立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特别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图谋。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摧毁资本主义,而是按照“另一种发展方式”的方向,通过多角度人道主义变革来改造资本主义。

如果把这种观点运用于俄国,那就意味着首先承认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准则方面采取某些措施是合乎规律的。其次,这意味着必须实行规模广泛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政策。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不幸与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改革活动的明确纲领。而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我们所经受的过渡时期里雇佣劳动以及广大居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遭到从未有过的侵害,他们承受了所实行的改革的基本重负。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在于,在雇佣劳动者、工人和职员物质状况急剧恶化,甚至丧失了苏联时期那样的对劳动过程的组织施加影响的杠杆的条件下,承担起维护他们的利益的任务。除了直接涉及劳动领域的任务之外,社会主义者在维护公民的社会权利方面还有广阔的活动天地。现在,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获得符合质量的医疗帮助、得到必需的药品、使孩子受教育、组织休养等的状况大大

地恶化了。现代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可做,但是在现代俄国还没有像样的社会主义联合组织,并提出为大多数居民所理解的政策。

原因何在呢?除了其他的原因(缺乏稳固的社会主义传统、组织方面的困难,等等),我只想指出一点:一个长时间生活在意识形态检疫环境中的社会突然之间热衷于自由主义的思想,最初是大众传播媒体热烈宣传关于社会不平等的好处的思想。但是,在上述不平等的某种积极方面产生影响之前,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它的有害影响——居民贫困,政权腐败,以从未有过的规模盗窃国家财产。人们肯定还记得在私有化之初时流行的自由派的论据:现在谁获得财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私有者。我们现在正在收获这种不道德的政策恶果。留给我们的唯一的光明前途是——等到我们的孙子辈的时候,我们的暴发户将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

然而,俄国在道德上复兴,同时也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复兴的真正希望不在这里,而在于在人道主义的平等思想鼓舞下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当代俄国社会处于病态之中,造成这种状况的重大原因之一是几乎自愿地忘却人道主义的理想。为了抵制无原则的致富,应当在我国唤醒人道主义、人类团结和文明的崇高理想。这样就能形成健康的道德氛围,劳动者、企业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人都将从中受益。

(载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4期)

顾家庆 译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 社会主义保守主义

[乌克兰] 弗·希洛夫

在我国,各种思潮转换,其速度快得离奇,从几乎普遍笃信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搀杂着一点持不同政见者的创见),直到又普遍热衷于自由民主的高调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公开性。但这“还没到尽头”,因为保守主义的浪潮又在兴起。又是召开“圆桌会议”,研讨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又是发表文章,剖析保守派的社会政治学说,剖析国内外保守派思想家的著述。更有人断言:“弘扬保守派世界观乃是我国社会学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在前苏联境内,特别是在两个最大的前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保守主义,其现状和前景究竟如何呢?

首先谈谈与保守主义现象有关的几个一般论点。保守主义就是固守旧有的事物,主张保留现存的事物。作为术语,这个名词是

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 于1818 年最早使用的,如今它已用于日常生活、家庭婚姻关系、艺术、道德等人类生命活动的不同领域。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领域,这个名词具有两个基本含义,然而究竟其中哪一个为主,对此国内外研究者莫衷一是。

普遍人类学的诠释。在这个场合,保守主义被理解为全人类的永恒立场,其中包括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和思想。传统(遗产、继承性)、稳定、秩序、权威、自由以及与之相结合的责任感、人与人之间的天然不平等、怀疑主义等等,均属于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观念。

人类学的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历史渐进成长的天然有机产物。在这里,“生长”是与“制作”相对立的,也就是说,保守主义反对对社会进化过程进行任何人为的干预。真理并非寓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之中,而是寓于具体的经验之中。经验和习惯与理性、逻辑、抽象概念相比,是更好的参照系。

人被解释为同时受到本能、情感和理智驱使的生物。恶是人本性所固有的,而并非特定的社会制度所固有的。社会高于单个的个体,人的权利是由人的义务引伸出来的。

社会组织是复杂的、多元的、等级化的,它是不可简单化的。与其支持未经验证的新制度,不如维护那些体现着先辈智慧的现存制度和治理方法。人们为消除现存的恶而做的种种尝试,通常导致更大的无序。

情势诠释。在这里,保守主义被理解为那些力图保留现存制度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中间并不存在对某一具体的历史情势的“眷恋”:保守主义被视作不同的群体、党派等在不同时代不断重复的立场。照此理解保守主义,把俄国

弗·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者,君主贵族思想代言人,著有《基督教真谛》等书。

历次革命时期的君主专制派及目前的正统共产党人算作保守派,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国外有位理论家·亨廷顿说情势保守主义是一种立场意识形态,此说令人不能不同意。他说:“保守主义之产生,是为了对抗特殊的历史危机。一旦这种需要消失,保守主义哲学也就绝迹。在每一种情况下,保守主义都表现为对特殊的历史情势做出的反应。保守主义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种种表现,相互间都少有联系。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并不反映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

由于这个缘故,在情势保守主义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完备的学说,就连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拥有的那种整套的主导思想,它都不具备。亨廷顿写道:“没有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促成保守主义的因素是理论家所面对的挑战,而不是他背后的知识传统。人们之所以投奔保守主义阵营,是因为对事态变化感到震惊,是因为恐惧地感觉到,他们曾支持过的或者视为天经地义、并与之息息相关的成规定律或典章制度,突然之间不复存在了。”因此,人们往往是以革命者开始,以保守主义者而告终。

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人类学保守主义和情势保守主义通常是互动的。人类学保守主义作为一般思维方式、一般世界观,受到具体情势的推动,并且具有极力保留、维护特定的社会制度的特征。

保守主义视其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而有所区别。保守主义通常划分为主张恢复腐朽制度的“反动的保守主义”、企图保留现存事物的“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以及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支持在保留今昔时代积极内容的同时进行必要改革的“改良主义的保守主义”。后者不反对渐进主义,而反对激进主义。

保守主义还可以分为“价值观保守主义”和“结构保守主义”。价值保守派在忠于原则的同时愿意改变社会结构;而结构保守派即使对改变结构也持否定态度。

正如我们所见,保守主义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必然特征。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成分搭配不同,而且这种搭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差异。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保守主义,作为它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定看法。

我国当代保守主义的产生,是对自由派激进主义实践的负面后果做出的反应。改革的动因之一,就是对人性善的信念。改革的思想鼓舞者和倡导者,是60年代的一批活动家,他们抱定的宗旨是从道德上净化社会主义,使其摆脱“官僚主义的腐蚀”。当时占上风看法,是认为人民是各种美德的载体,而权力(官场)则是各种弊端的渊藪。认为只要把人民从腐化变质的权力下解放出来,群众的自主创造将确保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取得进步。这就是改革之初的主导思想。

然而“解放了的”人们之所作所为并不如所设想的那样。他们表现出他们并不是集体主义者和利他主义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个人捞取几个卢布的好处,比国家遭受数百万卢布巨额损失更为重要。“攫取本能”主宰着各个层面。“上层”热衷于私有化、许可证、出口限额、收受贿赂。而商务旅行,换句话说,投机倒把和贩运私货,则成为“下层”的群众性职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大多数居民证明他们更像是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和开拓者。

人的破坏性因素表现为犯罪率触目惊心增长。例如,在乌克兰,据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的看法,已经形成了“第五权力”。所谓“第五权力”,即黑手党权力,正在迅速地压倒权力的其他分支——立法、行政、司法、大众传媒。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境况

参见《怎样消除第五权力的危害》,载《政府信使报》1994年8月9日。

也不比这里好一些。人的攻击本性和非理性本性,在民族流血冲突中也表露出来。

可以说,“解放了的人”不是更善,而是更恶。类似的结论和保守主义千百年的传统如出一辙。醒悟了的激进派,即“人民的解放者”痛心疾首,无可奈何。诗人叶夫图申科说:“我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肯定出了什么岔子。由于我们可以说根本不了解自由为何物,我们便把它加以理想化。例如,我们曾把言论自由当作一把打开繁荣大门的神奇钥匙。然而事情绝非如此,因为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言论自由不能当衣穿,在寒冷的冬天,言论自由不能给房屋供暖。此外,我们在把自由理想化的时候,以为自由总是只有一副美丽的面孔。”但是,如果说许多“解放者”由于拥有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过得还算不错,那么,“解放了的”人民日子可就艰难得多了。

“解放了的”社会辜负了对它所抱的期望。它简直变得失控了,各个方面唯一明朗化的趋势就是倒退。你不能不同意 . . . 佐托夫的见解,他说:“在俄国、乌克兰以及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发达世界(部分地也与第三世界)的典型趋势背道而驰:原料采掘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在增长;生产中的原材料消耗量和能源消耗量在增加;与此相反,科研、教育、医疗的经费开支份额以及这些部门对经济的贡献都在下降……”例如,1993年乌克兰的国民收入比1985年减少了33.2%,1994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8.5%,工业产值下降了1/3以上。而且降幅最大的是机械制造业各个部门、轻工业,在情况较好时,还有原料采掘业。这样一来,工业生产结构日渐恶化。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情况也与此类似。

《叶夫图申科谈生活的诗歌和散文》,载《论据与事实》1993年第6期第1页。

自由主义宣称,自由之于社会发展,既是一个必要条件,又是一个充足条件。然而自由主义在前苏联境内却产生了负面效果。因而时下的口号不是自由,而是保守主义主要价值之一的秩序。秩序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际关系受制于特定的规则(规范、法律)。前苏联的所有共和国的居民都渴盼秩序。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事物都与秩序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公民人身安全,适用于个人和国家的明确划一的法律准绳和道德准绳。当然,对这些准绳的内容进行讨论是必要的,并且永远不可能达成尽善尽美的决议。但是,这种决议无论多么不完善,一经全社会采纳,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直到通过另一项决议为止。坏的法律总比完全没有法律要好。

此外,秩序还意味着公正。所谓公正就是订立由社会从道义上认可的福利和负担的分配规则,维护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但对当前一个时期是确定的劳动和报酬关系——犯罪和惩罚关系。因此,秩序要求在社会中必须把个人所创造的利益同他的福利待遇水平严格地联系在一起,不允许有好吃懒做、坐享其成的现象。

秩序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可预见性和可控性,是人们对明日抱有信心的必要基础。秩序是照章办事。秩序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权力。以监督由社会所通过的共同生活的法律和规范得到遵守,这种权力就是惩恶扬善的权力。

. . 莫伊谢耶夫院士的话很有道理。他说,软弱的权力可能导致事态按照“阿根廷模式”发展,即一个富国陷入贫困的深渊,虽然产生了一小撮富人,他们买游艇,置别墅,送子女到尽如人意的“国家去留学,而国家、人民及其文化将持续倒退。腐败的官员

将越发感到他们可以完全逍遥法外。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权力和秩序。诚然,反对强化国家的人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会导致腐败的加重,导致官员年金的变相膨胀。有人认为,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会把一切都安排就绪。

的确,1991年国家被大大削弱,可以说已被摧毁,在这种情况下断然过渡到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自有其道理,况且从当时的政治情况而言,这恐怕是唯一可行的一步了。但这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不应当具有长期不变的性质。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代表并实现各阶层居民、各地区、各行各业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国家机构,是无法正常运行和发展的。现今的国家制度还只能对当前的紧急要求,特别是对那些扬言要“关掉氧气阀门”的人们(矿工、交通运输工人)的要求,做出反应。不错,国家官员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用来谋取自身利益。例如,乌克兰前代理总理·兹维亚基尔斯基现在涉嫌贪污巨额公款(该案涉及数百万美元)。显然,只要这样的国家机构存在,混乱和失控状态就还将继续下去,但这种情况不能把国家观念本身全然抹黑。

现在已经清楚,被寄予厚望的市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架构,是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这里需要国家去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企业经营也需要国家扶持。当然,还必须用法律保护企业家免遭官员们的欺压,用强有力的护法体制保护他们免遭迅速组织起来的犯罪活动的冲击。

强大的国家乃是组织市民社会并使其结成整体的根本——这

参见··莫伊谢耶夫《俄罗斯的朦胧(黎明还是黄昏?俄罗斯在十字路口)》,载《政治研究》杂志1993年第1期第13页。

参见安德斯·奥斯伦《东欧改制前四年的教训》,载《自由思想》杂志1993年第17—18期第95—97页。

种观念也是保守主义的观念。

国家的强大并不在于其机构的人员众多,而在于组成这个机构的人员具有专业能力和廉洁奉公精神。因此,这里所说的国家强大是指知识和道德方面而言。当然,当社会所认可的秩序受到威胁时,一个强大的国家却没有实行经济强制和肉体强制的能力,那也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一个因素,使得保守主义世界观变得具有现实意义。保守主义的特点是从不相信绝对化理论,而更相信经验。在各项改革过程中,理论和满脑子装着抽象方案的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破坏性的。早日实现市场民主理想,是多数甚至大多数居民的愿望。这个愿望在积极分子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它促使他们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自由主义激进派运动的一位积极分子说:“我感到自己一直不痛快。我们的确像是生活在樊笼之中。真想向人们证明他们是自由的,总想请他们站出来说话。只有使人们转变,才能继续前进。”

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立足于理想,这样做万无一失:现实永远“达不到”理想境界。90年代初,主张彻底变革的人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纲领。据一位民主运动参加者回忆,当时只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就是逼迫苏共这个怪物走下政治舞台。直到八月政变之后民主俄罗斯党才不得不思考该做些什么。而在此之前根本无暇顾及。”的确,1991年8月政权转到自由主义激进派手中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赖以博得居民好感的连篇累牍的承诺,多数是无法兑现的。事态发展的逻辑提示人们可以采取类似

· · 莫努索娃《参加民主运动的动机和价值》,载《社会学研究》杂志1993年第6期第67页。

· · 卡巴利娜《以谁的名义,反对谁,为了哪些价值》,载《社会学研究》杂志1993年第6期第49页。

“强力手段”的行动。但这样做却不符合民主派的形象——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的确，在管理机构被摧毁的条件下，这种政策显然是行不通了。

对自由派，即我们这里的所谓民主派所提出的理想，恐怕难以作出实质性的反驳。我们只指出一点，为按照这种绝对正确的理想改造现实而作出的激进的革命尝试，却导致了人民处境恶化，导致了社会倒退。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还记得形形色色的激进派的特点就是对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抱有简单化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激进的自由派同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有着亲缘关系。

保守主义有一个立论必须再次强调，那就是：由于人的才智有限，根本不可能预见自己的干预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人无权轻率地承担改造世界的使命。因此，在推行任何社会计划时，都必须随时对意外的不良后果有所准备。社会不是一个其参数显而易见、其元件可轻易更换的技术系统，而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机体。故此，对社会改革而言，“培育”一词比“制作”更为恰当。社会思潮的发展应当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只能依据社会机体的内部特点和趋势因势利导。那种伤及社会筋骨，留下不愈创伤和疤痕的猛烈摧毁的做法（革命变革），在这里是不可取的。在社会改革中循序渐进，审慎行事，宁取生长而勿选“制作”——这些也是保守主义者的传统口号。

如上所说，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保守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仍旧是保守主义的主导形式。当然，也还存在着主张恢复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之前的旧体制的保守主义，但这种保守主义很少见诸社会舆论和政治实践，虽然它并未丧失前途。

自由派激进主义未能奏效。其失败原因并不仅仅在于未考虑到经济生活制度化的特殊性（在没有竞争和亏损的国营企业破产的情况下放开物价，是不可能收到良好效果的），还在于社会传统

的惰性作用,大众意识价值取向的惰性作用。外部标志,诸如国旗、国徽、民族英雄称号、街道名称以至国号,改起来很容易。而要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定型观念是很难的。时至今日,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仍旧是社会主义意识,即自由派激进主义的政论家们所谓的“待哺”意识。研究人员指出如下事实:声称自己生活下降的人数在增加,而愿意再另外找一份工作的人数在减少。穷人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国家的照顾。原先预期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蓬勃迸发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对经济平等的向往一如既往。大多数居民对八月的胜利者叶利钦所抱的期望不是实行倾家荡产的市场改革,而是改善生活。一些社会学调查资料就是明证。例如,在问到“对于社会主义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这一论断您持何种态度?”时,早在1992年夏季就有35%的俄国人回答说完全同意,32%回答说部分同意。在独联体和东欧19个国家举办的一次调查中,12个国家的被调查者认为从前的制度比现在的制度好(从波兰的39%到俄国的59%),13个地区的被调查者把国家的发展方向界定为错误的(从斯洛伐克的47%到匈牙利和亚美尼亚的67%)。在俄国,达90%的居民固守社会保障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在乌克兰,59%的被调查者更看重指令性经济,只有19%更看重市场经济。

对于过去传统,应努力使其成为社会改革进程中的支点。摒弃这些传统是毫无道理的——人民的习惯是个十分沉重的载荷,尽管在有些方面甚至很陈旧而不合时宜了。如果使人民丧失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就会沦为世界文明的“阿斗”,只等待着“大人物”来拍肩膀表示赏识。

针对此种情况,还有一句保守主义式的格言:“如果我们今天

参见 . . . 瑟乔夫《“市场”中的一年》,载《社会学研究》杂志1993年第5期第81页。

珍惜过去,过去就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我们在观望中抛弃过去,过去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

对原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东欧国家(波兰、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等)和亚洲国家(中国、越南)正在进行的改革做一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模式比起“自由派保守主义”模式,在经济上收效更大。改革方向相同,但效果各异。即使走自由派保守主义道路最有成效的匈牙利,其工业产值在1989年至1992年期间也下降了42%,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20%。据推测,要到90年代末的某个时候生产才能开始回升。这就是说,匈牙利只能在下一个世纪的某个时候使产量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根据最乐观的预测,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也只能在下一世纪使其居民生活达到改革前的水平。然而据俄国激进自由派的最初预测,这个水平本应在1993年夏季之前达到。

与此同时,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国、越南),生产和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科研和教育拨款不断增加,外国投资不断涌入。

一种情况是,依靠现有传统,十分谨慎地对待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稳步前进。另一种情况是,大破意识形态的信条,摧毁旧的政治体制,弃绝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传统,从计划经济一跃而进入市场经济。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这一跃却等于坠入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混乱的深渊。

西方曾有人设想,只消两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就能在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并取得稳定的发展速度。如今西方困感而又惊恐地注视着后共产主义国家失控的进程。然而,如果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要用二三十

参见 .莫尼奇《匈牙利市场经济的形成》,载《社会科学和现时代》杂志1993年第6期第134—135页。

年时间才能“消化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么又有谁敢于承诺把俄国和乌克兰这样的破落大国提高到“世界水平”呢?

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机体是排斥自由派激进主义的。左派力量在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各国大选中获胜,在俄国取得显著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乌克兰,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力量(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农业党人)在最高苏维埃中占到三分之一,而共产党党团是议会中人数最多的党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的阵地在加强,虽则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绝非铁板一块。把斯大林制度视作理想境界的反动的保守主义集团人数甚少。“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现在很难加以区分,因为没有一种政治势力情愿维持当前全面崩溃的局面。不过,那些希望倒退到1985年4月以前的人,倒是可以划入这一类型。这叫作“维持现状的”结构保守主义:对于乌克兰共产党多数党员来说,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市场关系,都是不能接受的。

此外还有一种十分庞杂的力量,可以划归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在乌克兰,站在这种力量左翼的是包括他们的领袖——西莫缅科在内的部分共产党人;站在中间的是社会党人;而站在右翼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拒绝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但认为过去不仅仅只有“极权制度的种种灾难”,还有许多在向多元化民主和市场经济社会过渡时必须保留的积极东西。在这方面,乌克兰内阁经济发展和重建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奈焦诺夫教授发表的言论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三年的时间莫非还太少,还不足以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乌克兰所需要的,并不是只会使经济遭到破坏的全盘私有化,不是加剧通货膨胀、助长巧取豪夺行为的放开物价和货币流通,而是国家对物价、货币和信贷实行管制,把美元逐出货币流通领域……使工业重新合作化,振兴工业各个部门,为本国生产者提供关税保护,对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实行国家管

制……不要再高谈阔论宏观经济了,到了着手安排生产的时候了。”

这种“羞羞答答”的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相当平稳而又不引人注目地转向左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把温和的、可控的自由化作自己实行改革的航向,也就是说其主要任务不是破坏旧的东西,而是为新生的进步事物腾出空间。改革的经验表明,破旧本身并不能保证立新。在乌克兰,把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温和的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人物,目前是库奇马总统。这使得人们对立法权力机构和行政权力机构的合作有了希望,因为这两个机构谁也不倾向于激进的自由主义。

乌克兰未必会像某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希望的那样走上“中国道路”。但是,尽管新的国家领导班子主张更加果断地推行改革,乌克兰也不会走纯市场的“波兰道路”(顺带提一句,就连波兰自己也正在改弦易辙)。正如库奇马总统在对《乌克兰青年报》发表谈话时所说,“有人说世界走出危机靠的是纯市场手段,这是无稽之谈”。乌克兰内阁通过了1995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编制构想,那上面规定要提高对经济调节的效益,这里的调节就是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自由派激进主义在1991年8月之后似乎已取得彻底胜利,然而目前它不仅在大众意识中正在失去威力,而且作为官方学说也正在失去威力。现在乌克兰政府执行的方针,可以说具有社会主义改良派保守主义的一些特征。这里必须就用词补充几句。显然,社会应该从反共的极端中解脱出来了,应该克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些字眼的抵制态度了。任何一种主张限制市

· 奈焦诺夫《我们的病态经济不需要巫师》,载《基辅新闻》1994年8月12日。

《一个操纵游戏的人》,载《乌克兰青年报》1994年8月19日。

场自发势力,主张对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称之为社会主义政策。但是,既然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所有国家的政策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部分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些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如密特朗、罗卡尔,冈萨雷斯等人,都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是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运动,比我们改革前的那一套要宽泛一些。不过,那个时期也并不是一切都不好。对于诸如集体农庄或传统的生产领导方式这类旧的、不完善的、在没有新的之前仍起作用的东西主张加以保留,这就和保守主义有关联。但这是一种改良派的保守主义,因为这里认识到了旧事物的不完善,并为扶持诸如农场主、中小型商业、吸引外资等等新事物而工作着。这种保守主义就其性质而言,乃是价值观保守主义。因为在坚持社会保障、集体主义这些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同时,这里还令人感受到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决心,而相对于这些价值而言,经济和政治结构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这种隐蔽的“国家社会主义”甚至比公开的“党的社会主义”更为优越,因为俄国、乌克兰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开申明自己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提出的建议往往超出最佳极限而偏左。他们力求使诸如退休人员或其他经济成分中的弱者、贫苦无告者都“得到温饱”,有时提出全盘社会保障的主张,而这样做归根结底反而使保障对象身受其害。国家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褒义的官僚社会主义)对所治理的人民抱有健康的怀疑态度,对所谓的“普遍人”表示出合乎理性的不信任,这就是其人类学方面的保守主义所在。

国家社会主义是行政权力的有节制的社会主义。在这里我们观察到它对立法权力的铺张浪费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整个民主制度抱有不信任态度,它力求在管理方面保留等级制度,在组织整个社会方面保留不平等。这中间也体现出保守主义的一个特征,只不过这已经属于人类学保守主义了。

对待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的态度显然也在改变。民主的狂热已经过去。居民把自身生活条件恶化,同经民主途径选举产生的各个机构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些机构是反映全国多数人的意见的,是代表人民的意见的。但是,人民或者说其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永远正确吗?经验表明:民意可能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可能考虑不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可能很容易被大众传媒所操纵。有一种见解越来越明确:无论是关系到决定自身命运,还是关系到决定国家的未来,人们做决定的能力是不相同的。国家级的重大决策,应当由有责任感和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做出,而不应当让那些哗众取宠的空谈家去做,他们的奔走操劳反而使人民陷于困境;人民只须在这个或那个负责任的政治精英集团之间做出孰优孰劣的选择。属决策层次上的政治无需群众性。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不应该拿到群众集会上去解决。这里需要斟酌推敲,清醒地估量一切可能产生的后果,善于从总体上权衡利弊。政治作为管理社会的一门艺术,和任何艺术一样,都是属于精英的。这一点已变得很清楚:民主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民主不是绝对价值,而是次生性价值,相对于诸如人的生命和安全,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这些绝对的东西而言,民主只表现为辅助价值。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去构筑,而是应当自下而上地逐渐成长起来。我国的民主需要好多年乃至好几十年,才能这样自然地成熟到世界标准。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保护社会免遭政治化的少数人干扰,他们跃跃欲试,力图强化事态的自然进程。

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逐步实现自由化并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在中国、越南、俄国、乌克兰及独联体其他国家,我们在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能观察得到,然而这种自由化和转变的一次良机已经被错过了。

社会主义的大众心态失去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为凡是含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词句的意识形态体系,均已被搞得信誉扫地。大众媒体紧锣密鼓地灌输自由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而这些规范和价值在我国土壤中则被庸俗化,把不惜任何代价直至用犯罪手段谋求个人致富和发迹视为天经地义。

但是,社会改革需时不止一个十年,没有一个把个人和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理想,没有一个使个人行为具有超越个人意义的理想,这种改革就无法进行。仅仅只有盲目而强硬的市场力量还不行,它把社会上的一切弱者抛在一旁,只鼓励需要专业技能、创造最终效益的劳动。必须用某种超越个人利害的任务使个人活动具有崇高而神圣的意义。这就需要一种“共同事业”。从大众意识演变过程来看,重建一个强大的国家,壮大国民声威,应当成为这种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事业”,因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正在被重新弘扬。但这只是在俄国。像白俄罗斯、乌克兰等这样一些国家,情况则比较复杂。这些国家起初曾热衷的独立国家观念,由于经济方面产生的困难而失去了吸引力。这里正在滋长着重建昔日联盟,急于同俄国联合的情绪。

独联体各国人民都这样或那样地向往一个能够为人提供保障的富强国家,向往一个可以为之自豪、为之效力并可以把子孙后代托付给它的国家。对“改革前的”过去的怀旧之情正在增强。的确,人与社会相互关怀的社会主义观念至今尚存。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必须强化这一观念的建设性和爱国主义即献身于社会的一面。这种保守主义价值应当存在于社会,其存在程度应当不亚于自由、自我表现这样一些自由主义价值。

激进革命的陶醉时代在结束,一个伴有酒后头痛和为酒醉胡闹而悔恨的心情的头脑清醒时代正在到来。循序渐进地推行改革,依靠社会机体内部力量,以社会自然生长为重点,自由只能建立在责任感和不可动摇的秩序的基础上——这些口号在前苏联境

内的新兴国家中,正在成为当前口号,成为通向可预见、可控制的未来的指针。

(载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3期
范国恩 译)

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 社会比较分析

[俄] . 纳夫罗茨基

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最后十年间, 出现一些过程, 其深度和广度可以证明, “社会制度的基础正在更换”。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却感到, 社会的某些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社会学家们根据问卷调查材料, 对这一问题作了这样的表述: 如果说社会相当轻松地摆脱了旧制度的外特征, 那么“内在的共产主义”却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

保留在社会中的这种内核的本质规定和表现不仅具有纯理论意义, 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因为它有助于理解本质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然而, 在科学文献中还没有对共产主义社会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比较分析。着重点要么集中在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回顾性的描述(西方历史学家大体上如此), 要么只对过渡时期进行分析。

在前苏联方面, 1991年8月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是划分两个时代的“断裂点”, 在一个坐标系中对两个时代进行描述似乎是毫

无意义的。对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的这种“划分”的理解是由两个重要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心理因素的性质,它与事件的非同寻常的迅速发展相联系;另一个原因显然是分析家们的期望,他们想等到局势稳定下来以后再说。这种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含糊的公理,即只能对固定不变的社会状况进行比较。但是,现代科学的方法(包括动态系统论)能使人对那些非固定不变的现象进行比较。那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具有一成不变特征的对象的观点也是过于简单的。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前苏联为例,对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着重点集中在对那些历史上经历过或继续经历“共产主义”阶段的国家来说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性。

作为动态系统的共产主义社会

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至少在最初阶段要求把对社会思维的描述简化,把它简化成少数最重要的特征,其变化要能最概略地反映社会的演进。为此可以采用包罗万象的系统分析方法。在社会学中,系统方法的运用是相当广泛的。

众所周知,系统应理解为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并形成某种整体性的要素的总和。就人类社会而言,这个定义的具体解释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在这里可以这样做: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要素是把人按某种特征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我们把社会分成群体的这种或那种分解称为系统结构,或称为层面。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相适应。保持这些关系的方式

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关系决定着相应系统的稳定性,或者说社会的生命力。我们把这些方式的总和称为稳态调节机制。社会中现有的经济在多数情况下是稳态调节机制的一部分,尽管其基本特征(例如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可以作为整个社会的独立的特征来考察。

以上述方式构成的社会制度是以五个概括化的变量来描述的系统,这五个变量是:成分、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点、稳态调节机制、经济类型。在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时,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变量可以分解为一些别的子变量。例如,成分和结构取决于社会分为群体是以何种(政治的、民族的、职业的等等)特征来进行的。同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以相应的方式在发生变化。既然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发生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在共产主义现象中,按照所受教育的程度、宗教信仰、职业和民族属性诸特征区分的社会的层面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沙法列维奇在其著作《作为世界历史现象的社会主义》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

研究这些社会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方面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政治方面与政权的关系,社会方面拥有(或不拥有)各种特权——这都是大体上规定相应系统的成分和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共产主义系统的重要特点是,由这些特征中的每一种特征所规定的结构是相互一致的,因为掌握生产资料、权力和特权的是同一部分人。按上述特征由社会重合层面产生的这种原始性结构,我们称之为基本结构,而把相应的要素称为系统的基本要素。共产主义系统

我们的分析对象不是作为一种理论构想的共产主义。我们所指的是这样的现实社会,它们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形成于俄国,后来又 在其他一系列国家中建立,而且社会的类似现象在世界历史的不同时期不止一次地产生过。

的基本成分和结构非常简单:居民分为两个部分,其中少部分人(3—10%)拥有全部权力、生产资料和某种特权,而大部分人只完成纯劳动功能,处于对少数人的完全依附地位。这就为把“阶级”这一术语应用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依据。人们常常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称为政治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但是,严格地说,只有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共产党的党的机关人员才属于政治精英。

共产主义系统的下列变量,即要素之间的联系的性质也是比较容易鉴定的。系统的基本要素,即社会的“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是和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相互联结着的。在共产主义下这些关系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它们深入到了各个社会群体的内部,不仅在宏观上而且也在微观上决定着层面的特点。在宏观上维护这些关系的稳态调节机制(第四个变量)包括三个子变量。其中一个子变量可以确定为被奉为政治学说的政治暴力。社会的每一个人,只要不服从所确立的行为规范,就成了行使强制作用的对象,这种强制作用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从对肉体施加暴力到剥夺权益)实现。其他两个子变量——意识形态和经济——形成并维护某种行为准则和思维准则。经济这一子变量可以作为系统的一个独立变量来考察,这个变量是由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严格的中央集权的管理性质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来确定的。

当然,这里提出的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是不完全的,也不是唯一可行的。系统分析意味着要确立模型的相互协调的格局,其中的每一种模型要反映实际对象的特性。不过对上述模型

我们使用“特权阶层”这一术语,指的是:除了党的机关人员外,还有军队和强力机构的高级官员、国家官员、经理群、知识分子中的上层人物和其他某些社会集团。

要提供足够的信息资料,使之能反映共产主义社会一些基本特点,同时也要有足够的伸缩性,能通过模型变量的变异使之与这个社会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某种状况更加相符。最后还意味着,模型要能描述社会状况的变化,亦即模型应是一种动态系统。

如果指的是俄国和苏联,那么上面所作的描述更加适合于大约1930—1965年的时期。我们认为,这一时期代表着共产主义社会的“成熟”状态。在这之前的阶段的特点是,社会关系及经济体制原则中的变异是多种多样的。1965—1985年时期的特点则是稳态调节机制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潜在性和单变性。暴力、意识形态和经济逐渐失去了其作为稳定性因素的效力。到80年代中期,稳态调节机制逐渐恶化到了临界点。以后阶段所广泛采用的“改革”这一名称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在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国家间和共和国间的关系急剧崩溃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应阶级的重新组合、改革的逆反过程和稳态调节机制的同时改革。所有这些过程的结果是共产主义的大规模崩溃。

这一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后共产主义是新的阶段还是新的系统?

苏联的解体和许多国家的建立,是改革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最好还是把它放在另一种模型中进行考察。从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来看,在新国家中,社会状况的差异与其一般特征相比,很少是根本性的。这些差异必然会对社会系统的变异提供某种动因,在进行比较详细的分析时,这种变异应当予以考察,但可以大体上忽略不计。

共产主义崩溃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党的机关、享有特权并拥有全权的社会群体消失了。不再有作为这个群体的统治基础的意识形态。作为日常生活要素的政治暴力已成为过去。确定了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经济变化趋势。发生了社会生活的广泛民主化(大众传播工具的相对自由,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公民投票等)。我们现在以系统论的语言来表述这些事实。

共产党机关退出政治舞台并不等于该社会群体的消失。把这一群体作为系统要素来考察以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一要素变成了在系统结构中实际占据那个位置的那种类型的另一种要素。实际上,大部分政治精英变成了经济精英,以政治权力换取钱财。小部分人成了国家官僚或重新回到了政治上的俄林波斯圣山,尽管是以反共产主义者的角色出现的。特权阶层的地位产生影响。特权阶层也进行了重新组合。特权阶层从最精明能干的科技知识分子代表、刑事犯罪和有组织的犯罪方面的权势人物那里得到补充。在过渡时期的初期,社会流动性迅速增长,随后逐步减少。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并未对作为系统基本要素的特权阶层的地位产生影响。特权阶层仍旧占有生产资料,尽管是以另一种方式占有的。以前是集体占有,而且是不明确的占有(国家占有),现在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了个人所有。特权仍旧保留着,甚至扩大了。特权阶层的权力虽然失去了绝对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只间接地表现在经济方面并且权力分散,但实际上无权的居民并未减少,也未降低其对比以前拥有更大自由的统治阶级的依附性。正统的共产主义还以某种社会保障来回报公民的虔诚,而后共产主义甚至连这一点也难以办到。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形成因素,在系

俄林波斯圣山,又译奥林匹斯圣山,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推翻提坦神系后的居住之地。——译者注

统中出现了某种位移,但系统的基本成分和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关系的特性保留了下来,因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仍旧占主导地位。发生变化的只是维持这些关系的方式:不再有政治暴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指令性经济迅速崩溃。这就意味着,稳态调节机制的结构在变,但还谈不上这个结构的基本原则也在变。不难看出,这些原则依然如故。

实际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整个意识形态的消失。目前代替它的是市场意识形态和“光明的”资本主义前景的意识形态。形式上这是一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但实质上还是那种粗俗的、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在于,人们接受(或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是随意的。但是,在已形成的条件下,新学说的胜利不需要镇压来加强。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工具都在宣传它,而根据心理学的摆动定律,群众意识接受这种新学说比接受别的东西更容易。不妨回忆一下,本世纪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的成功也首先是靠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取得的。至于稳态调节机制中的经济成分,那么由特权阶层通过市场、银行、股份制及其他商业结构等垄断性的控制系统所实行的经济强制,一点也不比在国家垄断经济中所实行的强制少。

因此,系统的五个变量中,只有两个变量即稳态调节机制和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并且远不是最重要的变化。这是否为把新的社会系统与后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提供了根据呢?或者说,这里应该谈论的是演进的新情况还是新阶段呢?从系统分析的观点来看,稳态调节机制的结构具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它可以在系统演进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个观点也可以应用于诸如生态学的领域。所以,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使经济领域的变化具有何种意义。从科学杂志上所发表的观点来看,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向市场关系的实际过渡既没有在财经领域,也没有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经济中的变化基本上取决于旧系统的发展逻辑。换句话说,经济中的

主要因素仍旧是特权阶层中的不同群体在某种经济条件下所实现的利益,而提高经济效率、稳定与发展的要求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因此,现在把新的社会系统与后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还缺乏根据。

这一结论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通常把指令性经济、禁止私有制、国家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政治暴力当作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特征,但实际上它们不是系统形成的特征。这些特征至少不是所谈的社会系统的那些特征,它们只描述了实现其基本公理的具体途径。这些途径以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途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而系统却保持了它的完整性。

社会系统的公理

在对社会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时,可以尝试确立社会系统的某些公理,例如:基础结构相对于某些改造类型的不变性;经济层面递减率的增加;系统经济效率的提高。

这些公理和其他原则的某种组合,加上起始条件和外在条件,在一定时期内规定了某种社会系统演进的性质和方向。例如,系统经济效率提高的条件本身也意味着,(在其他同等条件下)在所有可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有可能实现的是那些有助于经济效率提高,亦即能提高把自然资源再加工成为该社会的人所用的物质财富的经济能力的结构。

在共产主义系统中,规定社会群体垂直结构形成规则的原则具有重要作用。任何系统都有可能形成这一原则,但是,一般来说,在公理的等级上,它并不处于首位。在大部分情况下,垂直结

构的形成是通过错综复杂的正反两方面的双向联系,同国家的经济状况、大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在非共产主义系统中,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的变量取决于更高层次原则的作用程度。

在共产主义系统中,这个过程(特别是吸收精英)首先是与精英们保持其特权地位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能力本身也是由共产主义关系的特点、官僚结构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和领袖心理规律等来决定的。在这里,对经济变量的依存性只是表现在,这些变量对因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如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影响可能是很少的,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精英保持并改善其地位的能力可能与经济指标的下降成正比。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垂直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不依赖于具体社会状况的准则的总和来调节的。这种准则的总和是系统的某种常数,并且它是一种基本的常数,因为精英们的基本功能——管理功能和完成这种功能的素质决定着整个系统的演进。这就为把这种准则的总和作为共产主义系统起主导作用的公理提供了依据。按照这个公理,精英的主要素质是“留在上层”的能力,所以也许可以有条件地把它称之为“权力公理”。

任何系统的重要特征都是在其构成要素之间占优势的关系形式。在很多情况下,也正是把这种关系形式作为系统构成的特征来考察的。因此,对于社会系统来说,这种特征也可以在个体与个体之间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领域中找到。共产主义系统是在所谓的公有关系中以及使这些关系向其极端形式的过渡中形成的,它的形成与统治—服从关系的扩展密切相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不仅取代了系统的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形式,而且取代了

系统的所有其他要素包括单个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形式。所以,把这种统治—服从关系形式的主导作用和稳定性看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系统构成的特征,是完全正确的。

可以说(无论是形式上,还是以具体例证),关于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系统主要变量重合的结论和关于起主导作用的公理的不变性和系统构成特征的不变性的论点,其意义是相同的。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撇开“权力公理”不谈,前苏联首先在共产主义的,随后在后共产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中所进行的所有主要过程看来都是荒谬的。显然,把这个公理区分出来作为起主导作用的公理是比较确切的,如果考虑到从共产主义向后共产主义的过渡本身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结果的话。但要充分证明后一个论点还需进行个案研究。

结 论

对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两种社会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共同特征,即:

? 在拥有政治权力、社会特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特征方面存在着重合的两个水平的层面;

! 在社会中“统治—服从”关系占主导地位;

”存在着调节社会垂直结构形成过程的准则的总和(“权力公理”)。

这些特征描述了这样一种“内在的共产主义”,它比1991年8月苏联一小撮人进行不成功的叛乱之后或者东欧“天鹅绒革命”时期所能展示的更具有生命力。在不同国家,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内

核的保持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种程度还是非常高的,足以对那里所发生的进程给予显著的影响。在具体情况下,估计这种影响需作详尽的分析。我们所提供的方法只能作为在这一方面进一步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载俄国《社会政治杂志》1995年第5期
戴隆斌 译 李宗禹 校)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原因的 结论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

[希腊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5. 社会主义被推翻,并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的经典观点的验证。其所以可能,是因为关系到党的作用、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的社会主义基础方面削弱了,发生了变化,遭受到了打击,而这些基础方面是保护社会主义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错误和专横之害的安全阀门。探讨深层原因,就必须对导致这些事件发生,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政治方面向资本主义倒退提供了前提的一系列因素进行研究。出发点仍然是这样一个观念: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它只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

社会主义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复辟行动是从内部自上而下地开

1995年在希腊举行了有33个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是在希腊共产党的倡议下召开的。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以及克服危机的途径问题。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会议准备了一个供讨论的提纲。这里选译了其中的一部分。

原文如此。此处似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译者注

始的,事先并未发生旨在恢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或人民起义,或国内冲突。工人革命运动史上曾经有过挫折,但那是在另一种历史情势中,在斗争胜负尚未成定局的另一种阶段中发生的事。在那种情况下,冲突的发展具有革命的人民群众与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鲜明特征。

资本主义复辟发生的条件及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要求研究问题要从主观因素,即从党以及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着手,同时也要研究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切内部矛盾的总和。在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具体阶段,另一组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的矛盾,对导致反革命的各个内部事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当然也产生了重大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26. 在事件进程中,党作为执政党和政治制度核心,丧失了其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党的活动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原则和规则削弱了,淡化了。

反革命威胁未被识破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面貌和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就连欧洲地区也发生了应视作“凶兆”的具体事件(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问题,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以欧洲共产主义为“急先锋”的、给资本主义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打击”的修正主义进攻)。

资本主义欧洲的各国共产党的分裂,也是资本主义正在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施加意识形态压力的一个严重警告。

正如最近的事件所清楚证明的那样,共产党曾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先锋作用是一成不变的,毋庸置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滋长了沾沾自喜、自我满足的情绪。对于保持并不断更新同人民的团结一致,同劳动人民和社会团体的民主关系这样一些对社会主义来说最珍贵、最必不可

少的东西,已失去了兴趣。

在某一个时候发生了脱离实际的现象,对人民的情绪、人民关心的问题、人民的疾苦和忧虑,丧失了理解能力。党的机构和党的组织变成了官僚主义衙门,结果使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主动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受到了削弱。

人民群众对党、党组织及其领导者的活动的监督逐渐削弱,以至最后化为乌有。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对于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序受到破坏负有责任。由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程序遭到破坏,导致了在执行决议方面的形式主义和公式化,导致了掩盖真相、粉饰太平的倾向,导致了对工作质量和效益丧失紧迫感。对于歪曲政治方针、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对于生产中的质量,形成了听之任之的氛围。

党内民主制度受到破坏,干部升官发财思想被培育起来,滥用党政职权的风气盛行,干部政策流于主观主义。共产党人的平等原则遭到践踏,漠视党内同志情谊的现象近年来有所抬头和加强。

这种状况为那些唯利是图的干部,缺乏政治才能和远见的干部,不能理解劳动人民的嘱托和意见的干部,不能发现、考虑不同意见并把它们与反社会主义宣传加以区别的干部,大开方便之门。共产党为自己的决议提供科学数据的能力下降了,这给建设社会主义和认识纷繁复杂的现象,造成了超出一般意义的后果。

由于这些现象与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受到了破坏。

27. 一些背离我们的理论、违反建设原则的论点和论据或被扶植,或被提倡。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战线被削弱。

有些场合则诉诸错误的理论,这些理论不是不符合实际,就是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简单化。例如,对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而宣扬早日过渡到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见苏共20大文件)“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全民民主”理

论等等。

苏共20大关于“不同国家在特定前提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多样化”的论点,就曾被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当作理论根据,用来攻击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革命规律被以民族特点和特征的名义加以修正。无须革命的飞跃,通过结构改革和“政治民主”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得到提倡。

这些观点低估和贬低了以下事实:剥削阶级有军事机器和反动的官僚机构做后盾,必将进行抵抗,而且任何一种过渡形式都应服从一般规律,都应当是议会内和议会外全面斗争的结果。

在随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智利和葡萄牙的经验以及帝国主义政策改变的影响,20大的某些观点和主张被摈弃了。20大引起的方针的修改,都是悄悄做出的,就是说这些修改没有经过有关各国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进行公开的、集体的讨论。

今天从过去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颠覆战略并未遭到来自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一致的进攻性反击。尽管一些党,尤其是苏共,在文件中谈到帝国主义新策略的危险性质,但在实际上却并未做出必要的努力,使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戒备和警觉状态,以进攻姿态和持之有据地应付新的形势。

资产阶级依靠其自从有了独立的工人运动以来所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把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心从外部巧妙地转移到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内部。他们把随机应变的丰富经验运用到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当中,这种经验是在与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治势力(君主专制制度、君主立宪制度、议会民主制度、法西斯专政制度、军事政变)对抗和合作的过程中取得的。他们利用了导致各种倾向和不满的错误和弱点、领导干部的野心、社会土壤、政治土壤。

这些由苏共21大和22大制定的论点,后来写入了1997年苏联宪法。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文件对无可置疑的社会主义成就,对二战后世界上发生的明显变化估计过高了,而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复杂的问题偏偏又估计不足。

有时把资本主义危机现象加以绝对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瓦解方式上散布简单化的观点。对于资本主义不顾各种矛盾、不顾给劳动人民生活 and 权利带来负面后果而把新科技成果运用到生产中的能力估计不足。

偏向不是凭空产生的。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错误未得到及时纠正或者造成错误的主要原因未被消除,对事物作出主观、肤浅的判断——这一切积重难返,从而转化为倾向(导致偏向)。

一些涉及国际事务和两种社会制度对立问题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见解和观点,反映出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压力之下退却的趋势,虽然下面的情况也是事实: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和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危急关头曾毫不犹豫地与帝国主义短兵相接。

机会主义直接或间接地为削弱共产党铺平了道路。它是帝国主义旨在破坏和削弱社会主义的努力取得成功的意识形态基础。

只在形式上谴责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观点及其代表人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辩证唯物史观的原则要求,必须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找到在工人运动中修正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前提所据以形成的客观事实。这并不意味着机会主义必然会占优势。只要认识到促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因素,共产主义运动就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克服其后果,以致挽回暂时的失败。

28. 旨在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和长期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新人的创造性的思想、政治和多方面的教育工作削弱了。

社会主义思想本来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这个新社会发展的支柱,本来应当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机会主义和修正

主义进行决战的条件下去探索新的途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具备足够的教育水平、政治思想水平以及必要的知识水平和觉悟水平,只有这样他们(群众)才能够参与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政治组织过程。

在同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决战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意识形态工作的作用极大提高的条件下,这一重要工作却未得到重视。人们不去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因为据说劳动人民自然而然地是这一制度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对于通过直接积极参与解决建设问题、社会和政治事务管理问题来培养社会主义意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如果对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展开讨论,本来是会使全党、党的各级组织、党员、非党人士以及全社会都活跃起来的。这样才有可能广开言路,借助于思想手段和有说服力的论据克服错误观点。

思想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地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在人民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削弱、衰退、低落的情况下,进步思想和革命思想就会倒退,而无政府主义残余、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本位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这样就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对复杂问题妥协畏难情绪的渗透和泛滥大开方便之门。今天,在全面倒退的情况下,这些缺点显得格外清楚。

29. 创造性地发展并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革命力量活动的经验来丰富革命理论的工作没有跟上来。

我们绝不想抹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但那里发生的事件告诉我们,在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当代世界情况而进行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工作中,由于共产党的过错而出现了理论滞后现象。一些专门的科研中心,包括直属各党的科研中心,在学术研究中不是对错误的结论认识不足,便是提出一些错误结论。

下面一个情况就未受到足够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不断发展理论和更新知识，只有理论和知识同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和管理相结合，才可以为培育新人提供土壤。

对理论和学术问题没有进行超前研究，以便及时克服困难，发现应当用辩证方式加以解决的新趋势和新矛盾。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接踵而来的革命运动高潮，都说明下述事实是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此以前经典作家们早就把一些关键性理论问题研究透彻了。把经验绝对化而不依靠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做法，是有害无益的。党作为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及时地形成对新问题的看法，善于透过直接的、日常的、局部的事物预见和把握整个运动即全局。

30. 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辩证联系削弱了，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和各种复杂任务的性质和要求发挥作用。

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能够把集中计划体制同人民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没能够在人民当中树立起社会主义财产的主人翁观念。70年代这种现象变本加厉，趋于激化。

出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形式的发展问题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正确发挥作用的问题，出现了滥用权力现象以及其他现象，而这些现象并不是全部都可以归咎于客观性质的问题或特殊情况。

具体制度本身所固有的潜力未能挖掘出来或者说未能发挥出来，而衡量每个具体制度的标准是：人民是否自觉参与，政府和管理机构有无社会监督，是否存在“党——苏维埃——人民”三者间的辩证联系和统一。

国内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了一些富有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由于必须把最有才干、最得力的干部派到社会主义建设战线，所以使各级苏维埃的干部队伍出现了空缺。新一代干部因客观需要而被提升起来，他们在争取人民参与和支持以及用民主方式处理问题方面，缺少必要的经验。在松散的氛围中，一些野心家也混入了当选的干部行列。

这些后果虽已被指出,但是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并未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因此这些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反复出现。

为了掌握相关经验,必须更加详尽地研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作为国家权力形式的苏维埃应起的作用和如何对它加以利用的问题,以及地方苏维埃和劳动集体的关系问题。

虽然也通过了一些法律,为地方苏维埃、劳动者、劳动集体提供更多、更大的权利,但在实践中人民参与和监督程序仍流于形式主义。

需要深刻探讨的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法律上和宪法上,它们的作用通过参与制定法律和决策,通过参与一切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而加以保障。然而在实践中,它们的作用并未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党与人民的联系削弱了,中央机关脱离了劳动人民,从而对社会团体的活动产生了消极影响,而社会团体本来应当是吸引非党力量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场所。

对于上述现象,应由共产党的活动和作用承担重要的和主要的责任。就性质和本质而言,共产党本应首先关心人民,把自己的活动同人民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经常支持人民的参与,限制和消除行政命令手段,为人民的直接机关和代表机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职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前提。

31. 出现的消极现象和问题并不能推翻下述理论命题: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是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这一政治术语加以界定的,这意味着它从本质上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专政。

资本主义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及改良主义者抨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时,都有意无意地采取如下错误立场:把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标准和适用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混同起来,对民主和自由概念持非阶级观点。

这类观点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就是把民主与多党制、与执政的和管理国家的政党数目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并不排斥其他政党的存在和活动。这些政党的存在主要由客观标准决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以外的政党数目、性质、作用都取决于具体的民族特征和传统,取决于社会分化情况或历史原因(例如社会革命党,他们参加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但在国内战争时期却转向反革命方面)。

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表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每个时期都必须力求最大限度地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而在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作为主要目标,则必须力求最大限度地改进集中制和发扬民主。

集中制必须反映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而民主则必须反映人民被经常吸收参与行使权力。两者结合得越是和谐,它们的辩证互动也就越是有力,而这种互动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保护自己不被颠覆的因素。强化集中制而损害民主的做法,导致在经济发展和满足集体利益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并成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机制的因素。

人民的参与和对社会主义财产进行社会监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自治还存在着历史差距。为了使人民成为全部社会财富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还需要时间,必须在保证、完善、扩大监督权利方面,在全面发展人的个性方面进行长期努力。虽然历次党代表大会也曾经认真研究过这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和计划,但看不出这些问题根据目标和需要得到有成效的解决。

除了客观困难,问题都是在错误、违反原则现象以及各种倾向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错误、违反原则现象以及各种倾向可以说都表现在劳动人民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态度方面,表现在吸收劳动人民在与集中管理日益增长的意义密切结合的情况下参与政

权工作方面。

32.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实际上违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经济刺激和精神鼓励制度需要不断完善。只要不这样做,只要这方面出现差错,就会滋生对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导致所得收入不符合工作数量和质量。虽然社会主义国家间断地在经济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归根结底,经济方法和经济刺激手段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没有增强,集中计划仍旧一成不变,仍旧卡得很死。及时供应市场的商品流通方面也存在着问题。

这个领域出现了问题,各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提出过批评性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价值规律的运用方法、商品货币关系、企业管理和运作、对劳动集体的使用方法。

特别是有关商品货币关系、消费品和服务质量、经济和精神鼓励手段、社会监督、参与计划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做专门探讨。一些批评意见是持之有据的,但是还必须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必须同各个共产党和学者们合作,研究某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的经验,因为这几个国家曾进行过实验。有些实验收效不大,引发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带来了负面后果。

苏共22大:正像不实行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一样,不经常发展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在1980年的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言说:集中和民主的正确关系问题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他强调指出,为了对作为统一整体的国民经济综合体进行有效管理,为了克服狭隘思想倾向和部门利己主义,就必须有一个中心。从另一方面说,为了使经济正常运行,就必须尽可能发挥全社会的基层劳动集体和领导干部的主动精神。关键是必须尽可能使大多数实际问题就地得到解决,并且要尽快去解决,不要瞻前顾后,不要非经过表决不可。

一些已经发生的、反映了背离理论的问题,非但不能推翻,反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向:社会主义时期的公有化(它的两个基本形式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能通过单个的独立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实现,为了满足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和保护集体利益的需要,只能通过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实现。

在计划领域,在地方苏维埃和工人集体及其作用方面,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曾出现过一些问题、缺点、错误,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提出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私有化政策,或者在好一些的情况下,提出“自主权”和“自治”一类的乌托邦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导致统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被分割为个别生产者集团所有制,从而损害全局的和集体的公共利益。实际上,这些观点的矛头所向是反对消灭阶级剥削,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权。

33. 构成唯物辩证法实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内部矛盾体系,没有被充分认识。每个发展阶段、时期都应保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和相互影响,这个必要性也没有被充分认识。

搞清这个问题,或许可使我们所关心的有关错误、弱点、缺点乃至悖谬产生根源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没有成为理论研究对象,更主要的是没有成为实际解决的对象,从而造成了反映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消极后果。根据列宁的看法,社会主义并不是没有矛盾和分歧的,如果忽视这一点,矛盾和分歧就可能转化为冲突,他的这些基本见解没有被

列宁指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平坦的。这条道路复杂得难以想象。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提到链条的环节,环节的形状和连接,谈到由事件组成的历史链条各个环节的不同,而事件并不像铁匠做的普通链条的环节那么简单,不是分别制造出来的。

充分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过程被估计过高,或者说被绝对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已失去其意义的错误观点曾经占上风,结果一些分歧和问题没有根据形势的要求被揭露和消除。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有时也开展过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70年代,而波兰危机之后,就更加活跃,但是这种争论没有继续下去。虽然问题被提出来了,但是看不出对这个重大问题给予切实的解决,仅仅只是在一些研究院和研究所做了一些理论研讨而已。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科技革命提出了社会进步和技术进步之间的有机联系问题的情况下,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必须经常注意下述问题:完善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高度组织整个经济机构,注意提高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修养。

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的突出特点是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迅猛地、在有些阶段则是飞跃地提高,而这反过来又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力。

这种不相适应越是得不到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就越会发生矛盾。在这种场合,用培育和美化个人消费的办法是无法消除这些矛盾的,当然用漠视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增长势头的办法也消除不了这些矛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表明,正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依据客观的可能去规定出一个平衡尺度,所以问题不断发生,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34.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化被忽视了,而这一事实又为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矛盾、特殊利益和地区利益的矛盾准备了土壤。

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过程中,阶级对抗消除了,工人阶级和居民中其他阶层、农民、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和差别退居次要地位,但并没有消失,这些角色差别以不同的形式(城乡矛盾、体力劳

动和脑力劳动矛盾等等)表现出来。

有些差别则与社会主义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与历史、民族、地域特征有关。有些差别表现为觉悟和取向的不同,产生这些差别的根源是旧思想的残余或者是在帝国主义发动意识形态攻势的情况下来自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社会的性质的下述论点有关:这个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性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的社会平等。

历史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论点,为深入研究和发 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的观点提供了许多新的依据。历史经验证实,社会主义社会仍保留着其所由脱胎的旧社会的残余、传统、深刻烙印。

阶级斗争并未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结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危机关头,尤其是在实现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和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时候,还有所强化。剥削阶级并不轻易投降,虽然他们已经是少数,并且已经失掉了某些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支柱。

阶级斗争藉以表现的形式是否在加强、继续、尖锐化,取决于社会主义关系的建设速度,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力量对比。在私人

马克思在阐释一般历史运动时,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意义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列宁在探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时,也研究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体制形成的条件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经典作家在描述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不同阶段时,并未把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人为地分开。他们在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相同的同时,也科学地论证了两者的差别就在于经济成熟程度不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与借口过渡性而否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差别的错误观点和反科学观点毫不相干。

资本存在的整个时期,小商品生产都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左右局势的还有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帝国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而帝国主义经常在寻求新的内部支柱,以便设法从内部推翻制度,因为从外部进行干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各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形式都不相同,这里起作用的是民族特征、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党与人民关系的质量、工人阶级同为在各自具体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措施和改造而奋斗的其他社会阶层联盟的质量。

很显然,生产中的社会主义关系越是牢固,社会主义民主越是加强,人民积极主动参加建设和政治社会事务管理越是广泛,社会主义的敌人就会越少。

35. 推广科技革命成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滞后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经常指出新技术推广和利用令人不满意的问题。科技革命成果采用和运用得不平衡,是有选择的:国防、宇航、重工业、大型工程运用得较多,而消费品工业和服务行业则较少。

除了客观历史因素外,科技革命成果利用程度较低、投入产出率较低的原因,还应在下述因素中去寻找:

管理的经济机制作用;

管理的形式和方法;

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制度;

物质和精神鼓励制度;

物资、资金、劳动资源的合理利用;

人民对计划机关和管理机关的经济活动、管理、监督的参与程度。

这些标准在发挥社会主义所有制潜力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但是这种潜力不可能在没有人的因素参与和不依靠科学技术的情况下自行发挥出来。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过渡,也同社会主

义民主的形式和质量、同群众参与有关。

还有一点也必须根据各国共产党的经验,并且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加以研究。这就是在各个具体国家和具体条件下社会主义积累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在科技革命成果的不断发展中,而主要是在科技革命成果的充分利用中,是一个客观因素,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阻碍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科技革命成果转化方式的这一论断,并不推翻以下事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一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和明显的科技进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相比较,是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起步的。一些研究资料和统计数据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很迅速,在科学和技术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尝试。一些发现和科研成果在许多领域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价值。苏联尤其如此,它有些时候曾经超过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传着一个论点,说生产力现代化滞后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倒台的决定性原因,这是站不住脚的。

这种观点片面地提出,生产资料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进步和民主的唯一标准和标志。它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问题,忽视了劳动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生产力虽然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但它的发展并不是反映人类活动的创造方面和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志。社会主义即使在生产效率较低的情况下(这里当然是指客观历史因素造成的),由于给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注入了质量要求,也能够向劳动人民提供比资本主义更多的东西。人剥削人制度的消除,提供了新的人类价值体系,用来确定生活的质量,确定标准和需求结构。

毋庸置疑,以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复杂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对生产关系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36.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帝反修斗争中行动不力、各行其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运用也随之放松。

在关键时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用统一的战略和策略对抗帝国主义的统一的战略和策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打击尤为严重的是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裂,这一决裂影响了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和反帝斗争中的统一行动。负面的连锁反应波及到全世界许多共产党。这种情况被用来为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打气。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又经历了来自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检验,而欧洲共产主义表明,修正主义、失败主义和妥协思想已渗透到资本主义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来了。

共产国际作为与其他共产党交流观点的统一中心,因其解散而产生的负面后果,今后应当加以研究和阐明。以国际会议形式出现的新的协调方式,在一个时期内对于共同制定战略和策略,对于采取共同行动起了促进作用。后来,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分歧和裂痕,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被放弃了。讨论某些问题,主要是国际问题的双边和多边的区域性会谈,取代了这种协调方式,这对于解决共同行动问题、思想和理论问题来说,是很不够的。各种观点的争论和讨论,就其性质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流于形式,与生动的、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争论相去甚远。

在有些情况下,以意识形态分歧为中心内容的争论,演变为公开决裂和断绝关系,结果造成隔阂和分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在独立负责、不干涉他党内部事条的名义下,停止了任何争论和批评,因而在交换意见和观点时各方之间的关系成了虚应故事。无论是前种或后种策略,都导致同一个结果:削弱统一或轻率地接受某种观点。最重要的是,对于理论问题和引起不同意见或倾向的原因的讨论,其水平下降,变得毫无生气。

必须参照多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与其他共产党交换意见方面继续下功夫,以便搞清楚就意识形态问题进行讨论的方式

和方法,搞清楚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搞清楚国际层面和地区层面共产党之间关系的类型。

不同观点的讨论,如果是在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就非但不会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反而是更好地反击帝国主义势力的一个因素。

37. 在社会主义的战略和策略中,在同帝国主义的对抗中,也曾犯过一些错误。

从帝国主义方面来说,两种制度的对抗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斗争,而是推翻社会主义活动的形式。

战后最初几年实行的那种和平共处方针,在苏共19大时已在某种程度上,而到了20大时则基本上导致了如下乌托邦观点:帝国主义放弃战争和军事手段是可能的,帝国主义能够接受建立在互利平等合作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能够同意和平发展经济,并用裁军节省下来的经费来援助欠发达国家。

力量对比的根本改变,世界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反帝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行动,足以有效地阻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进攻。

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没有认识到,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极力加强资本主义的各个薄弱环节,公开地或隐蔽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和主要武器——经常以使用原子武器和后来的氢武器相威胁,以便把这些国家保留在帝国主义体系之内。

为防止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斗争是一回事,在具体条件下宣扬关于完全消除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则是另一回事。

38. 对战后社会民主党的能力和作用的估价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共产党战略的基本要素是,不仅在裁军与和平事业中,而且在整个反帝斗争中,极力同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行动并结成同盟。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尽管发表口头声明,采取权宜之计,但在实际

上,却投靠帝国主义势力,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干着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勾当。在美国要求战后各国政府驱逐共产党人的压力下(马歇尔计划),一度建立起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而告吹。

在反帝和反军国主义运动正需要加强和扩大的关键时刻,却有人为帝国主义政策开脱罪责,说苏联和美国对扩张军备负有同等责任,把防御性的华沙条约与“冷战”的载体——北大西洋公约侵略集团相提并论。有些社会民主党,如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在所谓“东方”政策(78—308)中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政策的昭然若揭的目的是从内部鼓吹反社会主义活动,以便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些党派的性质的证据以及它们为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为调节其危机而效力的证据。

资本主义体系如果不依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政策,就不可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不可能恢复自己的力量,因为社会民主党除了起着资本主义的支柱作用外,还是破坏工人运动力量和统一的有效因素。

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当时就应当建立起坚定的、强大的、富有战斗性的意识形态战线,反对社会民主党在那个时期散布的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观点。

(载俄国《对话》杂志1995年第9期)

范国恩 译

走向新的国际主义

[英国] 劳·魏尔德

1989 年革命显然预示了欧洲政治新时代的到来。有多个政党参加的自由选举将成为整个欧洲大陆决定政治权力的公认方式。欧洲共同体似乎适合于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把新的民主国家吸收进来。然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却伴随着野蛮的冲突和政治经济危机。面对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走向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步履蹒跚。稳定仍捉摸不定,但民主进程在新欧洲取胜的希望仍在。在这个变化无常的时刻,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其潜力何在?一个世纪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普选权的到来上,但是,1919—1920 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共产党阵营和社会民主党阵营,严重地损害了选举战略。75 年后,共产党独

劳伦斯·魏尔德: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经济和公共行政系政治学高级讲师。

参见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选集》(一卷本)1973 年伦敦版第 649—656 页。

裁的垮台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为围绕民主社会主义理想重建新的统一提供了可能。但是,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不仅给共产党政权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也给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战略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这种情况使社会主义处于何种境地呢?

对前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进行估计有许多困难。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自共产党统治结束以来,只举行过一两次选举。第一次选举是“具有奠基性质的”活动,范围广泛的反共运动参加了选举,它们的思想立场各种各样。民族主义形式也掩盖了意识形态状况。由前苏联产生的一些国家到1993年底尚未举行过自由选举。在大部分国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已经解散并重新组建,表面上都否定了民主集中制,保证尊重政治多元论。最初的选举结果表明,这些政党在该地区东部比较贫穷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阿尔巴尼亚)中的势力比在那些设法与西方迅速建立密切联系的国家(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中要强大。但是,前共产党人在立陶宛(1992年)和波兰(1993年)取得的胜利,使格局发生了变化。虽然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没有多大影响,但准备据理支持缓和和市场改革冲击的政策左翼政党似乎得到了选民的有力支持。

在西欧,群众对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一直呈下降趋势。下表显示了截止到1993年10月经挑选的几个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所获选票的份额:

. 沃尔奇克《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载
. 莱姆基和 . 马克斯编《欧洲社会主义的危机》1992年杜克大学出版社版。

部分社会党国际成员党选举情况表

国 别	最 近	以 前	最好结果
奥地利	42 .8(1990 年)	43 .1(1986 年)	51 .0(1979 年)
法 国	20 .3(1993 年)	35 .9(1988 年)	37 .5(1981 年)
德 国	33 .5(1990 年)	37 .0(1987 年)	45 .8(1972 年)
西班牙	38 .7(1993 年)	39 .6(1989 年)	48 .4(1982 年)
瑞 典	38 .2(1991 年)	43 .7(1987 年)	50 .1(1968 年)
英 国	34 .2(1992 年)	30 .8(1987 年)	48 .8(1951 年)

(资料来源:《社会党事务》1991 年第4 期第64—65 页; .帕吉特和 .佩特森《战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史》1991 年伦敦版第3 章和《卫报》)

1993 年3 月法国社会党失败后,西班牙是西欧唯一保留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大国。尽管1992 年和1993 年爱尔兰、丹麦、西班牙、挪威和希腊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赢得了席位,但仍被排除在欧洲的主要权力工具之外。他们努力使选民们相信:他们有解决大规模失业这一中心问题的答案。共产党一度可以在法国(1978 年获20 % 选票)和意大利(1976 年获34 % 选票)获得巨大支持,现在它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得到了10 % 左右的选票。代表新社会运动,“鼓吹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的左翼”政党发现,很难吸引到6 % 以上选民的支持,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除外。

社会党人的计划能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并获得解决欧洲大规模失业、贫穷和内部纷争问题以及处理困扰全世界的生态和经济难题所需要的支持吗? 要对复兴的前景作出估计,必须解决社会

.基特谢尔特《新社会运动与党组织的衰落》,载 .达尔顿和 .屈希勒编《向政治秩序挑战》1990 年剑桥版。

主义运动历史上一直存在,近年来变得尖锐起来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集中在国家作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上。第二个问题是支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随着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队伍因积累方式的不断变化而相对缩小,如今这种社会基础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衡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问题。

国 家

社会党和共产党一直十分强调利用中央国家机器来控制经济,保障高水平的社会供应。此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然而,1871年马克思曾警告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把国家机器视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认为利用它来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是很困难的。作为国与国之间竞争体系的一部分,国家不得不为积累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这一点对共产党国家也是适用的,尽管这些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权大部分已被废除了。直到战后繁荣时期结束为止,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普遍承认,国家干预的程度越来越深是一个合乎理性和不可阻挡的发展过程。30年代经济萧条的经历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为战胜失业、恢复最快的是那些国家干预最有力的国家。国家对战时经济的严格管理,进一步证明了不可能依靠市场来满足社会需要。在战后时期,国营经济部门在所有的主要欧洲国家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似乎提供了克服周期性危机所需要的经济控制手段。“计划”成了经济理性和进

步的同义词。甚至共产主义理论家在提出“总危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来解释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的持续增长和相对而言的充分就业时,也承认这种可能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利用国家。但是在70年代,许多人开始对现有的“混合”经济制度是否会导致比较公平的权力和财富分配产生疑问。英国和法国左派的纲领建议实行大转移:把所有权从私营部门转到公营部门;而瑞典的工人基金思想则允诺把所有权直接转到有组织的劳工手中。但是,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动荡再次重演。不仅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未能避免大规模失业的卷土重来,而且国家预算也因为国际上的通货紧缩而大大压缩。不愿削减公共开支和税收的国家有资本外逃、投资取消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贷款的风险。社会民主党作出的充分就业的承诺与资本家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要求发生了冲突。对工会力量的进攻一直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变化强制进行的,这些变化旨在缓解迅速引进新技术带来的后果,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

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半边缘地位的共产党国家进一步落后于经济先进的国家。它们受到鼓励,借钱使本国生产现代化,但却无法提供出口物资以偿还迅速增加的债务。中央管制经济的僵化性质和充分就业的承诺使这些国家的状况更加恶化。破产的威胁和大量失业后备军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企业能够榨取高额生产利润。但在共产党国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尽管匈牙利在80年代末期也在求助于这种办法。所有这些国家都看到了把市场机制引入自己国家经济的必要性,但所有改革努力都在党和国家机构的稳定受到威胁时停顿下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产生了广泛的影

· 杰索普《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1982年牛津版第40—53页。

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与效率相一致的思想本身产生怀疑。结论是无法回避的:一国(以及后来在一个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上是荒谬的,实践上是一种灾难;这些国家的不民主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它们无法对这些压力作出反应。

如果西欧各国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确实有效地解决了低增长、债务、污染、大量失业问题以及相关的贫困、无家可归和犯罪等社会问题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确会陷入致命的衰落状态。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没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实际上使这些问题拖延下来。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新右派高唱“全面压缩国家开支”的高调,国家仍在消耗大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即便是在社会党人多年来一直未执政的地方,如英国和德国,也是如此。福利国家的纲领仍有适当的位置,尽管具体条款有一些削减。它似乎是某种连新右派思想家都一直无法抛弃的东西。在英国,保守党执政13年后,政府开支仍高居国内生产总值的42%,而1979年至1992年间税收负担实际上增加很少。

就通货膨胀、失业与保持增长之间的利害得失而言,80年代瑞典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对本国经济的管理要比欧洲共同体内的国家成功得多,虽然80年代末要求改弦易辙、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压力变得越来越难以抵制。在欧洲共同体内建立单一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并承诺通过半固定的汇率实现价格稳定,这些都是进一步削弱欧共体成员国一度享有的相对自主权的因素。与此同时,这种事实上的主权损失并没有通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而得到补偿,这个欧洲国家应拥有进行干预的权力,这

. 皮尔森《超越福利国家》1991年剑桥版第6章; . 奥费《福利国家的矛盾》1984年伦敦版第6章。

. 莱沃尔涅和 . 利皮耶茨《如何避免双重欧洲》,载《劳工与社会》1990年第15卷第2期。

种干预是弥补因自由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付出的社会代价所必需的。说社会党人缺乏实行起来可能把经济效率与公平目标结合起来的观念,这并非事实,例如,有瑞典的雇佣劳动者基金和更新基金,奥地利的社会伙伴关系,法国的竞争性国有公司,甚至有英国的全国企业委员会(8 8 32 0 28 6467 3 6)。本书所考察的一些例子清楚地表明,在现代世界经济条件下,在单独一个民族国家中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已不可能。

过去,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形式往往是官僚主义的,得到的反应很冷淡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毫无疑问,将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对国家干预进行反思,使之在劳动过程、管理系统、劳动时间和工作地点问题上更放权、更负责任和更有灵活性。要求负责任在公营部门也不必有所顾忌,如果扩大到社会决策和报酬的各个方面,它将代表着民主管理的重大进步。当然,在欧洲和世界上,有一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以通过国家干预加以解决,但也只是在这种“层次”上,即国家以其本来面目(作为一个正式的公共机构)而存在或国家不必向公众负什么责任时才如此。这是“民主损失”的又一个方面。目前,实际上整个欧洲大陆第一次全部拥有了自由选举的选举权,此时他们选举的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小于以往。如果社会主义者立志要利用政权来削弱跨国资本,那么他们的思想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

戈德利《联邦政府》,载科茨和巴雷特·布朗编《欧洲复兴计划》1993年诺丁汉版。

社 会 支 柱

工人阶级一直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拥护者。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岁月,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人只在英国占大多数,但人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阶级将在大部分欧洲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由于该阶级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受到剥削,因此它“客观上”对实现社会主义感兴趣。工人阶级在工作场所和各个社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的稳定性和同质性,为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提供了大量成员。

新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体力工人减少。与文秘工作、服务行业和专门职业有关的人员数量增加。非全日制工作的人员数量大大增加,在这类人员中妇女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大规模失业持续不断以及要求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劳动过程更有“伸缩性”的压力,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受到了严重削弱。大规模失业导致了数百万人贫困的加深,与此同时,有工作的“工人”阶级实际收入有了提高。所有这些变化造成了分裂。工会会员和社会党党员人数逐渐减少。生产结构的改变和要求工作有更大流动性的需求摧毁了各个社区。此外,随着批量销售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带来了一种个人贪欲思想。1956年克罗斯兰著文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背离了

“自我救助或积极的个人主义”和“走向平等”的趋势。实际上,福利国家提供了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运动的发展打下基础的社会福利工资。无论物质利益如何,这种发展带来的价值观念与克罗斯兰所预测的恰恰相反。

有人把工人阶级定义为包括所有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人,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认为可以在反对现行体制的运动中把这个四分五裂的阶级的各种兴趣都鼓动起来。在关于瑞典的章节中已经指出,不同的工人集团之间的竞争破坏了团结一致的协议工资制度,促进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失败。瑞典拥有世界上加入工会人数最多的劳动大军。就在10年前,它还在努力争取实行一些最激进的改革,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内进行尝试。近年来,个人贪欲之风得到了积极助长。社会民主党因为害怕失去那些把个人财富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人的支持,不敢向这种风气提出挑战。这种默认态度使得社会民主党更难对广泛蔓延的贫困和绝望所造成的惊人的社会后果提出相反的论点,也更难就政府拒绝对诸如无家可归、污染、城市衰败和交通污染等需要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承担责任提出相反的论点。

欧洲社会党除了奉行与广义的工人阶级中各个集团联合和联盟的政策外别无选择,这个广义的工人阶级未必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本身的利益,但是他们的要求与社会主义的抑制资本力量和追求公平目标的历史意图是完全一致的。社会党人往往带着怀

· · 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1968年伦敦版第64页、284页。

· 怀尔德《阶级分析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载《资本与阶级》1990年第42期。

· 埃斯平-安德森《针对市场的政策:社会民主党走向掌权之路》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版第321—322页。

疑的眼光看待联合或联盟,他们认为自己的激进抱负因权宜之计而变得迟钝了。但是,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处于退却之中的时候,新社会运动却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而且它们的议事日程上提出了比传统的左派政党还要激进的选择事项。新社会运动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共同体意识,但是,总的说来,它们还缺乏实现共同行动的实力,而这种共同行动是它们提出的要求所需要的。完全可以通过这种联盟着手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大规模失业,这是它的最大弱点。当它处在选举的巅峰时,这一点代表了一切矛盾。单独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奉行的“增长领先”的战略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工作共享的思想可能更有成效。争取削减工时、扩大教育、更早退休、弹性工作时间和“打破”在职期限的运动可以在整个欧洲共同体内赢得广泛支持。同样,关于环境问题的具体倡议可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产生看得见的效果。

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大批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情有可原地对社会民主党既试图吸收他们的要求,同时又忽视他们的要求的做法不以为然。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一直存在着“总体化”倾向,据此做出的尝试包含了所有的激进要求,但最终这些要求都变成了党的领袖的纪律和优先权。1968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直接针对老左派的这种僵化态度的。但是,在德国、法国、丹麦和荷兰出现了一些迹象,即许多社会党人把包括联合或联盟在内的多元主义的解决办法不仅仅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而

. 米勒-隆梅尔《西欧的新政治运动和新政治政党》,载 . 达尔顿和 . 屈希勒编《向政治秩序挑战》。

. 戈尔兹《经济理性批判》1989年伦敦版第3部分; . 斯科特《在职期限改革》,载 . 科茨和 . 巴雷特·布郎《欧洲复兴计划》。

是看作通过协商确定优先次序的一种可取的民主程序。最重要的是,这将涉及对应当从事什么样的政治重新加以解释,包括考虑社会性质和未来、生活质量、公民权利和社会责任在内。这些是向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的个人主义臆断提出挑战的“重大”问题。他们扬言要打破顺理成章的结局,这一结局是与显然不可抗拒的世界经济因素的力量相伴的。要不是社会党人改革了政治争论的议程,他们一定会表演如何抵抗这一力量。解决贫困、污染和歧视的战略方针很快就与民族国家的有限自主的壁垒发生冲突。有一些迹象表明,社会党人已承认有必要发展有效的国际行动方式。

国际主义

社会主义一直以其承担了在著名的社会主义歌曲《国际歌》和《红旗歌》中所表达的国际主义义务而自豪,但是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一直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未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进行有效的抵抗给予第二国际以致命的一击。第三国际很快变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延伸,盲目听从斯大林关于必须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解释。共产国际还卷入了谋害其许多

. 布朗纳《解脱了束缚的社会主义》1991年纽约和伦敦版第161—164页; . 拉方丹《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载《未来的社会主义》1992年第1卷第1期。

. 布朗纳《解脱了束缚的社会主义》第177—187页; . 德尼茨《冷战的结束:欧洲统一、社会主义与全球权力的转移》1990年伦敦版第6章; . 皮乔托《国家的国际化》,载《资本与阶级》1991年第43期。

成员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同时,社会民主党通过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与美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北约组织是一个针对共产主义威胁武装到牙齿的核联盟,并且正准备对新法西斯盟友采取宽容态度。社会党国际直到1951年才在法兰克福重新建立。由于在共产党接管政权期间,东欧的社会民主党被消灭,所以毫不奇怪,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党人是完全对立的。最大的成员党英国工党对欧洲统一的思想根本不感兴趣,所以社会党国际成了没有具体成就的情报交流和讨论机构。社会党国际发表了不少声明,这些声明的大意是说只有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统一欧洲才能找到介于俄国共产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神话般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各国党仍执著地坚持自己的国家战略。60年代末70年代初,数百万欧洲青年抗议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对此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一言不发”的态度,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英国工党愿意不顾一切地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赫尔穆特·施密特实际上提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双轨”政策,这一政策导致了80年代初在欧洲土地上新布置了一系列核武器。

冷战的结束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关于为减少市场造成的最坏结果而进行的改革的范围和速度仍会有大的分歧,但是,可能会在未来行动的两个前提上达成一致:第一,像1973年的英国工党方案或1981年的法国方案那样,企图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成功地执行十足的社会主义纲领,已是无法想像的了;第二,欧洲共同体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将成为所有欧洲人的主要权力中心,并将成为世界舞台上的

· 费瑟斯通《社会党与欧洲一体化:比较历史》1988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版。

主要角色。

谁的欧洲？谁的世界？

人们经常说,根据1957年《罗马条约》建立的共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俱乐部”;1986年《单一欧洲法案》(8 20 9634 2 8)宣布的加速一体化实现了“新自由主义议事日程”上的大部分目标。根据这一法案形成的1992年“的欧洲是远离国家主权的决定性步骤,但是,由于它主要是“经济”性质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分离保证了这一过程是作为行政活动而不是政治辩论出现的。欧洲共同体12国之间单一市场的实现允许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欧洲资本的节省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评论家认为“欧洲一体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面。”然而,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完成其使命的舞台”。

为了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联盟新体制中的潜力,我们必须考虑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达成的协议所包含的意义。尽管由于英国政府的坚持,条约中没有写上“联邦”的字样,

· 莱姆基和 · 马克斯《从衰落到灭亡? 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载
· 莱姆基和 · 马克斯《欧洲社会主义的危机》1991年伦敦版第15
- 16页。

· 德洛尔《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边界》,载 · 丹克特和 · 库伊曼《没有边界的欧洲:社会党人论欧洲共同体的未来》1989年伦敦版第32
页。

但是协议所表明总方针就是指向这样一种结局。虽然英国政府谈成了一项可以使它退出该协议的条款,但到1999年,正式的经济联盟仍将采用单一货币。为了为这一步作准备,一致同意在1996年底前后建立欧洲中央银行。把稳定价格放在优先地位反映在对借贷和赤字的限制上,这反映了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居支配地位,并且如果加以执行的话,将保证低增长和失业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建议成立的银行也将是支持欧共体高水平的就业、社会保障、持续增长 and 环境保护目标的法令所需要的。除英国政府外,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同意签署《社会宪章》,该宪章规定了关于最高工时以及健康和保险措施的一系列保障。从决策方面看,仍然有相当大的“民主缺陷”,因为众所周知,对欧洲议会的权力作出了严格限制。所有创议权均属于非选举产生的委员会,而部长理事会对立法拥有最终发言权,依提交讨论的问题的范围而定,或采取一致表决方式,或采取多数表决方式。这种从属原则意味着把共同体的行动限制在它拥有“专有管辖权”的领域,而所有其他事项则均须交给民族国家去做。由于这意味着这个中心与大部分现代联邦相比是十分脆弱的,所以它也为各地区或城市利用从属原则向中央政府提出决策权要求并直接与欧洲当局打交道提供了可能性。欧共体包括了大约3.45亿人,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美国。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七个成员国之间已经有了自由贸易协议。预计到1995年共同体将进一步扩大,包括瑞典和奥地利,也可能包括芬兰和挪威。到后期,一些前共产党国家也可能会加入进来。

1989年选举之后,社会党人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中组成

. 霍兰《设计复兴计划》,载 . 科茨和 . 巴雷特·布郎《欧洲复兴计划》第71—73页。

. 萨默斯《欧洲经济学:比较研究》1991年伦敦版第16页。

了最大的党团。如果把各种“绿色”、“彩虹”和共产主义集团算作潜在盟友的话,就存在建立进步联盟的可能性。排在要求加入欧共体的队伍前列的四个国家瑞典、奥地利、挪威和芬兰,都有强有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意识形态上说,社会党人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胜过保守党对手。社会主义一直拥护国际主义,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党不得不为通过各国议会进行改革而斗争,不得不声称自己是民族利益的可靠捍卫者。右翼政党一贯声称自己是民族利益的坚定不移的维护者。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政治体制和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统治精英们的创造物。虽然东欧的战斗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具有持久的动员力量,但是很清楚,在新欧洲它没有提供任何东西。

如果新欧洲被限定为与解除管制的贸易区差不多,是民族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激进改革的范围,甚至福利条款的维护都受到跨国资本势力和共同体财政协议的严格限制,那么它对一些工商业利益集团是很合适的。这就为“民主缺陷”一词提供了新的含义,迄今为止,这个词主要是指对欧洲议会的权力施加的限制。这种把欧洲视为“缩小了的国家”的想法将使公民们在工商业利益集团面前实际上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这是马斯特里赫特会议所表明的一种可能趋势,因为英国决定退出《社会宪章》打破了所有国家都将对本国公民承担同样义务的保证。此外,对公共借贷水平的限制成为用通货再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一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比较贫穷的东欧国家被吸收进来,可能会限制在欧洲大陆确立社会条款、工人权利和地区运动方面的“最佳惯例”的范围。

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是对迫使舆论“匆匆通过”的做法作出的可以理解的反应,人们已把这一做法同这种全欧洲大陆的组合主义妥协方案联系在一起。不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许为左翼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使之能够致力于争取形成可能是最强有力的

欧洲合众国(28 8873 9634),这种合众国赋予欧洲议会以充分权力,实行有效的地区分权政策,为公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以对抗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个难题,这就是一些左翼之所以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非出于认为该条约没有提供充分的民主或社会权利,而是出于追求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陈旧信念。从本书所研究的案例中得出的结论表明,这是一种有缺陷的方案。但是,社会党对加快一体化的疑虑因为这一事态发展的行政性质而大大强化了,归根结底,它可能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事态发展。德洛尔分两个阶段跃入欧洲联邦的战略受到整个欧洲大陆各委员会会议中极具权威的专家意见的推动。对持怀疑态度的人偶尔采取比较公开的申述理由的方法,例如,德洛尔1988年向英国职工大会()发表演讲时,十分成功地赢得了职工大会对他的看法的支持。整个“社会欧洲”(“ 3 0 9634 ”)战略是以人们所熟悉的社会民主党的“行政”方式实施的,没有动员民众以求得支持。

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劳工的国际化都大大落后于资本的国际化。双方对1982年“弗雷德林指令”(“ 6 02 6 80 ”)分别作出的反应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该指令来源于欧洲委员会,向跨国公司工人提供了知情权,使他们能够了解将对其产生影响的未来政策。经过美国和欧洲实业界极其紧张频繁的游说之后,这些建议变得毫无害处了。资方代表在游说过程中投入的财力大得多。他们代表着具有国际意识的利益集团。民族国家仍是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心,很少有国际劳工行动的例子。因为欧洲议会只是一个没有立法权的名义议会,所以工人运动一直未能从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实力中得到什么益处。麦克沙恩粗略地概

. 德沃斯《民主东道国的跨国公司:美国跨国公司与弗雷德林建议》1989年奥尔得肖特版。

括了工人运动可以在全欧洲开展活动的许多领域,尤其是争取缩短年工时总量和环境保护的斗争。在这两个领域里与新社会运动建立联系的潜力是很大的。欧洲许多“新政治”政党已经根据全欧洲范围的政策需要来制定自己的纲领了。

提议建立的货币同盟将结束国家主权定义的一个方面的内容——独立货币,并将加快承认主权向欧洲中心转移的步伐。然而,在最近举行的各国选举中,争论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各国政府只能发挥微不足道作用的少量民族问题上。左翼形成协调一致的政策仅局限于欧洲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当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比约恩·恩格霍姆评论道:“在欧洲所有的党代表大会上,我们都议论经济、环境和其他问题的全球相互依存关系,然而,我们社会民主党是以传统的民族形式组织起来的”。他还提到,欧洲议会的权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国会还小,这是多么“荒唐可笑”! 1992年11月欧洲共同体社会党联盟在海牙召开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建立欧洲社会党(1983年3月9日至12日,第30787号)。这是早就该做的事情。欧洲社会党的成员超出了共同体的范围,包括奥地利、瑞典和芬兰的主要社会党。在比利时外交大臣维利·克拉斯担任主席期间,新成立的欧洲社会党作出保证:到1993年底产生共同宣言,但是,很明显,该党的“组织发展”有赖于各国党。4位主要的社会党政治家安德拉斯·帕潘德里欧、米歇尔·罗卡尔、保尔·尼罗普·拉斯穆森和马里奥·苏亚雷斯的

· 麦克沙恩1990年的著作。

· 兰伯特《欧洲:民族国家断气难》,载《资本与阶级》1991年第43期第22页。

· 恩格霍姆《新的考验——新的机遇》,载《社会党事务》1991年第2期。

· 克拉斯《名称代表什么?》,见《欧洲劳工论坛》1993年第10期第9—12页。

评述阐明了这个新党很可能只是各国党执行委员会当选代表的咨询工具。显然,无法想象这个新政党会要求组织上的某种独立性以便它能够从所有的主要城市和地区吸收新成员,尽管这样做可以很好地动员那些对本国政党的表现不再抱幻想的人,取得他们的支持。这种发展态势可能会彻底改变自第一国际解体和社会党或工党建立以来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趋势。

统一欧洲的潜力是巨大的,但是,欧洲大陆在本世纪最后10年中面临的难题同样是巨大的。据估计,由于增长率为1.5%,欧洲预算的“统筹性开支”(“3 732 24 2 896”)水平很低,到2000年共同体的失业率平均为14%以上,西班牙和爱尔兰将达到24%或25%的水平。统筹性社会基金是专门用来扶助比较贫困的地区,补偿其因经济一体化所蒙受的市场方面的损失的。但是,按照拟订的共同体预算方案,到1997年,各成员国的政府开支只有3%,只要统筹性社会基金非常少,就无法补偿最贫困地区所蒙受的市场损失。要扭转最近出现的毁灭性发展趋势,必须有一个涉及普遍再分配、政府投资、大规模培训和研究计划以及工时大幅度削减的欧洲复兴计划(9634 2 36 63 63 6 11)。它对于重新确立欧洲社会主义的实际意义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把政治上由赤色和绿色政党领导的强大欧洲国家的方案坚持下去,就会出现具有全球意义的令人振奋的机遇。欧洲可以作为新的居支配地位的力量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保证创建更加平等的世界经济。巴雷特·布朗认为,新欧洲可以奉行第二次

《欧洲劳工论坛》1993年第10期第13—17页。

.科茨《复兴的规模》,载 .科茨和 .巴雷特·布朗编《欧洲复兴计划》第12页。

.德洛尔《共同体行动的范围和限制》,见 .科茨和 .巴雷特·布朗编《欧洲复兴计划》第46页。

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资本的势力而没有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政策:

业已确定的是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些机构没有完全实现凯恩斯提出的目标——建立由国际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管理的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了美国霸权的工具,美元成了世界货币。

问题是没有一个国家打算带头建立这样一种合作制度。尽管欧洲共同体的经济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但它不具备完全的国家地位,这意味着“它并不比其最弱小的成员国更有力量”。这一弱点在旷日持久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于贸易自由化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得到了体现。

国际债务泛滥成灾是世界上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只有最高层次的国际合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富裕的“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银行里有很多来自高额石油收入的投资资金。银行向试图通过出口增长带动的经济增长来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和改善自己的地位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的贷款。结果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债务危机,以致使第三世

. 巴雷特·布朗《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之外》,载《欧洲劳工论坛》1992年第7期第9页。

同上,第10页。

. 蔡斯-邓恩《全球形态:世界经济的结构》1989年牛津版第266—268页; . 阿里吉《世界收入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载《新左派评论》1991年第189期。

界陷入贫困之中,世界经济面临着摆脱不景气状态的极大困难。勾销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债务以及把其他国家的债务削减到可以应付的程度需要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和世界货币,而只有通过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达成协议才能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制度和世界货币。只有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才可能有民主管理的因素。这种体制的演变可以在所有参加者都长期受惠的条件下,为实现更进步的对贸易条件的管理铺平道路。这种解决办法具有很强的干涉主义味道,它和主要贸易集团中垄断性生产的出现一起,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提出了挑战。

具有行政权的负责的国际机构可以提供解决世界上迫切的生态问题的途径。主要的生态问题需要依靠国际协议来解决,这一点已经得到普遍公认。但是,1992年6月的里约热内卢全球首脑会议没有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这表明了这种符合理性的全球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主要贸易集团的短期利益的阻挠。它也说明了迫切需要通过国际政治监督来控制跨国资本势力。阿里吉指出,诸如世界银行、七国集团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等机构作出了越来越多的极为重要的决定。世界政府工具正脱颖而出。这种全球权力的政治性质要到下个世纪才会确定,不过,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将被卷入这场角逐。但是,从全球来说,“民主缺陷”问题显得比欧洲共同体还要严重。欧洲共同体正经历一场代议制危机,

. 麦克尤安《债务与混乱:国际经济的不稳定与美利坚帝国的衰落》1990年每月评论出版社版; . 吉尔和 . 劳《全球政治经济学:观点、问题与政策》1988年每月评论出版社版第182—188页。

. 阿里吉《世界收入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载《新左派评论》1991年第189期第64—65页; . 皮乔托《国家的国际化》,载《资本与阶级》1991年第43期。

. 沃勒斯坦1988年的著作第156—158页; 蔡斯-邓恩1991年的著作第343—345页。

在危机中公民们被变成了清静无为的臣民。这一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再现,缺乏个性的机构左右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方式。

试图在联邦制欧洲的框架内复兴社会主义的人面临着许多障碍。首先是人们所说的“欧洲堡垒”的危险。它不仅包括在世界经济问题上不愿采取主动,而且包括每天在对待移民工人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一个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欧洲民族主义(1963-2 832 071)倾向的强大欧洲对社会党人和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想法。社会党人通过他们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关系保证同这种走向“新孤立主义”的冲动作斗争。在世界贸易战中不会有胜利者这一点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从经济上说,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世界市场的逻辑——它已使凯恩斯主义在民族国家范围内遭到挫折——不在欧洲范围内奏效?新欧洲市场的巨大规模足以使各公司要离开这一市场的威胁变得不可信。关于反对较短的工作年限、最低工资和更好的社会条款,一些企业部门(特别是英国工业联合会)已经提出的论点是,这样做会削弱对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力。但是,内部市场的规模和美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压力,使国际竞争力的论点比它在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中被引用时的说服力小得多。实际上,欧洲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主要以德国为基地的资本的确应当提防以比较贫穷的欧洲国家为基地利用较低的工资和较宽松的立法的资本。英国人在《社会宪章》上的孤立情形表明,欧洲雇主同盟联合会(8 2 32 3 1 4033 67' 32 6 8 327 3 9634)所代表的大多数工商企业界非常希望避免“社会滑坡”(“73 0 914 2”)。

伍德1989年的著作。

·巴雷特·布朗《欧洲联盟:堡垒还是民主》1991年诺丁汉版。

·莱沃尔涅和·利皮茨《如何避免双重欧洲》,载《劳工与社会》1990年第15卷第2期第183页。

从政治上说,如果右翼政党能够在国家范围内获得“廉价政府”(“4 30 62 1 28”)的魅力,那么在欧洲范围内为什么不能呢?例如,复兴计划和赖债行为代价很大,需要实行高税收,这会吓住选民吗?在这方面,欧洲社会主义的坚定性和决心将受到严峻考验。如果想稳操胜券,欧洲社会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结成亲密同盟的能力将是至为关键的。保守势力将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他们在历史上就依附于国家,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尤为明显。右翼民族主义集团很可能在未来多年中使支持保守主义的力量发生分裂。二是保守派反对同大规模失业和贫困作斗争的各种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使他们处于为日益难以维持的现状辩护的地位,其影响不仅仅限于“新穷人”(8 “2 1 4336”)。社会党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阐发和宣传复兴计划的能力,取决于他们提供即使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也能达到目的的一些实实在在证据的能力。也许最难以估计的因素是后共产主义国家将对新欧洲的政治安排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1989年以来,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一直很小,但是平均主义的推动力仍然很强;新的民主国家中肯定会有很强的公营部门。

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出于国际主义的承诺而变成战斗的现实,那就会形成反对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阵线。一度受欧洲支配的社会党国际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组织。它提出或发出了许多关于南北关系、债务和附属国以及需要达成保护环境的全球协议的报告和倡议。孤立地看,所提出的这些政策外表上可能没有革命性,但是它们的实施可以驳倒新自由派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充满活力的说法。复兴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必须追求对国际金融新的权力中心和跨国资本进行民主管理。认为这些力量可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被有效地加以控制的想法是一种幻想,不过,欧洲民主国家的发展可以创造社会主义政策重新发挥其实质作用的条件。但是,这种政策会不会局限于社会主义的“软弱”(“1”)形式,只求对资

本主义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进行修补,不对其作为生产方式的存在构成威胁? 1950年,威尔弗雷德·菲恩伯格写道,基础工业的国际化提供了管理经济活动以保证实现社会目标的最佳形式。他还说,这一思想会受到反对,“直到西欧共同体的理想被接受并被赋予某种政治的和议会的重要意义时为止”。40多年以后,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即将形成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讨论过国际共同所有制的发展。现在,对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进行管理的必要性要大于以往,追求垄断性生产的趋势继续无情地发展。只要资本主义仍表明其无力在自己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安全和繁荣,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所有制和管理问题就仍将是悬而未决的。

(载劳·魏尔德编《当代欧洲社会主义》)

1994年达特莫斯英文版第171—186页。

许宝友 译

· 菲恩伯格《基础工业的国际管理》(1950年英国工党提交国际社会党会议的报告)第9页。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 及其前景

[俄 国 际 社 会 经 济 和
政 治 学 研 究 基 金 会

1. 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在19—20世纪之交,在西方社会主义和本国的激进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矛盾的本性不久就使它分裂成为两个互相竞争的,后来又相互敌对的流派。

列宁的观点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轨道上形成的:他把社会主义前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谴责民粹派的密谋恐怖方法。不是偶然的,他所创建的党取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然而社会对抗的增长和沙皇制度拒不进行业已成熟的民主改革把该党推向革命道路,产生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一翼。

1917年10月相对容易的胜利和上台执政,使得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所选择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年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这样也就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其目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社会民主党及其改良主义方针

这是1994年6月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即“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专题讨论会起草的供讨论用的提纲。

相抗衡。

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就已发现指望俄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是一种乌托邦。生活促使人们批判地重新评价革命口号,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新经济政策、和平共处等等)。但是,如果说在俄国存在过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由于斯大林的热月这种可能性丧失了。

2. 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的变种——兵营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执政的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用极权的方法解决了国家的现代化任务。

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期间,苏联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在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而在战后苏联成了强大的超级大国。与此同时,也揭示了企图用反民主的方法建立公平繁荣的社会是无望的。在60年代中期,苏联和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开始下降,在科学技术领域不断落后,居民的生活水平同西方的差距拉大。

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冷战”、军备竞赛、“铁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封锁的结果。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没有竞争力的经济政治体制,它们限制了对劳动和自由创造力的刺激。经济面向大众需求的方针和在左翼党和工会压力下按照凯恩斯的方案进行的结构改革,使得西方模式的优势显得更加凸出。

3. 斯大林逝世以后出现了改革苏联体制的现实可能性。赫鲁晓夫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在于揭露了它的极权性质,谴责了大规模的镇压,强调经济要满足迫切的社会需求,要求缓和国际舞台上的紧张局势。不过,他在给予社会一点自由之后,并没有触动体制的基础。他被解职之后,解冻又被封冻所取代。

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恢复了斯大林制度的基本设置,只有大规模镇压除外。由于对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在武装领域日益严重的落后感到不安,党和国家的领导不止一次地宣布改革

的必要性,然而每一次都是守旧的倾向占上风,使改革半途而废。苏联不仅自己不进行改革,而且还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革新运动,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施加压力,以遏制寻求改革的力量。

4.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并非毫无影响。主张进行深刻改革的情绪逐步成熟,出现了一批人,他们不仅对斯大林的正统思想,而且对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础的陈旧的价值体系提出了怀疑。

戈尔巴乔夫执掌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在加速技术进步和解放首创精神的口号下,奠定了激进改革的基础。经济、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导致承认市场经济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思想和政治的多元化;市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取消了极权官僚体制的基础和苏共的垄断领导,实行公开性,开始把单一制的国家改造成真正的联邦。按照新思维的原则,苏联为裁军铺平了道路并发起结束“冷战”。东欧各国人民获得了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

改革就其规模和意义而言相当于革命,然而是用改良的方法实现的。其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国内建立了议会制的基础。出现了几十个政治运动,开始成立各种政党,其中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政党。第28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特别是得到1991年苏共中央7月全会批准的新纲领草案,都贯穿了这一精神。

5. 1991年的8月政变中断了事件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使分裂主义的力量易于行事。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根本改变了俄国和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上成立的其他主权国家民主发展进程的条件。

盖达尔政府用“休克疗法”实现的一次性地取消对价格的监督、加紧私有化以及其他市场改革因素,极端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危机。在从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过渡的时期里,

公然无视社会保障,其后果是使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由于有可能通过投机致富,两年期间国内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则陷入了贫困的境地。削减生产以及相当数量的企业破产和关闭,造成了大规模失业的危险。农业生产继续下降。科学、文化、国民教育和保健事业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犯罪猖獗是国家的真正灾难。利用盛行的营私舞弊,黑手党开始向国家机关渗透。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加剧了纪律性和可控性的普遍沦丧,这个冲突以1993年10月4日的悲剧结束。民主派3年执政的结果是深刻的全面危机——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和精神的危机。领导企图通过新的宪法和签订“和谐协定”的办法达到团结,然而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在1993年12月12日的选举中选民们实际上拒绝信任打着“俄罗斯选择”旗号的执政党。否定其方针的还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自由民主党的票。社会主义的和接近其方向的政党和集团获得的选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从各种迹象判断,人民的情绪开始左转。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并非唯一的国家。在一些东欧国家,选民们对后共产主义制度的政策感到失望,它们投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政党的票。在某些西方国家,经过多年保守势力占上风之后,也可以看到倒向左派党的转变。

同东欧国家不同,在俄国还来不及形成和集中具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纲领和政治行动策略的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持这种方向的组织是分散的,影响不够大,而其中的某些组织还没有摆脱革命的共产主义教条。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可能失去自己的历史机遇。民主改革进程面临的严重危险,不是来自负责的左派和中左力量,而是复仇分子和民族主义可能会利用人民不满的火药上台执政。左翼激进派一点也不比右派好。

7. 有利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诸因素之一(其实, 到处都是如此), 是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政党和运动在价值取向和政治方针上的接近。

在普选权、议会民主以及在国家、劳动和资本之间按集团划分政治影响的条件下, 任何无视广大群众需要的政党都不可能指望取得成就。在坚持自己的原则(私有制、竞争的企业活动等等) 的同时, 自由派、保守派、基督教民主派以及其他传统政党都把社会要求列入纲领。

右派和左派(抛开双方的极端派和激进派不论) 之间的斗争已不再是围绕生产和消费社会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展开, 而是围绕社会化的合理的和最适当的程度问题。

选择还是反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结构一体化, 成了另一个对抗点。在这一点上各民主主义政党也有足够广泛的相互影响的基础。这就是说, 可以建立议会的和执政的联盟, 提出国家领导职务的共同候选人。

8.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取决于消除本世纪初发生的工人和民主运动分裂的后果。

苏联70 年历史的教训, 国外社会民主党的经验, 经济和政治生活急剧变化的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消除造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学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政策之间的原则分歧的主客观原因。

从70 年代开始,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在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中进行合作。随着开始改革、东欧各国极权制崩溃和俄国政治体制民主化,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价值作了重新估价, 放弃了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方针。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改革也延伸到组织上, 这方面的改革远远没有完成。有些党在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例如意大利共产党改造成意大利

左翼民主党)。另外一些党所实行的改革则是病态的发展。还有一些党不想从事变的进程中得出结论,紧紧抓住显然站不住脚的或者过时的教条不放。

在俄国这一过程特别复杂,因为在广大党员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地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帮助资产阶级愚弄劳动者的奸细。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潜在的社会基础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只有通过自身的经验才能摆脱此类成见,懂得进化道路优于革命道路,妥协战略不等于“妥协主义”和机会主义,而“小步”策略和具体成就策略比打算通过暴力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空想要可靠得多。

9. 今天很清楚,俄国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社会政治发展的前途,在很多方面取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方向的左翼和中左翼力量的团结。这在目前又取决于制定出这种团结的理论构想,把全人类的价值同社会主义的价值、纲领规定和运动的目标结合起来,摆脱教条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廉价的平民主义,把国家及其不可重复的特点引进新世纪的文明之中。

(载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1期
夏风译)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

[俄 国 际 社 会 经 济 和
政 治 学 研 究 基 金 会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特点和发展前景

戈尔巴乔夫在开场白中说, 当前俄国对社会主义价值和维护

俄罗斯“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即“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在1994年6月组织了一次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构想和这一政治流派的前景”的讨论会。大约4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多数为俄国各派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还有瑞典、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代表以及部分记者。会议提出了一个提纲,共9条。基金会的刊物《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1期和第12—18期合刊刊载了提纲(译文见本书第163—168页)和详细的发言记录。这是主要发言摘译,小标题是译者加的。

这些价值的党的兴趣,对社会民主党的新的替代性决定和纲领的兴趣之所以重新抬头,是因为现政权未能实现自己在攻击旧制度时许下的诺言。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人能够提出与现政权不同的政策。有两种替代力量是现实存在的,一个是社会主义价值的拥护者,一个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前者不能对人民的愿望作出积极的回答,后者就会掌握政治领导权。社会民主党首先应当提出反危机的纲领,能以最小的痛苦为代价摆脱危机的纲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抽象议论如果不与政治纲领性结论联系起来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要大力支持涉及除占人口5—10%的社会大量财富占有者以外的所有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要恢复实际上已被摧毁殆尽的政治结构中的反馈联系。必须发展自治,建立对行政权力的实际监督,用有效手段与特权斗争。这不仅是法律过程,也是政治过程,因为必须从反对政权机构中的腐败分子开始。必须彻底改变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政策。目前在俄国刚刚形成市场,而且是最野蛮的形式形成的,不仅使多数人陷于物质贫困,而且破坏了所有的社会生活准则、道德、精神和文化,因此西欧社会民主党关于“只要有可能,就实行竞争;只要必需,就实行计划”的公式是适宜的。这一公式使市场关系的自由服从于社会利益。在俄国,如果没有民主的国家机构的调控作用,有序的市场关系是不会形成的。另一方面,又不能允许国家蜕化成为专制主义的,这样就会阻碍民主改革和自由市场的形成。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明确地表述并且坚决贯彻这个二位一体的任务。

利皮茨基(俄国社会民主人民党执委会主席、杜马代表)说,在1991年8月以前,俄国的发展趋势对于形成由社会民主党占重要地位的制度是有利的,在共产党的众多成员的基础上建立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组织是完全现实的。8月以后,社会已越过这一阶段而向前进,使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显得没有必要和不够充分了。自由主义思潮已掌握了群众意识,阻碍社会民主主义潜力的发挥。

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是诉诸理智而不是诉诸感情的,是建立在中间道路之上的,对大多数公民来说缺乏鲜明色彩。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在本质上是中派主义政策,而政治实践特别是12月选举表明,中派主义不受欢迎,尤其是因为它缺乏能给选民以深刻印象的鲜明面貌。利皮茨基说,目前的客观趋势重新开始对社会民主主义有利。社会对自由派的措施不满,但还没有产生复旧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提出接近社会的并且能为社会理解的明白易懂的替代方案。为了产生吸引力,首先应当表现得鲜明甚至激进。应当摆脱学院作风,克服谨小慎微这一致命的弱点,要有能带动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强有力的、生气勃勃的领袖。

利皮茨基还说,需要考虑到俄国特点的现代的、本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它将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有明显的区别。这种观念是与对建立市场必要性的觉悟,与解决保存俄罗斯国家这一历史任务的必要性相联系的。

布兹加林“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联盟主席、劳动党员说,他不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更加“左”,更加“红色的”。如果共产党人这个词不是和久加诺夫、安皮洛夫或其他更加吓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话,他会称自己为共产党人。他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彻底、明确无误地、公开地拒绝“休克疗法”,拒绝官僚主义的、特权阶层的资本主义。目前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在于多大程度上调控市场,而是在于由谁、为谁的利益和怎样调控。这里的问题是很严峻的:是在现有制度中为争取经理、部长和其他席位而斗争,还是要在根本上从特权阶层资本主义向民主调控的、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过渡。为此必须同当前的政府和权贵作斗争。社会民主党对此是否有准备?如果不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会有成效。社会民主党至多只能在议会中和几个次要的部里混混而已。要做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首先是社会主义者,要比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更加左得多。与自由派发生冲突是危险

的,但是如果我们打算提出真正的左的政策,这种冲突是必要的。

· 麦德维杰夫(社会主义劳动党)说,俄国从极权主义向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形式的过渡本来是有可能以更加有步骤、有计划的方式进行的,无须采用经济的强制和残酷的“休克疗法”。如果说俄国通过强制和密集的暴力在70年的时间里未能建立一个实现社会公正和人道主义的社会,那么新的当权集团企图通过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动“骑兵冲击”的方法来破坏而不是重新调整国家中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何况他们既不依据任何新的意识形态,对自己的目的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和独联体其他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问题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了。我们的任务是:第一,防止伪共产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极权主义复活;第二,防止在已经瓦解的“帝国”的范围内建立极其野蛮的、买办型的资本主义,避免使俄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属国。

麦德维杰夫说,社会主义劳动党是以苏共内部某些具有民主倾向的流派为基础成立的,它的任务是,利用我国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已经取得的现实成果,即一切社会成就和机构以及社会主义意识的和国际主义的因素,在俄国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要利用过去几十年的积极经验,俄国人民的一切传统和成就,也要利用西欧类型民主社会中的一切有益的和合理的东西。我们主张多种形式的经济成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竞争,但社会所有制和民主形式的国家政权应占优势。我们主张政治的和思想的社会生活中的多元性。

斯拉温(《真理报》)说,没有任何思想能代替社会主义思想,这不仅是从永恒的社会主义价值的观点来说的。客观存在着两种基本倾向:社会的资本化和社会的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者企图把二者结合起来,建立某种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在某个过渡的历史阶段这是可能的。但历史的发展是

有利于社会主义倾向,有利于经济的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会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迟早会实现在社会生产更高发展基础上的个人自由这一理想,这是普遍的劳动(发明家、学者、艺术家等的劳动)统治的理想,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思想目前在俄国已经破产,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那些人迟早会被迫承认改革的破产而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社会民主主义就应当这样做。

斯拉温说,在俄国曾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是形形色色、面目不清的。现在人们说久加诺夫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他投票赞成“休克疗法”的预算,同时又声称他反对总统的路线。可以说他既是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久前沙赫赖在接受采访时说,从意识形态观点来说他始终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就政治信念来说,他是保守主义者、国家强权拥护者和大国主义者。鲁茨科伊不久前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公民联盟”主席,但今天他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也是大国主义者。趋向极端是整个俄国的特点,许多过去的正统派共产党人现在成了自由主义者。因此我对西方理解的那种社会民主主义在我们这里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行不通。极左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派别的社会民主主义有可能行得通。但是,如果左翼社会主义者像布兹加林那样只关心自治,那就不会有什么成果。相反,如果社会主义思想和正在萌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那就能占上风。谁都不想回到兵营式社会主义,大家都想实现正常的人道主义面目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们说,这种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是,一次、二次、三次不成功,也可能第四次、第五次会成功。

戈洛夫(俄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杜马代表)说,社会民主党在俄国有没有前途?如果这是指传统的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那么它在俄国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因为第一,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已

被摧毁,本世纪初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仅仅是留在记忆中的事了;第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从私有制出发来平衡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而俄国是从超社会的国家所有制出发进行平衡的。

布尔拉茨基(欧亚人文科学协作基金会)说,许多人曾设想,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结束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景在俄国是现实的。但是我们是应当考虑建立某种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民主主义—市场的新社会呢,还是应当在历史发展过程的轨道中前进,力图对这一过程作出自己的纠正呢?如果在这一意义上谈社会主义的复兴,那么这与其说是指建立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指社会思想、社会学说、社会运动,而这种社会运动是反映社会某些部分的现实利益的,是反映那些尚未形成理论,但已现实存在的情绪的。我宁可说俄国的社会思想,而不说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俄国的传统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和公社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集体责任和公正的观点、国家职责的观点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如果国家不发挥积极作用,这片广大的领土就无法治理。这种社会运动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前共产党人的演化联系在一起。1800万党员是社会的积极分子,其中许多人处于失望状态。今后几次选举不可能像在东欧国家或立陶宛那样使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拥护者取得胜利,但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如果提出明确的思想,摆脱相互关系中的宗派主义和激进主义,把对所谓民主主义或者对共产党失望的拥护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话,那么他们即使不能胜利,也会取得成就。

马利采夫(劳动人民社会党)说,俄国目前条件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极为不利。由于经济危机,为社会目的而对现有财富重新分配的可能性,首先是这方面的预算大大缩减了。以不正当途径获得大量财富的社会阶层,即所谓“新俄罗斯人”,将千方百计反对调控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激进的自由主义政策破产了,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方向的运动,包括趋向共产主义激进主义的运

动和正统派的运动。这是相当强大的倾向,不能低估。说什么目前谁也不想回到过去是没有用的。许多人想回到过去,首先是工业工人阶级和农业工人阶级,他们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柱,而是恢复国家社会主义(而且是残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柱。他们也有可能支持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目前这种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正在发展,这是对日里诺夫斯基有利的。当前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应当是俄罗斯民族利益的思想。这几年俄国已经作过两次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即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尝试,但都失败了,其原因在于俄国的社会民主党目前还具有表层性,它只是产生于社会的政治精英和政治积极分子中,它广泛传播的基础即社会自治,在西欧已有几十年的发展,而在俄国才刚刚萌芽。

库久金(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党团)说,人们在谈到目前的社会情况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不利时忘记了一点:他们心目中的那些事件,即目前西欧的那些事件,是长期的发展过程的结果,而社会民主党在这一过程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是耐心地 and 不断地为使无产阶级走出政治的和社会的“隔离区”而斗争,就不可能产生目前西方社会最先进、社会方向最明确的那一部分。库久金说,他在与西方工会干部交往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人美化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只不过他们给它戴上了笼头,在这一限度内它是文明的。如果一放松,你们已经看到过它会是什么样子了。

卡拉什尼科夫(劳动人民社会党)说,关于把社会主义只是理解成价值体系,还是理解成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一定的制度,这一问题涉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使国家回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还是仅仅改良俄国当前这种野蛮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使新的资产阶级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秩序,然后再试图去改良它,还是为使过渡时期以重新回归告

终(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而斗争?劳动人民社会党的61个地方组织在讨论党纲时一致对此作出了如下的回答:没有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价值。我们不想把某种最终完成的抽象模式塞进现实。我们打算利用那些已表现出积极性质的社会机构来建设。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设想承认多种形式的市场经济,同时力图保护集体的、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优先地位和有效的国家调控。调控将由真正民主的国家来实行。1991年夏天苏共的所谓改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翼已经掌握这些真理,那些继续忠于这些真理的人加入了我们的党。

尼柯诺夫(国际“改良”基金会,杜马代表)说,俄国当前形势是悖论式的和矛盾的。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各种共产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因素比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想要获得的要多得多。另一方面,我们还有许多野蛮的、早期资本主义的东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解释那些与社会民主主义联系的政党和运动的可悲命运呢?这是因为绝大多数选民对政治不关心,不考虑意识形态范畴。而久加诺夫的共产党,虽然实际上就自己的许多“参数”来讲已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却比任何社会民主主义派别掌握更多的王牌。共产党用十分简单的(如果不说是原始的)形式表现了社会公正,而这种形式恰恰可以为社会意识所接受,人们对它的领会比对任何一种西欧范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运动的领会都更好。社会民主主义现在在许多方面必须在共产党的阵地上活动,但我认为这没有多大前途,因为共产党比任何社会民主主义集团都组织得更好,共产党的领袖比社会民主主义者队伍中的任何知识分子都更加容易被人理解。因此,虽然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是有前途的,但这是从长远来说的。在短期内,共产党支配政治光谱左翼的机会远比社会民主主义为多,而蛊惑人民的煽动家自由主

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 的机会更多。

罗曼诺夫(俄国社会民主主义中心)说,1989—1993年俄国政治改革的悖论在于,尽管政治变化显然是革命性质的,而且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独联体全部领土上的权力仍属于过去的阶层,共产党特权阶层保持了,甚至可能还加强了自己的权力。除了独占政权以外,他们还掌握了过去在法律中属于全民的、仅仅由他们管理的财产的所有权。他们从管理阶级转变成所有者阶级,转变成主要是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戈尔巴乔夫是真诚地希望保护经济和政治自由并且把苏共改造成社会民主党的,但共产党特权阶层终于做到了使事件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对于特权阶层中的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1993年的十月政变表明,借助于建立专制政权使社会经济制度转变成特权阶层资本主义的过程已经完成。苏共未能改造成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从根本上是与它的性质和特权阶层的利益矛盾的,后者只要不受限制的统治,而不在于采用什么政治形式。在缺乏市民社会的条件下,各种方向的(民主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互相对抗的上层运动是处于各个特权阶层帮派控制之下的,甚至可以从上面发动工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社会的真正民主化是很困难的。那么是否有可能针对专制的特权阶层统治而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替代方案呢?一般说来对这一问题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这种可能性只是现在才有。但是,只有在正在形成中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力量能在人民群众中、工会中和其他社会团体中获得支持,而且不会(哪怕是暂时地)向极权主义的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势力讨好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才能真正实现。此外,民主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的条件在于推翻统治的社会阶层的政权,这实质上就是反对特权阶层和买办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为了这一目的,要组成广泛的人民同盟,包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广大熟练雇佣工人、工会、正在形成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是中小

企业家,他们和单纯的退休者同样受到金融寡头统治之害。

奥洛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说,社会民主主义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卫劳动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的政治运动。如果没有这样的基本立场,就不会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一切提出新的社会化形式、新的国家调控形式的尝试都只会歪曲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社会民主党人不会超越市场,不打算用某种方式使它简单化,而是力图掌握市场关系的代数学并使它适合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凡是用更加简单的范畴来思考的人都无权声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

奥洛夫不同意利皮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1991年8月失去机会的说法。他说,比这更早两年就已失去机会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未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以使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改良主义的共产党人能在党的范围内公开宣布自己走上改良主义道路的意图。我们保存了共产党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正是这一非常重要的情况使此后形成企图采用社会民主党名称的集团变得困难了。

奥洛夫还反对布兹加林关于要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他说,要使这种社会主义幻想和社会民主主义对接是做不到的,因为今天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那些人打算以某种方式避开市场关系,设想某种新形式的既能避免“该死的”资本主义,又能避免“该死的”市场的社会化。

克拉辛(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说,会上许多人讲到目前政治钟摆明显向左转,但在积极的前景后面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这就是会使人产生幻想,认为似乎这种摆动本身就能使社会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摆脱危机并重新发挥影响。如果左翼力量不对所有的价值作出重新评价,那么尽管社会的同情明显地转向左翼,结果仍有可能是重新失败。

俄国成立社会民主党的最好时机是1991年8月,当时社会民

主党应在新纲领的基础上从组织上与苏共分离。可惜这一机会错过了。目前社会民主党也只能在原苏共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但现在困难很大,因为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没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它们同时进入所有大的政治结构、所有采取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运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负担在拖这些运动的后腿。原教旨主义本身是成事不足的,但是它像蜚螭一样钻进所有这些运动和政党,从那里吸取生命的汁液。它为了存在下去,需要胡说八道,要有攻击“神圣”教条的敌人。它要在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方向的运动中找到这种敌人,在内部斗争中消耗它们的力量。此外,庸俗自由主义的阶级利己主义的政策及其给居民造成的严重后果,助长了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促使最原始类型的阶级意识复苏。因此在目前阶段,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团结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克服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

库里科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说,当前的俄国整个说来是趋向稳定,而不是趋向大崩溃。因此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全部问题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一稳定过程。目前社会民主主义在俄国社会中没有地位。这首先是因为社会并未朝民主化方向前进。其次,如果谈到民主的社会主义,那么按照我的观点就应当解释清楚社会主义概念,但社会主义思想已大大丧失威信,不可能以它为基础制定政策了。它需要多久才能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还很难说。

斯克沃尔佐夫(“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说,目前的社会情况是,一方面大家都失望和丧失信心,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感到市场的好处和优越性。随着市场的形成(尽管政府还存在严重缺点),随着竞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还将日益明显地显现出来。因此我敢于对1996年的政治情况作出预断。我认为要求恢复旧状态的人们是行不通的。历史表明,当人们对民主失望时,就会出现暴政。因此,建立一个能促使俄国沿着民主道路发展的政党是最

迫切的任务。这个党只可能是社会民主党。是否已具备建立这个党的条件,我并不十分有把握,但必须尝试。

沙赫纳扎洛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对讨论中的某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第一,社会民主主义首先是改善社会生活的方法,每个国家都采取不同方式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应当说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之点:1. 它们都采用小步前进的方法、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2. 只用政治手段,不诉诸暴力。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的问题。俄国历史和十月革命的主要教训是没有把这二者密不可分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只和集体主义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政治制度是另一回事,它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其他随便哪一种形式的,例如在有的国家,生活的社会化形式不仅与个人专政共存,而且和世袭王国共存。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能起什么作用的问题,我认为,即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很快成为群众性的党,它的主要任务也是保卫民主。实际上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议会、宪法法庭、公开性等等已统统遭到侵蚀。俄国已建立了波拿巴主义政权,在它身后已看到专政的影子,而目前实际上只有个别的文学—政治集团是捍卫民主主义的机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是否有前途不在于用什么名称,而在于形成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强有力的集中制运动。基础是有的,目前的主要不幸是各自为政。我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任务不是要建立某个政党,而是要帮助人们对各种不同的学说的前景阐明自己的观点。下一次将讨论保守主义。应邀请所有的人参加,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科学讨论,不是政治俱乐部。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我认为应当首先考虑创办一份共同的机关报,社会民主主义的《火星报》。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和工会

戈尔巴乔夫说,客观上有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可能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第一是大工厂的工人;第二是普通的人文科学和技术知识分子,他们的心态、利益和关注点与“御用”知识分子不同;第三是劳动农民、中小企业主。这三个集团能使社会民主党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还必须依靠其他居民阶层包括民族企业家。民族企业家懂得自己对国家、对人的责任,反对社会刑事犯罪,反对黑手党和买办集团。如果不和上述的群众性社会阶层密切结合,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都不可能实现。

布兹加林说,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愿意独立地维护自己的人,有能力发挥社会创造性的人。其中包括:第一,愿意成为主人翁的工人,或者愿意在强有力的工会中为保卫自己利益而工作的工人;第二,不是只想在今天捞一把,而是认为经营过程、首创精神和独立性最有价值的那些企业主;第三,那些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而不是把自己在大众传媒中的位置当作主要目标的知识分子。

利皮茨基说,目前社会民主党只注意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而不去寻找同盟者,有些人要求纯而又纯的队伍,却几乎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工会对社会民主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工会目前仍依附国家,它执行某些社会职能,但还不能成为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独立的群众组织。工会害怕改变现状,因此它在政治独立性方面显然有困难。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改变,社会民主党人就很难指望获得群众基础。社会民主党应当促进当代工会运动、公民倡议运动、地方自治和一切形式的公民主动精神。没有这些方面的发展,社会

民主党人就不会得到群众支持。必须走出狭隘的学院圈子,到劳动者群众组织中去开展工作。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迫切需要与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结成联盟。

布兹加林说,首先应当支持工会。作为最低要求,必须在议会中为通过相应立法草案而斗争,同时支持舆论中的某些倾向。作为最高要求,要为使工会成为反对派而斗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社会伙伴思想今天已行不通,因为这将导致与特权阶层——职团主义政府结成伙伴,实际上将把工会上层拉进这一结构,并最终结束工会运动。如果不在工会中组成针对目前路线的强大反对派,那么这些工会就永远不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样重要的是在特权阶层转化为私有主的条件下支持劳动集体的权利,否则他们就不会支持左的倾向,而掌握工会权力的将只是对政府或者对特权阶层——职团制资本主义采取伙伴态度的集团。

伊萨也夫(劳动党)说,今天的工会在客观上是自发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体现者。工会本身在过去时期里也发生了很大的演变。领导更换了,理想和观念改变了,工会内部产生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俄国独立工会联盟的纲领和莫斯科工会联盟的“经济民主”纲领是工会自觉地通过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但是目前工会这个群众结构与社会民主党“上层”(很大程度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联盟还受到一些因素的阻碍。首先是工会普遍对政治疏远。工会领导在拒绝了苏共的控制后十分病态地害怕

职团主义(或译社团主义)主张社会各行业(工、农、商、运输等)的雇主和雇员分别组成本行业的统一职团,处理劳资关系,并作为利益代表机构参与和贯彻政府决策。1926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宣布成立所谓“职团国家”,由政府的职团部领导和控制全国的职团组织(一方面是全国性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另一方面是各行业的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实行法西斯极权统治。——译者注

出现对任何一个政治结构的依附。十月事件和后来的十二月选举突出了政治自治和政治联盟问题。工会运动需要政治同盟者,但却没有。目前在工会运动中关于必须建立能成为工会运动伙伴的、强大的政治机构的思想已经成熟。正在形成中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可能类似英国工党,在其中相对少数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集团可以与由单个的工会组织和工会联合会构成的集体会员联合起来。在那种联合中,人们不期望那个知识分子部分使其成为“争取廉价香肠的党”,而是指望他们使这个党提出某种能在我们的情况下把社会团结起来的理想。

库久金说,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常常遇到一些社会学方面的空想。例如“大工业无产阶级”即国防工厂中的工人(只开工三个月),实际上像“倒爷”一样来来去去挣钱。如果他们的工厂最终重新开工并且正常地发放工资,他们愿意回去。那么他们算那一个社会集团?完全不清楚。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含混不清。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职能是参加建立新的社会结构。如果不是经常努力从事社会的自我组织,我们就不可能有正常的、或多或少现代化的社会集团,包括雇佣工人集团。我们也可能有真正的、正常的、或多或少名实相符的资产阶级。

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力量的团结

戈尔巴乔夫说,应当讨论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和自由主义力量的团结问题。这两个民主主义方向的改革力量的联盟,特别在俄国这样的政治上四分五裂并且存在专制主义残余的社会里是十分有益的。二者的接近和合作具有重要的思想的和价值的条件

——它们渊源相同,都忠于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二者或迟或早会团结起来,从而在政治上使社会的民主改造过程趋于稳定。但是目前还做不到,这首先是由俄国自由主义的现状造成的。不久以前,自由主义思想曾风行一时。但由于实行货币主义的“休克疗法”,大多数居民陷于贫困,现在它已大大丧失信用。俄国自由主义遭到深刻的危机。只要自由主义的党和运动不进行自我批评和重新评价自己的经验,不能摆脱对自由主义的庸俗解释,那么与它接近在政治上就不会有好处,反而会给还未站稳脚跟的社会民主党造成损失。那时原共产党中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一部分人就会转向其他方面,转向最保守形式的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接近对民主的改革是有益的。谁真正做到这一点,谁就必须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社会倾向,并在这一基础上制定已走入死胡同的自由派社会经济政策的替代方案。这样的建设性批评能使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民主力量摆脱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实践,并且加速靠拢社会民主主义。可能有一天,这两个社会政治流派的联合会成为现实,从而使俄国的民主派团结起来。

布兹加林说,与自由派联盟从抽象的理论来讲是很好的想法,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俄国的自由派会向何处去?他们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智利的皮诺切特模式。坦克已向议会开过炮,以后还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第二种是与特权阶层中的新的占有财产的一翼联合,这是极端的自由主义与极端的官僚主义的结合。这恐怕是对他们最有好处的方式。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是与社会民主主义流派联合,而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会力量,这条道路对于他们都要困难得多。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与自由党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布尔拉茨基说,不能把盖达尔及其改革称为自由主义的。这是把价格的自由化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混淆起来了,而后者

与目前俄国所做的毫无相同之处。俄国目前是典型的用暴力栽种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是野蛮的、犯罪的市场,另一方面是职团制国家。而最可怕的是这种暴力的复活。盖达尔现在建立的党是典型的金融和商业资本的党,它的对立面应当形成反映雇佣劳动者利益的党或运动。

. . 麦德维杰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说,我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和解的公式抱很大怀疑。这不仅是由于盖达尔使自由主义思想丧失了信用,在自由化的旗帜下使社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而且主要是因为当代自由主义具有好斗的、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一些主张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不能调和的作家和学者成为自由主义的偶像,他们把社会主义看成自己主要的敌人,例如米塞斯,哈耶克,波普尔等。这些作者的著作到处被引用,为人们提供思想、论据和判断,把社会主义驳斥得体无完肤。很难指望那些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会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奉者取得一致。戈尔巴乔夫在回答麦德维杰夫时说,这种合作不应当在理论层次,而应当在实践层次。例如马利采夫在发言中曾说到下诺夫哥罗德地方自治中的情况。他们那里在选举时能把共产党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罗斯党的代表联合在一起进行协商,在自治委员会中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克拉辛认为,可以从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排他性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他说,这种关系包含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价值层次,在这一层次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毫无矛盾:自由主义可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由之出发的前提,二者有共同的根源。在人权问题上难道能把自由主义同革命传统对立起来吗?自由主义的奠基者约翰·洛克是在革命传统中成长的,自由主义起源于革命传统,起源于对英国革命经验的思考和概括。另一个是实际政策的层次。目前俄国在这方面起支配作用的势力所执行的政策不仅是反社会主义的,而且简直是反社会的。与它们的联盟

当然只会破坏正在成长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声誉。只有在对这种庸俗的自由主义(这是自由主义的边缘分支,甚至连自由主义思想家也要对之嗤嗤以鼻)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认识时,在政策层次上的联盟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范式的转换

· 麦德维杰夫说,如果不了解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构想、社会政治运动和现实社会实践)的危机的原因,就不可能认清社会发展的前景和正确估计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关于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这说明社会主义学说,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错误的。另一种认为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所造成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由社会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不如说首先是由世界上整个文明的性质的变化造成的,而这些变化是与工业化时代潜力的耗竭和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相联系的。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西方社会也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它今天已与19世纪的,甚至与20世纪初年和前半期的资本主义已有显著差别。也可以说过去的整个文明连同它所固有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危机。在目前阶段,西方善于适应形成新的文明的条件和需要,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它与人们生命活动的许多方面的社会化的关系在内。但自称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却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自我改造和适应,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遇到保守主义的、惰性的力量方面的反抗。由此产生出社会主义革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应当克服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及其缺点以及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和背离。社会主义理论应当摆脱单维性和武断性,不应声称拥有绝对

真理, 不应有排他性——这一切都曾使它成为某种形式的宗教教义。另一方面, 要革新社会主义思想, 使它和20世纪末年的现实结合起来并面向21世纪的开端。这一任务是更加复杂和重要的。如果社会主义不对由于目前社会中的变化、文明性质方面的急剧转变而产生的问题作出回答, 那它就没有前途。社会主义不应表现为最终完成的、刚性的结构, 其中的所有成分都具有单一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如果像这次会议上有人所讲的那样, 只通过价值体系来界定它, 那又是不够的。社会主义既是现实的倾向, 也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社会化过程, 也是保证劳动者得到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使社会生活某些方面得到管理的现实机制。

戈尔巴乔夫说, 当前世界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政治的上层建筑、而且整个旧的文明都已用坏了。新的文明要来代替它, 这种新文明将把即将发生的事件的经验, 包括积累起来的全部价值和新世纪的全部要求综合起来, 形成一个复杂的合体。我们经常在新的考察问题的方法的范围内寻找新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而不去考虑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适应新的文明。不管你愿意与否, 新的文明要来的, 不考虑它是不行的。目前的世界已进入这样的新的历史时期, 历史过程的新的分界点, 许多学者把这一过程与趋同论联系起来。不管你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但变化是要发生的。因此必须改变观点、世界观、概念, 也就是进行头脑里的革命。最近加尔布雷思发表演说, 描绘了当前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 两种制度的相互影响。教皇保罗- 约翰二世也很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他既不赞成纯粹的资本主义, 也不赞成社会主义, 但并不全部否定它们。他也谈到调控, 社会公正等等。我们似乎在旧的观念里兜圈子, 而这些观念已不再反映事物的现状了。新的文明中的最高价值是人、人的权利和自由。我相信, 新的文明的成分将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和全人类的价值。这些成分的相互作用是在民主主义的结构内, 在成熟的民主制和市民社会

的范围内进行的。

麦德维杰夫说应当超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的范围来讨论目前社会发展的道路。两分法不能解决当代的基本问题。应当既批评这个制度,也批评那个制度,应当分析二者的本质,指出它们都有自己的过去,也有自己的未来,但不应对它们作出以意识形态偏见为根据的毁灭性批评。据法新社最近报道,教皇提醒人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的“真理核心”。他说:“由于这一真理核心,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对西方社会具有吸引力的现实。”麦德维杰夫认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深刻的、根本性的和不妥协的,同时又是客观的和建设性的。但是骑兵冲锋式的、感情用事的政论式的歪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克拉辛说,社会主义思想的复兴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都取决于对新文明的挑战的回答。社会主义学者们好几年以来已在讨论社会主义的范式转变问题。首先是从结构范式(社会主义模式)向价值范式的转变。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早已走上了这条道路,但在俄国才初见端倪。斯拉温把从价值出发考虑问题的方法看成抽象的与生活现实脱离的方法。从价值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社会结构。价值固然要在某种社会结构中实现。问题在于是把价值还是把结构置于优先地位,而恰恰价值优先的态度是把社会主义问题置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之上的。从结构出发的态度总是要制造某种刚性模式: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作用等等,而且总是要把这种模式运用于各种不同的,往往完全不相等的条件。而从价值出发的态度却要具体分析现实情况。所判定的政策是挣脱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决定论的。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要探索自己的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形式和方法。甚至从长远的前景来看,在世界的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多样性的情况下设想会有某种单一形式的社会结构,也是

大可怀疑的。更加可靠得多的是把世界的结构设想成若干个世界的联盟,设想成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多元化体系。设想西方的、中国的、印度的、阿拉伯的、非洲的和其他的文明会趋向某种统一的形式,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他说,关于社会主义范式转变的第二个因素是,从排他性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和运动过渡到承认它是更加广泛的人类的精神和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这样的术语本身至少按官方的解释来说似乎是强调其他观念的非科学性、不完整性和次级性。必须从这种特殊性和排他性过渡到各种社会观点、各种设想的商讨和互动。当然这样就会使人们所设想的一元完整性发生问题。现在所要求的方法和利益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了。社会主义设想应当包含某些根本的认同价值和范畴作为核心,而其余的则是大量的有移动性的思想材料,是对商讨、对周围环境的变动的反应。

米洛斯拉夫·朗斯道夫说,传统的共产主义范式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范式都是用途已经耗尽的范式。二者的主要过错都是国家统治主义。二者(包括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内)都没有超出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非合理性”的范围,都没有提出社会理性的“新的形式”。正因如此,有这样一种的意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世界观的三种形式、一种设想的三个变种而已。当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转变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消失了。西欧的和全世界现存的那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没有摆脱从前的设想。不仅共产主义者,而且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应当寻找新的价值,新的范式。

(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4年第11期、第12—18期合刊

殷叙彝 译)

社会主义的当代观 或当代的社会主义观

[俄 国际社会经济和
政治学研究基金会

讨论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拟定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角度认识当代(即不同于某种传统的)社会发展的构想,从而实际展示社会主义对当代的认识,顺便说一下,当代的主要特点,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危机。对任务提出的这些条件,要求我们必须对认识的社会主义性作出反应。正因如此,这场旨在展示社会主义对当代的认识的辩论的对象,首先是当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的危机? 是否需要新的范式?

基金会全球纲领中心草拟并供与会者讨论的提纲说,造成社

这是俄罗斯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基金会(即“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组织的一系列专题讨论会之一——“当代社会发展的构想:社会主义观”的发言综述。

会主义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崩溃;然而,其深层根源与其说是这些制度崩溃这一事实本身,不如说是在这一事实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它在历史上形成的那种形式)在适应向新的文明过渡的条件时所遇到的矛盾和困难。

因为昨天那种社会主义——有关它的观念至今仍在我们的意识中占主导地位——乃是古典工业主义的理论模制品,带有古典工业主义的固有特征:耗材和劳动密集型技术、明显的所有制界限、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阶级对抗、党派的政治结构占有优势。但在现实中,“后工业社会”已在取代古典工业主义,其本质特征是:灵活的技术、知识和信息工业、所有制关系与阶级划分模糊不清、国家职能改变、出现新的社会主体和没有党派性质的运动、政治文化一致。社会关系正在受到新需求的影响,这些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并不归结为经济利益,而往往被统归为一类。这些根本性变化(它们直接触及评价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发生在完整、相互依赖,同时又成分各异、相互矛盾、充满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强烈反差的世界之中。历史上形成的那种社会主义,没有准备好接受时代的挑战。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不完全符合当今的历史变动了。

尽管如此,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趋势的行列式的进程,在这种变动是否占有一席之地呢?提纲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首先,在当代复杂的社会中,正在产生一个相互依存、彼此联合、要求实行民主调节的社会经济联系体系。该体系中正在成熟的成分有:对经济进行社会调节的内部设施、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基金、生产工人参与管理。提纲的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俄罗斯,不过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在市场关系形成的进程之中。科学和文化也日益要求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显而易见,不如此,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无法发展。其次,整

个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绝对必须解决的全球问题,如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态、裁军、生态、人口、能源等问题,而没有所有国家和民族的通力合作,没有自觉的调节,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在提纲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决定社会主义趋势的过程。而且,这些趋势并不仅仅归结于经济的必然性,其中,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因素也同样起作用。这些决定因素并非是些事先决定“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毫无个性的力量,而是能为社会行动提供动因和意向并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现实。

哲学博士 . . . 克拉辛在其报告中对提纲的这些论点作了发挥。他强调提出,不仅是社会主义,还有其他社会观念,包括自由主义观念,都处于需要更换观念范式的危机之中。克拉辛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这两种观念都是建立在一元论基础之上的,而正是社会制度和发展中的一元论首先受到工业化现实及其后现代主义的解释的质疑。克拉辛特别谈到了后者。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古怪构想是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因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飞跃而发生根本变化的征兆。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构想把社会关系相对化,实际上是完全否认作为体制的社会存在任何稳定的结构,以离奇的模式集中了某些现实问题,并按自己的方式向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理性主义的构想发出挑战。

克拉辛论述了一些基本方向,他认为,寻求制定社会主义构想的崭新看法,可以而且应该按这些方向进行。

1. 从结构转向价值观。根据某些固定的结构(公有制、国家计划、工人阶级领导权等等)来设计一个与资本主义模式相对立的、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尝试,都带有历史暂时的性质……当今多种多样的现实,揭示了另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即

对各种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团结等等)加以系统综合的途径。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把这些价值观念同某些经济范畴拴在一起是不够的。有关每个领域内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容及其相互依存和从属关系的问题日益突出。

以往社会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在于,把它看作是摆脱争取自由主要障碍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现在已经清楚,异化的根源要深得多,枝杈要密得多。社会主义要成为能唤起具有巨大能量的社会行动的伟大目标,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广泛的解放概念,能够揭示出克服各种不同形式的异化的方法。

2. 从“摧毁”论转向有机论。这里说的是革命与改良的相互关系以及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性……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应当溶入历史进化的有机进程之中,而不是将自己的逻辑强加于它,否则,现实一旦予以“拒绝”,这种主观逻辑就不可避免地转变成摧毁价值的暴力和极权。

3. 从目的论的决定论转向对社会历史创造活动的非预先决定的不同方案的意识。这首先说的是要克服禁锢社会主义的呆板的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此外,该思维方向还触及立足于社会主义传统基础上的整个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明的深远传统,它以世界末日论来看待历史进程。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中,占主导地位的本体论”的观点把历史看作由客观规律决定而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和意识的不同阶段构成的某种序列,它离奇地与政治中的极端唯意志论结合在了一起。“矛盾消除”的原因是,唯意志论政治援引历史必然性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说法更多的是信仰,而不是科学认识的对象。20年代,一批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尔什、卢卡奇、葛兰西)曾试图借助于作为主客观统一体的“实践”范畴,来摆脱历史的“本体论”解释的绝境。这种尝试当时未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尽管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产生了影响。

当代复杂社会的后工业化趋势,尖锐地提出了一项任务:把历史看作人们活动的产物,而不是由无个性的客观规律预先决定的。历史进程的轴心是主体及其广泛范围内的自主的活动。行为动机的多因素化及社会群体和个体探索的多元化,使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的性质和后果变得无法预测……

这样就需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思考衡量社会主义方案的众多的社会哲学尺度。例如,把进步理解为直线上升的发展,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还必须放弃革命救世论,这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说法的直接产物。关于社会和谐一致(它被用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的观念也是天真的。显然,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可能达到的只是变动着的社会平衡,但这种平衡丝毫不消除社会冲突:冲突是无法消除的,它们扮演着社会发展发电机这一不可取代的角色……而理论,这里指社会主义理论,应当寻找调节冲突的最有效的机制。

4. 从对人类社会以及相应地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完全单一性(整体的世界、单一的文明)转向包容各种社会、文化、文明的多形态系统的观点;转向其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前景的观点;转向平等的、摆脱了“社会联盟”人为障碍的、作为人类文明自然状态的观点;转向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不同类型(即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5. 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认识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转向全球的角度。

6. 从社会主义观念(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排他性转向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在哲学和政治意义上,这种讨论意味着各个社会政治力量、运动、思想流派的相互影响,意味着社会政治思想运动的建设性进程。通过该进程掌握多方面的社会经验,对各种价值观作出选择和综合,使不同的社会政治传统互相充实。在当代,这一讨论正成为社会认识和政治实践发展的主

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特殊性、排他性、分立性对任何社会观念,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观念都是有害的。但是,加入讨论就会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磐石般的完整性提出质疑……从其中一方面分出比较稳定的被证为同质的核心(包括基本价值和最普遍的范畴);另一方面分出较为活跃的思考材料,它不断对讨论作出反应,思考其他思潮提出的问题 and 建设性思想,当然它是透过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思想的。

在总结必须更换社会主义观念范式的看法时,克拉辛强调指出:这里所指的是深入改变整个观念,直至改变观念的哲学基础,让观念在多层次的社会思想总潮流中找到自身的位置。克拉辛最后指出,表明社会主义立场同质的标志,可以而且应当是:1. 方法和评价中的社会性,即意识到反映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群体在社会关系体系中地位的利益和志向对历史行动的社会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立场赋予劳动者的利益以优先地位;2. 团结,这是社会主义一词本身一开始就有的概念。“社会主义”术语是皮埃尔·勒鲁在19世纪30年代首次使用的:他把表现集体团结精神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取代个人主义的选择;3. 国际主义,它表现了国际团结,这种国际团结是面对目前的全球性挑战所必需绝对服从的要求。

提纲和报告为开展富有成效的辩论开辟了广阔天地,我们认为,它们相当全面地阐述了范式问题,展示了问题的基本前提。在这里,“旧”范式被想象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是一个在整体上自我同一的东西;作者抛开了例如古典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列宁主义,“现实社会主义”中的自我区别的具体情况。

然而,辩论中并非人人都认为这些“细微差别”是无关宏旨或不言自明的,这是同上述问题,即同对社会主义危机原因的解釋,同是否认为有必要根本更换范式的问题有直接联系的。例如,哲学博士 . . 斯拉温发言的主旨是认为存在根本差别,并相应地

同被他指责为不加区别的“个别创新者”展开直接论战,斯拉温认为,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基本原理迄今为止仍然是可以接受的,而斯大林(与后资本主义的“列宁不同的绝对反资本主义者”)对这一范式进行了歪曲。斯拉温认为,作为个人原则和公共原则和谐一致的社会主义(勒鲁语)必须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理解,即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形态,其最高阶段共产主义要求物质生产的发展具有相应的高水平(物质生产普遍自动化、经济领域完全不使用体力劳动等),这种水平今天任何地方都没有达到。

劳动人民社会党的纲领把社会主义看作价值体系,看作社会经济制度的“综合体”,并以此解释社会主义新观念问题。哲学博士 . . . 卡拉什尼科夫坚持这种看法。他还谈到,社会形态的更替,不在于消灭而在于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成分,在于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比例,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集体所有制形式占优先地位、国有经济成分和国家调节具有重要作用的话,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市场机制,因为没有市场机制,社会主义的按劳动分配原则就不能实现。总之,如我们所看到的,卡拉什尼科夫对彻底更新整个社会主义范式的必要性问题也未给予肯定回答;他把制订社会主义新构想首先与苏联和东欧各国曾经建立的那种模式的崩溃联系在一起,“至少”是与当代世界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联系在一起。

如同前两个发言一样,艺术学博士 . . . 阿尔斯拉诺夫的发言也对社会主义全球危机的原因作了解释,其中包括从哲学—历史的角度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批判。他问道,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不仅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而且完全放弃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整个文化传统,放弃黑格尔的辩证法等等的问题?阿尔斯拉诺夫接着说,西方思想家较少掩饰这种放弃。

. . . 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之一)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随着十月革命的破产,对客观理性存在的信仰也破灭了,黑格

尔的客观辩证法也被摧毁了。如果说十月革命失败了,那么,从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整个人类都失败了。阿尔斯拉诺夫最后讥讽地说,我们是不会让自己如此坦率的,因为我们在极力扮演“正派人”(《作为一种现实的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季诺维耶夫语)的角色。

(克拉辛对此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如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具有历史性,与自己所处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反映时代的矛盾、成果与局限性。按照这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属于19世纪,但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这一传统至今仍有意义,并且还拥有未来。这一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克拉辛继续说道:我同时认为,马克思的一个疏忽是对康德哲学传统的意义估计不足。伯恩斯坦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康德的传统对于社会主义观来说非常重要,它过去和现在都需要按照康德的方法论进行批判。我们估且称之为社会主义理性的批判,即要揭示出社会主义理性的能力、可能性和局限性。这项理论工作没有完成至少做得很不充分……结果美好与公正的思想由于其与现实的关系准则受到破坏而变成了极权主义的实践。)

历史学博士洛基诺夫则从唯一的一个,但却是真正全球的和现实的(而不是纯学术的)问题角度出发,来看待新范式的必要性问题,给予了完全肯定的回答。他说,即使迫于生态问题,也需要一个现代的、形式和内容都崭新的、能对当代世界及其前景提出社会主义认识的社会主义观。这位历史学家说,我们正经受着利己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危机,这种方式在大众意识中培植一种“消费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企图把一批“文明国家”置于其余人类之上,置于居住环境之上,置于自然界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被福山热情描绘的在20世纪末出现的自由主义的胜利,确有变为“历史终结”的危险,而且已不仅仅是按照黑格尔的方式。如同早期基督教曾帮助人类进入其发展的新时期一样,构成社会

主义世界观核心的团结和集体主义思想,在获得新形式和新内容之后,是能够成为拯救的手段和向文明的新阶段过渡的旗帜的。

哲学博士 . . . 克列在发言中呼吁保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中的有价值的东西。这位哲学家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与其他构想有两点不同,第一,它认为社会主义是从历史自身合乎规律地成长起来的;第二,它认为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两个观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克列认为,提出“价值观的方法”,实际上是要危险地放弃这两个观点——在世界观出现真空时放弃科学性。值得注意的是,哲学博士

. . . 兹洛宾在发言中也反对肆无忌惮地批判马克思主义。他批评说,这种批判把科学性和价值对立起来了。他强调指出,科学并非处在价值之外,因为任何一种科学都是主体的,因而也是主观的,也是有价值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性的,而其中的社会性并不是没有个性的。其次,他认为,将一种社会形态原则与另一种对立是错误的。他说,社会形态原则只是科学认识社会的一种方式。(正如我们刚才听到的,科学并非处在价值之外,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社会性,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批判,本身会在这里形成一个封闭圈。在这些表面上对立的“批判的批判”的言论中,第二种逻辑封闭圈表明,在这种把科学态度和价值观对立的背后,在对这种对立的批判背后,隐藏着一种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其背后实际上都可以看到一种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与另一种价值(自由主义价值)的对立。

正如历史学博士 . . . 韦贝尔在其强调方法论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价值观对立的基础,归根到底“恰恰是从决定论角度,而不是价值论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

韦贝尔接着说,然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同时有机地融入了民主社会主义构想之中。因为社会主义(如果不从决定论、“本体论”去解释,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是社会形态的一种)是与民主相容的,它实际上彻底贯彻了民主原则;而早在1847年在“正义者同盟”中就与勒鲁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共产主义,归根到底只是极端主义的乌托邦,这种共产主义离开强制,即某种形式的暴力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要打碎“旧”社会,塑造“新人”,使新制度获胜并具有普遍性)。韦贝尔发言的重要部分在于揭示社会主义的不同尺度。第一,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某些发展趋势的标志,它受人们对集体财富(490—337)的需求所制约;第二,社会主义是某种价值取向,它是上述社会发展趋势的理想体现;第三,它是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方向的运动。

可见,从价值角度看待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是相互对立的。韦贝尔解释说,相互对立的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即绝对自由的观点与平均主义的公平观点之间的对立。

如果仅限于权利范围,自由与公平是兼容的。公平要求平等的自由和机会均等。它同时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团结精神,作为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的民主一致的基础。为说明这些论点,韦贝尔在发言中举了20世纪出现的集体保障社会需求的趋势作为例子,即体现在社会福利国家中、表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支出大幅度实际增长的那些趋势。

历史学博士 . . . 奥尔洛夫在发言中指出,如果说令人费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中寻求摆脱本体论解释历史的怪圈的出路的话,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则从上世纪末至今一直信奉这种实践哲学,具体成就就是社会福利国家。奥尔洛夫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中社会发展的主要成就。

“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 “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

有关社会—民主经验的思考的发言,起初似乎曾使辩论有所减弱,但最终却重又推动了辩论,使之变得富有成效并纳入较为彻底的历史主义转道。首先,在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中,“主体论——价值论”对立的绝对化被剔除。同时,在“主体论”认识范围内分出、区别出并重新认识了“结构性”和“社会形态性”的因素,进而与“决定论”成分脱钩。

例如,历史学博士 . . . 佩列古多夫不同意单一的价值观的方法”,他强调,在社会经济领域,伦理社会主义的哲学和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模式,及其经济民主和积极政策(在劳动关系、劳动市场、就业等领域)的方针,是同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直接对立的。而且如果说在经济领域中私有制和私有—集体所有制尚能在上述模式中占有中心位置的话,那么在社会领域中强调的则仍然是国家原则;得到承认的不是“小的”,而是“大的”、有权威的和功能众多的社会福利国家。不从一定的结构上(而不仅仅是价值观上)去看社会主义,就无法看到其危机的实质,因而也就看不到危机后的前景。

针对对价值观提出的这些保留意见,奥尔洛夫在上述发言中

回答说,他赞同的正是由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观向价值观的转变。他同时指出,这一点并不与持社会民主主义方向的政党的“结构行为”相矛盾;在何种意义上不矛盾,看来是清楚的:因为这些行为中看不到社会形态—改造原则。奥尔洛夫不无用意地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价值中(同自由派一样)把“自由本身”放在首位,但(与自由派不同)同时又把自由同自己纲领性文件中包括的两种根本价值——社会公平和团结一致——联结在一起。

不论怎样,在解释社会主义危机问题上,佩列古多夫讲得非常明确和坚决。他认为,危机的主要本质特征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在发挥作为日益增强的国家的作用之化身时表现出的危机——“不仅在我国如此,在西方也同样如此”。(“因为除国家社会主义外,谁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的危机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危机”)他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危机”这一命题中,找到了解释社会主义对当代的看法问题的重要的关键点。

经济学副博士 . . . 克拉西利希科夫考察了该问题的内在逻辑。他首先校准了问题,将社会主义危机的核心,具体归结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其次,他揭示了这个问题同一系列问题的联系(例如:从异化问题看当代对社会主义的解释;从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看“现实社会主义”破产的意义;西方以及俄罗斯社会政治体制的进展等)。他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本体论”中的“社会形态”因素进行了反思。

西方百年来的发展,被哥德堡的特恩波恩称作高度现代化。克拉西利希科夫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在下述程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即可以在现有工业化生产和保留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在经济社会形态范围内,是变得高尚的人道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工业社会主义作为在可能程度上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使西欧得以完成科技革命——起初是其50—60年代的第一阶段,然后使它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信息革命。西方开始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尽可能地贯彻社会公正原则,这就为工人子女打开了大学和专科院校的大门,保证了消费的增长;这一切意味着培养了新型的工作者、新型的人,意味着劳动与科学知识的结合,这决定了西方在30年前就能取得技术和经济成就。但是,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西欧的社会主义开始过时了……现代工作者首先依靠社会福利国家的成就,极力争取自我实现、自我肯定、能够独立地保证自己获得高工资、送子女进私立学校、请私人医生看病,等等。由此而产生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现代极其复杂的劳动力的载体对社会福利国家的需求已大大小于他们的父辈。社会福利国家不能满足已提到首位的需求——自我肯定的需求、消除人的异化的需求。这样一来,社会福利国家未能,看来客观上也不可能实现文艺复兴的基本思想,而社会主义就是从这种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作为资本主义自身的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危机,也必然标志着另一个高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具有神话性质的“第一阶段”——“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现实社会主义”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失败了,因为它首先在智力方面失败了,这指的不仅是没有提出新思想,而且也没有掌握全部科学成果,没有在实践中实现所提出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在我们这里可行吗?现代化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完结?克拉西利希科夫认为,在今后几十年内,俄国将不会实行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俄国没有产生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那些文化和历史根源。20世纪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雇佣工人就其心理而言仍为私有者。西欧的社会主义想把工人变成主人,而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则想把“资产者”变成“同志”……在俄国,只有当左派力量彻底铲除自己的反资本主义和反西方的特性时,当左派能够提出实现现代化和向后工业化过渡的口号时,他们才能期望获得成功。否则,他们将陷入平民主义

的蛊惑宣传中不能自拔,或者去为日里诺夫斯基唱赞歌,或者完全退出政治活动的舞台。

历史学博士 . . . 施韦泽故意使用自己的“新语”,谈到了“社资”(即西欧“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现象。他指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政治本质。市场经济成为可调节的,因此危机只是周期性的,国家是法制国家,而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全稳定的。正是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使意识形态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出现了真正的非意识形态化,那些不与社会进步相矛盾的价值观得以存在……出现了(并且还在出现)各种政党、运动和集团,它们过去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个小点缀,而现在它们程度不同地削弱了传统政党的政治地位。施韦泽说,也许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是西方政治结构中构造断口的一种特殊初级阶段,“各种思想的党派”——自由主义派、社会民主主义派、基督教派、保守派逐渐开始退出政治舞台。或许,西方的部分选民的大众意识已对政治形成纯实用主义态度,并对这种范式的载体表示好感。

历史学博士 . . . 加尔金在发言中从更广泛的理论角度,对社会体制的政治结构问题作了阐述。他指出,任何一种体制,首先是社会体制,如果它不想自我摧毁的话,就会同时发挥对整个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的两种功能:一是传递(传播)已贮存的信息;二是收集新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在通常被称作发达世界的那部分地区,传递贮存的信息的功能至少已有半个世纪是由右派政党,主要是保守党承担,而适应功能、收集新信息的功能则由左派政党承担。二者之间的失衡曾多次导致政治动荡,但并未摧毁体制;在内部机制的作用下,均衡之势得以恢复。这是通过将重心从传播贮存的信息转向接受新信息,或反向而行达到的

……

加尔金接着说,上述情况同意识形态有直接关系。现有思想的筛选,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在“右”和“左”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筛选还在每个价值体系内部进行。体系所拥有的一些价值提前,而另一些则退后……

在俄国现实中,出现的是反常的现象(原因另议):举世公认的左派政党,在我国发挥传递社会贮存的信息的功能,而传统上被列为右派的政党,却力图发挥适应功能。不过,目前一切都逐步各就各位了,我们正在走向“正常局势”。这种“正常化”的结果之一,是在政党结构的左翼部分出现了一个大深沟。这个深沟第一是需要填补它的政治力量,第二是需要这些政治力量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可是,目前这两种都不存在。出现了真空状态……

真空的出现首先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任何一个政党在发挥上述两种功能中的这种或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功能时,不可能仅局限于这一点,它至少应具有双重功能。以左派政党为例,除了使社会适应变化中的形势这一功能外,还应捍卫很明确的一部分居民——雇佣工人的利益……双重功能的局面造成不少困难。问题在于,左派政党实现的一种功能,常常会与另一种功能相抵触。在此基础上会爆发导致左派力量分裂的冲突。

当代俄罗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力量的悲剧何在呢?它们理解自己的第一种功能,也有智力和政治力量去准备实现这一功能。但另一种功能,即表现具体的社会利益功能的情况却糟一些。基于政治考虑而邀请来的脑力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方向与工人运动之间出现了分裂。所有制止分裂的努力迄今都未见成效。但离开工人运动将一事无成。如果看不到这种情况造成的严重威胁,不找到解决办法,社会主义运动就将无所作为,沦为一种小型俱乐部网。

在东欧国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密切联系。在那里,自由主义思想在民族复兴的浪潮中占了上风。相应地,对自由主义的

失望削弱了民族主义势力,加强了左派的力量。在我们这里,自由主义的方针是否定民族主义思想,否定民族利益的。对自由主义的失望,激发了民族主义,这明显地表现在工人阶级中大部分人的立场上。具体的社会调查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日里诺夫斯基的选民,主要是大型企业的工人和科技人员。在日里诺夫斯基的身旁将出现新的领导人物与之竞争,他们将更强有力,更与众不同。加尔金警告说,对自由主义失望的雇佣工人的基本群众多半会被他们(而不是左派)牵着走。

哲学博士 . . . 梅朱耶夫在其发言中,也原则上触及了政治结构问题。他指出,在一个过去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抵制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办法,只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同自由主义联盟(例如,魏玛德国就是这样做的);而我们却宁可要反共产主义和激进民主派的垄断政权,也不要这种联盟。后果已经出现:自由民主派在一翼失去盟友后,正在提心吊胆地望着另一翼,更加可怕的一翼。此外,这两翼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并不反对建立在极端的基础上的联合。发言者指出,这就是匆忙与过去决裂的代价。

社会主义思想的含义

梅朱耶夫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本身的未来不是与回归过去,而是与复兴和革新社会主义思想,与把社会主义思想溶入现代精神文化相联系的。

这位哲学家指出,今天,思想在其中流传的那种思维空间,各政党活动的那种政治空间,在许多方面未吻合,还未形成统一空间..... 我们过去宣传过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提法,认为这一提法是不

容置疑的真理。实际上,这是一个能给理论与实践带来严重危害的相当危险的提法。把这一提法用于社会主义尤其有害。斯大林主义的全部谎言就是建立在这一提法的基础之上的……发言者警告说,当今的社会主义者不要自我欺骗,不要以为社会主义现在就可以按照这一概念的含义完全实现。要知道,作为文明基本特征的许多东西,就是今天我们也不具备。但是在思想领域,社会主义当然占据着荣誉的和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就根本不可能有关于世界的现代理论、社会—哲学观,就不会理解世界的现在与未来。与自由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一道,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社会—哲学知识和我们时代全部精神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梅朱耶夫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它与流行的错误结合不同(如与压制个性、个体的集体主义的结合)。他说,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以“自由的个体”为取向,这种个体不同于自由主义所维护的“私有者”、私人。如果说个体原则是全部欧洲文化发展的基础的话,那么私人(私有者或私人工作者)所体现的私人原则,作为分工的结果,则构成了全部西方文明发展的基础。私人原则在生活的一切领域的胜利,也就是这一文明的主要成果。与其对立的是包含在文化中的个人原则,社会主义所捍卫的正是这种个人原则。从这一观点看,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西方文明从西方文化的立场出发的自我批判。所以,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是西方自身内部的争论(西方文明和文化之间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只能在西方社会以后的演化中得到解决。

我们所解决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问题。当试图在由西方传入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概念中提出这一种问题时,我们便产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曲解概念。在我们这里崩溃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被我们称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即千方百计使之现代化而仍然保留了传统主义和古代“胎记”的社会。社会主义在此不是以其

本来特性,而是作为一种现代化(或工业化)的方案出现的,这种现代化不仅使国家保持了完整,而且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工艺上的和经济上的差距。另一种方案是纯民族主义的(达到极限时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它更“适合”于民族成份相当单一的国家。在尚未形成市民社会,没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缺乏法律素养和稳定的民主传统的地方,即社会尚未能按纯自由主义面貌发展的地方,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现代化方案都会获胜。在这种局面下(此局面今天在许多方面仍存在),最好不要完全消灭所谓社会主义选择(这样会不可避免地助长民族主义),而应逐步使其向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方针靠拢,使之民主化,将其纳入法律规范和设施的作用之下……

梅朱耶夫最后强调,社会主义者今天应以所有自由主义口号武装起来:市场、民主、法制国家。否则,就不会有现代文明,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持反自由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在背叛其自身,损害自身的信誉(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的自由主义亦是如此)。这并不是要求社会主义者应处处像个自由主义者。市场经济的口号是由自由主义者倡导的,几乎被他们看作是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而同一口号落入社会主义者“手中”则是另外一回事,社会主义者明白,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绝对的,其中不包含终极真理,它要求国家和社会结构对它的消极后果进行一定的限制和调节。

哲学博 . . . 卡普斯京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含义进行哲学上的理论重构时,在社会主义空间中发现了曲解这种含义的三种错觉。

错觉之一是错误理解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野,把集体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

事实上,正如马克斯·韦伯揭示的那样,市场是极端非个体化

的力量,它会制定出规定个体活动和个体相互依赖关系的前所未有的严酷体制。这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任何一种为该体制运作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客观前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传统,首先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和对市场使个体非个体化的一种抗议。

卡普斯京认为,社会主义是为什么和怎样最终等同于集体主义的,这可以作为社会学和哲学反省的一个问题……此问题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是如何设想新型的集体主义的,而这个集体主义又恰恰是建立在个人原则充分发展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此问题既脱离了变成革命实践的“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实际已经定位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40年代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冯·哈耶克坚决捍卫“自生的市场秩序”,反对诸如威廉·冯·洪堡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危险的(如果不是毁灭性的)个人主义。从市场体制再生产的逻辑角度看,哈耶克是对的:个人主义如果代表一种价值和目的,而不是一种辅助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具有反市场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市场是建立在要求自己适应,而不是批判性地反省的传统之上的。

错觉之二是认为国家与市场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早就掉进了这种非此即彼的陷阱,至今仍不能自拔。自从国家在理论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实践)不被看作是黑格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880 8(德行),而只被看作是拥有一定操作规程的设施体制之后,它就被肯定地比作一个市场,也被列入工具理性范畴,对它来说,人只是一种工具。国家和市场的冲突,就是实现各种形式的工具理性的冲突。从总体上看,工具理性在“铁幕”两侧变得越来越多,无论这些形式的工具主义的关系和比例在这方或那方如何变化。

只要社会主义还是在“国家——市场”这种两者择一范围内来考虑,只要它还看不到这种或那种选择充其量只是技术方便问题,而非原则内容问题,它就根本无法作为取代资本主义集体主义的选择而有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所走的路,战略上(而非战术上)都是没有前途的,它仅仅是以自己的无前途去“教育”他人。

实际上,“国家——市场”两者择一,是另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联系问题被搞得面目全非、故弄玄虚的表达。历史上曾有过解决此问题的三种基本范式(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像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所展示的那样,压制问题或回避问题)。第一种是城邦—共和国范式,它要求私人利益服从公共福利,不允许私人利益具有独立性和自由。第二种是早期自由主义范式(在孟德斯鸠和弗格松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主张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是“权利平等”关系,同时承认双方的独立性和自由。第三种是“黑格尔”……范式,它主张在不压制和否认私人利益的独立性的情况下,使私人利益升华为普遍利益。

寻求在历史实践中实施“黑格尔”范式的形式,即在传统的和(在某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背离自己的纲领,退化为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时,实施原来的主体自由的自由主义纲领,这也许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大业之所在?但这不会是从市场转向国家(指现代含义的权力设施体制),而是从作为人类活动空间最常见的体现工具理性的市场和国家,转向作为道德—政治理性实践手段的市场和国家。卡普斯京说,我认为,朝此方向发展的任务,目前已列入全球议事日程,尽管由于社会主义信誉受损,很可能这一进程已不在它的庇护之下。

错觉之三是简单化地理解和否定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问题的私有制:把社会主义与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把资本主义(和

自由主义)与私有制的绝对化联系在一起。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是未区分私有制的两种文化历史类型,它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命运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如想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者,就应对它们予以区别对待。卡普斯京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条件下,私有制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如同经济尚未成为一个独特的“基础”领域一样),而是一种“综合”范畴,包含道德—政治概念。这一点在洛克那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卡普斯京认为,这也反映了一定的、后来分裂成占特殊地位的和冲突的成分的社会现实。作为“综合”范畴,私有制主观上表现在对财产的权利(

)上,这种权利同私有权()不仅含义不同,而且是根本对立的。

后者的产生,是“综合的”私有制裂变的结果,变成独特经济范畴,并被客观化为超越个人的、丧失个性的异化的社会力量,使个人的其他生命力的表现和社会意识领域服从于自己的逻辑。以这种新身份出现的私有制,不仅会脱离平等的价值观,而且会脱离自由和道德自律的价值观,会与它们发生激烈冲突(正因如此,如目前我国后共产主义的经验所展示的,私有制尽管在经济上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是合适的,但在道德上却不能被看作是应当的,不能成为在政治上起动员作用的思想)。

因此,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使私有制退化为个人以外的、予以“垦殖”的经济范畴。社会主义则像它历史上存在过的那样,把这种退化的范畴当作私有制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和方式,不顾一切地表示反对(不过有一个保留,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阐述的个人所有制将来将在新基础上获得复兴,这一点被社会主义的实践忽视了)。道德内容丰富的“综合”私有制变得一去不复返了。

卡普斯京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如果有未来的话)取决于这三种错觉能否克服。而目前,社会主义确如梅朱耶夫所言,只能成

为一种批判,首先是文化批判,而不是独立的实践纲领。

. . 克拉辛在就卡普斯京的发言插话时指出,在国家和市场两分法的框框内,确实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但可以跳出这个框框。克拉辛援引哈贝马斯的关于社会生活的三个调节因素的思想,这三个因素是政权、货币和团结。缺乏团结这个因素则整个社会主义构想就毫无意义。

实际上,政权和市场(货币)已经表明了自己能做到的极限,超出这些极限,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只有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社会力量的团结才能做到。这一思想并非新东西,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在经济关系方面是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在政治方面是人民政权。在马克思那里,团结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现在问题变得更为广泛,但正是团结才能限制国家和市场的专横。也许这种团结将产生于市民社会,但必须是这样的社会,其中每个主体的私人利益将上升为公众利益,即上升到认识到市民团结的必要性。

克拉辛认为,被“国家—市场”两分法俘虏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主义。对有人援引洛克的论点(他似乎不是从“市场”角度看私有制,而是把它看作由不动产、生命和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克拉辛反驳说,洛克有两个关于私有制的定义:除广义的(卡普斯京谈过该定义)外,还有狭义的定义(拥有财产、不动产),即被市场关系的框框所限定的定义。克拉辛强调,就连洛克也未能消除这种矛盾……当需要论证法制国家思想时,他使用了广义定义;当提出经济关系(市场)问题时,则使用狭义定义。自由主义不能跳出上述两分法。社会主义思想依靠雇佣劳动工人的团结因素指明了出路。克拉辛强调,现在,哈贝马斯正尝试给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下一个当代定义。

. . 梅朱耶夫在第二次发言中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思想今天能提供什么新东西?要求社会公正?可这首先是自由主义

的口号,是社会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那里取来的。无论如何,社会公正的思想不是区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准,而是使他们接近并联合起来的東西。如果举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共同(因为二者构成了民主派的两翼)奉行的平等原则,则它既可作公正解,也可作仁慈解。在前一种情况下,它可导致政治平等下的社会不平等,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可导致社会(或文化)平等。把政治平等与社会平等结合在一起,这正是社会主义本身的事业。

除自由主义捍卫的个人享有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外,社会主义还补充了人人享有文化、自由发展和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己个性的权利。它所捍卫的人权,不仅包括根据自己的劳绩和劳动努力而拥有(获得)的权利,而且还有成为上帝、自然或他本人所创造的人的权利。

自由主义主要诉诸权利,社会主义则诉诸道德。就本性和起源而言,社会主义较道德化,也就是说,它所持的对人的看法比自由主义崇高,后者奉行的是利益上的功利主义原则和个人“自然权利”的自然主义观。此外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没有权利的道德,还是没有道德的权利,都不能成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充分根据。权利是实现公正社会的条件,道德是其人性、人道的基礎。公正原则极其重要,但却不能解决人所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所以,奉行平等权利原则的自由主义,不是导致“历史终结”的完成的社会理论,它不可避免地要向更高级的价值方向漂移,不仅保护人、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平等,而且保护其社会和文化的实际平等,但这并非意味着在收入分配上搞平均主义……

在揭示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特有立场时,梅朱耶夫强调指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所捍卫的正是“每个人对财产的权利”,当然,不是对任何形式的一切财产的权利。正是社会所有制才是每个人的所有制,但这只是对成为所有人的劳动条件即“普遍的劳动条件”的东西的所有制。那些成为分工劳动手段的东西,那

些只有在一定生产部门工作的人才能利用的东西,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化的对象……社会所有制仅仅是每个人缺之不能进行劳动的财产的所有制。现代生产中这种普遍的劳动条件首先是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知识便是现实的社会化的主要对象。从更为广义上说,社会所有制是对整个文化、社会精神财富的所有制。社会精神财富是很难私有化的。科学、文化就其本性而言属于每个人,亦即为全体所共有。但是,只有当它们成为生产劳动的条件,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能实际社会化。因此,社会所有制只适合这样一种生产类型,它被马克思叫作“科学”的生产类型(区别于机器、工厂生产),今天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型”、“信息型”等等。在这里,科学正在成为主要生产力,而人与科学的结合决定整个生产进程。如果使科学仅仅成为私人所有,那么生产就要停止。文化和科学永远是全民财富,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也应成为每个人的财富,这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它们实际上的社会化。梅朱耶夫最后说,没有人断言,私有制在今天已经丧失了作用。但也有某种它不能覆盖的东西。如果说在物质财富领域要求自己劳动或成功从事经营所得的那部分财富是合理的,那么在精神财富领域要求得到一切,同样是合理的,并且与个人收入无关。

透过现代化看社会主义思想

可见,造成当代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研讨会多数与会者看法一致),是工业时代社会主义所需的条件丧失了,至少在世界发达地区是如此,社会主义思想在历史新阶段必须彻底更新。哲学博士 . . . 潘京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有必要对危机特征补充一点

重要看法,即社会主义已由一种主要是欧洲的意识形态变成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移向正在经历现代化时期的那些地区和国家。

这种情况本身就提出了文明、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互关系中形式与内容的复杂辩证法纳入现实的观察过程。从这方面看,对俄国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选择是否现实的问题的传统辩论开始显得有点闭塞。

历史学博士 . . . 普利马克不同意有人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主义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并且其中不包含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成分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向量是个现实,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方面的发展极为困难。普利马克认为,1917 年以后的俄国史,就是尝试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等的历史。

. . . 卡拉什尼科夫认为,恰恰是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任何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某种其他意识形态,在20 世纪上半叶成了加速俄国现代化的一种手段。只有这种意识形态才能在当时的具体形势下提供条件,以满足加速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保持国家统一,即保持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实现了作为社会主义主要标志的按劳分配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是以原始的方式实现的,但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方案。

这种议论的公式似乎也可以用于毛主义的中国。顺便说一下,在中国,目前就现代化问题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更加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这一点从历史学博士 . . . 杰柳辛的发言中可以看到。杰柳辛指出,对(首先是邓小平)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想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文化大革命”的悲惨经验,它把社会主义思想引入了荒谬绝伦的、极端恶劣的形式;二是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和苏联的崩溃。

发言者强调,邓小平对理论的态度一个特点是,他的理论

(他本人也多次说过)不是读书的成果,而是对实践思索的产物。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允许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不允许出现把社会分为极富和极穷两部分的剥削现象。研究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可以看到一个经常使用的否定词“不”。这个词发挥着重要作用:邓小平表面上既不同毛泽东和斯大林争论,也不同其他人争论,但他借助这个否定词确定了自己那种实际上往往与传统观点对立的立场。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邓小平提出了“致富”的口号,这使我们想到了布哈林。中国人认为,市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是理论上的一次突破。市场社会主义构想并非是一下子问世的。起初是承认在保持计划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只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垮台后,邓小平才决定加快向市场经济过渡。他认为,市场应能挽救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法现已作为全人类的方法得到承认。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中国学者在赞同邓小平看法的同时,开始断言(诚然,这种思想在中国的文章中并不常见),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是资本主义趋势的继续发展,这种趋势在社会主义形式下具有新的意义和新的性质。

杰柳辛认为,邓小平的成就之一,是他反对毛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断。邓小平认为,阶级斗争已经过时,目前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社会和国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尽管继续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右的思想,但认为反左斗争尤为重要。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那里仍存在着左倾观点和思潮的土壤。综观邓小平的思想,不得不承认,他已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但仍有一定的继承性,即邓小平宣布的所有那些自由,均受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

实际上归结为一点:绝对不允许削弱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邓小平认为,不这样,就可能发生内战,出现混乱和无序状态。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稳定,才能进一步实行改革。邓小平坚持加快向市场过渡,认为市场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他同时(还是借鉴苏联的经验)认为,不要急于进行政治改革。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俄国,回到下列争论中来:俄国是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外表”下进行过现代化,或者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在因历史条件而变得困难的现代化的“材料”上进行的。在这些争论中,也许有朝一日会产生真理。但目前这种争论有一种烦琐哲学的味道。正因如此,潘京在关于俄国的发言中,完全回避了以两分法形式提问:是社会主义还是仅仅现代化?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是革命后时期(或者还要早些,从1861年起)出现的那种现代化形式的危机。相应地,俄国的社会主义,或者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种东西的问题,首先是现代化的形式、方法、速度、社会代价问题。不论我们怎么想,不论制定了什么计划,不论持什么观点,今天国家面临着完成旧意义上的现代化,向现代化的新界线过渡的任务。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由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必然会成为历史运动的向量。我对此不能苟同。正如任何其他学说一样,社会主义并没有先天拥有这种能力。它必须在每个历史阶段重新使自己成为现实的历史选择。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潘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主义者今天应当成为比多数自由主义者更加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成为比“市场派”本身更为坚定的“市场派”,否则社会主义就不能进入俄国今天所面临的那些问题的领域,会再次变成一种抽象学说,而不是历史的选择。

为什么俄国的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当然是特殊意义上的?原因之一是,现代化因社会主义而具有了解放的当然是按

我国的标准看)性质。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败给布尔什维克的原因,不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者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他们未能描绘出符合俄国历史发展基本向量的前景。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做到了这一点,甚至不惜以背离学说为代价。由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得以摸索到在俄国开展斗争的试金石,扩大可能的战果,使自己的纲领在历史上扎根,赋予其(尽管是暂时的)全民性质(解决土地问题、退出战争等)。

斯大林的现代化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走的仍然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以往俄国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改革军事领域,将西方技术成分移植到俄罗斯土地上,而又未对这片土地的结构进行根本改变,未给社会关系的体系创造相应的现代性。到80年代中期,当戈尔巴乔夫在政坛上崛起时,俄国最初出现的那种形式的现代化已经过时。按此模式继续发展,已与经济、居民的需求相矛盾,会使国家向后倒退。应当使工业服务于国家发展、俄国人富足的需要和需求,使现代工业成为革新全社会的杠杆。除此之外,80年代俄国的现代化还应解决一个任务——为俄国与科技革命有关的行业(不仅是军事领域,而且还有经济中的民用领域)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同样要求改革社会关系、政治领域,要求经济非国家化和放弃命令式的管理方法等等。

潘京说,我不想冒险断言,在经营条件、所有制关系、科学和卫生人才的地位方面发生的一切改革、变化,都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即使是这样进行的,那道路也是曲折的,会出现巨大偏离,耗费大量的精力、自然资源,浪费人的潜力。简而言之,就像彼得大帝、亚历山大二世、斯大林时期俄国的各种革命——改革一样。

未必需要寻找罪魁祸首。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负有全部罪责。潘京声明:我反对这种做法。第一,不能仅以错误来评价一位历史活动家——从法律的观点看待过去是不能接受的。第二,政治家,甚至大政治家,都有可能成为巨变、不可抵御情况等等的人

质。因为我国的情况是,政治舞台上的自发势力浪潮,其规模之大,远远超出共产党人和民主派、改革派和改革反对派的预料。第三,戈尔巴乔夫及其志同道合者没有能够改造斯大林时期现代化的主要工具——苏共。顺便说一下,列宁要把俄国变成新经济政策的俄国(然后才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打算没有取得成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所创建的政党未能走这条路: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的传统在党内比自我改造能力更为有力。

发言者认为,现在,当现代化一方面应结束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应开始解决后工业化发展的更高任务(在俄罗斯所有任务照例必须一同完成)时,我们大家都应当是现实主义者。如果社会主义者不想成为徒有虚名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就应当在现代条件下反对富人靠牺牲穷人的利益、少数人靠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获得自由,争取在不发生混乱、不出现嚣张犯罪的情况下使政权民主化,保护出版自由,开展斗争以争取更新的联邦,维护法律在全国领土上的威力,消除专制的管理方法,采取措施来发展文化事业。这些任务的解决未必就会把俄国推向“社会主义”(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可以为国家没有障碍地沿着当代人类社会前进的共同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载俄国《政治研究》杂志1994年第5期)

王秋文 译 夏风 校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

[俄 米·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1995年4月7日举行题为《改革：构想、实现、教训》的讨论会，本文是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发言。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在会议开始之际，我想首先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感谢你们应邀与会。这是我们举行的第三次会议。已经开过有关经济改革及其命运问题的会议。我们试图弄清楚，改革提供了什么，它将向何处发展。我们还召开了以“改革与知识分子”为题的讨论会。以后还要召开两次会议，一个是外交家和学者的会议，另一个是讨论政治改革问题的法学家“圆桌会议”。我们希望搞清那些主要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它们是在思考改革这种复杂的、不是单一含义的而无疑又是大规模的现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出的。

我们计划出一本书。书中将有一些国外作者的文章，他们既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

有政治活动家，也有政治学家。此外，基金会准备就同样的问题出版专著。这样，我们的工作计划已运行起来，而且看来有所收获。

现在是个不平常的、危险的时期，它要求对今天和未来那些迫切的问题作出回答。因此，在我们召集的任何一次会议上我们都不能离开这个主题，无论是在基金会以内，在基金会以外，还是在外国——与此相关的主题到处存在。我们当然无权忽视它，否则我们将脱离现实，只是对历史事件做一个简单的年表，而不是对其进行分析，可能只是弄清了事实的连续性，而看不到近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同当前形势的联系。我觉得，那是白费功夫。因此我希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主题和任务，应该意识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要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有的人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但不管怎样，每一个与会者都在承担这个责任。这就要求我们讨论的目标，不是为单纯地回到很久以前或不久以前的过去，而是为了从回顾过去中得到某些新的知识和实践科学，以克服当前的困境。

会议参加者和报告人的构成使我们可以期望，在这里将进行有意义的内容丰富的辩论。应该考虑到，这次会议将会对研究最近十年来我国发生的事情的各研究中心所从事的事业做出贡献，推进对我们身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哪怕只是推进几小步。而这对于我们大家都是重要的。

有时停下来看一看是有好处的，看看我们——人民、国家、社会、政治领导集团及其主导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在哪儿迷路了。并不是要给大家均匀地“抹”上一点责任，而是要用较为理性的运动去对抗那些贸然的、不加思索的运动。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我们还是不得不再次回到一个问题上来：1985年开始的改革、改良有必要吗？我得到舆论基金会就这个问题所做的调查资料。库瓦尔金教授已经在《独立报》上发表文章，对数字所提供的情况进行了分

析。问题就在于：舆论基金会二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回答1985年开始的改革、改良是否必要时，俄罗斯似乎分成两半：40%的人回答“是”，45%的人回答“否”。从数学语言讲，情况近乎完全不定式。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多数被询问者的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是国家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使然，这些回答在多大程度上同改革这个大背景下的改革措施有关。这也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去年底我在诺夫哥罗德和今年我在新西伯利亚的时候，人们都问到我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各种场合问题大体是一样的：目前国家、政权、所有制、社会环境、法制所发生的事情是改革，还是同改革根本不同的东西，完全是另一种政策？人们都希望弄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是值得给予全力支持的。因为很多观察和判断证实的似乎是另一种情况。有人断言，人们仿佛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可以这样说，政治对于他们是“事不关己”，他们只忙于个人的生计。我的旅行，我同各界人士——大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接触和交谈证明，事情不是这样。人们都在很严肃地观察政治，顺便说说，他们十分清楚，是谁在牵引社会，引向何处，向什么方向推进。我认为，即将举行的选举同以往所进行的一切选举大不相同。人们已经清楚，某人价值多少，其纲领和声明价值几何。这本身就给人以极大的希望。

我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还是想讲几句。

我担任总书记之际，已经确信必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根本的改革。人们在战后恢复时期就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再后来是安德罗波夫，他们在执政之初都想到了改革。社会需要变化，它在不自由中被窒息了，因为政治体制实际上堵塞了一切通道，扼杀了一切重要的、能表现历史创造精神的有效机会，人们

在痛苦和不安中看到,国家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竞赛中怎样失掉了自己的阵地。如果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无痛变革最有利的时机以前曾经有过的话,那么到80年代中期已经太迟了。国家明显地、不可避免地滑向没落。这是强加给国家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历史性失败,这种模式究其实质,就是极权地以宗派主义的命令方式操纵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人民对此已忍无可忍了。

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认真地、刻不容缓地进行改革。而我们这些处于国家的核心和领导地位并领导各项事变的人已经了解并感觉到,用“粉刷工作”甚至宣传的喧嚣都敷衍不过去:社会孕育了改革,而这种改革已经不能用无痛的方式来进行了,这首先是因为太晚了。可以回想一下讨论科学技术进步的全会,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曾希望借助这次会议“启动”改革“机制”(这事发生在1968年),但会议没能举行。这证明,国家需要进行严肃的、深刻的、切实的,而主要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深思熟虑的结构性改变,需要寻找经济适应的方式,因为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它符合科技革命的要求,比其他经济具有优越性。

全会毫无结果,只留下已故院士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小组为会议准备的两口袋资料和报告,成了无结果的残迹和“安慰”。

但我还是提醒你们注意并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尽管你们该记得这次会议——这是公开宣布过的,但它始终没有开成。我在这里回忆这次没有开成的全会是为了证明,应该同时采取全线行动——整顿和改革经济,解决迫切的社会任务,在现代民主原则基础上革新整个政治关系体制及设置,使国家的民族国家体制现代化,并批判地重新认识外交政策的原则和优先点。这一切应该在我们对社会、对其继续发展的道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和认识得到更新的基础上来进行。实际上我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如下声明(尽管有人觉得此思想是显而易见的):议论1985年的改革同议论1995年的改革远不是一回事。问题甚至不在于改革的历史前景

和改革构想提出后所发生的一切使人们改变了对这个构想的看法,而在于必须认识到:“是在此之后,并不意味着是因此缘故”。莫斯科大学就是这样教我们法学系学生罗马法基础知识的。遗憾的是,今天批评改革的人却忘记了这一点。

1985 年时需要确定方向。

和中国人不同,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上述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推迟到或远或近的未来去做。对苏联社会来说这种做法是无法接受的。

这当然不是说应该杂乱无章地在所有方面采取行动。具体步骤应该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连续性,它们在第一阶段,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在改革之前,就相当明确地作了规定。这种逻辑性表现如下。

在由于长期停滞和改革过迟所产生的特殊条件下,应该首先保持对改革有利的总的环境,获得人们的信任,用来自下层公民的积极性来充实上层的首创精神。因此从一开始就采取发挥公开性,使政治领域民主化的方针。这里不需要什么投资耗费,需要的只是表现出决心并积极行动。这种方针立刻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改变了国家的局势。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基本群众转到改革方面来,他们在数十年间亲身经受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垄断的沉重压力。

在经济领域最初的打算是这样的:以科技进步、国民经济的科技改造及其结构性改革的综合纲领为基础,达到经济的加速发展。顺便说说,这是那些甚至在学术论文中受到猛烈抨击的问题之一,至于那些思想上的反对者以致政治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应该说,我们并不像今天某些书籍中所描绘的那样愚昧无知,因为我们认识到了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不是抽象地“一般地”做,而是非常具体地做些事情,以实际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不仅如此,据我所知,我们的经济形势甚至迫使我们在政治局内建立一

个又一个的委员会。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些委员会做了些什么,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曾成立解决女式连裤袜脱销问题委员会,它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伊凡·卡皮托诺夫主持。我记不清了,似乎是1978年,发生了“火柴欠产”,中央委员会就去解决这件事情。还有大家记得的国家动力系统的失衡……它由叶戈尔·利加乔夫负责。

最后当你们看到在我们党的机构中竟设立有机硅联合体部,你们可以想象,党的机关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党的管理“首脑”,这就是党自身忙着干的事。目前情况也是这样。这就是我国经济状况的形象的说明和不充分的反映,赤字使我们喘不过气来,全国都在排队,但是预算赤字却被精心地隐瞒起来了,我们没同任何人商量就把手伸向储蓄银行,用透支来抵补了这个赤字,诸如此类,更不用说我们本国产品的单位价值比“世界价值”高0.5—1倍;消耗在单位国民收入上的能源、水泥、金属等比国外多0.5—1倍。这是自杀性的浪费经济。必须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种经济的蜕化过程。

不仅如此,最复杂的是——我们无法依靠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转到新的生产工艺上来。很多部门都存在这种衰退(国防综合体除外),如果不使俄国现代化,要运用新工艺就必然完全受国外进口供给的支配。自然,不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加入到经济发展进程中去,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去获得其他的成果,从而开发和利用新的资源,并有新的可能去解决整个综合任务,首先是解决社会问题。

最初的打算自然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对可能的途径以及何者优先的理解。事变的发展表明,不可能用治标的办法治理好经济状况。而没有激进的经济改革,结构性的工艺改革计划就难以实现。在日益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加速实行政治改革,然后是在共和国联盟内更新民族关系。而且,改革之初引起

的早期欣喜被批判的现实主义所取代,随后变革所引起的疲惫感越积越多,而预期很快取得的社会成效又没有实现,这就使当局逐渐失去了居民信任。政治风暴——从矿工罢工、闹民族主义、阶级意气到个人倾轧——开始动摇国家的根基,一直闹到保守的反改革势力试图发动暴乱,以终止改革,这就开启了国家新的历史阶段。

总结这部分发言,我想强调,改革的目的是防止威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后者也是个争议的话题。一些人认为,国家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另一些人认为才开始陷入危机。一般说来,这也是议论的话题,不过可能今天这已经不那么具有现实意义了。

我们认为,改革已经根本不存在理性的选择,尽管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断定,历史似乎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发展方案。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现在觉得,在整体上把经济改革和民主结合起来是正确的,符合业已成熟的需要。

至于改革的失败,我坚信,尽管形势十分复杂,任务规模宏大和异常艰难,尽管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所引发的困难重重,尽管今天的一切还这样或那样地同改革有联系,我仍然认为改革不是徒劳的。失败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它是领导集团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不恰当的行为甚至直接错误的结果。正是主观战术的错误以及必然存在的任务的客观复杂性,致使某些政治力量,既从左的方面也从右的方面,推翻了实行改革的领导,抛开了改革的主题和战略,使事件的发展转向另外的轨道。

关于我个人的错误,我已经不只一次地谈到过。首先,在改革之初花了不少时间去开展经济改造;尔后,1987年激进的改革纲领通过后,在原教旨主义和保守势力、冒险主义和激进势力的猛烈反抗下,缺乏足够的耐心、果断顽强的意志去保证它的实施。例如,我们着手实行了价格构成的改革——我现在更加坚信这是正确的步骤,对于通过一定的当然是激烈的措施以达到稳定经济的

目的来说,它就像空气一样必需,然而社会却反对这一举措。甚至提出价格构成问题的科学院院士和新闻记者们也因稍有点不可避免的物质方面的某些不便而表示坚决的反对,反对他们自己选定的改革路线。我不得不在有众多听众的“舞台”上公开发誓,没有社会的认可,我们将不放开和提高任何价格,而如果我们一定要做这件事,那一定会预先宣布和说明。在这种虚幻的公正和得人心下,我们丧失了速度和时间,这是战略性的失败。因为那时我们还享有威信,那时我们手里还掌握着强有力的政权,苏联还存在,而我们可以决定很多事情,那时进行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社会经济过程在内,都可以少一些痛苦,当然,会与今天全然不同。

第二,破坏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同步性和协调性。批判的浪潮简直席卷了大众传媒。与此同时,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对实际改善人们的生活却做得很少。

第三,对族际问题的尖锐性和深刻性,对在真正联邦基础上更新联盟国家的必要性估计不足。对围绕俄罗斯因素所玩弄的手法和进行的投机估计不足,而各共和国宣布拥有主权的浪潮就由此而来,这股浪潮损害了国家的统一,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使反改革力量活跃起来,其表现就是暴乱。

第四,始终不理解对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结果党越来越陷入保守的原教旨主义情绪的影响之中,而社会上活跃起来的却是怀着变革情绪的民主力量。这导致党的退化、消极,并自行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结果也使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和形式上消失了。总之,领导集团没能向党清楚地解释改革的真正目的,把它的有效的力量组织起来,因此改革失去了能扭转国家发展方向的基本杠杆。

这样,改革遇到失败,成为被激烈攻击的牺牲品,在自身的矛盾中被扼杀了。改革者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没能牢牢地控制政权,将社会向民主化转化的进程继续下去,使积聚起来的历史困难和问题得以自然地 and 相对无痛地解决。政权落到激进力量的手

中,他们信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把新的方针强加给国家。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国家进入了其历史的新阶段。不管这是一个濒临绝境的还是充满希望的阶段,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阶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争论),但这是一个新的时期。

我想,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应该清楚地理解最近十年来改革的所有发展阶段,并对它们作出评价。

但首先我应该说明,我们开始改革的事业是因为现存的社会政治体系可以也需要改善。我们曾经受到那些错觉的支配,我们的前辈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我指的是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

是的,局部改革例如部门的、州的、区的规模的改革的经验(其中也包括个人的经验)似乎表明,在那些实行严厉的干部政策、提出现代的现代化纲领的地方,局势能有重大改变。但是,如果认为这些成果和局部经验可以修改一下并推广到整个体制和整个国家,那显然是过分简单化的、过分美妙的乐观主义。我们最终应该承认并看到,政治制度、体系像其他任何体系一样,没有受到过如此深刻的、异乎寻常的革新。它一感觉到受到严重的侵犯,立刻就反抗甚至是报复。而且像你们所记得的那样,存在着“原始森林效应”——“上头呼啸,下头寂静”。改革的思想得到发挥,具有了某种面貌,在政治决议中成了形,但是它们一旦转到现实政治中去,通过层层官僚主义的行政官员体制时,实际上就被取消了。不只是我个人,而且全体领导在国内巡视带回的都是同样的“新闻”——地方上什么也没有改变。不仅如此,他们开始固执地劝说:请别闹腾,在苏维埃国家和神圣的俄罗斯改革者还少吗,我们也熬得过这一切,一切很快就会恢复原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制度在反抗,接着又给予回击。到1988年我们认识到,不改变和革新体制本身,我们就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进行。而我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从这时起可以说是进入了改革的第二个内容丰富的阶段。它已经立足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其基础是社会民主思

想。

我认为这整个经验值得注意,因为它教会我们很多东西。首先就是必须随时随地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如果改革不被社会所接受,如果它不顾及业已形成的政治实践,如果它不符合现实、传统、习惯、社会思想倾向、改革的前后联系,不去与文化、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状态相适应,那就不能指望改革会取得成功。

正因为如此,我们选择了渐进的发展道路,尽量去顾及前面说到的那些方方面面,尽管这条路最终没能走到底并遭到了失败。

如果回到下述问题,即今天和近年来所做的一切是改革的继续还是别的什么呢?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无疑是另一种政策,另一种政治方针,另一种改革。这种选择已是既成事实,我们的任务只是要弄清楚更换和取代原先的方针和政策有多少是正确的。

我确信,这当然不是改革的继续:改革在最尖锐的决定性阶段中断了,因此很难确切地讲,事件将会怎样继续发展下去,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国家、经济或是社会都不会陷入今天这种悲惨的状态。目前的方针是1992年初开始实施的,其主要各点都与改革的思想、政策和实践相背离。它否定改革。改革主张革新和保存联盟,而现政权的中心点和指导思想是让国家解体,“使俄罗斯摆脱食客”,利用本国“取之不尽”的资源,在最近3—4年内步入繁荣兴盛国家的行列。

如前所述,改革的出发点是:我们是在复杂的社会中开始改革的,负载着数十年积累起来的问题,带着不单是过去70年而且还有上述发展阶段的烙印。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们有最军事化的经济,有极端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此社会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中,这就很明显,变革在这里必须进行得十分负责和谨慎,不要用急转弯来损伤人们和社会。也就是说要走进化的道路。1992年以后,改革者的犹豫不决受到诅咒,特别是那个“主要改革者”,因其软弱、政治上的无能等等罪名而受到诅咒。总之,

各种各样的话我听得够多了。他们决定显示一下应该怎么做。他们所显示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样子。

过去,把人们赶进集体农庄,完成枪毙和关进劳改营的计划;由于过分尽心竭力,有人甚至要求增加枪毙和逮捕的限额。如今还是按照过去的精神办事,我们称之为新布尔什维主义,如此而已。只是新布尔什维主义被用新词包装起来,不过像其先辈一样,它可能也会延续几十年。实施改革的牛仔方法必然造成我们今天这种状况。真正民主的、有效益的、经济的进化运动被中止了,“作为阶级被消灭了”,从文化和心理状态的基本价值观的层面上被否定了。因为强制深入的国家资本化的指望遭到了失败,首先正是在文化层面上失败了。必须去捕捉从历史进程本身成长起来的趋势,应该设法掌握和巩固历史,而不要揠苗助长。

最后,如果说改革的政治方针遭到了失败,那么所争取到的一切——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公开性、代表机关和被选举出来的权力机关的作用提高等等,这一切全都受到限制和坦克履带的压制,甚至是直接的炮击,只要当局认为有此必要。

在所有的主要点——联盟、经济、民主上,目前的方针是对改革的路线和构想的否定。这一切值得深思。那么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否需要号召退回到改革上去呢?我不这样认为。不能回到苏联,不能回到改革。不过我们需要联盟是毫无疑问的。准确地说,我们需要新的联盟。我相信它是会诞生的。如果我们想靠专政来拯救我们,或是靠军人执政委员会和我们自己的皮诺切特来拯救我们,如果采取这种方针,我们就不可能前进。他们说,让我们这么干吧,用任何方式——全民公决或其他方式——来延长现政

皮诺切特·乌加特,智利军人,1973年9月领导军人执政委员会发动军事法西斯政变,夺得政权,建立了恐怖秩序,1974年12月至1989年3月任智利总统。——译者注

权的权力,然后我们再想办法从法律上和思想上装修一下。感谢上帝,我们并不缺“装修先生”。

我想,如果把我们的智力用到这上面,那么这种运动就不会走入荒野。

我根本不想诅咒这三年。社会没有停滞,人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他们在这段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他们经历了过去20年、30年甚至是50年从容不迫的、停滞的生命历程中所没能经历过的政治锻炼。

许多事情改变了,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很多东西应该掌握,以便在了解形势的基础上“滑”向新的政策。我觉得,目前实行的制度甚至在一年以前还可以期望它能使国家在摆脱危机方面向好的方向转化,但今天它已经在人民眼里破产了。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偿付能力,因此应该考虑更换这种制度,当然,要运用民主选举和宪法的方式。政治学家、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为延长现制度的寿命所进行的一切探索,即使是“按劳动人民的要求”做的,都是对俄国的背叛,如此而已。

因此我们必须拯救民主制,它可能是不完善的,但却是最好的、绝对有力量的政权。我在此说一下自己的老立场。我看不到其中有任何矛盾。当我谈到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时,我指的是强有力的行政权、强大的议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避雷针和替罪羊;我指的是有效的司法体系以及其他很多东西,首先是自由的独立的报刊,它能保证社会监督和居民消息灵通,保证居民对报刊的监督。强有力的政权,就是民主政权。由此我认为必须真正自由民主地选举新的议会和总统。

现在我不想叙述我对未来政策的基本设想,尽管从某种角度说,谈论这个问题,比起回忆改革是如何开始的、我们的成功和不成功之处,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希望将会有我详细谈论未来政策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很快就会到来。现在回顾过去,看

看我们的今天是很有益处的。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以后该怎么办呢?政策需要规定方向,这应由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以及我们的科研中心来提供。缺乏方向,政策将会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来回折腾和摇摆,不会有任何成果。因此我觉得,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不会局限于学术探讨,我确信它将会政治化,我也希望能够这样。这将会用新的知识来武装我们,它可能对当前参加竞选运动的健康政治力量有所帮助。为此目的,我们回顾改革的历史。

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看到未来。

(载俄国《自由思想》杂志1995年第3期)

徐向梅 译 夏风 校

社会主义——关于处理 一个概念的困难

[德] 社会民主党执委会
基本价值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重新检查自己立场的必要性

对于早期工人运动并且随之也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具有对幸福的允诺性质的。“迎着朝霞”,面向“充满光辉的未来”,这就是对未来的想象,这就是社会主义。但对于东德和东欧的人们来说,“社会主义”却变成了完全另一回事。瓦斯拉夫·哈维克在若干年前曾经非常简练地说明这一概念:社会主义,这是一根用来敲我们的头的棍子”。因此,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按

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1994年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原书未注明出版年代。这里选译了其中的第一、六两节。

原文此节无标题,现在标题是译者加的。——译者注

照它的柏林基本纲领中所确定的纲领性要求,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党出现在东德人和东欧人面前时,尽管“民主”这一附加语标明了这种社会主义与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批判的距离,但是他们起初仍旧以抗拒的态度作出反应,就不足为奇了。归根到底,人们从“现实社会主义”获得的经验是:这是一个经济上、生态上、政治上和伦理上彻底失败的制度。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以明确的、人人都看得见的方式与一个已经垮台的、已经失败的制度划清界限之所以是迫切必需的,尤其是因为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后共产主义的、从前的国家党目前已改变名称,成为以社会主义命名的党。这一方面的最有重要意义的表现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改称“民主社会主义党”——使用了一个剽窃来的名称。

尽管存在着认同危险,社会民主党却无法回避这一任务:要以历史的和批判的态度深入研究从1917年开始的、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20世纪的特征之一的、以另一种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尝试为什么会失败。在这样做时明确表示“现实社会主义”从来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仍旧是正确和重要的。这一事实在工人运动分裂成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是最后的、再也无法克服的原因。但是批判的社会理论除了作出这一论断之外,还必须探讨1917年开始的这道路之所以失败的历史和具体的(而且是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在这里不仅需要作出历史的说明,而且要找出并且区别开,哪些错误发展和哪些具体的变质是由特殊的俄国条件和那里所采取的道路(1945年以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另一些国家也被迫必须采取这条道路)造成的,哪些则应当归咎于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和错误估计。对此,无论是一些保守主义者的公式“马克思死了,伯恩施坦活着”也好,社会民主党的也许能带来点自我安慰的警句“列宁死了,伯恩施坦活着”也好,都是无济于事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柏林基本纲领中强调了这一论断,即它的思想财富是从各种极不相同的来源汲取的:“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工人运动的经验包括这一点:各种不同的流派,也可以说不同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在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思想中以及在启蒙思想中,都有社会主义的许多来源和根源;宗教乌托邦思想、非暴力无政府主义领域的自由思想、法国的文化社会主义、盎格鲁萨克逊的合作社和自治团体思想以及尤其是基督教的、社会伦理的思想,都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作出过自己的一份贡献,正如马克思的思想即解放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分析的(不仅是强调规范的)反资本主义也有它的一份贡献一样。社会主义的民主的和解放的主流,始终支持反对由政治上和社会上未受到充分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机制所造成的弊病的斗争。在社会内部和自己组织内部实行民主的绝对必要性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而这恰恰是从1917年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行使专政权力和肆无忌惮地控制共产国际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促使社会民主党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对自己的立场进行批判性检查的推动力不仅来自东方。西方也有人屡次谈到“社会民主党模式的危机”,这特别是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和奥地利等国的福利国家发展。一批问题(第一世界中也已出现的生态危机、资本市场国际化、日益增多的国债、日益增加的失业)的全球化已使带有凯恩斯主义特色的民族国家福利政策的行动可能性达到极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甚至社会民主党的必须认真对待的批评者在1989年的重大转折以前就已经谈到“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对于这一说法还提出如下的论证:在这一段时间内,已有如此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因素渗透进西欧各国的社会结

构并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这些社会可以说是“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社会民主党人原来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那么社会民主党是否必须与自己的主导概念“民主社会主义”分手呢?社会民主党内部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这一概念已由于失败的“现实社会主义”而丧失信誉。它在20世纪末年也已不再如实反映它自己的纲领目标设想,因为它作为政治和思想体系的关键词,与19世纪的其他大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并立,会使人想到一种全盘替代方案,而这种全盘替代方案今天已不再能正确地表明各相应政党的真正的共同性和差别了。

另一些人指出,一种遍布全世界的历史性运动不能抛弃由这一概念综合表述的经验。不仅如此,不应当用自愿放弃一个概念来作为对人们滥用这一概念的回答,因为这样一来,“现实社会主义”就会在事后仍旧被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最后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现行的柏林基本纲领中仍旧将“民主社会主义”设想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原则,也作为规范性思想加以坚持。这个概念同时也是运动本身的标志。

基本价值委员会没有职责对这一争论作出决断,也没有职责“以权威身份”提出纲领性设想或解释。但是它能够尽一份力量来帮助人们理解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以及今天还能赋予这一概念以什么样的价值。

在1989年世界历史性剧变之后 社会主义还留下什么?

1989—1991年的世界历史性重大转折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前

景有什么意义,关于这一问题不仅可以深思并加以讨论,而且是绝对必须这样做的。一种自夸为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已经把社会主义从思想世界带到现实中的国家制度灭亡了,这必然也会使迄今始终主张另一种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政治设想受到触动,哪怕这仅仅涉及政治交往层次,仅仅涉及向男女公民传播自己的观点这一层次。

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关于人们应当从这一形势中得出什么结论的看法差别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概念层次的问题,即人们是否还应当继续使用一个易被误解的概念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战略分歧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继续遵循传统上与“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目标设想的问题。因此,如果用一种综合性的、共同适用的措词来表述双方的见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各自的论证完全丧失锋芒。除此之外,目前这种把两种观点并列叙述的做法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对于1989年的重大转折恰恰是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此同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存在着由于两种互相格格不入的社会制度而造成的长达四十多年的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因此,我们用尖锐的形式把两种观点的论证表述如下。

主张必须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观点:

一、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不应当一上来就把那种能使我们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述方式现代化的做法列入禁区。正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其新的基本纲领草案中也建议的那样,用“社会(的)民主主义”代替“民主社会主义”,只会有助于避免错误的解释。对在政治上和伦理上对我们具有根本意义的内容及时地重新加以界定,并且克服阻挡这一内容得到理解和贯彻的障碍,这也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历史的特征。

二、实际的民意调查也表明,只有几乎不到五分之一的居民把“社会主义”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词同我们在概念上,也就是伦理

上和政治上用这一词所表述的意思和意愿联系起来。指望通过加强政治沟通来使人们了解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真正想法,并从而弥补上述缺陷,这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缺乏根据。看来,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这个词已经成了理解实质的障碍。

三、在德国统一以前起草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是以使(旧的)联邦共和国现代化为目标的,现在这一纲领必须在东方还缺乏明确政治方向的形势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西方社会民主党已经经历过的学习过程目前在东方还有待进行。也就是说,在东方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协同维护西方政治文化中的那些因素,而对于这些因素,社会民主党从有自己的历史以来并不认为首先要由它来负责维护,但是它通过学习已经认识到有理由对之加以赞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一词只会引起无益的混乱,因为东德人和东欧各国人根据自己的政治生活经验不可避免地要把它同那种错误的、已经失败的、针对西方的“替代制度”混为一谈并从而使它丧失信誉。

四、共产主义崩溃以后,欧洲的未来取决于东欧是否能成功地过渡到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因为只有到那时,欧洲的经验才能带来进步,而这是一种稳定的欧洲和平秩序的前提。新的社会民主党东方政策必须准备应付这一形势。“社会主义”这一用语对于制定这种政策只会造成混乱。

五、在内政方面,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而迫切要求

——实行现代化、环境能承受的增长、社会保障以及特别是东德的建设和重新工业化的全德战略;

——由于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加在西方各国(德国和欧洲)身上的负担;

——采取明智的态度对待外国人迁入德国和实行一体化的问题。

对于这些情况,“社会主义”一词也不能指出任何有帮助的基本方向,特别是因为今天的冲突战线已经不仅仅首先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而是例如也在以下双方之间展开:东方和西方的工人为社会地位而斗争;东方和西方的企业为市场份额而斗争;工人(工会)和失业者为工作位置而斗争;外国人和本国人之间的斗争。

六、“社会主义”概念的麻烦不仅来自欧洲从共产党人自称的“社会主义”获得的反面经验,而且还由于对我们自身来说,“民主社会主义”今天所描述的不是一种模式,也不是我们力求实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而我们知道,这一思想只能在以下的基础上获得实现:受到社会限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承认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具有重要的协同调控职能,以及承认社会制度的各个部分具有仅仅是有限的民主化能力。

七、在目前的高度复杂的社会里,在大多数领域,引向替代方案的通道是狭窄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说,主张全盘结构替代方案的想法已不再是明智的。因此在我们自己的纲领里也不再提出这一要求了。关键在于各个大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方向差别,也在于各种社会结构的、经济的和社会福利的塑造替代方案之间的,可能是十分重要的侧重点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曾在19世纪代表各种具有显著特征的全盘性替代方案的那些大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词即“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已不再能以富有启发性的和切合实际的方式标明各个大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差别了。

八、因此,在今天本来已经由于充塞不实之词和过多地玩弄象征性词句而不堪重负的政治沟通中,如果继续使用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预示根本性替代方案的那些大的词,那么,由于这些词之间的持久的、已经被政治公众中的敏感的和有批判能力的那部分人所熟知的分歧,再加上日常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分歧,就会加深政

治话语与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在接触政治时所获得的经验和所产生的思想之间的疏离。我们应当避免给人们以带来幸福的政治许诺的暗示,大部分人反正是不会相信这种许诺的,在许多人那里甚至会引起恐惧和抗拒。相反,我们应当使人们明白,我们男女社会民主党人所关心的是表述和表现一种改良的前景,这种改良就是对非常具体的社会不公正和生态不合理情况实行具体的改变。

主张必须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观点:

一、社会民主党不应当小声小气地参加庆祝资本主义胜利的人们的合唱,而是应当坚持不懈地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如果不是不断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的纠正,就根本不会有能力维持下来,而且也不会是值得维持下来的。

二、“社会主义问题”不是由于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与对以下社会学事实的洞察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已不存在传统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作为本来的从未能得到精确界定的社会基层已经消溶在各个阶层、群体、界、网和利益联合体中。“传统的阶级关系”在这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新的、“超越等级和阶级的”社会矛盾掩盖。

三、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历史上曾一再提出这一问题,现在仍旧提出这一问题:它能依靠谁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目前社会中存在一种个性化趋势,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化以及朝放弃团结的方向改变行为的趋势,如果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已不再存在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载体的社会阶层,那就意味着掉进一个社会学宿命论的陷阱。社会变化是否也会彻底加强成立团结互助的自治组织和进行伙伴式交往的意愿,并从而释放出从事改革和革新的新的力量,这一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这里涉及的问题也不属于“假设”的范围,而是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名称和精神的具体实践、替代性生活方式和可信的政治计划。

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要求这样的运营方式,即它为了维护自己也必须依靠资本主义外的或者说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者要致力于保持这种生产关系;它也必须依赖既定的自然基础,却同时又一再损害、破坏和摧毁这些基础。要保持资本增殖过程的运行,肯定不能只是不断地生产商品,而是也应当生产需求,而与此同时,如果这样造成的需求会对生产方式的生存能力造成威胁,又必须加以补救。

实际上民主的工人运动已能够做到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使资本主义改变成一种受到社会节制的、开明的和温驯的资本主义。在这段时间内,现代的后福特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在其中心地区,从理论上讲可以容许人们假定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再主要依靠剥削人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也容许人们通过扩大公共监督而使对生产资料的基本上已经稳定化的支配权和决策自由进一步民主化,超出人所皆知的共决形式。因为资本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以及经济的、社会的和技术的变化的多样性已使社会调控的需要日益增加。

五、一些人谈论“全球革命”的必要性(罗马俱乐部),另一些人主张放弃迄今主要通过利用和燃烧矿物能源而获取能量的方法,以排除对“太阳能革命”的障碍。除了这些概念上的区分之外,有许多数据证明,西方发达中心地区的具体生活方式和经营方式给大地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担已达到威胁性的极限。如果把这种模式搬到整个世界,就会意味着这个星球的末日。因此,如果人们不打算把无限制资本增殖的这些后果进一步发展成灾难,也就会产生超越国家的社会调控的需要。

六、在实践上仅仅是想像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目前结构,即东德居民恰恰必须痛苦地忍受的这种结构,其中存在着个别企业的经济合理性与整体经济的理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在政治行动领域才能解决或者缓和。正如柏林纲领所要求的那样,在这

里重要的事情是重新确定社会的生态改造与社会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双方之间的比重。

七、要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都经得住考验,就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要想在这里起塑造作用,就需要坚持使“民主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本质:它过去是,现在也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原则,同时也是解放与进步的规范思想,尤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自我描述和自我理解。

未来的共同任务。

尽管在这里对于今后怎样对待“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但是社会民主党整个说来仍然有可称为共同任务的未来任务。必须做的事有:

一、寻找社会制(7 007 80 8) 的自治的、自我调节的形式;

二、提出能使人们摆脱困苦和外部强加的目标的、在经济上合理的思想和行动;

三、组织对自己的个性有自觉的人们的共同社会生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的组织里,由经济合理性产生的客观强制要服从生态目标和文化目标;

四、为达到以民主方式确定的、能使社会公正实现的目标创造民主形式的框架条件。

如果未来的社会能使这些目标更加接近于实现,那时是否要把它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将由在其中生活的人来作出决定。

后 记

当然: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今天从一个想象出来的零点——在它的历史上是没有这个零点的——出发重新从头做起,它大概不会用某种“主义”的概念来表述的自己的意愿。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今天使用某种政治的主导概念,我们就应当总是努力尽可能具体地说明我们的想法。鉴于在解释社会主义的含义、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实现社会主义等方面,在历史上存在着如此多的矛盾,而我们恰恰是不应当忘掉这段历史的,因此这样做就更加有必要了。1990年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按照这一意义在党的基本纲领中写道:“因此,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男女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在我们确信‘民主社会主义’概念不致被人误解成斯大林主义变种的‘现实社会主义’或者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今天用来引诱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口号混为一谈的时候,才能使用这一概念。因此我们宁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

尽管如此:还不存在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促使我们抛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但是,我们曾经反对前共产党人滥用这一概念或者保守主义者把它当作一个骂人的词使用。归根到底,它曾经是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主义(“现实社会主义”)所伪造的社会主义思想区分开来的概念。直到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是同几代人为争取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公正、更多的互助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东方共产主义崩溃后的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

[德 霍·海曼

“一个举世罕见的事件没有产生效果”——沃尔夫·莱佩尼斯的这个批评性的结论，在关于西方对东方变革的反应的公开讨论中，成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名言。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导致了德国国家的重新统一，这场崩溃事实上不仅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而且也是一个举世罕见的事件”。

莱佩尼斯指出“一个举世罕见的事件没有产生效果”，是以此批评西方对东欧这场深刻的持续性剧变的世界历史意义尚不理解，因此还没有得出必要的结论，即：鉴于东方的激进变革，西方的社会关系和人也必须改变，要正确评价这一“举世罕见的事件”的历史地位！

几乎没有人反对莱佩尼斯的呼吁，所有的人都赞同他，并且强调在西方也有许多事情必须改变。这种情况能被理解为是希望的

霍斯特·海曼：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

沃尔夫·莱佩尼斯《一个举世罕见的事件的后果——统一后的德国人》1990年柏林德文版。

征兆吗?也就是说,西方的人们会利用这个出人意料的,也许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东方发生持续性剧变后进行一次自觉的历史性转折吗?或者说,东方的“这个举世罕见的事件”,在西方不会再继续不产生效果了吧?

“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动力和动机”在“国家社会主义”死亡后仍然活着,这在莱佩尼斯看来是在西方进行必要的变革的前提。虽然社会主义不再能作为另一种可选择的制度被用来与资本主义对抗,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不必考虑为在以自由为前提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中争取更多的平等而预作准备——这个问题将迎接我们,在不远的将来的国际社会,它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的胜利使得它的进一步改造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鉴于欧洲和全世界的现实的社会发展和“日益尖锐化的社会冲突”,根据莱佩尼斯的评价,“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动力和动机……很快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继续生存的能力乃至继续生存的必要性”。

本文探讨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机会。民主社会主义的有组织的主要政治力量当然是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但是另一方面,1989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欧洲社会主义——回顾和展望》的编者完全切合实际地强调,“‘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义词”。因为在组织上置身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之外的各色各样的左派组织和左派知识分子,无疑也是社会主

沃尔夫·莱佩尼斯《一个举世罕见的事件的后果——统一后的德国人》1990年柏林德文版第43—44页。

同上,第43页。

赫尔加·格雷宾、彼德·勃兰特、乌尔里希·舒尔策-马尔梅林编《欧洲社会主义——回顾和展望——维利·勃兰特纪念文集》1989年埃森德文版第7页。

义理论讨论的当事者。因此这个概念从广义上讲涉及西欧整个知识界的和政治上的左派。

把独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包括进来是必要的,因为他们今天仍然对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特别是因为,上个世纪形成的西欧左派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盟,才使得民主社会主义成了一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力量要素。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虽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乐观主义所预言的那样,用社会主义这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替代整体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整体。但是,与美国不同,在西欧社会中,除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第三种主要力量崛起了,并且在与另外两支力量的竞争中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因此,尽管经济制度在主要方面还是资本主义的,但是谈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再有充分的根据了。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西欧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选择了一条社会的特殊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因此在西欧形成了一种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纯资本主义在质上有重大区别的社会。

西欧社会模式和美国社会模式之间的这种质的重大区别,也是米歇尔·阿尔伯特的那本引起热烈讨论的著作《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论述对象。作者认为,由于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后不是无可选择地仅仅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而是存在着两种有显著区别的模式,即“莱茵模式”和“新美国模式”,所以历史仍然会有不同的发展前景,还没有到达自己的终点。阿尔伯特用大量的事实和论据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莱茵模式”不仅在社会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比“新美国模式”优越得多。

米歇尔·阿尔伯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92年法兰克福 纽约 德文版。

沃尔夫·莱佩尼斯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使得它的进一步改造成为绝对必要的了”,这一结论按照阿尔伯特的意思可以更精确地表述为:进一步扩充和扩展“莱茵模式”,削弱“新美国模式”。但是他得出了一个可能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发展趋势预测:尽管“莱茵模式的经济和社会的优越性已得到了证实”,但是它“正受到其美国竞争者的政治、传媒和文化影响的全面冲击。它在政治上处于退却状态”。甚至“莱茵模式的最强大的堡垒”也“抵挡不住美国的魅力”,因此那里“现在正在进行着经济、财政和社会特性的演变(畸变?),这些演变甚至使这一模式的支柱发生了动摇”。

在东方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失败之后,效能较低的“新美国模式”更具魅力并且向外扩张,以致于事实上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具有更高效能的“莱茵模式”在这场新的制度竞争中似乎败下阵来,这种情况该如何解释呢?

革命的知识分子背弃社会主义

解释效能较低的制度的可能的胜利取决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社会发展和政治意识的形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事实,而是对这些事实的阐释,是这些事实在知识界的讨论中得到的解释和评价。因此,对于像东欧的持续性剧变这样一个举世罕见的事件的后果”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事件是被人们怎样阐释的。

保守主义的社会哲学家君特·罗尔莫泽尔在其对“现存的社会

主义的崩溃”所作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一个具有无法预见的，甚至有可能是革命性的后果的世界历史事件。”这一“世界历史事件”的后果将首先来自对这一事件的阐释，因为：“在历史中决定性的问题不是事实、统计和数据，而始终是：由谁来阐释事实和数据？即使对政治而言，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关键性的问题”。

因此，从人们对东欧变革所作的阐释中，完全可以推断出在西欧这个举世罕见的事件的后果”：非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引起轰动的和被传媒广泛报道的崩溃，说成是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据，因此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灭亡的证据，这是理所当然的和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的。

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机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当然不是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这种本来就一直存在着的抵制，而是社会主义迄今大约150年的历史中出现的一些全新的因素：在这一漫长的历史中，近几年来第一次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左派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绿党—替代选择派、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承认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并且承认保守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对手是历史竞争中的胜利者。左派的各种报刊杂志、会议、研讨会、专题论著和文集，乃至在各种社交聚会和聚餐会上的谈话，都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左派知识分子的困惑、幻灭和迷惘，证明他们已经丧失了乌托邦理想、信仰和一致性，而这些左派知识分子本来是社会主义思想和方案的不可缺少的制定者和承担者。

见汉斯·施帕策内格尔编《失去信誉的资本论？——现实社会主义失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1991年萨尔茨堡德文版第187页。

上述这类证据的洪流目前还难以通观全貌,这里仅从中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自新左派抗议运动,代表绿党—替代选择派的绿党“现实政治家”约施卡·菲舍尔,早在1989年就已确信不疑地和明确无误地断言:“19世纪的中心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有了定论:资本主义胜利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人们只能认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斗已决出了胜负。西方的资本主义……赢得了这场历史性较量的胜利,这是无法挽回的”。

与约施卡·菲舍尔相类似,独立的左派社会主义的社会学家瓦尔特·米勒-延奇也明确地称资本主义是这场刚刚决出胜负的竞争的无可争辩的胜利者,而且它作为胜利者所战胜的社会主义,既包括在现实中应用的社会模式,也包括在理论中构想的社会模式。现实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认为重要的几乎一切方面都遭到了失败,对此今天已几乎不再有争议。资本主义已经证实了自己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方面比现实社会主义更有效、更合理、更富有学习和发展能力”。

在左翼社会民主党—工会的各种流派中,可以以教育与科学工会()主席迪特尔·文德尔为例来证明,首先是左派知识分子把资本主义称作是战胜了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者。他甚至认为,对第三条道路或者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构想都是虚幻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已经失败了。因此工会不应当再“以一个替代的社会制度的设想作为自己决议的基础”,因为“目前并不存在对一个值得追求的替代选择的切实可行的设

约施卡·菲舍尔《工业社会的改造》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文版第58—59页。

瓦尔特·米勒-延奇《国家社会主义崩溃之后——政治教训和前景》,载《工会月刊》1991年第9期第549页。

想。存在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

附和自由派和保守派所谓战胜了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的说法的人,尽管还不是全体左派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但在目前还在公开讨论中发表意见的那部分左派知识分子中却占了压倒多数。由于知识界左派的这种思想上的投降,所以自由派和保守派才得以在思想上未付出多大努力就赢得了意识形态方面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

如果不立即以进攻性的姿态在知识界的讨论中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那么即使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还存在,民主社会主义也不会再作为思想上政治上富有影响力的第三种主要力量生存下去,而会融入另外两个流派即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中。那时“莱茵模式”将让位于“新美国模式”,后者不仅同样也会在西欧扩大社会贫困面,而且还会促使经济衰退。以19世纪下半叶民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兴起为开端的,旨在争取更多的社会公正的西欧特殊道路,就会作为已告结束的历史时期终止在跨入新的1000年的门槛旁。

那样的话,恐怕就不再是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而是紧随其后于世纪之交在西欧发生的持续性剧变,应被视为“1789年以后和1917年以后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世界历史转折和最举世罕见的事件”。因为1989—1991年在东欧被抛弃的只是十月革命的成果,也就是说,只是源于1789年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的反常状态。而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消亡,则意味着抛弃源于1789年革命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的真实的解放思想。

假如社会主义约150年的历史值此世纪之交时真的在西欧终结了,那么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及其知识界的先进分子

迪特尔·文德尔《“现实社会主义”的崩溃与工会的自我意识》,载《工会月刊》1989年第12期第716页。

在政治和思想的竞赛中被竞争的流派所战胜,而是因为他们自相矛盾地竟然在社会主义的反常状态终结之后,宣布与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价值的真实的解放内涵断绝关系。鉴于大批知识分子背弃社会主义的行为,新左派理论家奥斯卡·内格特早在1990年就作出了悲观的预测:“正如几乎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事实所提示的那样,社会主义恐怕难以活到距我们正好还有10年的2000年;因为一种思想恐怕不大可能降格到比这更低的层次,即甚至那些曾不断地援引它并相信自己整个的一生都将忠实于它的人,从现在起竟想要从记忆中抹去这个名称的痕迹。”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拥护民主社会主义

与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背弃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旗帜鲜明、态度明确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容辩护。在1989年12月18—20日在柏林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新的基本纲领中明确地确认民主社会主义是其思想和政治上的自我意识的居指导地位的基本概念。维利·勃兰特、奥斯卡·拉丰丹、汉斯-约翰·福格尔激烈地反对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已遭到失败的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等量齐观的任何企图。针对或多或少是出于善意的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建议,他们自信地表示坚信,正是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垮台之后,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构想不仅在西欧,而且也在东欧有了更大的成功机会。

从那时以来,虽然这一信念在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逐渐让位于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即至少是在短期内,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在东欧还不可能赢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尽管已认识到在东欧取得成功的前景渺茫,德国社会民主党仍未接受保守派、自由派和知识界左派中的多数人关于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均已失败的说法。

在1991年6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庆祝社会党国际重建40周年纪念会上,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驳斥了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概念已经无可挽回地被用坏了……”的人。他指出:“想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所依据的理想——同时实现自由、公正和互助——作为过时的东西轻率地抛弃掉,将被证明是历史性的错误。”

与勃兰特相似,已卸任的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约翰·福格尔在其于1991年5月28日在不来梅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也明确表态主张坚持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就我个人而言,我坚持两个概念,其中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这个概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包含着我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为之奋斗的一切。共产党人滥用表达这个概念的名词达数十年之久,这也无法使我动摇。对于抢劫或者盗窃一件物品的企图,人们不能用放弃这件物品来对付。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概念。”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12月通过的新的柏林基本纲领中,几乎是一致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的基本概念。而且该党居领导地位的代表人物一再拒绝放弃这个概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垮台之后,虽然独立的知识界

《法兰克福评论报》1991年6月26日第5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新闻简报》第15页。

左派陷入了困惑,但是政治上的左派,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没有传染上呢?也就是说,作为西欧第三种主要思想政治流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受到威胁,而是很有保障的呢?或者,社会民主党人在处理其因“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看来已失去信誉的传统的基本概念时,是不是有些太过于草率了呢?

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其基本概念虽然是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继续保持生命力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但是仅有这一个前提还是不够的。为了能在知识界的讨论中站稳脚跟,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审视自己的理论传统和纲领传统,并且要不带偏见地探究其中是否存在与东欧已遭到失败的社会主义方案具有共同点的东西。此外还要以自身的历史发展为背景精确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今天对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是什么,以及这个概念今天已不再能用来指什么。

知识界讨论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从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开始,历经哥德斯堡纲领,直到柏林纲领,通过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纲领的深刻变化,民主社会主义在各个层面上都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成了它们的反题。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1989年柏林纲领中和一系列原则声明中,不是根据思维的惯性,而是根据充分的理由来论证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

在知识界的讨论中目前仍占上风的所谓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都已终结的论点,是不是因此就被经验所驳倒了呢?米歇米·阿尔伯特曾警告过的,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更

富成效的“莱茵模式”被“新美国模式”所排挤的危险,是不是因此就被排除了呢?达伦多夫关于左派已丧失了乌托邦理想的论断,是不是也因此而被驳回了呢?达伦多夫认为:“1989年的革命令人迷惑地同时也摧毁了那些对共产主义丝毫不感兴趣的人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理论构想。”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12月通过的柏林纲领虽然不包含虚幻的和非现实的乌托邦预言,但是无论它怎样客观务实,其中总还是包含有“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理论构想”。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西欧第三大思想和政治力量继续生存,仍然还是没有保障的。因为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动力和动机”不仅具有“继续生存的能力”,而且还具有“继续生存的必要性”(沃尔夫·莱佩尼斯语)的充分理由、事实和论据,没有进入知识界关于东欧巨变对西方的影响的讨论之中。在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人们无论从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队伍中,听到并引起共鸣的主要是这样一些声音,这些声音赞同最新的左派的时髦思想,并运用同案犯作证规则,也同声宣布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对人们的意识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界的讨论中,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和政治的主要流派根本就没有到场,因此意识形态的两大霸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连同日益强大的右翼民众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边缘势力)就得以甚至在西欧也毫无竞争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霸权扩张为独裁。这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独裁之所以能够立足,是因为独立的左派知识分子不了解在改良社会主义的传统中“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理论构想”,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几乎未作任何努力在知识界的讨论中宣传这一

拉尔夫·达伦多夫《遁入无为之路》,载《法兰克福总汇报》1992年10月28日第33页。

构想。

因此,如果说在一部厚达1000多页的学术著作中,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这一章里,民主社会主义竟然未占一席之地,那么这绝不是蓄意捣鬼,而是表现了我们当今社会知识界的认知能力。但是在《19世纪的政治理论》这一章里,除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流派也作了详细论述。而在论述20世纪的这一章里,从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各样的流派中只选了反民主的派别来论述,而且还为此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理由:“本章只能以对20世纪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决定性影响的那些作者和思想发展为主线”,即列宁和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以及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在不带党派偏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对20世纪的进程”已不再产生影响,因此对这个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派别甚至连提一下似乎都显得不再必要。

因此,在那些对20世纪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决定性影响”的社会主义派别失败之后,甚至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要确定思想方向也只能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选择。致力于社会批判但政治上属于右翼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一篇专访中强调,他不是保守派,因为他主张激进的变革:“但是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医治一切弊端和不幸的万应灵丹”。因此他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知识界的讨论中,一个可作为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汉斯·芬斯克《20世纪的政治思想》,载汉斯·乔基姆·利伯编《从古代到当代的政治理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1991年波恩德文版第744页。

《法兰克福评论报》1992年7月18日。

特别是一些有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在不厌其烦地竭力证明,从前曾在欧洲存在过的第三大思想和政治力量民主社会主义如今已不再存在,而且它更谈不上有什么前途。在《法兰克福评论报》的副刊上,曾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过去的一支力量》这样的醒目标题,发表过意大利“西尼斯特拉代俱乐部”(俱乐部的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保罗·弗洛雷斯·达尔凯斯的一篇文章。他谈的中心意思是,“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社会民主党也同样成为不适宜的了”,而且“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被卷入了共产主义的崩溃”。他论证的根据是,这两者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也是以共产党人的基本思想为出发点的,也是认为“社会不公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从‘形式上的’民主走向‘实质上的’民主的最佳道路是不断地对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它“拒绝使用暴力并主张逐步地渐进”。在该“俱乐部左派”看来,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与共产党人共有的错误抛弃得太晚了,因为“……今天,事实上是今天才听到人们众口一词地说:多幸运!幸亏社会民主党承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对认定社会民主党同时失败的论点所作的上述论证,不仅违背常理,而且简直是厚颜无耻。因为社会民主党事实上不是今天才承认,而是早在50年代就已经“承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正是该“俱乐部左派”曾因此而大声指责社会民主党背叛。尽管该“俱乐部左派”的论据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如此虚伪,但是在一个左派没有历史意识的社会里,下列信息还是长期地对人们的政治意识产生着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前进动力已经耗尽……在(公民理想)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传统的储备是贫乏的……社会民主党……无可挽回地属于过去。”

因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知识界的讨论中没有到场,所以即使连左派知识分子也没有意识到,从根本上讲西欧存在着一条社会的特殊道路,而这个较完善的“莱茵模式”正受到“更富魅力的”新美国模式的威胁。同样是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曾以《不存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为题发表过一篇访谈录。在这篇访谈录中,西班牙左派知识分子曼努埃尔·巴斯克斯·蒙塔尔万用与新左派的时髦思想相一致的口吻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一切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替代模式,无论其采取的形式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的社会主义,都遭到了失败。”由此他还明确地否认美国的资本主义同瑞典的或者德国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不存在欧洲的第三条道路。当欧洲的左派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一起以一个他们统治下的欧洲为出发点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这包括在理论上构想欧洲的另一种蓝图……这个蓝图现在已无影无踪了。欧洲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集团。”

在知识界的左派只记得社会主义传统的那些实际上已经被驳倒了意识形态错误的情况下,前面已经引证过其著作的迈克尔·阿尔伯特能挽救他们对社会主义继续生存的能力和继续生存的必要性认识吗?因为他毕竟用大量的事实和数字雄辩地证明,在正在扩张的新美国社会模式和正在退却的西欧莱茵社会模式之间,存在着重大的质的区别。此外,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落伍的新美国模式反而更有魅力得多,而较完善的莱茵模式却不断受到遏制这一令人迷惑的事实,他也提到了一个主要原因。在再次强调了莱茵模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优越性之后,阿尔伯特简练而准确地断言:“然而这一切却令人惊讶地鲜为人知”。而这就意味着,所有这些成就的消失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既然它们

《法兰克福评论报》1992年9月26日。

迈克尔·阿尔伯特前引书第127页。

不为人知,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人会因为失去它们而惋惜。

尽管米歇尔如此令人信服地和鲜明生动地努力使人们了解“莱茵模式”的优越性,并对“新美国模式”的凯举行进发出警告,但是他这样做丝毫改变不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知识界的讨论中没有到场这一后果严重的事实。他虽然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所遵循的基本思想和基本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被否定”这一事实,认为它是卓有成效的“莱茵模式”退却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自己却几乎未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人们了解西欧特殊道路的这些“基本思想和基本价值”的内容,特别是来源。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教会的社会学说的作用”,但是对社会民主党却只是简略地一笔带过,并且否定它对未来的重要性:“现在,与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有关,社会民主党正在加速衰落”。

米歇尔·阿尔伯特对两个模式之间的重大区别所作的经验性的描述虽然是雄辩的和令人信服的,但是他对导致形成这些不同模式的那些要素所作的理论分析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读者从中可能会获得这样的印象,似乎“莱茵模式”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优越性是上天的恩赐,它现在又被收回去了,因为有那么多接受赐予的人不知道珍惜这些礼物。他对于“为什么效能较低者获胜?”这一关键问题所作的回答,难以解释这种令人迷惑的现象。但他的以下论断无疑是符合实际的,即尽管有种种危机现象,“美国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大众传媒所青睐的明星”,而“莱茵模式”却更像是“一顶被戴破了的旧帽子”,特别“没有吸引力”。此外他的

米歇尔·阿尔伯特前引书第197页。

同上,第198页。

同上,第185—186页。

同上,第189页。

同上,第197页。

以下认识可能也有助于保卫“莱茵模式”：“一种思想只是本身正确是不够的，即使它已证实了本身正确也还是不够的。它必须能从政治上被推销出去。”

要把正确的、经过考验的思想从政治上推销出去”，并且不仅要在日常的政治辩论中推销，而且也要在知识界的讨论中推销，为此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和信奉者无疑必须作出努力。但是米歇尔·阿尔伯特却没有提到这些人。正像整个知识界的舆论几乎都还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有意地排斥以下事实一样，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西欧曾走过一条社会的特殊道路，因为这里除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外，社会主义曾作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第三大力量出现过。阿尔伯特所说的“莱茵模式”即是西欧社会的特殊道路，其主要载体是源于19世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有组织的利益代表之间的历史性联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

如果人们在“莱茵模式”中丢掉了历史意识，搞不清是哪些社会政治力量依据何种思想实现了一种具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共识的社会制度，那么就无力抵挡“新美国模式”的推进。

为什么知识界的左派排斥或者否定对社会主义传统的回忆，为什么如达伦多夫所问的那样，东欧剧变令人迷惑地同时也摧毁了那些对共产主义毫无兴趣的人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理论构想”？

这一令人迷惑的现象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绝大多数拒绝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方案：社会主义等于社会化加计划经济。但是这一方案事实上已经最终失败并且不可能再使其复活。1989—1991年，不仅东欧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崩溃了，而且西方大批左派知识分子的非

米歇尔·阿尔伯特前引书第186页。

拉尔夫·达伦多夫前引文章。

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也崩溃了。知识界的左派曾用科学社会主义完全错误地解释世界,从这一痛苦的认识中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这个世界是根本无法解释的。因此他们由从前的过分崇尚理论变成了厌恶理论。由于他们把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理论传统排除在得到承认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流派之外,所以他们现在无法追溯这一传统,并以此来补偿左派在知识界的讨论中的亏空。

因此恰恰是自由主义者达伦多夫不得不提醒厌恶理论、困惑而迷惘的左派记住,他们的任务是阐明替代选择,为此,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对现状的各种替代选择总是需要理论的。人们不能拿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生搬硬套;人们必须创造理论”。

毫无疑问,为了保卫“莱茵模式”的现状,反对“新美国模式”的替代选择,理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况且改良社会主义的理论曾是西欧实际贯彻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完成这一防御任务是按柏林纲领的精神推行一种不断扩展的改良政策的前提,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把柏林纲领“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理论构想”引入知识界的讨论。

美国知识分子尼尔·波斯特曼也同样不得不提醒从前曾对理论着迷的欧洲左派回忆起理论的必要性,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的话。值1992年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开幕之际,他以《信息洪流将淹死我们》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撰文提醒人们,我们恰恰是由于信息洪流而不再能解决问题。我们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这不是因为缺少信息,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养成足够的意识来辨别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而为了培养这种意识,人们需要一种可信的‘故事’。我这里所说的‘故事’指的是人类的历

拉尔夫·达伦多夫前引文章。

《时代》1992年10月2日第61页。

史,它重视过去,说明现在,并为未来指明方向”。

尼尔·波斯特曼同时还警告说,“也有破坏性的故事”,例如本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讲给德国人听的“那种故事”。对他的这一思想必须用以下论断来补充,即尤其是在不再能听到建设性的故事”的情况下,“破坏性的故事”就会赢得大量听众。所有那些追随时髦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失败轻易地视作“伟大的故事”的终结的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本该看到:因为不再能听到建设性的故事”,纳粹主义的新的“破坏性的故事”正在东方和西方赢得如此之多的听众。

然而,正在讲述重视过去,说明现在,并且为未来指明方向的”历史的不仅有纳粹主义,而且还有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最终战胜了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后者的影响面更加广泛。这一新的“破坏性的故事”甚至不以否认社会主义驾驭未来的能力,歪曲、贬低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为满足。这一意识形态诱导人们相信,自始至终一直只存在着残暴的斯大林主义,而一些受蒙蔽的左派过去不愿意现在仍然不愿意“正视事实真相”,即“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出悲剧,它自始至终是一部暴政、血腥和镇压的历史”。

这个加引号的“社会主义真相”,并不是对时髦思想的种种长篇大论的精辟概括,而是逐字逐句抄录的引文,其原文可以在社会科学杂志《利维坦》1992年第3期中找到。由于刊载在一个科学杂志上的这一“社会主义的真相”,毕竟只有仍受社会主义蒙蔽的少数固执己见者中的极少数人才会看到,所以汉斯-马丁·洛曼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上把它介绍给了范围更广的公众,他在介绍时不仅对原文毫无异议,而且还明确地和刻意强调地表

示赞同。

在认定资本主义已获得最终胜利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中,即使是那些并不把曾受到斐迪南·拉萨尔、奥古斯特·倍倍尔、爱德华·伯恩斯坦、罗莎·卢森堡、库特·舒马赫、维利·勃兰特等人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仅仅看作“自始至终是一部暴政、血腥和镇压的历史”的人,也同样否认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约施卡·菲舍尔不仅宣布资本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而且还追溯既往地抬高资本主义,断言它是在社会发展中自觉地和目标明确地采取行动的唯—主体。而与同时,他把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贬低为英明的和无往不胜的资本主义的无意志的和消极的客体,这表现在他认为下列功绩是资本主义胜利的一个原因:“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赢得这一胜利,特别是因为它成功地吸取了改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从而获得了一个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生产率”。

这就是说,是资本主义作为自觉行动的主体实现了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并且还借助这一历史功绩战胜了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不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从前曾迷信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全知全能,而现在却代之以同样没有根据地迷信资本主义的永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全知全能。资本主义被视为决定一切的力量,被视为社会中主动地和自觉地行动的唯一主体。

有一种得到许多左派知识分子赞同的观点认为,只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对它的替代选择。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以在意识形态上美化和过高评价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是与否定和贬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相联系的。因为这个主要为从前

见《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1992年第11期第1044页。

约施卡·菲舍尔前引书第59页。

参见迪特尔·文德尔前引文章。

的左派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则无所不至地渗透到并决定着我国民主的多元社会的一切领域,也就是说,这个纯粹的资本主义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自觉行动的力量。把整个社会大肆张扬地和刻意强调地定性为“资本主义的”,这其中同时就包含有宣布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失败的意思。因为假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名称在西欧至今还有充分的根据,假如无法把西欧社会与未曾有过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美国社会区分开来,那么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将近150年的历史就是徒劳的和多余的了。

鼓吹资本主义获胜和无替代选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当今很有影响的“破坏性的故事”之一。它“重视过去”,声称那时资本主义就该同社会主义的有害诱惑和错误道路作斗争。它“说明现在”,称现在是最终避免社会主义危害的“转折点”。它“为未来指明方向”,断言不存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选择。对于有辩证法素养的,认为自由本来就是必然性的认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新的导向肯定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时髦思想的意识形态认为,一切伟大的理论构想以及有意义的和指明方向的“故事”都已经终结。许多轻信这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看出,自以为获胜的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转变了的前左派,在向各阶层需要指引方向的人们胡扯些什么荒诞离奇的神话故事。这些平庸的神话故事越来越能够把广大阶层的政治意识向右引,因为左派不再有能力用“可信的故事”来对抗这些神话。

尼尔·波斯特曼所说的“可信的故事”,指的是最广义的联系现实和结合实际的理论。为了打破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流派在知识界的讨论中的理论垄断,左派并不需要重新从零点开始,而是可以把受排挤的改良社会主义的理论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就能够对东欧剧变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未

来作出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新左派学生完全不同的阐释。后者不仅否认民主社会主义有驾驭未来的能力,而且还贬低它的历史。

伯恩施坦战胜列宁和马克思

针对宣传资本主义战胜了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利·勃兰特早在1989年12月就已在《时代》周报上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阐释东欧的发展,即“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勃兰特提出的这个替代阐释是有事实根据的。随着伯恩施坦的出现,西欧社会民主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等于社会化加计划经济”的经济主义方案,这一方案事实上的确最终失败了。列宁不仅创立了一个反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派别并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决裂,他还同由伯恩施坦开始的对计划经济方案的背离进行了最无情的斗争,严厉谴责其为背叛。至迟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列宁主义者就不仅预言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和社会民主党的灭亡,而且无论他们在哪里夺取了政权,都总是用暴力镇压社会民主党。但是,与列宁主义的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胜信念相矛盾,民主的改良社会主义战胜了专制的“现实社会主义”,后者在其崩溃之后,退出了塑造未来的政治和思想竞争。

民主的改良社会主义不仅战胜了列宁主义的政治体制,而且还战胜了直到最后的决战关头仍把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化加计划

经济的那些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案。然而有不少这种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从前的信徒,今天不肯承认他们曾与之斗争的改良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他们宁愿宣布资本主义是胜利者。

约施卡·菲舍尔曾论证过,资本主义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它成功地吸取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从而获得了一个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的社会生产率”。凡是不否认改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的人,都可以这样来改述菲舍尔的论证,从而使工人运动重新成为行动的主体,即: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以及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的历史性竞争中,改良社会主义最终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它成功地吸取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从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生产率促进了改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改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通过社会改良把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和利润原则从许多社会领域中排挤出去,代之以源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的替代原则和规范,从而使谈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有充分根据了。米歇尔·阿尔伯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已不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在经济制度方面还是资本主义占优势。

走向“莱茵模式”的道路上的历史经验,还促使西欧社会民主党重新确定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社会主义是对新的、更加美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称谓,据说这一制度很快就将以无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取代没落的资本主义。然而,尽管有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崩溃的种种预测,资本主义却没有灭亡,于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就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归咎于已从理论上的革命者演变成为实践上的改良

参见埃卡特·施波编《怎样继续前进?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联邦共和国辩护》1988年汉堡德文版。

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阶级背叛”。这些革命者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因此从掘墓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病床旁的医生”,使早已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再次延长了生命。

与此相反,在改良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力导致了修正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绝不是即将继承其此刻已衰老和早已久病不起的狠心父母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遗产的孩子。作为新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以及作为新的价值和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都是启蒙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科技和经济进步的嫡生子。社会民主党人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从原则上怀疑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他们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应接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替代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设计并实际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的尝试,应被看作是最最终失败了。按纯经济的标准衡量,虽然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种种替代选择,但是只有比它更差的,却没有比它更好的。鉴于替代的经济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上述最终失败,只有在经济制度和整个社会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才能挽救社会主义的概念。这种区分与把经济制度及其原则视为决定整个社会的力量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教条主义是相矛盾的。以这种否认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的活动余地的教条主义为基础,确实可以从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出发,推断出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论。这种推断虽然是合乎逻辑的、符合经验的,但却是错误的。

在经济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失败之后,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规划或者纲领,这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比目前的社会现实更接近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是对所有那些旨在朝着实现更多的自由、公正、互助的方向自觉地变革和塑造社会的基本价值、基本要求、思想理论和纲领立场

的总称。它也是对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在同其他思想政治流派的竞争中为实现这些目标和思想而工作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称谓。在这些力量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最强大的和最重要的政党,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思想和社会力量。

认识到不存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全面替代,这并没有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政策方面听天由命。相反,恰恰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了用一个经济上无效率的计划经济制度取代一个虽然带有许多社会弊病,但经济上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它能够实现重要的社会政策要求。这种社会改良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把在经济制度中适用的利润原则从尽可能多的社会领域中排挤出去,或者如安德烈·戈尔茨所表述的那样:“扩展摆脱了经济核算和物的束缚的领域”。但是戈尔茨明确地强调,这里并不涉及一个替代的经济制度:“扩展摆脱了经济核算和物的束缚的领域,并不意味着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或替代的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经济。迄今为止除了资本主义的企业经济学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企业经济学……社会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吸收(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去实现以民主方式确定的社会目标……”。

民主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改良政策的基本原则,并非仅仅是未来才有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是在西欧起过实际作用。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基础,人们变革了社会,实现了替代“新美国模式”的“莱茵模式”。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并非仅仅与我们所期望的未来的东西有关,而是也关系到许多过去已经争得的东西、现在正受到威胁的东西和因此必须保卫的东西。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在“莱茵模式”中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结合,即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它在经济上

安德烈·戈尔茨:《核心冲突中的新老活动家》,载《工会月刊》1990年第2期第77页。

甚至比正在扩张的“新美国模式”更有效率，在社会方面甚至比已经灭亡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更加公正。从以上这两种单维模式中取得的经验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完全排除了竞争原则和利润原则，与西欧有社会福利国家保障的市场经济相比，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领域都得到了更差的结果。而美国和英国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则证明，“不带形容词的市场经济”，即竞争原则和利润原则的专制，不仅造成了更多的社会不公，而且也限制了经济效率。因为社会福利国家及其社会共识，如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竞争原则和利润原则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生产率要素。

西欧社会相对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准是三大思想政治流派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竞争中彼此争夺思想影响和政治权力，但是它们绝不想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竞争，以便——像从前东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独自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一切民主主义者都承认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三大合法流派。他们甚至把这三大流派——顺便提一下，它们与政党并不完全重合或者等同——的存在和竞争视为西欧多元化社会的一大优点，一个当这三个流派中的某一个流派退出思想和权力竞争时就会丧失的优点。尽管没有哪一个政党政治家会在选举斗争中公开宣布，但是在这三大流派的开明代表人物之间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共识：这三个派别中的某一个派别退出竞争，这不是获胜留下来的派别的“胜利”，而是所有派别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社会质量的损失。

尽管如此，完全排除了竞争原则和利润原则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在东方和西方还是被新保守主义的和老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巧妙地卓有成效地利用来以利润原则反对社会原则并使利润原则取得统治地位。鼓吹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都已失败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把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

原则上失败的、多余的、无用的和有害的,并把它从迄今为止得到公认的各种合法的主要思想政治流派的多元组合中剔除出去。尽管对这种来自右面的思想进攻必须认真对付,但是构成威胁的主要危险还是来自左面,是来自左派知识分子,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的自我背弃。

社会主义者的不知所措的自我怀疑,在许多前左派那里得到了喝彩和赞同,而在基民盟政治家瓦恩弗里德·德特林那里却遭到了坚决反对。他指出: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崩溃也损害了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情况本来是不该发生的,但是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人物甚至连该党的历史和纲领的较好的部分都害怕提及的时候,它却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拙劣的基民盟宣传标语(‘社会主义去了;我们来了。’)人们可以不放在心上,但是该党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却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

“该党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的一个原因在于,在知识界的讨论中,“甚至连该党的历史和纲领的较好的部分”都没有到场。而只有当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再次与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的讨论氛围相联系时,这种“自我怀疑”才会让位于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广泛的思想和价值联盟才能再次成为政治意识形成的一个积极要素,成为超然于个人的利润取向的社会政策义务的标准指向、定义和动机。

在左派自愿退出知识界的讨论后,意识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之一是,人们虽然每天都淹没在关于现存贫困现象的大量信息之中,但还是把这种得到如此真实的描述的社会境况看作是一切可能的社会中的最好的社会。因为没有任何解说性的阐述来揭示变革的可能性,并为人们自觉地变革这种社会境况的实际义务说明理由。而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阐释的垄断只含有以

下有价值的提示和动机,即从这种恶劣的社会境况中为他们自己谋取最好的境况。

新保守主义者和老自由主义者都非常清楚,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后的这些讨论中,涉及的问题不仅限于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前途。而许多左派看来却连什么正处在危险之中都一无所知。君特·格拉斯提醒所有那些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的人回忆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历史中的作用:“根据对以往的苦难经历的回顾,难道不该承认,使野蛮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文明化并让资本主义担负起社会责任的是欧洲的工人运动吗?”他透彻地说明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讨论中什么正在遭受威胁:“今天认为可以抛弃相互争吵的三兄弟之一社会主义的人本该想一想,到那时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将会失控。现在应当警告人们提防野蛮暴行的再次爆发。”

维利·勃兰特早在70年代就已针对“该党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深表赞同地援引过奥洛夫·帕尔梅的警句:“如果我们不再敢谈论社会主义,那么对手就已经赢得了一半胜利”。东欧的共产主义灭亡后,他捍卫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内容,对那些至少是想放弃这个词的人反驳道:“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仍旧没有失效。自由的要素应被重新唤醒,公正和互助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谁要是想把这些学说当作历史垃圾抛弃掉,谁简直就是一个傻瓜”。

(载霍斯特·海曼编《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和2000年的民主社会主义》1993年科伦德文版

王学东 译

君特·格拉斯《我的欧洲梦》,载《每周邮报》1992年4月15日。

同上。

《维也纳人》1990年第4期第5页。

社会主义失败后， 未来将是什么？

[法 让·罗日金

从社会主义模式在七月王朝时出现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如果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算起（1795 年），则可以认为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相对而言，苏维埃制度的垮台，比以往社会民主党试验的失败，更令人感到切肤之痛。但仔细想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列宁主义的模式到建立在“国家救世主”、“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划清界线”等基础上的模式——以及所有的工人运动，今天不正是都陷入危机之中，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吗？

在我看来，唯独以上的形势判断，才能真正说明何以可供选择的社会改良方案今天竟已穷竭；唯独这一形势判断，也才能为展望未来的可能前景，真正解除人们的恐慌和满足人们的期待，打开一条新的出路。因此，与其一开始就在伦理和体制方面提出可供选择的建议方案，我主张不如回过头来，先考察业已发生的两场大“地震”，因为我相信，这两场地震不但是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

原因, 而且也是在下世纪中切实保障社会进步的可能载体。

一场大地震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危机和被超越, 所有的社会主义蓝图, 包括苏维埃政权的试验在内, 原本都从属于这种工业文明。另一场大地震是社会文化的剧变, 这些剧变打乱了传统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特性, 而社会主义蓝图却依旧以这些分界和特性为依据。

随着信息革命的崛起, 在资本主义内部,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四根支柱今天发生了问题:

1. 工业唯生产力论以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分离。

2. “劳动”(限于强制劳动)和“自由支配时间”(限于劳动以外的时间)之间的分离。

3. 从几千年以来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构架中脱胎而出的, 又经过资本主义而加工的设计者、指挥者和劳动者三种职能的分离。

4. 公共空间(政治和舆论的领域)和私人空间(家庭和职业的领域)的分离。

社会文化剧变打乱了原来的阶级分野, 从而使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天然联系丧失了依据。但这丝毫也不等于说, 剧变取消了劳资之间的阶级对抗, 而只是使阶级对抗改变了形式, 因为雇佣劳动者今天不再由单一的工人集团所体现, 而是由职业特性各异的众多集团所代表(他们从事的不是简单体力劳动, 而是需要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设计、管理等工作)。在我看来, 社会文化剧变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 大批妇女, 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高学历女子, 投入到劳动力市场, 这种现象已成为可持续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服务部门尤其突出。妇女职业化不仅使劳动特性, 而且也使夫妇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分工, 使职业活动和家庭生活的关系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对雇佣劳动者或对雇主, 妇女职业化势必会产

生深远的影响。

2. 由于学龄期的普遍延长,青年已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尽管这与通常意义上的阶级完全不同),这一剧变破除了文化继承关系和家庭社会关系的传统形态(特别是对女青年)。青年和妇女在所有的工人运动和传统政党活动中难得出头露面,却在80和90年代世界各大社会风潮(中学生闹事,大学生罢课,以及生态保护运动等)中扮演了主角,此事决非偶然。更进一步说,“代际关系”的危机(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沟),严重地扼制着左翼价值观念(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内)代代相传。面对工业文明的危机和新文明的崛起,今天的青年人不再认同其父兄们曾屈从的旧价值,他们要寻找和确立新的方位标,特别是他们的父兄自己正处在莫衷一是的彷徨之中。

3. 新的价值体系目前正在各社会活动领域破土而出:每一个人都有权发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以协商合作的形式,而不是以国家强加的千篇一律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应该承认,这个价值体系因可作多种解释而含义不清,甚至有不少人(特别在认同国家救世主和平均主义价值观的那些人中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而已;实际上,新价值体系完全可以同时克服个人至上的自由化倾向和集体至上的相互依赖化倾向,条件是进步力量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可惜今天的情况还远不是如此(在工人运动及公共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组织中,平均主义的传统势力依旧十分强大)。

下面再逐点阐述我们的论据。

一.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危机 和社会主义的危机

如同保尔·博卡拉一样, 我所说的“信息革命”, 其定义是与工作母机的工业革命相对而言的, 用以确指从手工功能的客体化过渡到从自动化中抽象得出的某些脑力功能的客体化; 这是把自动化纳入到涉及所有活动部门的一个范围更广的整体中去, 把信息的创造、流通和储存在第一位, 最后又把这一崭新的科技革命与推进全部劳动生产力的新型要求(在促使作为信息革命主要载体的个人全面发展的同时, 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 联系在一起。

我这样做的特殊考虑是要对信息概念本身(信息的类型, 鉴于权力的金字塔结构而产生的信息共享问题, 信息、含义和规则之间的关系) 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并把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组织革命(在权力关系中) 和文化革命(伦理革命) 联系在一起。

所以, 我们这里所说的“工业文明”, 不仅指狭义的技术革命(工作母机), 而且指广义上的文化革命和生活方式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模式, 包括马克思的模式在内, 都是在工业文明中孕育而成的。这种文明具有四个基本要素。

1. 工业唯生产力论以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分离。

大家知道, 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说到底, 无非就是一种唯生产力论, 它提倡把人的主体当作一种抽象“劳动力”加以使用, 其唯一“价值”完全由制造一种商品所需的抽象劳动量加以衡量, 而制成的商品则是由此产生的劳动价值的体现。正因为如此,

始终占统治地位的“管理文化”,包括服务业在内,历来优先重视劳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而不问产生的用途和提供的服务;甚至在广告、营销和金融行业,人们也侈谈什么“产出”,以便与资本主义工业效益的衡量方式保持某种连贯性。为生产而生产从此成为公认的准则;商品生产统治着以生产者或消费者身份出现的人的主体。这种唯生产力论不仅在苏联产生了极其荒唐的后果,而且在西方文明中,也表现为诸如超级市场以及在那里推销的各种新奇玩意儿(生态保护主义者指出,在效益准则支配下的这种盲目消费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工业唯生产力论的另一基本特征是把为资本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与所谓“非生产性劳动”对立起来,后者的作用或多或少被贬低,因为它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一种普通的收入性支出:在工业革命时代,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由家庭的私仆和国家的公仆所体现,亚当·斯密猛烈地抨击了二者的寄生性。大家想必知道对非生产性劳动的这种“道德”批判产生了什么可悲的后果:在苏联,它表现为公共服务部门的工资偏低以及不重视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在工人运动中,表现为对服务业职工的排斥,服务业职工约占积极人口的60%,但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代表人数却少得可怜。

当然,到了今天,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危机的压迫下,资本统治者不得不更多地关注使用者的需要和服务质量。但在重大的管理决策中和在现存的经济法规中,原来的劳动生产率准则,不论它们何等荒唐,仍被奉若至宝,甚至设计事务所或科研机构也在计算什么“生产效益”(对“量化”的滥用,如同对待物质产品那样追求数量,生硬地规定设计人员必须写出若干行字的设计,要求一名研究人员发表若干篇文章或所写的著述受到他人若干次引证,等等)。

今天,我们应该革除所有这些经济文化和经济伦理,优先强调个人的发展和为使用者服务,要节省使用物质产品,使人从机器的

奴役下解放出来。

2. “劳动时间”和“自由支配时间”之间的分离。

唯生产力论的伦理观表现为对“劳动”的崇拜,其根据就是在“强制劳动时空”(为人类主体的繁衍所必需)和“非劳动时空”之间严格地划清界线。根据马克思的乌托邦,未来的共产主义实现之日,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这种严格区分消除之时。但是马克思隐约地觉察到,“工厂立法”的矛盾发展将在劳动社会化过程中为培育人从事复杂劳动和全面发展提供具体的途径和条件。

马克思100多年以前设想的可能性时空,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完全符合实际,这丝毫也不是低估马克思分析的重要意义。无论在工业与科研、通讯、多学科组织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或在人员的培训方面,目前的需要已不再能用工业革命时代的尺度来衡量:在工业革命时代,劳动者的主体形象纯属依附于工作母机的制造厂工人。戈尔茨认为,即使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单位里,劳动者今天在劳动领域中依旧没有真正的“自主权”可言,“个人的实现”仅限于“非劳动时空”。我们对这种悲观论不敢苟同。

在我们看来,脑力劳动是今后社会的发展方向,而随着脑力劳动的发展,“强制劳动”和“自由支配时间”之间的分离势必将丧失其意义。就以记者、研究人员、干部、工程师等职业的情形为例,由于他们对劳动的兴趣以及由兴趣刺激的投入,人们再也不能在为职业劳动所花的时间和劳动以外的时间之间划一条严格的界线:他们在离开办公室或工厂以后,并不因此就停止自己的思考;更何况,利用电传和电脑等现代手段,在家工作的人已完全可以把“公务”和“家务”穿插起来完成(这也不无危险,因为有人借此在搞“私活”)。对这一类人来说(他们的人数正不断增多),重要的问题已不再是减少劳动时间,而是如何以更高的责任心来发挥创造性和实现自我。

3. 设计者、指挥者和劳动者三种职能之间的分离。

设计者、指挥者和劳动者三种职能之间的分离今天也已经出现了问题。社会学家通常说这是“泰勒制的危机”,虽然在我们看来,这个概念不但模糊不清,而且归纳性过强。早在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生产者以及仰赖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为生的非生产者)的初期,社会就存在祭司、武士和劳动者三种不同的职能;至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它远在手工工场的时代就已诞生,只是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才由泰勒加以体系化而已。此外,人们在把注意的焦点集中于泰勒制的危机及其种种卡壳现象的同时,却偏偏对以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形形色色的“后泰勒主义”(注重人际关系、工业民主化、享有半自主权的班组、日本经营模式等)继续建立在这三者分离的基础之上,虽然人们已比以往更加重视总体生产力,并且正逐渐扩大操作者的自主范围。但是,今天谈论后泰勒主义,岂不等于是推行某种变相的鸵鸟政策?因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让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

4. 公共空间(政治和舆论的领域)和私人空间(家庭和职业的领域)的分离。

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产物,它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在黑格尔和启蒙哲学的含义上)和公共政治空间的分离;换句话说,即所谓“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离。随着词义的演变,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发现,公共领域又可划分为“国家公共领域”(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和“具有批评职能的舆论领域”;后者产生于古希腊的城市,在17世纪的法国,由资产者和贵族的文学团体和“文化人”所体现(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公民与生产劳动相脱离)。

另一方面是公私活动领域的分离:在市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私生活”的领域,用米歇尔·福科的话来讲,即所谓“独善其身”的领域。在近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小家庭”(与宗法制和公团制的大家庭相对而言)的崛起,私生活更突出地表现为夫妻之间的分

工(丈夫工作谋生,妻子操持家务)。从伦理的角度看,非商品性的私生活领域不但与商品性的职业生活领域,而且与公共政治领域,始终存在着本质的对立。

这种双重或三重分离,今天在某些因素(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发生动摇。在消极因素中,哈贝马斯特别指出了商品对家庭私生活和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入侵;此外,还必须强调私营经济的经营管理标准(效益、利润)也渗透到公共企事业单位中来(包括培训、文化等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的服务部门在内)。自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著《启蒙的辩证法》问世以来,这一切都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事;虽然如此,人们也不容否认,分离的被打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为新兴的信息革命创造众多的可能条件。

我们这里至少可以看到,当今社会的五大发展趋向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把私生活、职业空间和公共空间三者之间的旧隔阂扫除干净:

——随着社会效益标准在企事业中变得更加重要,经济因素(以利润和经济效益为准则)和社会因素(与不可触动的经济理性相配合)的分离已不再能维持下去;面对这一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相应调整自己的策略方针。

——信息革命的兴起对劳动责任心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使“公共的公民空间”和“私人的事业空间”的分离已不再能维持下去;在私人事业中担负起公民的责任心,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一大要求。

——“资产阶级权利”的抽象表述,在掩盖阶级区别、性别差异、统治和剥削关系的同时,又可为个人的自主发展充当跳板和保障,但有一项条件,即应充分发挥这项权利的全部潜力,最大限度地实行非国家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为扩大公民的活动领域和逐渐缩小形式上的人人平等和实际上的权利不平等之间的鸿

沟,展开声势浩大的政治和社会斗争。

——大批妇女加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正在打破家庭中夫妻间的传统分工,并迫使雇主在人事管理中给予丈夫的职业地位更加切实的保障。

——公共辩论的电视转播并不真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描绘的那样纯属哗众取宠,尽管在电视节目中,故作姿态的卖弄确实大量存在;应该承认,凡在进步政治力量占上风的情况下,就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抉择展开的公开辩论足以表明,与17和18世纪那时的情形(政治辩论仅限于文化精英的小圈子)相比,使用信息新技术毕竟意味着社会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二. 社会文化的三场大地震,深刻改变现存的社会阶级关系

1. 两性关系革命的开端

两性关系的革命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文化革命,这场革命至今刚崭露锋芒。它是两大社会现象汇合的产物:大批妇女加入雇佣劳动者大军,特别是在服务部门;1968年以来,在当上孩子妈妈的已婚妇女中,继续工作的比例急剧增加。人们可以认为,离婚率的急剧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是妇女加入雇佣劳动者行列的共时性现象,反映着传统配偶型家庭(其特征是男子垄断职业活动)的危机,以及新型家庭单位的难产(由于经济危机,妇女首当其冲地蒙受失业的打击)。

2. 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代沟

第二场社会文化地震表现为代际关系的解体:随着学龄期的延长,青年人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与中老年人往往格

格不入。据我看, 代际关系传统形态的破裂在熟练工人和中高级职员家庭显得特别突出, 女孩子的“叛逆性”则比男孩子更加强烈; 她们与传统的模式决裂, 对“职业前程”和“婚配方式”都有自己的打算; 人们几乎可以说, 熟练工人家里的女孩子对工人传统文化(女孩早婚, 妇女操持家务, 男人就业谋生)的衰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这种传统文化在工人运动及其领导机构中仍有相当的影响。

3. 正在形成中的价值取向

关于正在形成中的价值取向, 人们不宜只根据那些前程无量的职业青年的情形, 而产生盲目的乐观情绪。在我看来, 重要的还是应倾听广大低学历青年的呼声。他们求职无门, 被排斥在社会之外, 因而在绝望之余, 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 甚至濒临犯罪的边缘。社会学家 . 杜贝在这些青年中进行了抽样调查后撰写的一本书——《苦役犯》——值得人们重视。作者指出, 这些青年愿意就业, 因为他们需要挣钱, 以便摆脱屈辱和依附的境地……但同时又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混账透顶的强制劳动’”。在当今的世界里, 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两极分化, 即使一些拥有高学历的青年也面临失业或职业不稳定的威胁, 至少他们的潜在心态与那些比他们境遇更差的同代人是完全相通的。

三. 设计未来的蓝图

有鉴于这些危机和社会剧变, 为了设计一项旨在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计划, 人们可以试图采取以下六条潜在的新途径:

1. 寻找一种不再与人类和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的切实有效

的经济新理性。

戈尔茨建议,在组织经济时,应同时注重“效益”和“节约”,这正是保尔·博卡拉提出的关于“节省人力和物力”的管理新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自18世纪以来就已陷入其中的恶性循环,才能破除那种一味追逐利润,而对社会主义伦理观置之度外的经济功利主义,从而建立起合理、有效的经济新体制。

2. 今天,人们纷纷提出倡议,要求在经济生活各领域大幅度减少强制劳动的社会时间;但是,在缩短强制劳动时间的同时,又把个人的自主和创造仅限于非劳动时间,这样做是否可行,似乎还是个问题。

3. 雇主正小心翼翼地从事旨在改善劳动组织的试验;至于工会组织,它们主张在班组一级设置有形的和无形的咨询机制。然而,在信息革命的今天,为了真正消除战略设计、生产指挥、组织劳动和干活出力之间的分离,在企业 and 组织中(包括政治组织中)实行“交换角色”已成为势在必行的时代要求。

4. 妇女职业化越来越使“交换角色”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显得更有必要(在夫妻关系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以及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中,引入互惠原则)。

5. 在政治体制的水平层面上,代议制机构、中央集权制以及所谓地方分权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陷入危机,这就要求在推广各种自治形式的同时,实行名副其实的权力下放,并确立真正能对代表实行民主监督的新型代议制民主。保尔·博卡拉在1991年12月《出路》杂志举办的讨论会上已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6. 提倡每个人独立自主地发挥创造性,从而实现自我。这种以协商合作为基础的新伦理观既适用于家庭,也适用于职业生活和政治生活。它将在各种社会空间中,以讨论、争辩等形式,让所有人对社会和经济准则,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提倡这种新型伦理观,还意味着对平均主义乌托邦进行建设性的批

评”,因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平均主义曾把“计划经济”简单地归纳为“对社会发展的绝对预见”,又把“社会的休戚与共”说成是在非商品型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实行平均分配”。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能完全预见社会的具体变迁。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因而不可能通过计划调节经济。进一步说,我认为,由于社会本身的极端复杂性,在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计划化都不可能预见社会的一切。苏联计划经济的破产即是一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乌托邦平均主义,即所谓“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到了今天,我们在倡导社会休戚与共的同时,更应充分考虑到个人才能的不平等。在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我们主张应根据各人的劳动、才能和创造性支付报酬,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毫无疑问,这个方针并不仅仅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现实性;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拒绝承认个人的才能至少已成为工会遭到青年冷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当然并不想步唯生产力论的经济自由主义之后尘,亦步亦趋地追求“竞争效应”,而是希望正确衡量每个人以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服务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从而确定崭新的分配标准。

(载法国《思想》杂志1994年第1期。山风译)

社会主义的未来

[巴西] 弗·维夫特

过去三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给左派带来了沉重的打击。1989年开始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如晴空霹雳,让所有人感到震惊。1991年苏联帝国解体,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之一的俄国革命以巨大的悲剧性失败而告终,更是令人为之瞠目。现在,世界各地的左派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

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当时,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失败。30年代的大萧条后很快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曾经在20年代取得一系列政治胜利的法西斯主义,其军事力量也日益膨胀。30年代后期,尽管资本主义在美国出现暂时复苏,但在欧洲仍处于崩溃的边缘。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结盟,或许会赢得战争(事实上也胜利了),但许多人认为,这场胜利不足以把他们从最终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

弗朗西斯科·维夫特:巴西圣保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已经显露出注定要在现代取得胜利的迹象。确实, 尽管社会主义运动在20 世纪下半叶开始丧失其力量, 但社会主义的神话直到1989 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才告破灭。

虽然熊彼特厌恶社会主义, 但他相信资本主义将屈从于社会主义。在他看来, 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生产是未来的趋势。或许恰恰因为熊彼特是社会主义深思熟虑的敌人, 所以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具有说服力的, 而且成为仅仅依赖理性的人们遭受历史戏弄的鲜明例证。熊彼特思想的错误所在, 并不是那个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特定预言, 而是一整套并不为他个人所独有的历史目的论的概念。

历史发展终极论思想, 尽管通常与左派思想相联系, 但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或现代社会主义组织出现以前很久即已存在。熊彼特以其惯有的严谨学术态度提出: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不可避免的演进过程中, 谁也不能排除出现骚乱局势的可能性。在这里, 熊彼特用词很谨慎, 例如, 在谈及关键词“不可避免性”时, 他指的仅仅是“可以观察的模式中表现出来的趋势”, 这些趋势永不能告诉我们这个模式将要发生些什么, 它只能告诉我们, 那些趋势如果像在我们所观察的时期中那样继续活动, 同时又没有别的因素闯进来时将会发生些什么”。我认为马克思不会否认这一观点, 因为尽管他经常预言, 他也会欣赏一个科学家的严谨。

出人意外的重大事件, 如1989—1991 年的剧变, 其价值之一是, 它们给历史归根结蒂是自由的历史的古老观念注入了新的生气。在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等等现代思想家中, 持有决定论观点的人相当普遍, 因而决定论显然是应该加以讨论的问题。即使我们考虑到熊彼特曾努力批评过马克思, 但他们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纽约第3 版第61 页。

共同持有把历史看作是必然运动的观点是毫无疑问的。熊彼特的那个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预言,即科技革新的逐渐衰退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衰退,并未得到证实。尽管现代资本主义恰如熊彼特担心的那样摧毁了“保护阶层”(手工业者、贵族阶级等),但他所设想的那种灾难性后果并未出现。相反,面对挑战的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创造出其他保护机制而成功地崛起。同样,资本主义能够消弥知识分子的敌意,甚至能够得到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支持。

如果说熊彼特的例证是令人感兴趣的,那是因为它表明:由于社会主义的崩溃而引发的知识分子的危机,并不仅仅是左派的危机。而拉丁美洲所以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地区,其原因在于,它以活生生的事例证明,1989—1991年事件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并不仅仅局限于体验过“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众所周知,在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崩溃的预兆是,大量不断出现的经济失败和内部意识形态的缓慢衰弱。在拉丁美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很少付诸实践而未被触动。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古巴和智利是两个明显的例外,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但并非是政治现象,而是一种文化学术现象。

从传统上讲,拉丁美洲是民粹主义政治家的狩猎乐园。最近,不同党派都向社会民主派和具有社会意识的自由主义的扩张敞开了政治的大门。这种政治状况尽管是非社会主义的,却证明了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并不十分成功,其意识形态辩护士也并不十分勇猛,因此,该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为数不多,但在当地的政治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当发现自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受到1989—1991年剧变的巨大震撼之后,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有益的方案,以重建其停滞、分裂、落后、奉行社团主义而又极端官僚主义的社会。

严格地讲,1989—1991年事件按任何既存的历史范式都是不可想像的。或许某些目的论和决定论的思想模式在一段时期里已陷入危机,但是左翼人士对“进步”所保有的最后一点自信一直维系到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覆灭之时。直到1989年,很少有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式方面回复到资本主义状态。1991年,旧的思想模式的最后一线希望也被埋葬了。

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与马克思的思想有联系的思想,但其后果远非如此。1989—1991年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预示着一个政治上的新发现,这一发现不仅震撼了过分注重历史决定论的左翼人士,同时也震撼了坚持以经济解释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新保守主义辩护士。

新保守主义的挑战

以上所述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代纪元的意义是什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一篇短文不足以论述清楚,不过我可以提出一些设想。我认为,我们的时代不仅是对国家的信赖已经削弱、对市场机制的依赖得到加强的时代,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和市民社会增强的时代。这一点是基础,因为它表明,与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相反,市场并不是当代社会唯一的“游戏”。如果社会主义思想要想持久并具有现实意义,那么它必须开始认真地探索此类假设的意义。

熊彼特的思想是重要的,因为他提出了一种以新的民主概念取代传统民主概念的方案,也就是说,他认为民主是通过精英人物和平竞争的方式挑选政府的一整套程序,而不是实现共同幸福的

工具。这样,由于政府是由人民在自由选举中选出的领导人治理的,民主将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此外,熊彼特还暗示,只有在充满愉快的环境下,政府才能转化为林肯所说的那种“民享”的政府。

我承认,每当重读熊彼特关于民主的著名章节时,总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这些章节对非常适合现代思想的理性和个人主义流露出巨大而又令人不安的怀疑。另一方面,熊彼特提出的大胆的现实主义设想,为把握现代世界政治现象的真正自治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尽管熊彼特明确反对任何把民主本身作为目的的观念,但是,他也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提供了可能的出发点,这种政治分析允许他的读者回避他的观点,去采取任何方式重新建立把民主作为价值的观念。

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即便是程序上的民主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的正式规则问题。事实上,成功的民主程序是以可以使人民获取自由的制度安排等不可否认的实质性事物为前提的。如果不对此类事物加以考虑,我们怎么能理解1989—1991年那些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政治民主在全球范围的广泛传播?当然,拉丁美洲、东欧和南欧的民主化经验应使我们关注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之间的重大区别。此外,他们的经验表明,必须建立避免任何形式的决定论的理论观点。

新保守主义把民主界定为似乎仅仅取决于市场经济,他们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他们提出的问题不错,值得在此讨论。没有经济自由,能有政治自由吗?我的回答是:没有。没有市场,会有政治民主吗?我的回答还是:没有。但是这两个问题及其答案都过于抽象,缺乏实践作用。在批评东欧和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权方面,它们是有用的。但在反对不久前还在拉丁美洲和南欧盛行的“官僚主义—强权主义”政权方面则作用甚微。这些政权敌视民主,但同时为了促进以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

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们也奉行国家干预主义。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政府力求对经济活动施加完全的控制,一切事物都政治化了,而经济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托克维尔所极为看重的那种中央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媒介不复存在一样,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差别也消失了。当政府以这种方式无情地侵犯社会和经济时,个人自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于是,当新保守主义者谈论政治自由时,他们会采取这样一个观点: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市场也就没有民主。

但是,当他们不得不涉及复杂的实际历史事实时,新保守主义者就陷入了困境。其困难之一是,在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对经济的接管并不在镇压政治民主之前,而是在其后。国家实施对经济的控制,常常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措施,或者是为战争做准备,或者是为了把已经开始的战争有效地进行下去。因此,常常只是在非民主的政权已经强行控制了经济之后,人们才能说这个受国家控制的经济是极权主义政权的堡垒。

同样,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老问题,丝毫不会影响工人和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观的反对。无组织的个体工人在与雇佣他们的大型企业的关系上有经济上的自由吗?当代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所有工会都会说没有。但是,如果作为个体的工人在与企业的关系上不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经济自由更多地依赖于其可以通过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获得补偿和平的自我保护的方法,而较少依赖于市场。把同样的道理运用于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生活中普遍存在经济和社会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是否有政治自由呢?任何一个在考虑政治思想史时感到困惑的人都会知道,这后一个问题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它也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政治自由的问题(尽管保守主义者想忘掉它)。

经济体制与文化价值

然而,新保守主义提出的问题确有它们的用途,其主要功用就是突出了对“什么是自由?”这一理论问题采取某种立场的必然性。从我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显然倾向于那些从政治方面定义自由的理论家。而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则是根据经济来定义自由的。例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解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时显然确信前者是第一位的,“符合法律的自由包含着经济自由,而经济控制,即控制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则使控制一切自由成为可能。”哈耶克否认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差别,因而把政治民主降低为市场的工具。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某些服务除外)都是迈向强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但是这种论述似乎是错误的:严格地讲,哈耶克用一个定义性程序解决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像他曾向读者说过的,“要么接受它,要么放弃它”,但这种解决办法是从它的历史特征中抽象出来的。

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采用的是不同的处理方式。她没有给出答案,以使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参与)的方式得到解决。作为托克维尔传统的女继承人,阿伦特比她的前辈们更多地引用了古典理论的评论:经济领域(在其私人的或包括古代奴隶制在内的家庭生活的原本意义上)是必然的王国,自

由只能出现在公共政治活动的舞台上。

在告诫人们“社会问题”进入政治领域会产生强权主义的危险时,阿伦特与哈耶克的想法或许是一致的。但与新保守主义者不同,她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尽管对自由在当代世界的前景不时地而且是可以理解地流露出各种悲观的情绪,但她最终还是坚信,人民有机会在政治活动当中或通过政治活动,即用他们的语言和行动”获取自由。例如,阿伦特认为,现代革命的基础是自由反对暴政的斗争,这种解释是决定论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新保守主义者)所无法接受的。对1989—1991年那些事件的评价,有哪一个比这个评价更早呢?或者就事后而言,又有哪一个比这个评价更明确呢?

在这令人深感困惑的时刻,社会主义者或许应该读一读罗伯托·鲍比奥的《哪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部题目即给人以启示的作品中,作者总结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他指出,没有哪一个民主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亦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民主。作为“自由社会主义者”的鲍比奥所暗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现在所知道的:东欧国家要获取民主就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如前所述,人们无法否认,这无疑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政治胜利。把生产的社会化理解为国家控制生产的极权社会主义,带来的是政治压制和经济停滞。因而,市民社会的复苏所激发出来的渴求自由的意愿,必然会带来厌恶国家的情绪和向民主与资本主义过渡的要求。在全世界目睹了东欧的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只有找到一个全

汉娜·阿伦特《人类状况》195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版第六章:“个人传记和现代”。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1963年纽约维金出版社版。

罗伯托·鲍比奥《哪一种社会主义》1978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版。

新的理由,才能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幸存于世。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没落,社会主义者发现,他们正在摸索着向自己和别人解释,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可以真正取代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我前文所说的经济体制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区别有意义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可以一如既往地平等、社会正义等旧有的社会主义价值倍感自信。正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文化”要素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多社会主义者。尽管有人或许会说,这些价值在现代民主国家已被广泛接受,因而它们并不是专属于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不应该被看作是认真的反对意见。我们正在讨论的恰恰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因而,如果社会主义者在没有可供替代的经济和社会理论的情况下,在今后接受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不是与特定的体制密切相关而基本上是由价值界定的,那是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

国家与市场

爱德华·伯恩斯坦很早以前说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辉煌岁月里,“运动”是工人和社会民主人士为实现具体要求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所从事的斗争,而“目的”则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消除剥削的思想。但是今天,我们在现代民主方面的一般经验和现代社会民主的特定经验,给了我们更多的发言权。伯恩斯坦强调“运动”重于“目的”的主张是对的。因为运动本身引导人们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创造了目的。历史上没有现成的先例可循,正如古语所说“路是人走出来的”。

当伯恩斯坦说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夸张的方式,而这种夸张是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的。目的当然不再是注定将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中产生出来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表现。那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人构想出的“目的”。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大量不确定因素的时代里,社会主义者最不应该专注于为既有的确定因素辩护。但是社会主义怎么会失去追求的目标呢?事实上,目的是存在的,但它是一种自由的事业,而不是宿命的结果;它也许可以获得部分的实现,也许甚至会由于巨大的障碍和不可预见的事件而遭受挫折。此外,如果目的是未来的景象,那么它必定会根据目前的环境而加以改变。目的是受高尚的理想激励的,但并不是一切。不管“科学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们怎样想,目的并没有明确的保证,但它是有意义的东西。就像一个行者,没有目的,征程就没有意义,或许永远也不会踏上征程。

如果社会主义的未来观仍然是可能的,那么考察一下我们所处时代的民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它肯定得益于1989—1991年的剧变。在东欧、南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控制经济和社会的努力遭到了失败。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家就在各种经济和政治背景下一直采取攻势。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变体,“官僚主义—强权主义”政权,以及其他强权主义,是多年来导致国家不断扩张的最为显著的(但不是唯一的)政治形式。国家在本世纪的大规模膨胀,不仅局限于独裁国家,而是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

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应该为市场留有空间,但也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并体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多元

化。当今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说明社会能实现一种把社会平等原则与政治自由原则结合在一起的自治政府形式。民主社会主义从激进的民主概念中得到灵感。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寻求的是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一切差异这一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恰恰相反,它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改善政治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制度,特别是那些与劳工界密切相关的制度。这样的观点并不否认,也不能否认这样一种认识,即最先进的经济部门越来越具有跨国甚至全球化的特点。拒绝这种国际化就是接受倒退和停滞。

但是,即使在最先进的现代社会,市场也不会自动运作。在最好的情况下,市场的健康运作,也是由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制订和颁布的行政法规来保障、激励、甚至推动的,诚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所说明的美国的情况。国家频繁地干预市场是事实,但还没有人找到一种办法使市场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运作。承认现代民主生活中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恢复国家社会主义(78 8 73 071);相反,这是摆在每一个熟悉现代历史的人面前的简单事实(至于国家社会主义,虽然作为一种实体并没有彻底死亡,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毫无疑问地灭亡了。)

由此可见,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在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采取的两极分化的思想倾向,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论,即没有一个现存的社会认为自己是市场经济。我们在此感兴趣的是,所有民主社会的经济都是混合型的,其经济活动以相反的方式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划分。我们可以举例为证:日本的干涉主义,德国、瑞典的

这只是一个理论概略,不幸的是因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此充分阐述。亚历克·诺瓦《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1983年伦敦版第五章“可行的社会主义”和阿伦·沃尔夫《发展的三条道路:市场,国家,市民社会》(未出版的手稿)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新工业国家》1967年波士顿版。

社会民主主义, 美国和英国的自由民主主义。

现代民主关于混合经济的丰富历史经验可以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它首先表明, 国家在经济中的某种存在, 即使是最突出的存在, 其本身并不会导向强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现代民主社会不是一个“最小国家”的社会, 相反, 它是以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前提的; 同时, 它还要求市民社会和民主强大到足以控制国家。政府与市场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关系, 但它们彼此之间又相互需要。现代民主, 即不会像思想肤浅的社会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 没有市场也可以实现, 也不会通过新保守主义者所理想化的那种“最小国家”的方式获得实现。

社会主义者的教训

然而, 对民主社会主义者而言, 最大的教训还不在于此。如果说新保守主义思想倾向于决定论和市场的一元化, 那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是多元化的, 并且要面向更多的可能性。对社会主义的诠释应该始终把社会秩序看成多元的实体, 在这个实体中国家、市场、民主的政治文化和自治的市民社会等都是基本的要素。将社会主义运动与其他民主政治力量区分开来的标志是, 社会主义运动将推动社会实现更大的平等和把自由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现象的时代, 社会主义者要想站稳脚跟并向现代化迈进, 必须学会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共存。但是, 他们无须在其价值观上和运动中认同资本主义的“灵魂”。社会主义应该出于爱情而与民主结合, 但它与市场的结合则必须是一种

“利益婚姻”。

这会将他们置于比熊彼特所说的那些坚信想象的“科学社会主义”,并认为“历史的必然”站在他们一边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更脆弱的地位吗?我不这样认为。但是即使他们的新地位真的变得更弱了,那也是每个真正把民主作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者必须付出的“最小代价”。只有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并承认,你的个人观点只是不完全的,不代表每个人或整个社会,你才能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如果社会主义获取了新的意义并相应地在政治上东山再起,其原因将在于,社会主义者已经最终学会了在民主游戏中接受竞争对手的正当出现。那就需要一种认可:在任何可以设想的形式下,社会主义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历史的“必然”。1989—1991年剧变后,社会主义者应该很容易地认识到,他们只是所有人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未来的主人。

同理,他们也应很容易理解那些经过奇怪的意识形态转变而认为未来的主人是资本主义的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如果如洛得·阿克顿所说,历史是自由的历史,那么未来就根本没有主人。这是应从1989—1991年剧变中吸取的众多教训中最有意义的教训,也是希望建立更加自由、现代和平等(如果左派能完成这一任务的话)的社会的人所必须吸取的教训。

(《重读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一书》1993年巴提莫尔和伦敦英文版第84—93页。

王伟 译 贺和风 校

这一观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杰弗里·温托布教授在一封信中向我提出的,其措辞略有不同。

未来的社会主义

[美] 约·罗默

一、导言

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灭亡,使许多人以为社会主义无论在当今世界上,还是作为一种理想,都不复存在了。我认为,社会主义还能存在;但是,这要求对关于社会主义构成因素的通常看法做

本文系作者对其《未来的社会主义》(199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版)一书的综述。这里翻译的是该文第一、二、三和六、七节,其中第六节对证券社会主义的描述与《未来的社会主义》一书有所不同。——译者注

约翰·罗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一定的修改,因为倘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那么,它显然已经灭亡了。我赞成市场社会主义(168730071)的主张。“市场社会主义”一词产生于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核算问题的大辩论,当时的辩论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奥斯卡·兰格,另一个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兰格认为,被经济学家现在称之为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思想说明可以将中央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而哈耶克则反驳道,计划本质上会破坏作为资本主义的活力来源的机制。哈耶克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批评,以及近年来科尔内·亚诺什(237362)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绝大多数是中肯之言。但是,过去50年来,不仅社会主义的经验,甚至连资本主义的经验也说明了重新阐述市场社会主义概念,回击哈耶克派对其思想先驱的批评的可能性。我的任务就是进行这种重新阐述。

经济理论还不能使我们开列一份完整的损益表来说明市场社会主义的得失。30年代期间,当兰格和哈耶克围绕着市场社会主义问题展开大辩论时,苏联正在迅速地进行工业化。当时,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工人和机器大量闲置的现象,而苏联却显然实现了充分就业。因此,哈耶克在辩论中处于守势,而兰格则很可能意识到他的建议是对必然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微调。今天,局面倒过来了。但30年代赞成社会主义的人和今天赞成资本主义的人,在下结论时都过于仓促了,因为我们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地理解市场的作用。

经济理论可以说明,如果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都与市场关系不大,并且不能单独地影响价格,如果没有外部因素,而且如果有足够的保险和金融市场,市场经济均衡将怎样形成一种符合帕雷托效率的有效的资源配置——这里的有效,是从不存在可以使每个人同时过得更好的其他资源配置方式的意义上讲的。但是,这种静态效率与通常被认为是市场优点的动态效率相比,也许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因为市场能比其他经济机制更有效地实现技术创新和生产更多

的商品。尽管我们似乎有许多证据说明市场具有活力,但是我们却没有充分适当的经济理论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可控性实验,使疑心重重的科学家充满信心地断言市场从这种动态意义上讲是优于计划的。从科学的角度看,现实中的实验(6 0-0 24 6 1 287) 都是很不纯的:过去30年中,大多数充满生机的国家(日本和东亚虎们)采用了市场与适当计划相结合的办法;而共产党国家不仅实行计划经济,不要市场,而且还实行政治独裁——后者是实验设计者希望能够加以改变的背景条件。

因此,社会科学家对市场效果的了解肯定不比基础经济学教科书和通俗刊物多。诚然,当代经济理论已经认识到各种市场都是在非市场制度的大环境中运转的。这些制度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企业、契约法、经济制度和其他行动者之间相互联接的制度(如企业和股东之间的互联制度),以及国家等。资本主义大企业都是实行集中计划的(它们的内部交易并不以价格系统为媒介),并且通常是由受雇代表股东利益的经理来经营的。经理做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像他们的自我利益并不总是和股东的利益一致一样。契约法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长期契约确实是一个工具,它以高昂的代价让契约双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回到市场中来。此外,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形成了不同的非市场制度——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在进行某种现实的实验,这种实验有助于对可供选择的经济机制进行评价。譬如,德国和日本的企业所有者就采用了与英国和美国极为不同的制度来监督企业经营。

一句话,市场不是孤立无援地建立自己的功绩的,它有无数的辅助制度,这些制度是在不同的市场经济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漫长的时间里艰难地形成的。我的中心观点是:这些解决资本主义设计问题(8 7 2 463 0 17 3 4 8 0 7 1)的制度办法,也使我们联想到,社会主义设计问题在市场环境下能以什么方式得到解决。

为了说明为什么可能是这样的,我要很快地肯定也是不充分地概括一下哈耶克的(更全面地说也就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从长远看,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是由各种生产要素,主要是人的才智,包括企业家才智的相对稀缺性决定的。从长远看,产权本身应当被视为才智的衍生物。企业只是企业家利用其才智牟利的工具;反过来,正是企业利润使它们的所有者能够购买不动产和其他资源,因此从长远看,自然资源也是归有才智的人或他们的后代所有的。而且,任何企图干预市场运行,即干预经济领域内使竞争自由最大化的制度的举动,只会减少总的福利,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企业家充分施展才智。

如果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平等主义者要想纠正不平等,除了教育,便别无选择了,因为教育有利于尽可能地开发人的才智。此外也许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征收遗产税。不过,我确信,我在以上三段中所勾画的资本主义制度观说明了这样一点,即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庞大而复杂的制度的产物,它的运行有赖于许多“普通”人的共同努力——这里说的“普通”,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他们的才智并不像哈耶克派所认为的那样非常罕见,而是可以培育出来的。社会财富主要不应归于强健杰出的个人,事实上,社会财富是可以按照人们非常易于理解的行动计划再生的。市场是实现竞争和节省信息所必需的,但是,市场培养不出杰出天才的灵感。

有一种现代资本主义观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启示着社会主义的未来,这种资本主义观把企业视为委托代理的联系纽带(2 297 3 46 2 4 0- 28 6 0 8 327 47)。把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说成是企业家利用其才智牟利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些企业的利润是在许多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这些人不能直接控制决策从而影响盈利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对企业的成败承担责任。企业是由其所有者雇用的代理人(287)经营的;这表明,受

雇的代理人也可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经营企业,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利润分配比在资本主义大公司里更分散。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使所有者能够控制经营管理的机制,也可以移植到社会主义制度中。

“狭义的”哈耶克新古典观把市场视为一种结构,一种在有才智的个人中间组织竞争的最小限度的结构(1 2 1 0 7869 896);与之相反,“广义的”现代观则认为市场是在复杂的人为的制度环境中运行的,所有个人的努力通过这些制度都被消毒和净化了。我认为,这两种市场观存在着质的区别,不像前一种观点,后一种观点是经得起市场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检验的。特别是收入分配,按照广义观,就更容易受外界影响了;不用进行大规模教育,也能打开大幅度减少不平等的大门,因为如果做得妥当,利润再分配几乎甚至完全不会对经济效率产生不良影响。

下面,我将尽力充实完善这些模糊的主张。

二、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

我认为,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1) 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的机会平等;(2) 在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机会平等;(3) 社会地位的平等。所谓自我实现,我认为,是指个人天赋的发展和施展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意义。这是马克思特有的人的发展观,它和约翰·罗尔斯(3 2 107) 的实现生活计划的概念是不同的,因为生活计划也许是喜欢和家人朋友在一起,也许是吃顿美味佳肴,或者是悠闲自得地数数青枝绿叶,等等,而这些活动是算不上自我实现的。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它要求进行奋斗,不是吃

顿美味佳肴就能解决的。不过,一个人可以从喜欢与家人朋友在一起和吃顿美味佳肴中获得福利(106),所以我认为这些活动在社会主义者的考虑中是有价值的,因为目标1)要求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的机会平等。

目标是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在自我实现和福利上的平等,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多说几句。如果目标是福利平等,而不是福利的机会平等,社会就要向那些选定了代价很高而又不现实的目标的人提供大量的资源。假定我是一个穷运动员,以为除非登上珠穆朗玛峰,否则生活便毫无意义,那么,我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来雇用足够的夏尔巴人作向导,还需要得到其他辅助性服务,使这次攀登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福利的机会平等则要求我自己承担责任,选择合理的能产生福利的目标(106-292-307)。选择什么样的资源配置以使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福利或自我实现的机会,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希望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的原则是清楚的。是什么东西把社会主义者或左派与保守派区别开的呢?是他们认为要实现机会平等,人们必须走多远。保守派认为不用走多远:如果雇用人时不存在歧视,而且每个人都能通过公共教育系统或担保(039-67)受到教育,那么,保守派的机会平等标准是可以满足的。但是社会主义者确信,这些保证只触及了表面问题。机会平等要求对于那些没有特权的家庭的孩子给予特殊的补偿或补贴。最为普通的是,机会平等要求对那些因自己不能左右的因素而致残的人给予补偿。

假定我们已经弄明白了目标1)、(2)、(3)的意义——我这里不打算提出对目标2)和3)的任何解释——目标1)、(2)、(3)的表述仍然是不准确的。譬如,社会主义者真正追求的不是在自我实现方面的机会平等,而是自我实现在更高程度上的平等。所以

目标(1)应当这样重新表述: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它使自我实现的机会均等化的水平不低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所达到的水平。换句话说,目标(1)认为,我们应当以高于其他所有可能的组织的水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实现的机会,使每个人能以同样的水平达到自我实现。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第2)个目标要求我们选择能使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机会平等最大化的组织。同样的表述也适用于目标(3)。不过,要使三个目标同时达到最大化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那种能使自我实现的机会平等最大化的社会组织却很有可能使政治影响力的水平极不平等。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时,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使三个目标同时实现均等。我认为,这种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第二种看法认为,应当承认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着交换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大家正在做的。譬如,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生过一场大辩论。三个目标谁为主呢?是民主还是平等呢?或者换句话说,是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机会平等更重要,还是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的机会平等更重要呢?对于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有不同的回答。与大多数苏联社会主义者相反,西方社会主义者强调政治影响力方面的机会平等的重要性。有些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反对桑地诺分子,就是因为尼加拉瓜没有出版自由和民主。

我这里不打算对三个目标提出任何带有特别偏好的排列。下面我只着重研究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收入平等化而又不使效率有任何不可接受的损失的可能性。我确实认为,提高穷人的收入是增加他们在自我实现和福利方面的机会的最重要的一步。

三、公有制

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制造了一种公有制崇拜:公有制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8 72 59 232),这种看法是以错误的推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我前面列举的三个平等;在采用什么样的生产资产产权关系(4634 683 60 832 2 463-9 80 77 87)来实现这些平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者应当持开放的态度。在企业完全无限制的私有制(这种形式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和企业完全由政府机构控制这两种形式之间,有无数种可能的产权排列组合。在这些排列组合一端的是国有制,它同三个平等目标的关系是脆弱的,而且我认为,最好把国有制的概念从社会主义宪法中去掉。社会主义者应当赞成实行这样一种生产资产产权关系,这种产权关系将使社会最倾向于实现上述三种平等。时至今日,老实说,人们还不能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产权关系一定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在企业和其他资源方面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关系,完全是一个手段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大致经历了如下过程: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所有制。由于复杂的原因(包括官僚僵化和阶级利益),后一种形式在70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工人管理企业的产权形式(396 - 1 2 - 61 463 μ 4 683 361)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则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与社会主义相反,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权形式:非盈利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伙制、独资制、社会民主所有制(73 0 13-

6 8 4634 683)、工人管理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共和所有制(38 6 3617 3 73 0- 6 49 0 2 4634 683),等等。最能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所有制形式也许包括生产资料的人民直接控制(6 8 43490 6 328630)或生产资料的国家只是遥控的形式(78 8 328630 2 3203 78 28 1 3)。

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我指的是大多数物品包括劳动通过价格系统来分配,企业(不论是否由工人管理)利润在居民中非常公平地进行分配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安排。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机制才能实现利润的这种分配,同时又不至于在效率方面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

从某种抽象的角度看,对企业和土地的产权关系的选择应当在以下两个目标上实现最优化:它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对效率的影响。就效率而言,有一点我们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产权关系应当能造成竞争和创新,而且应当能使企业避免政府的某种无效率的干涉。企业私有制有时能实现上述目标。当一个行业的所有权不过分集中时,私有制能造成竞争;当防止无效率的政治干预的法律规定得到执行时,私有制也能防止这种干预。私有制给某些人以刺激,要求依照法律执行这些所有权,也就是不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美国,企业私有制在防止政府干预方面也不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制度。1950年,杜鲁门总统曾查封(7 4)了几家大钢铁厂,以便迫使它们为朝鲜战争增加武器生产。这一行为最终被法院裁决为违法。我举这个例子,是想鼓励我们对产权关系看得更广一些,把它视为具有某些特性的手段。20世纪的经验表明,企业也许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实行国有制,或者是实行私有制。但是,从原则上讲,除私有制外,很可能还有别的制度,它们既能像私有制一样形成竞争,防止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同时还具有更好的分配性质。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私有制对立物的那种产权关系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的事实并没有使选择

的问题得到解决。

六、一种带有股票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一部分里,我要简略地勾画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中有四个“法人”(36436 8)行为者,在他们之间将产生金融交易。第一是成年公民(908 84 263)。第二是国营企业(49 0 617),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们不是归国家直接所有的。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大企业(大致相当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司)都属于这个部分。第三是一批共同基金(1 989 0 92 7)。第四是国库(78 8 86 7963)。

每个成年公民都将获得国库赠予的等量的证券(394327)。只有用证券才能购买共同基金的股份(7 6 7 3 1989 0 92 7),而不能用金钱购买。只有共同基金才能用证券购买国营企业的股票。因此,公司股票(36436 8 7 6 7)和共同基金的价格是由证券来表示的,随着股票的供求关系而波动。公民可以自由出卖其共同基金股份来换取证券,再把证券投资于其他共同基金。最后,企业可以用证券与国库交换,获得投资基金,也可以用钱从国库那里购买证券。证券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兑换成钱。这些投资基金在企业中扮演着股本(59 83)的角色。

共同基金拥有了企业的股票,就可以获得企业的利润。公民拥有了共同基金的股份,就能获得共同基金的收益。公民去世后,其共同基金股份必须卖掉,证券的收入要交还国库,国库再向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赠予证券。

企业的投资资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银行贷款或由银行筹措

的公司债券),一是通过证券交易从国库获得。公民把积蓄存入银行。贷款的供求关系决定着利率,证券的供给和对国家投资基金的需求决定着国库内证券与投资基金的兑换率。国库的基金靠对公民征税(或靠征公司税和个人税)来筹集。

因此,证券体制意味着让每个公民在在世期间都有源源不断的收入(786 1 3 2 31),即让他对国家的“国营”企业有短暂的产权。每个公民只在活着时才有获得企业利润的权利。因为股票只能用证券购买,公民不能卖了证券去换钱,所以富有的公民拥有的股票一般不比贫穷的公民多,除非他们更了解投资机会。由于证券体制要求购买共同基金而不是个别企业的股票,所以贫富悬殊的状况将得到缓解。当然,有的公民最终会拥有比较有价值的共同基金有价证券(0 09 0 4368 3037),但是它们不能遗赠给子女,因为证券体制禁止共同基金股票的生前赠予。

由于两个原因,共同基金成了公民和企业之间的(强制性的)中介。第一个原因是家长式的,即保护公民,使之不要把国库赠予的证券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投资上。第二个原因是颇为微妙的。由于公民不能将自己的股票遗赠给子女,也不能卖钱,因此如果公民能够直接从企业那里购买(证券)股票,有些企业就容易发展成“现金牛”(7 31)。这些企业会廉价卖光其资产,把收益作为股息分给股东。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股票的(证券)价值将下降为零,但是,到那时候,股东已经用手中的股票牟取了收益,从而避开了国家对其所持证券征收百分之百遗产税的规定。这种现金牛很可能构成对资源的无效利用。当然,从原则上讲,无控制的共同基金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有的基金可能专门持有现金牛的股票。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控制共同基金,要求它们的所有者在年龄分布上要均衡。而要保持年龄分布的均

衡,就要求共同企业(1989 0 61) 不要只购买现金牛企业的股票。

股本和债务融资的存在,使企业能选择所希望的举债经营程度(6 3 0 0 6)。如果弄不到股本,而所有筹资活动又都通过银行进行,那么,利率可能要比在“类似的”资本主义情况下高一些,因为债务人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如同所设计的那样,企业股本制度中还有一个财富再分配的因素。因此可以假定,为国库筹措资金的税收是累进性的,尽管所有公民最初通过证券体制都掌握着等量的股本。

在均衡的情况下,证券总数等于公营部门股本的总证券价值(8 838 0 39432 0 09 3 59 83),因为没有哪个企业想持有证券(没有交易成本)。既然公民持有的股票的总证券价值(8 838 0 39432 0 09 3 783)也等于证券总数,我们就有了如下恒等式:股票总价值等于公营部门企业的总股本。

在证券经济中,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监督机构发挥着特殊作用。银行也是证券经济中的公共企业,它们的股票也能用共同基金购买。

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证券机制的目的是要在成年公民中非常平均地分配企业利润。利润的平均化分配对公害品的水平产生了影响,由于这种影响,证券制度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在以下两节中,我将研究这种影响,研究关于证券体制能带来资本主义企业所特有的竞争和创新的主张。

七、证券经济和平等的资本主义 经济的福利效果之比较

我在这一节中所描绘的模式不是对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完全描述。有几个问题并没有谈到,譬如国家的投资计划和企业监督问题。建立现在这个模式的目的是要分析一个问题,即公民福利水平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在出现产生利润的公害品(463 8-2-9 2 49 0 7)的情况下,由于企业产权界定方式的不同而产生的。

我将描述一种经济环境,一种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证券)政治经济机制均可以利用的经济环境。问题是要计算居民在每个机制达到均衡的情况下的福利状况。在这个环境中只生产一种公益品(33),所有的人都喜欢用。同时,也有一种公害品(49 0),譬如污染。人们可能把这种公害品看成是对每个企业生产函数(463 9 8 32 92 8 32)的投入,尽管实际上它是企业生产过程的一个连带产品,因为企业被许可“排放”的公害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它的生产水平——在其他投入(即物品本身 8 33 87 0)一定的情况下,许可排放的污染量越大,企业的产量越高。因此,企业用“投入”污染和物品生产着公益品(33)。

在这个经济环境中有许多公民,其中一小部分人最初是富有的,其他大部分人则处于中等或低等富裕水平,也就是说,最初时,

在英文中 33, 作为形容词有“有的,有益的”的意思,作为名词,有“好处,好东西”的意思。这里作者显然是在把它作为“坏”()的对立面来用的。——译者注

富人拥有大量的物品,中等富裕者拥有少量物品,穷人拥有的就更少了。所有公民在不同时间里的物品消费偏好都是相同的,对公害品亦是如此:效用在物品的消费中增加,在公害的消费中减少。害是“公害”,因为所有公民必须消费的害是相等的,即由企业“排放”的公害量对每个公民是一样的。这种经济环境中可能有许多企业,也有许多吸存放贷的银行。

在这个经济环境中,事情发生在三个相关的日期里,我们把它们称为0时、1时和2时。物品的消费发生在0时和2时,公害品的生产和消费发生在2时。这样,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可以用 (x_0, x_2, y_2) 来表示,其中 x_0 代表0时的物品消费, x_2 代表2时的消费, y_2 代表2时的公害品消费。在这个经济环境中存在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下述形式,即2时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外部情况(78 8 7 3 8 1360)。它们是由应当被看成是模式以外发生的事件造成的。问题在于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取决于外部情况。譬如,外部情况可能是天气,因为天气可以影响企业生产,农场的情况就是如此。又譬如,投资者可能拿不准2时将发生什么样的技术变化。假设所有公民在0时就知道2时将要出现的所有外部情况。每个公民在0时不仅拥有表现其贫富程度的一定量的物品,而且拥有一样多的该经济环境中每个企业的股票。每个公民都要在0时作出关于消费和投资的决定,其确切的性质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公民在1时投票决定允许企业排放的污染量。2时出现了一种外部情况,之后生产开始进行,每个企业排放出1时投票决定的污染量。根据公民0时作出的投资决策,企业的产品被分配给公民,并被他们消费掉。

现在让我们在这种经济环境中采用资本主义经济机制。0时存在着股票市场。最初人们拥有等量的所有企业的股票,现在他们可以交易这些股票,股票价格是由物品单位表示的。因此,人们可以在0时用赠予他的股票和物品进行交易,购买有价证券(

4368 303 3 783)。他还要决定把得到的赠予多少用于0 时的消费,多少以现行利率存入银行(反之,他也可以从银行借钱)。他还要在企业的总投资(这是其物品投入)中投入一份,其数额与他所购买的股票的数额相等。在1 时进行了投票,确定了公害排放量之后,在2 时外部情况显露和生产开始之后,公民从每个企业得到一份产品,其数量与他所购买的企业股票量相等。他还得到了他在0 时存入银行的本金加利息(反之,他要支付借款的本金加利息)。这样,如果公民在0 时可以预见到1 时的投票结果,并且清楚每个企业的股票的价格和利率,他们就能选择一种使其预期,即在考虑到2 时可能出现的各种外部情况后作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 的 有价证券和消费计划。这种最优化选择对每个人是一样的,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形式当然可能有所不同。

一个企业怎样选择自己的投资水平呢?也就是说,它在2 时用多大的投入进行生产呢?在每个企业的投资水平达到均衡的情况下,公民购买企业股票的量是不一样的。企业董事会将由三种股东代表组成,但投票权与其所拥有的股票额不一定要相称。企业的投资选择必须由董事会决定,但是董事会要遵守它为解决其政治问题所制定的某种规则。譬如,投资选择可能是对董事会中的中等股票持有者来说最优的选择。

最后,我们必须规定人们在1 时怎样对公害水平投票。假定人们在0 时已确定了投资和消费选择,每个人都对公害提出了某种最优水平的排放量。(在这种经济中,只有三类水平,一种是对穷人最优的公害水平,一种是对中等收入者最优的公害水平,一种是对富人最优的公害水平)。请注意,在企业投资选择已定的情况下,增加企业2 时的公害排放量可以增加企业的产量,而且因此将增加每个公民2 时的物品消费;但是,另一方面,增加公害水平也会直接减少每个公民的效益。总的来说,每一类公民都有各自的使这种交换最优化的公害量排放水平。

用一种简单的投票理论规定,投票结果是中间投票者所偏爱的公害水平,就我所选定的参数而言,他们是中等收入投票者。我假定,而且是比较现实地假定,政治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以致三个收入阶层都对公害水平的确定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提出有关这一过程的成熟理论,我将走一条捷径,即简单地规定,投票结果将使穷人、中等收入者和富人的效益的某种加权平均数最大化,我把这个平均数中所采用的权数(1 87)确定为这一政治过程的特征。

现在,我们准备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的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就是一组0 时每个企业股票的价格和利率,0 时每个公民对有价值证券和消费的选择,每个企业的投资总量和公害量,结果:(1) 在这种公害水平上,在这些价格和利率水平上,而且每个企业的投资选择已定,那么每个公民0 时的消费和有价值证券选择将使其预期效益最大化;(2) 在每个公民的有价值证券选择和公害水平已定的情况下,董事会通过我在此不能确切描述的内部政治过程为企业确定了一种投资水平;(3) 在每个人的有价值证券选择已定的情况下,公害水平是1 时政治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使富人、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效益的适当加权平均数最大化);(4) 0 时银行吸收的总存款和放出的总贷款数额是相等的。

在对代理人(287) 的偏好和企业生产函数作出适当限制之后,就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状态,而且我们能够根据具体的生产函数选择来计算这种均衡。

接下来我描述一下证券政治经济机制。它和资本主义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特征是不同的:即在证券机制下,股票不能用物品只能用证券来购买。具体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如前所述,每个公民在开始时被赠予一份物品,譬如说1000 张证券,企业股票的价格只能用证券来表示。用证券换物品是非法的,个人只能用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也只能用卖股票去换证券。这样每个消费有两种预算约束,一个是物品的约束,一个是证券的约束。证券预算约束规

定,一个人购买的股票在价值上不能超过1000张证券。物品预算规定, t_0 时的总消费与 t_0 时的储蓄和个人选定的以有价证券形式用于企业投资的物品总量相加,其总和不能超过一个人最初被赠予的物品的总量。

其他一切和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的描述一样。我们现在可以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均衡,它包括,一组 t_0 时每个企业股票(现在由证券来表示其价值)的价格和利率, t_0 时每个公民对有价证券和消费的选择,每个企业的投资量和公害量。这样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定义中所阐述的(1)至(4)项条件都满足了。这里唯一的区别是,股票价格是由证券表示的,而不是由物品单位表示的。在对偏好和生产函数加以适当限制之后,就出现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均衡状态,而且,针对有关生产函数的具体选择,均衡是可以计算的。

因此,从原则上讲,人们可以计算富人、中等收入者和穷人在两种政治经济均衡状态中的预期效益。我下面将谈到这些计算的某些情况。但是,首先请允许我从质上推测人们可能预料到的在两种机制下政治经济选择中的某种差异。人们应当预料到在资本主义机制下会发生的一个情况,那就是穷人,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中等收入者,会把初始时被赠予的企业股票大量卖给富人,后者则给他们物品,而穷人和这些中等收入者在 t_0 时将消费掉这些物品。这将使股票所有权集中在富人手中,并由此造成两个后果:第一,富人将在大多数企业组成支配集团,使企业的投资选择符合他们的利益;第二,因为他们拥有大部分企业股票,他们对增加公害排放量的兴趣比穷人和中等收入者要大。但是,在证券经济中,富人被排除了购买所有企业的多数股权的可能性——因为股票只能用证券购买,而所有公民初始时被赠予的证券数额是一样的。因此,可以预料,在均衡状态下,由于中等收入者和穷人拥有社会中大多数股票,他们将支配大部分企业。这样,企业将选择符合中等收入

者和穷人利益的投资水平。此外,富人 α 时的消费量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来自企业的利润,因此,他们就不像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那样热衷于增加公害排放量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推测,因为一般均衡的结果可能是十分复杂的。要确定什么样的福利效应处于均衡状态,唯一的方法是证明一个定理或进行某种计算。我在这里没有一般定理,但是我要报告表1中的某些计算结果。

表1显示了在这个经济环境中,对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均衡的计算结果, α 的值在0和1之间变动, α 代表着在决定政治结果(和公害水平)的过程中富人效益的权数($\alpha = 0.8$), $(1 - \alpha)/2$ 则代表着穷人和中等收入者的权数。表1显示了两种机制政治经济均衡的三个方面:公害水平、两个模式的效益、企业投资水平。首先,请注意,就 α 的所有价值而言,穷人和中等收入者在证券经济下比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要过得好一些,而富人在证券经济下比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要过得糟一些。第二,请注意,在证券经济下,公害水平始终是比较低的——所以证券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两种经济机制在同一环境中的差别是实质性的。在 $\alpha = 0.24$ 时(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值),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污染”水平比市场社会主义高50%。第三,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投资水平始终比较高。

总的来说,市场社会主义机制防止了“搭便车”(6-6-6)问题的出现,这是在资本主义机制下令穷人和中等收入者头痛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每个穷人和中等收入者个人而言,把他们拥有的企业股票大量卖给富人是最佳选择,但是,这也就造就了一个富人阶级,他们控制了企业,其收入依企业的利润而定。富人开始控制了企业,而且通过他们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公害水平的

提高将接踵而来。在市场社会主义中,穷人和中等收入者不能用股票去换钱,因此他们在股东中仍占据着支配地位。同时富人 also 变成了一支要求降低公害水平的力量。这些变化的最后结果(2 8 88 8)从理论上说是不容易预测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是在一个例子中,穷人和中等收入者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最终会过得好起来,而且这个制度是绿色的。

最后,对这些结果作几句评论。在现实生活中建立证券股票市场有一个好处,即防止穷人把他们的股票过早地卖给富人。人们担心会发生这种情况,譬如说,像前共产主义经济所做的那样,实行企业私有化,把股票分配给全体公民,然后开办完全自由的股票市场。这种过早将股票变成现金的情况在证券经济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那里证券不能交换成现金。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机制下,如果穷人对2 时发生各种外部情况的可能性了解得比富人少,这种情况倒是尤其可能会出现。指出下面一点很重要,在表1 报告的均衡模式中,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在这个模式中,行为者都具有同等的知识和理性水平。因此,人们可以预料到,在现实生活中,穷人在两种机制下的效益差别将会比表1 大得多。

(载美国《政治与社会》杂志1994 年第22 卷第4 期)

张文成 译

告别社会主义模式

[卢森堡 安·霍夫曼

从近况来看,还很难断定我们是否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局势将向何处发展。

“现实社会主义”的终结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还不是全部。

长期以来,无论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都信奉的信条,譬如相信进步意味着无限的、理所当然的、走向共同富裕的增长,已受到怀疑。

法国“调节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福特主义协商”的时代已告终结。借助于多种形式的社会调节所促成的大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受到重大干扰,而恰好是这种平衡保证了30年来大致均衡的增长。现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开始了。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结构性危机,从中即使不出现这种“社会主义,也会出现社会调节的新形式。至于到底会出现何种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力量对比。

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如恢复到“前福特主义”状态)不是解决问

题的办法,相反会激化各种社会、经济矛盾:使社会分化加剧,失业增加,增长与就业脱节,并因此使生产与销售失调,引起南北分化,经济危机……

人们本来指望左派值此变革时期能够特别有所作为,用观念和建议,用政治行动和社会声势来影响发展方向。然而,自70年代以来,左派已处于守势,无法组织起反对力量,更谈不上建立一种反对性的统治力量了。

既非“民主社会主义”亦非“社会主义民主”

传统社会主义左派的两大派别自本世纪初分化以来,都没有实现他们当初提出的目标。

“共产主义”派别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成为民主,而只是一幅社会主义的讽刺画。

共产党人虽然经过艰苦奋斗促使资本主义在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让步,他们从未放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在本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也由于过久地参与了把“现实社会主义”演变为极权主义制度,或者没有无情地对这种现象进行充分的批判和分析,而失去了威信。各共产党因巩固了非民主的社会制度和采取教条式的作风,而错误地估计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并阻碍了党内外的政治争论。

社会民主党左派固然对资本主义从社会福利国家方面进行了约束,但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国家本身也十分缺乏民主,因为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市场的占统治地位

的原则的制约。

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安德烈·高兹写道：“市民不是社会福利国家的行为主体。作为受救助者，作为纳税人，他们是受管理者，是客体；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同市民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表明市场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漏洞的原因依然存在。”高兹认为，社会福利国家非但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它本身也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产生的，“就像一个必要的框架，保护市场经济免遭全面崩溃”。

因此，“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消解：“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经济合理性从属于社会目标的话，社会主义的问题将依然存在下去，这些社会目标是人人都想实现并且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的，是人们休戚与共的基础。”

左派自身也在转变，但转变得很困难。几乎可以这样说，在口头激进主义与机会主义或听天由命的观念之间似乎不再存在选择的余地，两者都或多或少有其理论基础，都同样不能或不愿意改变和塑造社会关系。

那些尚能提出不仅要管理、而且要改变社会关系的左派，只有彻底放弃他们所喜爱的陈旧理论观点和实际作法，才能变得主动。

譬如这样一些观念：历史必然性必将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并导致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一个团结一致的社会阶级将作为历史主体，在革命变革中实现历史必然性，之后按事先知道的“模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能够自发地保障生产力的无限增长、民主和个人发展的社会制度。

安德烈·高兹《劳动的演变》1988年巴黎版第227页。

同上，第166、167页。

同上，第166、167页。

放弃历史目的论

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坚持决定论的传统,把马克思视为“历史意义”的发现者和必然的历史或经济规律的发现者。这种决定论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每当我读到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必定灭亡、或者必然导致生态环境崩溃这类语句的时候,我不相信这种决定论是有说服力的。

是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这种决定论出自马克思本人吗?譬如科·卡斯托里亚迪斯就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的、经济的规律与人的活动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或者的确有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活动,或顶多有作为技术的活动;或者人的确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那么,理论工作的任务就不是发现‘规律’,而是阐明活动得以开展和受到限制的条件,以及可以提示活动的规则性的东西,等等”。在他看来,承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错误的,正是这种错误观念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葛兰西早就拒绝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决定论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会把实践哲学还原为社会学,从而把世界观贬低为机械论信条,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全部历史就装在我们的口袋里一样。

然而,卡斯托里亚迪斯把“规律”同人的活动截然对立起来的作法是成问题的。难以设想,如果没有“规律”概念作为依据,我们如何解释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定义规律概

念和考察的方法,如何把自然规律同社会规律区别开来,如何把社会规律同哲学上所谓“历史的意义”等界定开来。

法国学者密歇尔·瓦岱在其新著《马克思,可能的思想家》中建议阅读马克思的非决定论著作,但不要完全放弃“规律”和“必然性”概念。

瓦岱写道,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活动和条件两个方面都是存在的……活动与条件的关系是辩证的。忽视前者而强调后者,只能导致无法克服的机械决定论的错误观念,导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瓦岱认为,支配着人的“必然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异化”,是能够并且应当克服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自然的和必然的方面,这是因为它们的贯彻方式同自然规律有相似之处;二是同样重要的非自然的和非必然的方面,因为它们是有历史的、暂时的。”

瓦岱得出结论,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不是必然性的思想,而是自由的思想:“马克思的全部思想在于论述自由的观念……所谓自由,是一种具体的自由,是通过人在历史中的实践活动实现的自由……自由与其说是被认识、被发现的,勿宁说是被赢得的。自由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前提。”

密·瓦岱《马克思,可能的思想家》1992年巴黎版第104、51页。

同上。

同上,第449页。

寻找主体

谁是社会解放的承担者？

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左派看来,历史变化的主体是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它以改良或革命的方式实现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它要受其政党的教育和引导,并且只有通过政党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

姑且不论这种目的论历史哲学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工人阶级”已不存在。工薪者的人数固然增长了,但传统产业工人的人数却急剧萎缩。劳动条件、生活方式、“雇员”的需求都发生了分化和个体化。在这里,非物质性的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工作岗位上和工作岗位之外的个人发展,社会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财富,参与决定权,“生活质量”,用于个人发展的时间等。尽管文化工业和休闲工业已为这些需要服务,但对它们仍要认真对待。然而,应注意不要忽视基本的物质需要(工作、收入、住宅)和问题(社会不平等、贫困化和分化)。

资本势力、新自由主义派和保守党人主张差别化、分化,以保证“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力量对比有利于他们。他们主张:以低工资雇佣临时工,增加机器运转时间,实行企业劳资标准差别化以削弱工会影响,有选择地吸收个别雇员进入类似质量小组的企业组织以抵制参与决定权,等等。

与此相对的是,左派的传统作法(阶级斗争或阶级团结)已失去效力,或者只还有很小的影响。因此,必须在考虑到客体分化和个体化这种社会发展状况的情况下,找到并实现关于团结互助、共

同管理、共同规划社会发展的新方案(同时不落入自由主义的陷阱)。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批判“现代性”,从中重新定义主体概念,把它同社会历史功能区别开来,而现代派(尤其是在其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中)则是把主体与社会历史功能等同看待的。

图雷纳认为,把“制度”和“行为者”等同(这种等同是现代派的标志)起来,已经过时了。主体的本质恰好在于拒绝社会的和历史的认同,一再避开制度(市场、消费、国家、民族、阶级……),但它不是自我封闭,而是积极地致力于实现社会目标,不过,不是在“阶级斗争”(它也是制度)中,而是在“社会运动”中。

“同社会角色的疏远,社会化的局限,社会功能和个人生活目标的分歧,是表明我们已经远离社会一体化的旧观念和人作为市民的希腊模式的重要事实。我们的现代社会努力维护这种模式,或者把它更新(把人叫做劳动者而不是市民),但是,实际情形却越走越远,主体的命题越来越直接地与拒绝制度及其组织和权力逻辑联系在一起,正如安·高兹和乌·贝克明确论述过的那样。

我们不能撇开自己的根本主张:主体是一种社会运动。主体并不形成于自我意识中,而是形成于反对反主体、反对制度逻辑的斗争中,尤其是当这些制度成为文化工业,进而追逐集权目标的时候。主体是拒绝、反叛的表现,这种表现创造主体。”

我认为,图雷纳是把人与市民截然对立起来,忽视了具体社会、经济形态下现实利益对立和不平等的现实。

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即贬低个人,过分强调阶级、群众、政党的概念,推崇制度对个人及其思想的现实统治。因此,我认为实际上迫切需要关注另一个方向,即强调个人主体的(相对)自治、他的

权力、他的责任,应当胜过强调现实条件、伦理范畴和社会目标。

有了一个新的主体概念之后,左派既可以更好地对付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又可以把“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合理论断应用于自己的社会解放目标,具体地改变“市民社会”的说法。图雷纳关于在社会运动中组织和运用个人主体反对市场、权力和意识形态制度的观点,值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批判地)吸取。

告 别 模 式

“现实社会主义”瓦解以后,部分左派(包括那些批判这种模式无法实现的人)心疼“模式”的丧失,并一再思考如何确立新模式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失”是一种得。我们应该彻底放弃这样一种观念,即必须确立一种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善的模式。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这就明显地排除了一个完善的社会模式。此外,从“社会模式”本身从未生长出什么,现实的发展往往是另外的样子。在过去,初始设想只是被滥用来证明反面的东西的政治合法性。

我们还必须放弃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只要现有的“整体”还没有屈从于一个新的“整体”,社会解放目标就无法实现,新的“整体”只能在较短历史时期内的革命行动中生长出来,其他方式都是改良主义。

马克思曾谈到“社会革命时代”,其意思显然是指深刻的社会变化,比如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只能缓慢地进行。

政治革命则相反,它不依赖于社会革命,也不应该同社会革命相混淆。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革命无法预见,而事情本来也应该

是这样的吧？

因此，必须承认，实现社会平等、解放以及民主制度的目标，只能借助于艰苦的、彻底的改革过程，借助于（葛兰西所说的）“长时期的阵地战”，阵地要逐个占领，它们也可能得而复失。我们需要社会变革的目标作为“脚本”，而不是作为“模式”。

在这里，我们应该克服极端的选言式思维（不是……就是……；不是计划就是市场，不是改良就是革命，等等）。这种思维方式无法适应复杂和经常矛盾着的现实，反而会导致虚假的单向因果性解释和片面的选择，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使富有成效的合作难以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封闭式的理论、一些政党的“科学”世界观等等不复存在，我们终于能够抛弃引导别人认识绝对真理的狂热，做到在各抒己见的气氛中，通过平心静气地交流观点和建议来探求和利用社会变化的可能性。

具体的分析、论证和建议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在工会组织中。马克思本人也曾经从理论的天国降落到尘世，要求实行累进税和八小时工作制，此后又称赞劳动日的缩短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经济学”对“资本经济学”的胜利，而不是把它贬低为卑劣的改良主义。

市 场 经 济

反对权力机器的机制，不是说要废除国家；同样，反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也不是说要废除市场（并通过计划经济代替它）。

哪里有劳动分工，哪里就有市场存在。今天能够设想废除市

场吗？

我认为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矛盾在这里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能否和如何限制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如何使市场服从其他社会的调节因素。

所谓“马克思主义”派倾向于拒绝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党人则屈服于市场经济。双方都把目光对准国家：一方把国家视为社会的财产所有者和中央计划机关，另一方则把国家当成克服市场弊端的良医（社会福利国家）。

法共经济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菲利浦·埃尔佐格在其与法国左派经济学家合著的文集中写道：“共产党倾向于预算管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声称实行左派政策，实际上却滥用委托于他们的权力，屈从于资本主义市场模式……如果人们最终真正明白市场是一项成就，就会看到，这不是说对市场可以不加限制，对其弊端可以不予克服。除了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外，市场还可以通过别的手段加以调节。”

埃尔佐格与高兹不同，他没有放弃人在劳动中获得解放的观念。

高兹解释了“劳动中人道主义的终结”：异化的劳动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分化无法克服；劳动分工无法消除；劳动领域仍然是充满异已统治的领域，是“各种专业化活动的通称，这些活动把个人贬低为由外界、由现有组织所规定的功能”。在这样的劳动领域中谈不到自治，顶多对少数有特权的雇员是例外。这种“经济合理性”促使社会发生分化，使一些人成为特权雇员，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失业或成为无固定职业的临时雇工。对这种“经济合理性”只能

见安·高龙、菲·埃尔佐格等合著的文集《经济变化》1992年巴黎版中埃尔佐格的文章。

安德烈·高兹《劳动的演变》第49页。

从外部加以控制,借助于社会调节,使人人都有工作,也使人人都有了一份与工作无关的基本收入。

因此,高兹所说的解放是指摆脱劳动束缚的解放,而不是在劳动过程中的解放。虽然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只存在于劳动之外,但是,在“必然王国”,即劳动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而高兹认为这恰好是不可能的。

相反,埃尔佐格确信在经济领域(劳动)内部能够实现自治:劳动者应借助于一些经济活动的新规范干预经济过程。“这些新规范因雇员参与企业管理而被采用,不是旨在废除市场,而是旨在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而在社会、生产和生态方面提出新的目标。而利润准则和利润率则是以人的创造性和环境为代价来增加利润和资本积累的。”

从新的“混合经济”的意义上说,企业中的“自治”只是多种层次的调节因素之一。“把自治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是可能的。雇员和市民可以在企业和地区执行他们的计划,监督资金的使用,但这要以改革制度(实行真正的放权)、重新划分决策权为前提。与这种民主进步相联系,人们必须设想一种新的国家,它在税收、财政、银行等方面都实行改革。目的在于,在规范多元性共存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混合经济组织……调节经济要在多种层次上进行:企业、城市、地区、国家、欧洲。在所有这些层次上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必要的。”

埃尔佐格确信,今天单独在一个国家实行调节不易奏效,因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6—927页。

安·高龙、菲·埃尔佐格等合著《经济变化》第61页。

同上,第61—62页。

必须也在国际上、至少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调节。

在我看来,社会调节的目标一般来说必须是提高人的能力、保护环境和实行社会再分配:收入和购买力再分配,消除不平等;“劳动”再分配(人人都有机会从事素质要求高的工作),对妇女有利的再分配,世界经济中对“第三世界”有利的资源再分配,以及从上到下、从权力机关到普通公民、从企业集团核心到一般雇员的权力再分配,等等。

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

或许可以设想另外一种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它不以废除市场制度为标志,而以不同的民主调节形式、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和以民主方式管理社会的新制度为标志。

1990年,《当代马克思》杂志在巴黎索邦大学组织了一次国际讨论会,议题是“共产主义终结了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何在?”雅克·泰克西耶在会议论文中写道:“现代社会的后资本主义特征及其或多或少的社会主义特征,不取决于市场制度的继续存在,也不取决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而是一方面取决于联合起来的个体对生产条件的真正监督,另一方面,也是基本的方面,取决于社会上全体市民在何种程度上支配那些控制着大量财力资源以及经济趋向的公共权力机构。”

雅克·比岱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试图借助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理论定义“社会主义”,认为“曾经是自由主义基本纲领的

‘社会契约’,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主线”。

在比岱看来,现代性是以三个层面上的协约关系为标志的:一是个体间关系的层面(市场);二是集中的层面(国家,计划);三是联合的层面(工会等)。个体间关系与集中的矛盾是现代性的对立面。片面强调个体间关系层面会促成市场资本主义,反之,片面强调集中层面则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克服这种矛盾。“问题在于创立自由而平等地共同支配计划和市场的方式”,即一种公开讨论和监督的制度,一种民主管理公共领域、约束国家和市场的形式。“体现了平等自由的正义原则的契约制社会主义,把这样一种观点定义为左派的观点,即主张通过对可防止任何形式的没收的过程,不论是市场过程还是集中过程,实行共同支配,把权力交给多数。”

这不就是马克思在论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就自信已经发现了的那种东西的现代形式吗?“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社会解放的要求以及作为其政治形式的彻底民主化的要求,仍然是欧洲左派所关心的极为现实的和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只是这些要求必须适应现代的关系和可能性,充实具体的内容,并转化为新的社会行动。

(载德国《马克思主义革新杂志》1993年16期
柴方国译)

雅克·比岱《论现代性》1990年巴黎版第17、144页。

同上,第17、144页。

同上,第30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95页。

市场的社会化

[英 迪·艾尔逊

我的这篇文章 主要是想探索一种能够同时替代亚历克·诺夫的复合经济和欧内斯特·芒德尔的无价格经济的内容。我在文章中提出的许多建议主要取决于我的现实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坚定的信念。文章第一次被翻译发表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改变,而在将来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

迪安·艾尔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新左派评论》杂志编辑部成员。

这篇文章是题为《社会化市场还是市场的社会?》一文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亚历克·诺夫和欧内斯特·芒德尔的论点之争。原文曾在《新左派评论》1988年11月至12月第172期中发表,并在《共产主义评论》中用法文转载。1993年作者又在原文的基础上重写。——译者注

这篇文章重写应主要归因于迈克尔·巴勒特·布朗的评论。

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关于经济的社会构成问题的争论通常始于企业的所有制形式问题。而所有制主要通过它对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所产生的影响而显示出重要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制同生存手段分离。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一个受资本积累过程制约的因变量。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基本对立使作为劳动力卖主和买主的家庭和企业相互对立。这种局面应改变,以使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成为一个资本积累过程应服从的自变量。

为此,应使每个家庭拥有收入而无需被迫(包括向国家企业)出卖劳动力。总之,应确保它们有不错的生活水平,这样它们才能在出卖劳动力问题上有真正的选择,而不是被迫而为之……

在工业经济中,家庭的自由选择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方面,有关保健、卫生、教育、用水等基础服务部门提供免费服务;另一方面,保证每个公民拥有符合简单生活条件,可满足吃、穿、住和家庭设备基本开支的货币收入。

主张保健和教育部门实行免费服务的论据,主要依据这些部门的特性(相互依赖性和外在性)。此外,人们还将会为城市交通等其他部门的免费服务问题进行辩护。由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赞同有关这些方面的主张,我们也就不再对此做详细探讨了。但我想补充谈一谈有关免费进入信息网络问题,它具体涉及印刷装置、电话、影印机、传真机、计算机等。正如将来会出现的情况一样,市场社会化的条件之一就是免费地、平等地存取信息。信息的传播是合作、信任和互利关系的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但这并非说

每个家庭本身都要配备计算机、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电话或抛物天线,而是假定每一户家庭能够在与学校和医院相同条件下使用这类装置。

为使这些免费服务满足每一户家庭的需要,而不是只满足那些提供这些服务的家庭的需要,应确立作为家庭代表的形式。在西欧某些国家(例如英国社会健康委员会),已初步具有了这类代表的形式,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权力。

根据诺夫在有关芒德尔的主张的争论中提出的理由,基本收入的其他组成部分将不会免费提供,但将以一定数额的钱作为补偿。目前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中保障收入的意义文章越来越多,对此我就不详谈了。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如果大家都受益于可使他们不必再出卖劳动力的最低收入,那么如何保证以这种得到保障的收入购买的商品能够实际被生产出来呢?第一个回答是,大多数人希望消费超出最低收入所允许的范围(能消费牛排和酒而不是小扁豆和水),于是他们就会十分高兴地出卖劳动力,以得到更高收入。另一个回答是,人们用自己的钱购买生产资料,或建立家庭企业,或与其他家庭组建合作社。另一个更进一步的回答是,如果人们要想使实际购买力与得到保障的收入相吻合,就要充分意识到公众利益,因而明确应为生产作出贡献。但是这一观点由于受到“蹭车者”反对而搁浅。这些“蹭车者”认为人们不会产生这种社会意识。很明显,许多人都依赖于这种使收入得到保障的形势,这里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以收入受到保障的资本主义取代“福利国家”的资本主

参见范·德·维恩和帕里斯、奥林·赖特、诺夫和埃尔斯特的文章,载于《社会理论》1986年第14卷第5期。同时参见德·珀迪《工资论》1988年伦敦版。

义,连同它的生产方式。这个保障收入的资本主义应被看作是更广泛的社会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必须以取消资本为先决条件。

我将提出一个涉及“蹭车者”问题的建议。“蹭车者”同样认为使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无报酬劳动社会化作出贡献的益处。我的建议是,对保障收入立法,而作为补偿,就业的成年人有义务进行涉及个人福利的无报酬劳动。除了已在照顾小孩、老人、病人或残废者的人之外,所有其他人也都应从事这一无报酬的集体服务,如照顾有生理缺陷的儿童,以减轻经常从事这一工作者的负担。家庭及其他无报酬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一直是社会主义女权论者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她们似乎过于强调使家务劳动进入托儿所、养老院、精神病医院、饭店和集体洗衣店的必要性。所有这些设施显然都有它们的作用,但它们却使独立的私生活、属于自己的卧室、邻里关系被过于否定。我不想缩小家庭生活的范围,而想使在家里照顾其他人的劳动被社会承认。我主张的结构同样要改变在这类劳动中的性别之分,即男人应掌握通常属于妇女绝对权限之内的、照顾他人的必要技能。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公民都受益于个人收入得到保障这一事实将会大大有助于减轻妇女和儿童对男人的依赖……

某些家庭将会选择建立私人企业,或同其他家庭联合建立合作社并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是这些活动的范围可能不会很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将会选择在国营企业中作为雇佣者进行劳动。随着这一义务的消失,劳动力买方和卖方之间对立的基本理由将同时不复存在。即使如此,在经济环境改变了的情况下,在工资、劳动组织和劳力分配方面仍会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使劳动力成为自变量意味着,即使机器和原料是以金额形

式体现在企业账本上,劳动力也不应被看作是与同质资产。

自治的公营企业

它意味着公营企业是自治(工人管理)的,其工人的“就业权利”得到承认,工人的基本工资根据“社会化”劳动市场而定。所谓自治,就是说一个企业在劳动力方面的总开支将不再简单地被看作是应压缩至最低限度的开支。这可能会引起一些有关这类体制“无效率”和它无能力进行改革的反对意见。但是,如果自治的企业能够把其一部分生产增益用于对空闲时间或工人收入方面的开支的补充,那么它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寻求一种更好的、可减轻劳动力方面开支的结构。此外,自治的企业还将负有这样的使命,即寻求其他的降低劳动成本的办法,而不是求助于提高危害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劳动强度或裁员。后者会使人产生一种效率提高的幻觉,但这只能是一种片面的措施,因为在进一步满足家庭作为买主的需要的同时,却降低了它们作为劳动力出售者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

如果自治的公营企业工人不能独立地支配企业资产,他们就不会拥有与合作社工人同样的监督地位。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各个部的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强制性地作出有关这些方面的某些限制。无需多说读者就能明了消除这一现象的必要性。我主张这些部由公营企业监督局代替,其作用将不再是制定企业生产目标和规定其运行方式,而是使人们遵守在公债使用上民主确定的一些方针,如使工人不能把企业资产归于他们自己或其合伙人所有。作为共同体的代表,监督局拥有对企业的产权。企业工人将行使

规章规定的权利。而资本市场、公开出价收购和破产这些现象将不再会出现。企业调整属监督局权限。工人享有盈余的权利受到限制,而作为补偿,他们将以工资形式得到一部分可观的酬劳,并同时得到根据个人、班组或企业的不同业绩而分类的生产奖励。除了生产提供免费服务项目的企业外,所有企业都要在“社会化”市场上购买它们所需的材料和设备,销售它们的产品。它们的活动应限制在配备齐全的检查团要人们遵守的,有关环境、保健、安全与保护消费者的严格规定的范围内。除了那些生产免费产品的企业是以税收为其资金来源外,其他企业一般都应在自筹资金基础上运行。

鼓励创建新的企业。工人班组可求助于监督局,以获准建立企业,并作为股份持有者得到相应的公债。在某些企业,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制度,即工人班组为一段时间内公用设备的管理进行投标。在这种制度内,任何公众监督的形式和权力下放的举措却将会有其位置。

当企业不再能承受其重负,因而不得不重新改组的时候,国营企业监督局有责任进行干预。非但一个人都不解雇,相反,监督局还要帮助该企业制定使其工人向其他企业类似的岗位,向培训或新的职业转移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下,工人们将受益于规定的权利,并可采取一些法律上的行动,使这些权利得到尊重。国营企业监督局将向这种转移调整提供必需的资金,但如果工人只想依靠补助金生活,监督局也同样有权停止提供资金。

我现在谈谈实现真正自治的企业内部所必需的程序问题。在企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工作内容之间仍存在着很大技术差别的情况下,每个人不可能发挥相同的作用,重要的是应尽力减少那些从事

关于国营部门组织形式改革的深入讨论,参见 . 默里《所有制、控制与市场》,载《新左派评论》1987年7—8月第164期。

辅助性工作、技能较低者的不利条件。另外,建立所有劳动者都能进入的、公开的信息网络是十分必要的。而知道如何利用信息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缺乏透明度,所以各不同工人组织如果想要更好地提出他们的要求,并在企业调整过程中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利,就应选出自己的代表。而在决定权集中在少数决策者手里的不稳定的环境中,透明度也是不够的。另外,工人自治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平均主义表现形式还会对企业间的关系产生一些影响。实际上,不可能存在一种在企业内部公开的信息系统,也不可能对其他企业保密。而一个在企业间完全公开的信息系统,即是社会化市场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有助于稳定企业环境、使买主与卖主之间建立牢固联系的关系因素。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化市场将更适合工业民主,而不是一些单独由企业建立的市场。

社会化市场

这一章将从社会化市场的几个总的特征开始,然后再较为具体地探讨社会化市场如何在劳动力、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方面发挥作用。社会化市场是一个公众介入的市场,它的资金来源于企业和家庭所缴纳的税。在这样的市场上,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无形的手”、融洽与和睦这类表现形式,将通过公开的信息网络形式表现出来。这些网络由一些秘书处控制,秘书处资金同样来源于税收,而不是靠出售它们的服务。

拥有公众干预者(我们称之为价格和工资委员会)的益处在于清除阻碍有关私人市场信息传播的障碍。奥地利学派曾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产生信息,但没有过分强调这一信息又是如何被

市场所粉碎的。一些企业力求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并通过交往联系重新实现了相互间的联合。它们欲掩盖其有关生产率、生产成本和改革方面的信息。市场的优点之一就是有利于各方面积极性的发挥,而缺点之一是有碍信息的综合。而社会化市场不但使各方面积极性都能发挥(这是使人获得解放的社会的特征之一),它还采取一些新的方法和鼓励措施,以使个人积极性为共同利益服务。

价格和工资委员会将履行三个基本职责。首先应对有关市场状况方面的信息交换给以必要的支持。这些支持在性质上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在贫穷的农业经济中,第一步是建立市场。在拥有微电脑的工业经济中,将建立电脑市场。电脑市场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处于无规则发展状态。而当它在今天遇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设备不能相互适应的问题时,公共电脑市场将通过各种设备的统一标准化而显示出它的巨大优势。一些重要的规模经济能够在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中实现。而一体化的电脑市场也将享有低廉成本。这样,企业和家庭都将会乐意利用这一公共电脑市场,因为这比他们利用自己的手段收集分散的信息要省钱。

价格和工资委员会应收集什么样的信息呢?应收集有关产品单价及其单价以外的信息。社会化市场的一些益处应归功于使价格形成机制透明这一事实。在工业市场经济中,大多数企业在确定它们的产品价格时,都把利润加到成本中,而成本与利润之间没有区分。价格委员会将收集有关产品成本的信息,以使公众能在成本与价格之间作出判断。企业会因提供这一信息而增加其费用吗?不会。因为企业为其内部管理需要已制作了这一信息。

价格委员会的第三个职责就是控制价格和工资的形成。当然,委员会不可能监督每一个合同和从“中心”控制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避开“中心”控制,进行“灰色”或“黑色”秘密交易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着。但是,委员会将提出价格和工资标准,并提供价格和

工资个别调整”所必需的信息,同时通过税法和合同制使工资和价格标准得到遵守,使违法行为得到追究。任何交易的价格和工资都要同标准进行比较。如果买主和卖主双方都想更快成交或进行上等品的交易,那么,他们可能会离开这个标准。但他们也可能通过要求有关委员会进行调查,而不完全偏离这个标准。如果很多买主和卖主都想脱离这个标准,那就说明这个标准应该修改了。价格的不易改变性是分散的工业经济短期内所表现出的特点,这里通过数量进行调节发挥着主要作用,如定货单的更改、存货的变动、生产构成的改变。而在更长时间内,由于价格对投资决定的影响,通过价格进行调节将具有其重要性。由于价格的这一不易改变性,委员会应在日常交易中的价格明确变更之前,做好还击准备,而不是追随交易,改变价格标准。为此,委员会应发挥反映有关库存和仓库容量使用率变化的信息的作用。价格标准的制定应以来自买主和卖主方面的有关信息为基础,通过协商来完成,而不是从“中央”对其作出强制性规定,而不考虑他们的需要。较先进的经济可建立电脑市场和电脑付款系统。公共电脑系统能把人们所签定的每份合同的所有内容都储存起来,这些信息将被处理,以鉴别所签定的合同与所要求的标准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仍是这样,较低的价格会促使买主和卖主使用这一系统。这样的付款自动化系统在资本主义工业国正处于发展中,但如同在电脑市场中的情况一样,它们遇到了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原成本价较高等问题。

买方与卖方信息网络对直接交换有关产品规格、制作方法和投资计划方面的信息感兴趣。通过这一网络,公众实现了对市场

通过电脑确定价格的思想存在于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但其价格形成的过程则不同于这里提出的过程。参见 . 兰格《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载于 . 诺夫和 . 纳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972年哈蒙兹沃思版《企鹅现代经济丛书》之一)。

的全面介入。这样的网络 既有别于官僚主义及其按章程行事的等级制度,也不同于以金钱为标准决定保持还是中止各种关系的市场。由于它拥有一些以公债作为资金来源和负责信息流通的秘书处,因而亦与企业间不拘形式的加工制造网状组织不一样。任何人只要履行了一定的最基本条件,都可免费加入这一网络。这些信息网络的主要关注点将不再是价格和成本,而是产品的总额、规格和制作方法。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但它将受到公共信息网络的限制。公共信息网络的调节者有权让你透露信息。买者与卖者信息网络将体现出各因素间存在着某些相互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通过对相互间影响的全面认识,将会作出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决定。

信息网络调节者像价格和工资委员会一样,其职责是方便信息流通,保证信息传播,同时还发挥(在这里)针对产品规格和制作方法的(同电脑)对话作用。应设想建立许多如涉及能源、交通、技能和消费资料等方面的信息网络。买方与卖方信息网络应主要针对存货、生产能力和技术规格方面的变化。而对于企业来说这并非是要它们制作会增加其额外开支的信息,而是要它们传播其自己本身也需要利用的信息……买方和卖方信息网络奠定了分散地具体制定计划的过程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在对每一个生产单位进行投资的计划实施前,都要把这一计划所产生的效果考虑在内。这些网络的秘书处将像制定全国经济战略的全国计划部门那样行事。而有关生产能力的使用和改革的决定权的下放,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总的经济规划都成为多余的。相反,必须有一总的方针,指出需要发展和进行调整的部门,决定投资和消费的方向与内容,最后确定可放松或需抓紧的生产薄弱环节。而这一战略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信息网络潜力的另一种探讨,参见迈克尔·巴勒特·布歇《信息论》(1988年,未公开发表)。

方针不是通过物质财富的集中分配和为每个企业确定生产目标来实行的。法国或日本战略计划经验最接近我的设想,但它们缺少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自由支配的一整套程序,而且它们所依靠的信息网络“如同过去”的商会网络,不是可以免费进入的网络。由于工资委员会和信息网络在劳动力、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所以将对它们分开进行研究。

劳动力市场

工资委员会的职能是收集有关职业供求方面的信息。当然,这对它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创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提供这些服务非常缺乏资金,以致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信息(这样就以赢利或非赢利目的,把一大块空间让给了私人职业介绍所)。特别是不能提供任何可使企业和工人确定劳动期限的有关劳动市场总的状况的可比较的信息。也没有可利用的有关工资确定方式的信息。

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工资委员会不能局限于处理有关可提供的职业的信息。它还应关注工作条件、酬劳、岗位状况和职业发展前景方面的信息。这类信息是人事部门一定要收集的。现在所缺少的,正是对这类信息的发布及委员会对其进行的处理。而一些微电脑完全能够很快地对求职者或招募者需要的数据进行综合。只要拥有必需的手段,工资委员会就不会再成为一个官僚主义阶层,因为它将要取代的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以突然的和秘密的方式提供这类信息的人。

工资委员会将促使人们遵守有关劳动合同的最基本的要求,禁止在社会化市场内提供不符合其标准的职业。它还要帮助制定

一些如体现同工同酬原则的工资标准或复杂劳动优于简单劳动的等级工资制度。这些当然应该立法,而同时,委员会还将支持最先进的企业发挥带动作用。

除了信息管理外,工资委员会还应为工资等级表和工资普遍提高而制定一些参考标准”。这将绝对有利于实现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和控制通货膨胀。从(民主选举的)总统到劳动熟练程度最低的工人,所有人的工资都要考虑在内,这是绝对重要的(我在这里假定不存在财产收入,而个人储蓄所得利息则另说)。由于每个人的最低收入将得到保证,因而那些从事技术性较低、单调或沉重工作的人的相对工资可能要高于今天的工资,因为没有人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

制定有关的工资标准要经过对岗位实行民主监督的发展过程,并且每年要接受一次审查。审查将把职业供求统计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考虑在内。制定工资普遍提高的标准要根据涉及投资和消费总水平和生产力提高的宏观经济情况来决定。要通过各种方式保证这一标准的实施,如坚持税法、统一合同、制定标准、公布违犯行为,特别是建立一种信任的气氛,这一气氛以透明的社会为基础,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价格都是在价格委员会确定价格标准后才形成的。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工资普遍提高标准的实施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增加工资制定机制的透明度。

在这种体制中,工会主要关心的将不再是有关工资的谈判。但是,为了赋予工会会员捍卫自己权利的各种手段,为了就有关生产的组织问题和税后可支配的盈余部分的使用问题进行谈判,为了在制定各种标准的过程中利用它们的经验,工会仍将会发挥与过去同样重要的作用。工会是一种劳动分工的表现形式。在分工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工会的作用也要变化。但是,只要工作内容存在重大差异,如某些工作是负责进行组织(“脑力劳动”),而另一些工作则限于对任务的执行(“体力劳动”),那么工会的主要任务就

是捍卫从事体力劳动者的利益。这一作用同时包含有罢工的权利及真正的组织上的独立性。

将不会再有被迫的失业,因为国营企业监督局将作为一个失去工作者持股公司发挥作用。它将付给失业者基本工资,向他们推荐组织和培训机构,直至找到工作。职业供求者(包括家庭和培训教育组织)之间的信息网络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以减少这类工作的费用,并通过收集有关就业结构与预测方面的信息,为制定有关劳动力方面的计划提供参考。许多信息网络将按不同的工作和技能建立。职业供求者都对技能的发展感兴趣。而这些信息网络将为培训劳动力,避免创立无发展前途的工作或培养过于受限制或过于特殊的技能提供参考依据。它们不去消除每个人拥有一份满意工作的愿望与企业必需保证自筹资金两者之间的冲突,而是提供这样的场所,在这里各种人都可以把他们有关对工人进行培养、教育和组织的设想进行比较。除了收集整理信息的工作,这些信息网络还有一项任务就是通过培训班进行经验交流,以及组织培训和教育中心同相关的委员会之间的人员交换……

生产资料市场

生产资料的购销使一些企业间建立了联系。没有理由认为企业在购销生产资料方面,在国营企业监督局规定的范围内,不能采取权力下放的举措,以便更好地控制生产中出现的波动和避免资产的浪费。对于价格委员会在负责保证有关市场情况信息流通方面的活动,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而在某些生产资料工业中经常出现的价格卡特尔化和价格协议的情况下,价格委员会有权让企

业透露其信息的职责则具有特殊重要性。我们能够相信企业会遵守财会准则和公开它们的产品的成本吗?它们不会建立两套账目(一套为价格委员会检查用,另一套为自己用)吗?因此,信息的质量问题是头等重要的。我们很清楚,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在集中调拨物资的体制内,企业未把与生产手段的需要直接有关的信息告知中央计划制定者。在这种体制内之所以存在着制造“假信息”的倾向,是因为制定计划机构既确定企业的生产目标,也向它提供相应的财力。这样,企业自然会夸大对其需要的估计,以便更容易实现其生产目标。是否存在着可能会导致高于或低于告知价格委员会的产品成本的机制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应研究一下价格标准的形成过程。

在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大多数企业通过把产品成本和利润率相加来确定价格标准,其中利润率随着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反应而变动。价格委员会也将确定一些相类似的价格标准,所不同的是以产品成本的平均数作为参考,而利润率将根据经济投资需要而变动。这样,计划所允许的投资率愈高,其利润率也愈高。而为了使那些规定要较快发展的企业得到更多盈余,使那些不需要快速增长的企业盈余较少,投资率在各企业高低不一。这是卡莱基所赞同的价格标准形成过程。它不同于兰格主张进行探讨的方法,即由于企业间赢利不同,价格标准不应以调节供求关系瞬间的变化为目的,而应推动与计划密切相关的经济调整。卡莱基所赞同的价格标准形成过程,同根据某些样品生产非统一标准产品(这在机电工业中经常遇到)时制定特殊价格标准的过程是相近的。价格标准每年检查一次,在两次检查之间保持稳定。这每年一次的检查将会弄清楚,产品成本的变化和需求的变化(通过库存显示),是否说明对价格标准的修改是必要的。产品成本比例的变化

反映在价格标准上。产品成本的变化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知道某一已知企业的生产水平是否应该提高、维持或降低。这一价格标准形成过程,在公众要了解制定价格标准的尺度和把实际价格同现行的价格标准进行比较方面是透明的。这将促使人们对其功效进行研究,因为价格标准依赖于平均的成本和利润率:一个成本低于平均数的企业将会有更大的盈余,因此会有更多资金供其支配,或用于企业发展,或使工人得到更多补助。这将限制大企业,使其不能为保证自己的利润而减少为其加工产品者应得的利润,也阻止了企业在其能力未充分发挥时,却仍想得到利润的倾向,以及不想降低价格或者说不想提高它们的能力使用率的倾向。企业的这些表现构成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点,即经常冒险去实现某些不适当的要求。

价格标准形成的这一过程有助于引导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和减少通货膨胀中经济失控的危险。实现宏观经济一体化,同时进行企业调整,由于这双重的必要性,所以不应只让企业在价格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企业(自信息网络运转开始)有权作出有关生产水平、生产组织和生产配合方面的决定,而价格标准制定过程则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可行性取决于转达给价格委员会的信息的质量。我们能够想象这样一些情形,即一小部分企业控制着某一系统,并力图采取一致行动向价格委员会提供一些夸大产品成本的信息。这就会使它们得到的盈余超过委员会规定的标准。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预防这类制造假信息的危险,如:建立人力物力充足的检查团,负责检查企业的账目;制定保障免费进入信

这一倾向引出许多理论文章,如奥肯的《无形的手》和卡莱基的《垄断的阶段》。参见 . 奥肯《数量与价值:宏观经济分析》1981年华盛顿版与 . 卡莱基同上文章。

息系统的条例;建立一套使管理双重账目(不管是以账本形式,还是以磁带或软盘形式)变得十分复杂和昂贵的措施;最后是使所有信息便于流通,减少企业串通的可能性。价格委员会当然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将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用于金融机构对资本市场进行干预的财力的重新分配。而价格委员会所需要的正是工商银行的计划分析员的职权。

生产资料买方和卖方网络将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职能。一方面,要减轻由于投资中断而引起的企业在能力使用上的波动,这一波动可能会在某些企业中表现得很突出。另一方面,要保证推广工艺改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买主与卖主在有关生产资料的设想与规格,在确定将来投资方位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新的自动化技术扩大了企业网络的范围。这一网络将不仅涉及所有有关特定产品的长期合同,还将实现生产的整体构思与规划。某些研究人员使用了“生产体系”这一提法,以选定这样一些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由许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将保持自治,并通过信息自动化处理技术,使产品的变化同生产程序紧密结合。而建立这一“生产体系”的可能性一直受到另一种可能性的制约,这就是私人企业保守其获得的信息的秘密的可能性。它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会给它们带来竞争上的利益。但在这里所谈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划中,将不存在这种权利。国营企业应使有关技术改革和生产程序方面的信息公开化。这是享用公债的条件。合作社和私人企业具有相同的义务,这是它们进入公共市场和信息网络的条件。为了坚持对工艺上的改革给予物质上的鼓励,注册专利要向工艺研究中心交纳专利权费,而网络中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中心。该中心同时还将向企业的研究工作提供资金。竞争中绝

· 卡普林斯基《电子基础自动化工艺与生产体系》,载《世界发展》第8卷1985年第3期。

不允许出现扣压信息的现象(在这方面,我所预测的社会主义经济比其他任何经济形式都更接近于权利平等的新古典主义模式,它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根据这一假设,任何技术都可以被人们掌握)。

消费资料市场

前面谈到的许多程序都可以扩展到消费资料方面。因此,这里要强调的是消费资料市场的特殊性,即买主都是一些家庭。它们没有企业那么多的财力与专业知识。再者,倘若它们追随短视的、自由选择的消费政策,即把每次采购都看作是一次单独的行为,因而忽视商品的生产条件和使用之间的联系,那么,它们就很可能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社会化市场的作用就是使家庭掌握知识,认识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价格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将使家庭认识到一种商品的零售价格是如何构成的,即它包括对商品制造过程能产生效力的各种成分的不同估价,生产的不同阶段的利润余额和成本的不同比例,最后是各种税款和补助金。这样就可向每个家庭说明降低价格的理由,同时向它们指出,为了有利于扩大生产,哪种产品成本已提高或哪种产品的利润余额已增加。每个家庭对价格提高的反应是资本主义经济或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原始动力。在任何这类经济中,每个家庭都不会得到必要的信息,以对价格进行估价,对价

有许多阐述这方面观点的例子,参见 . 赫希《增长的社会极限》1977年伦敦版。

格提高是否有道理作出判断,或在经济调整所必需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同价格总体提高之间作出区分。而实际上,价格的不易改变性趋于减弱主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相对价格的调整只是作为价格普遍提高的一个因素。如果价格不含有商品的现时成本和未来投资需要,那么任何价格体系都不能生成一个实行财力分配的合理体系。而在价格的形成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如下情形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异的,即每个家庭都不会对宣布需要提高物价的权威(不管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计划制定者)表示信任。而人们并非需要有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详细信息,只需得到在家庭开支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基本商品的信息就够了。

加工制造网络以一种类似生产资料存在的方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中以及大分配者和它们的提供者之间。一些分配者如马克思、斯潘塞、博迪·肖普或本尼顿都是“生产体系”中的杰出代表。但是家庭没有进入这一网络,它们目前的地位比较虚弱。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建议组建消费者联盟,它将作为使家庭和企业建立联系的网络和调节者发挥作用。这个联盟将像某些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的消费者协会所做的那样,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信息。除此之外,还提供有关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条件及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信息。不愿购买在某些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而想购买在另外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每个家庭都将拥有必需的信息。在最好的条件(从生态学、机会均等或工作条件观点看)下生产的商品将受到青睐。消费者联盟将告诫家庭要把采购的直接后果考虑在内,并且不要一味追求以最低价格满足直接需要的方法。它要使每个家庭懂得,在某个时期的“最好的选择”可能会带来长期的麻烦。消费者联盟正是以这种方式分担着许多“社会主义家庭”的忧虑。

消费者联盟的活动还将超出这一指导的范围。因为它将同时提供一些方便采买的服务,并促使每个家庭在产品的设计和规格

上提出建议。联盟在每个地区都有它的分部,每天追踪有关产品和服务使用方面的信息,并将其通过地方电视系统传送到每个家庭。使用自动查询货物装置,联盟可既快又方便地收集到有关商品存货的数据。如果某一家人想知道在哪里能够给他们9岁的男孩买两条深蓝色条绒裤子,联盟将会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以使他们避免长时间徒劳地寻找。它还要使家庭主动订购某些产品,而不是只限于对生产者的建议作出反应。它的人员包括一些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专家,还有一些设计师和工程师。他们能够甄别未得到满足的各种需要,并同生产者协同工作,以查实生产者是否适时地把用户利益考虑在内。当然,生产者力图逐步显示出其销售的潜力,但它们实际所采取的行动却不是这样,因为它们本身倾向于制造出一种虚假的需要,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而对每个家庭来说,如果它们不懂得干什么都离不开技术,就很难选定最好的方法来满足其需要。抽象地确定所需物的标准通常是很难的,但是如果人们同明确的物品相比较则对所需物标准的确定就会变得容易了。当然,在提高产量以降低成本的经济与产品的个性化发展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但是,随着产品专业化的发展,以及使用可使产品成批、省时生产的设备,这一冲突将会减弱。

所有希望生产或销售以家庭为对象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都应在消费者联盟登记,并告之其有关产品、生产方法和库存量的信息。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用于市场研究和广告宣传方面的大量资金将依照消费者联盟的需要重新调配。为了使联盟能够完全独立地行动和避免使用最具攻击性的销售技术,最主要的是要使它的资金来源于税收。

在这样的经济中,竞争将继续发挥作用。但它将被一种比任

人们饶有兴趣地看到,在英国,一开始就受到资助的消费者协会求助于这些技术,以争取新的会员。

何资本主义经济都严格的方式所限制。除了保护健康、安全和环境的法律及其他确定工人和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外,竞争还同时受到每个家庭都能够了解各种生产手段但对私人占有缺乏认识的限制。当然,这些限制不应使人丧失革新的勇气,因为注册专利的费用将由工艺研究中心提供。但不管怎么说,这并非革新的唯一动力。想要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得到社会承认、创立一门新的学问和解决一个问题的乐趣,所有这些都是革新的动力。此外,国营企业监督局在企业调整和创办之时,也都重视工人班组的革新能力。

调节与有意识的控制

我现在将试着以概括的方式提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方式。其目的不是要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甚至在生产尚未开始之前)先前的平衡。而是要指出通过私人市场进行调节的问题所在,即这样的调节不是不能实现,而是不能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自筹资金的企业不会降低过剩的产品价格和提提高急缺的产品价格。也正是从卖方市场的协调中,卡莱基得出价格的不易改变性。而一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制度主义者已开始探索另外的解释方案,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发挥作用。而社会主义者主要担心的失业和通货膨胀这类宏观经济问题正是根源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市场机制之所以不健全,是因为它不能完全实现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之所以不能分开对待,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确保提高生产力和满足人们的需要,实现可避免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方面问题的调节过程。

总的经济计划要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确定一些参数,以限定每个企业的活动领域和使企业提前实现重要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总的经济计划表现为一种指导的策略和对未来的想象,而不是物质财富分配的详细过程。经济计划制定中心机构的计划制定者将依据信息网络,提出一些选择方案,然后按民主政治程序对方案进行选择。税务和货币政策将在方案的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在日本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将同样是建立互利、合作、信任关系的机会。

除了合作社与私人企业外,所有企业都不听命于各部的行政机关,而隶属于国营企业监督局。国营部门的企业的工人对保证自筹资金的企业拥有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企业间劳动力的分配由监督局负责。企业可自由选择它们的营销商和客户,但所进行的交易及最终对家庭的全部销售都是通过价格和工资委员会、网络调节者和消费者联盟来完成的。企业将通过以税收为资金来源的公共信息网络,同商人和客户订立合同。这些信息网络完全是公开的,价格和工资的制定是透明的。这样,私人市场在信息流通中构成的障碍就会被排除。

这样的调节系统并不意味着要同时控制与总的整体规划相违背的大量信息。它将建立在有规律地、按部分地收集和为企业为自己所用而制作的信息的基础上,这些信息涉及产品成本、库存量、产品规格和制造方法。在这里没有技术上的障碍,因为今天的微电脑技术完全能够在最理想的期限内处理好这类信息。落后的经济所能使用的是电机技术(甚至“算盘”),因而在市场的社会化范围内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公共信息系统不是要汇入私人企业大量的分散的活动中,而是要取而代之,以建立重要的经济。因而障碍将不在技术方面,而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因为掌权的那些人反对信息的传播。尽管没有有效的方法强迫进行信息传播,但是在创造性才能得以充分施展的经济中,或在没有资本市场的经济中,

确认人们能从分享信息中得到好处应是不难做到的。

免费存取信息是有意识地控制经济的关键。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发展的倾向认为,只要使所有必要的信息向着唯一的、在完全了解各分支(机构)及其相互联系之后就能做出一些决定的中心汇集就足够了。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设想,况且它也并非是人们所向往的。最好能设想出一种如同每个人免费存取可自由使用的有关产品及其价格的信息一样的对经济的有意识的控制。这样就可使任何决策者了解其他人所了解的同样信息。

这些将会对了解如何从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到达我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产生一些影响。目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重点似乎是要打击资本对信息的控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网络。一系列涉及市场调节、限制性实践和卡特尔、环境问题、保护消费者、工业民主、民族工业政策及政府透明度的问题将会联合构成一个争取免费进入信息网络的战场。要优先考虑帮助那些最缺乏获得信息的手段,受教育程度和劳动熟练程度最低,即最穷的人进入这一网络。这将在道德领域和把非社会主义者像社会主义者一样联合起来方面同样有好处,并能在资本使生产发展的能力中处于中心位置……

(载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

陈双苑 译

这种网络的一个例子就是迈克尔·巴勒特·布朗领导下的、把联合王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使用者联合起来的双边贸易”。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与 民主主义问题——论新型 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日〕碓井敏正

从1991年8月苏联政变计划的失败开始,到苏联共产党解散、联盟解体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1989年开始的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过程的结束。

一种观点认为上述事件表明共产主义垮了,资本主义胜利了。尽管许多人从对日本资本主义现实的实感出发,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但也不容否定,东欧剧变确实给对社会主义寄予希望的人们带来了信念上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时候,我们更需要无所畏惧地从社会主义激荡的历史中总结教训,现实地展望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

然而,当我们从现实社会主义体制瓦解中反思教训的时候,有一个需要预先澄清的前提,即: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配称社会主义吗?如果回答是“不”的话,那么总结教训就没有意义了。

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苏联如同它自己70年代初所定义的,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认为苏联受其亚细亚生

产方式的落后性的制约,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有别于社会主义的特殊的社会经济体制。

我认为前者可以不予考虑,但后者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众所周知,在俄国革命时代,苏联确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远未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它努力实现了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国有化)、导入计划经济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并由于30年代推行工业化政策而使其经济达到了一定水平。

就这点来说,苏联是以社会主义为起点的,但后来由于十月革命后内战等严酷的内外环境所迫,导致了一党专政、官僚主义、政权脱离人民等与社会主义理念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但这些都该被看做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结果,我们可以把这种运动的蜕变过程视为社会主义的教训,而且必须这样做。

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瓦解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把握:

(1) 经济的崩溃(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

(2) 市民的政治自由及民主主义的欠缺(一党专政、党和国家一体化、官僚主义问题等)。

1989年以来东欧动荡,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国家和社会一体化)为特征的现实社会主义体制下,这两个因素难以分离地结合在一起。不过,本文(1)将讨论市场经济问题及与之相关的人格类型问题;(2)将讨论官僚制度问题和议会制民主主义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与市场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市场的理解

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经济中导入计划性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不以某种形式实行计划经济,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尽管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直接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行不通,但对计划经济本身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将会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计划经济进行分析,而是要探明计划概念背后的哲学前提(这也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点的重要前提)所存在的问题。这对于与市场概念协调,构建新型计划概念是不可忽略的课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需要首先确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市场概念和计划概念的看法是始终一贯的。如果从结论来说,包括列宁在内关于这一点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众所周知,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曾试图通过大胆恢复商品经济来重建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改变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对商品生产及其价值规律的否定)。从重视提高生产力的立场,他谈到了刺激个人利益、企业的责任感、甚至泰勒制,但这都是作为革命领袖的列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加强实力的措施。对于列宁这样的现实的政治家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实践的目的始终是最重要的。

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市场)的否定态度是继承马克思的。否定市场,作为导入计划经济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之一,

列宁在这一点上当然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在此,出现了马克思对市场的理解问题。简单地概括地说,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观点是这样的:

历史地看,市场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市场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为自由和平等提供了物质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18世纪,竞争是为个人开拓进一步自由发展新路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

但是,尽管市场曾经发挥过进步的历史作用,但社会主义仍必须废除它。这是因为无政府的竞争体制造成了社会整体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无节制的浪费,同时派生出大量多余的功能——尽管现在它们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论》)。此外,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造成了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和隔离。

恩格斯在人类史发展的意义上论述了市场经济的不合理性和计划生产的优越性。随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商品生产将被废除,从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被废除。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将取代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个体生存竞争将消失。只有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才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反杜林论》)。

恩格斯这一论述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以经济的、社会的理由说明从商品生产向计划生产的过渡是由于商品经济造成浪费和竞争者间的对立,而且从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的应有的变化这一角度进行了阐述。这使市场与计划的问题不只停留在经济问题的层面,而具有了哲学的含意。下一节要证明这一点。

2. 废除市场背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恩格斯论述中的要点,是“废除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他认为废除商品生产,导入计划生产的意义就在这里。这种观点也是早期马克思的异化思想。马克思把劳动者对于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

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作为异化的首位的主要的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前提,是高度评价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应予否定,首先是因为它异化于“人本来应有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异化劳动(雇佣劳动)使主动的劳动变为单纯的谋生手段,因而应予谴责。

因此,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作为人的自身异化的私有财产制度的积极扬弃,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恢复。

重要的是,作为分工结果的私有财产制度之所以造成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在于它是自发性的产物。因此,共产主义既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扬弃,同时也是有意识的计划性战胜自发性。

这种由异化论而来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下面这段关于共产主义的定义里充分表现出来: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青年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可以用下面的图式来表示:

{ 私有财产制度(分工) ——自发性
{ 共产主义——有意识的计划性

如果把自发性看作使人的主体性异化的诸恶的根源,那么,作为它的典型产物的商品市场关系当然必须全面废除。这是共产主义哲学的一个结论。我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哲学界定一事必须慎重,因为它往往有一种不是具体考察社会主义,而是给人以抽象的“无内容的信念”的倾向。就认识商品市场关系来说,我们与其对它进行哲学批判,毋宁应该对它在社会主义中的具体的可能性进行讨论。

当然,马克思并不只是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的有意识的创造来理解,而且还把它当做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客观解决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主义的。在这种意义上,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归于“设计主义的合理主义”(哈耶克)的范畴。此外,把受自发性支配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看作人类的前史,把以有计划地构建社会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看作人类的正史的历史观,或许从宏观上讲没有错误,但超出这个范围使用它就可能是危险的。

3. 各种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一样吗?

与上一节的考察相关,有几个论点应该作为问题提出来。其一是,能否在相同层次上谈论对社会诸力和自然诸力的驾驭。把自发的社会诸力(生产力等)置于人的有意识的驾驭之下的想法,可以说是以把自然诸力与社会诸力同等看待的观点为前提的。

恩格斯在刚才引用的《反杜林论》那段话的前面,把作用于社会的诸力与自然力看作完全相同的——当人们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时候,它们产生破坏性作用,但是人们一旦认识了它们,便可驾驭它们,把它们作为手段来实现目的。他把被驾驭之前和之后的生产力之间的区别,比喻为闪电的破坏力与电信、弧光灯等为人所利用的电力之间的区别。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把来自于市场经济的生产力的性质与自然力同质看待是不妥当的。因为尽管经济活动确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超越了作为其活动主体的人的意识而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但是这个过程只有以人的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为条件才能出现。

因此,如果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这种条件施以影响,那么就不能把生产力作为给定的东西像自然力那样界定。闪电(被驾驭以前的自然力)也罢,弧光灯(被驾驭的自然力)也罢,其中电的本质并无改变。但是,废除商品市场关系就不能不给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带来根本性影响。

4. 市场的合理性, 计划的合理性

与前述问题相关, 让我们谈谈合理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所以一直被视为合理的经济体制, 是因为它以合理的控制生产, 代替了造成浪费、恐慌、环境破坏的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生产。它使依据于预定社会生产目标的、合理的资源分配成为可能, 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但是, 由于以下原因, 在现实社会主义中这种设想并没有成功, 即: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图建立社会整体的合理生产体制的倾向中可以看出, 它是着眼于建立宏观层次的合理性的; 但是, 这种宏观层次合理性是建立在忽略甚至牺牲微观层次(各个经济单位)的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显然,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指令性质。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微观层次合理性的追求, 是与造成宏观层次的非合理性扭结在一起的, 在这一点上, 恰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形成相反的关系。

但是, 重要的是微观层次的自由的经济活动(它在竞争的条件下表现为对最大合理性的追求), 是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合理核算的基础。也就是说, 被自由经济人的私利驱动着的竞争性经济活动, 自然形成确定价格的合理机制。因此, 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名义下取消了微观层次的自由的经济活动, 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否定了作为合理核算依据的合理的机制。

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韦伯。他讲过: 只要计划经济以取消货币核算和资本核算为必要条件, 那就必须忍受形式的合理核算的削弱。在这种意义上, 实质的合理性与形式的合理性的对立, 是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矛盾(《经济与社会》)。

现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崩溃以更激烈的形式证明了韦伯的预言。但是另一方面, 彻底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现代资本主义也同样存在着深刻矛盾。如果考虑到这些, 我们就应该在确保形式的合理性的, 即以商品市场关系为基础的、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结

构中,去发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这个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市场”与“社会性计划”的关系(结合)问题,关于这一点将在第三章中讨论。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需要考察的问题,即分别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相对应的人格类型的问题。与社会体系相区别的人的问题,正如在本章第3节中看到的,只要生产力等社会诸力不同于自然力,那么它作为关系社会主义成败的重要因素就不能忽视。

5. 关于新型社会主义的人格类型

人们一向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是追求个人最大快乐的功利主义人格。这种人格类型容易转化成把追求货币视为“真正”需要的、精于盘算的、疯狂妄想的欲望的奴隶。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意义之一,就是将这种异化的人格类型转变为大公无私的丰富的人。

但是,只要商品市场关系仍将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要素保留下去,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青年马克思关于人格类型的剖析。相比而言,我想参考 . . . 密尔描绘的人格类型,提出如下与新型社会主义相对应的人格类型(参与社会主义变革的人格类型属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这种人格类型,即:在以利己心为原理的同时,能够从公共性角度对其进行调和,并能理解这样做也是符合自己的长期利益的——这样一种理性的人。密尔说过:“真正的私人感情和对于公益的真挚的兴趣,在每一个受过正当教养的人身上,都是可能有的,不过程度不等罢了。”(《功利主义》)这种人格类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不如说是典型的近代个人人格类型。

然而,无奈现实社会主义的挫折却证明这种人格仍具有现代意义。可以说现实社会主义过急地提倡了理想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的抽象性,与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存在庞大的地下经济)的实际状况结合在一起,导致事与

愿违,反而派生了赤裸裸的利己心(请看党官僚的特权腐败等事实)。

密尔早在社会主义体制诞生以前就已预见到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主义难于实现。密尔认为,若要使共产主义成功,必需使社会全体成员具备很高的道德与理性水平。而按密尔对此问题的悲观看法,达到这种水平即使并非不可能,但在当时也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密尔的下述言论似乎预言了俄国革命的结局:当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尚未达到时,迫使这些缺乏准备的居民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强制,即使在政治革命赋予进行这种尝试的权力的条件下,仍将以失败告终”。(《社会主义论集》)

6. 市场型人格与社会主义人格

当然,社会主义并非要以密尔所说的高度道德水准为条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要确立刚才所谈意义上的近代个人就可以了。而且我认为这种人格类型不仅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具有普遍性。

但是,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特殊性,这种人格类型处于不断向把对货币的追求当做“真正”需求的、异化了的人格类型转化的危险性之中。

对付这种危险有两个办法:一是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危险的办法,即把近代个人当作资产阶级的个人机械地否定掉,而代之以抽象的共产主义人格类型。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这种办法不解决任何问题。

另一种办法,就是把这种危险作为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的宿命接受下来,通过对教育及经济—社会体系的重组,不断地同这种危险斗争。不用说,这才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分析过(《政治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随着货币的出现,以物易物时代未曾有过的新的生财术产生了。它与合于自然的获取财富的办法(家政术)

不同,是商人性质的东西。由于这种生财术,人们热衷于无限地积蓄货币。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不是健全地生活,而仅仅是生活而已。

顺便说一句,马克思在《资本论》(“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中提到货币积蓄者问题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考察。

只要社会主义不实行实物经济(以物易物的现代翻版),而是把货币作为经济活动的手段,那么,生财术导致的人格异化就仍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正面对待这种问题,即承认利己心的刺激是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动机,同时探索防止其向无节制追求货币的方向转化的办法,这将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最大课题之一。

我们下面应该考察的问题是,在关注上述人的问题的同时,如何构建基于商品市场关系的社会主义体系(市场社会主义)。但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它也与政治体系问题有关,因此在下一章讨论了民主主义问题之后,再谈市场社会主义问题。

二、关于社会主义中的民主主义问题的考察

1.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和官僚制度论

第一章以经济问题为中心进行了讨论,在这一章里将考察社会主义中的民主主义的问题。现实社会主义体制崩溃的原因,不仅在于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而且在于民众反抗共产党一党的权威主义统治,要求自由与民主主义。

我想,可以用以下几个主题词来概括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本质,即:“基于对马克思、列宁的教条主义—权威主义理解的、对共产党的绝对化——共产党一党专政——党和国家官僚

机构)的一体化——排斥对立的政治势力——拒绝议会制民主主义”。

当然,不能忘记这些要素是由俄国特殊的落后性而派生的。观察南斯拉夫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可知道,它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导致的唯一结果。但是,至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了与上述主题词相衔接的要素。因此,如果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不构想新的政治上层建筑模式,就不可能获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

在这里我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官僚制度理论为焦点谈一谈。这个问题与经济方面的市场问题有着相似的性质,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论的一种局限性。

马克思从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出发构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国家机构《法兰西内战》。其首要前提是,工人阶级不能运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去实现自身的目的。于是,马克思对工人阶级掌权的国家的框架做了如下描述:

废除常备军和官僚制度。代之以由武装起来的民众组成的军事组织和经普选产生的、随时可以撤换的、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的工作机关。它直接对选民负责。这意味着以市民社会消化作为寄生组织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的这个构想,不久后由恩格斯做了修改《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他提出,由于军队的现代化等情况,街垒战等武装斗争已落后于时代,因此他认为基于普选的合法的议会斗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变革。

另一方面,列宁由于受俄国近代议会制度未成熟的落后性的局限,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国家与革命》。不仅如此,他还给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增添了新的乐观主义,即关于公务员工作的性质。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行政职能简单化,它

们已经不是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这些职能。

2. 官僚制度与列宁的弱点

可以认为苏维埃制度是列宁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的尝试。但从后来苏联的现实来看,国家不仅没有走向消亡,其职能反而日趋强化。不能将其归因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内部,存在着推动国家强化—镇压职能强化的因素。

最大的原因之一存在于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特性之中。因为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中,从资源配置到确定价格,一切都必须由官僚机构控制而在商品经济中是凭借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为此,行政职能的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为了避免官僚机构强化,就需要向社会主义经济中导入市场原理。

可是,即使这是解决官僚机构不必要的膨胀的处方,但官僚机构本身包含的问题并不能因此得到解决。在此点上应予以重视的是党与官僚机构一体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列宁时代已经表露出来。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弱点,是由于他把官僚主义看作旧时代的残余,因而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必然面对的本质性问题给予考虑。实际上,官僚主义有其独立的法则,所以,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中,必须从制度的角度考虑建立对它的监督系统。

列宁本身非常重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但是,他为同官僚主义斗争而选择的道路,是依靠作为精英集团的党。例如,列宁晚年曾提议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他说:“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国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源泉吗?”(《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以党和国家机构的一体化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现在看来是笑话,但在当时落后的俄国现实中,这也许是可供列宁选择的唯一的办法。但是,这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列宁提案的背后隐含着的,那就是群众利益与党、甚至领袖的利益一致的信念。诚然,

若没有这样的信念,一个政治势力要实现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归根结底,这只应作为市民社会层次的政治势力的信念而存在,如果将它作为政治体系在国家机构中付诸实践,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3. 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与议会制民主主义

必须指出,导致官僚机构强化及官僚主义横行的原因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乐观主义态度,即认为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只担负简单职能,并最终将被市民社会所消化。

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即使是我们设想的新型社会主义,也不会简单实现这种转变。原因在于,随着社会高度发达,行政职能趋于复杂化,另外,官僚机构有着相对独立于大众利益的逻辑。

因此,我们应该像韦伯那样,承认官僚制度是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近代化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前提下,预先掌握对付它的办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官僚制度的利弊进行冷静分析,在发挥其有利方面和抑制其有害方面的办法上下功夫。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现实的对策,我们便不是支配官僚制度,相反是受官僚制度支配了。

官僚机构膨胀的原因在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但是,社会主义之所以还需要官僚制度,原因在于经济的计划性。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在什么领域、何种程度上进行投资?在决定这些问题时,需要中央、地方各种层次的专门规划。在社会主义中从事这种工作的专家集团的作用,比在资本主义中更重要。

另一方面,必须建立抑制官僚制度的机制的理由,存在于官僚制度的这种积极作用之中。这是因为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以及如何投资的问题,不仅是在办公桌上做规划的问题,而且是如何反映和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的问题,所以为了妥善处理这项工作,绝对需要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议会对官僚制度的主导权。失去这个条件,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就会成为空谈。

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的计划需要官僚机构,也需要对这个

官僚机构进行审查的议会。但是,议会的职能与官僚机构一样,随着其管辖范围的扩大,可能出现极度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从提高业务效率来看也许是好事,但从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观点来看,会引发多种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或行政成为一部分专家的排他性工作,存在着一般大众被关闭在政治参与之外,实质上脱离政治的危险。这种矛盾不可能通过一般性地加强议会的职能获得解决,因为议会职能强化本身就在扩大这种矛盾。

我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基于分权化的自主管理机制达到何种程度。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组织方式问题在其他章节进行综合考察。

4. 议会制民主主义的窄路

这里话题稍稍扯远一点,谈谈与议会制度的本质有关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体制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制度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它的作用是代表国民的意志和对官僚机构进行控制。就这点来说,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议会制度没有本质区别。那么,随着劳动群众人数的增加,代表劳动阶级的政治势力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占据多数,是否容易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呢?

从议会的本质作用是代表国民意志这一角度看,似乎这是容易做到的,但实际上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根本前提中潜藏着防止建立社会主义权力的倾向。一般地讲,议会制度,不论在资本主义中还是社会主义中,在本质上都具有维护既成体制的职能。

那么,潜藏在议会制度中的维护现行体制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呢?它是由议会制度的作用是抑制权力这一基本理念派生出的职能。也就是说,议会制度的根本前提是防止出现强权,这样在现实中就形成对既成体制的维护。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权力的目的在于通过强行行使权力来废

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议会制度从本质上不希望出现这种强权。因此,议会制度发挥着预先防止拥有这种纲领的政治势力扩张的作用(因此,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社会主义势力往往淡化革命纲领的内容)。

议会的本质不在于如何行使它的权力(尽管表面看来相反),而在于如何限制权力过大,如何保护个人自由。唯有个人自由才是议会制度应该保护的首要目标。这种个人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用说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自由(包括剥削的自由)。

通过考察议会制度的诞生地英国的政治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议会制度的根本前提。从历史上看,议会即把限制王权作为使命,这也反映在洛克的政治思想上,从本质上表现出防御的性质。这种倾向不仅限于洛克的时代。

对于工党左派思想领袖拉斯基这样的人来说也是同样,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意义就在于确保政治自由(它由于政权更替的可能性而得到保障)(《近代国家中的自由》)。此外,在某种意义上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的波普也主张政治论的课题应是防御。在谈到蒲鲁东的领袖论时,他提出如下主张:

蒲鲁东由于提出政治学的课题是“应由谁来统治”、“谁的意志是最高的”,从而给政治哲学带来极大混乱。我们宁可反过来思考,正是应该考虑防备坏的政治或坏的领袖的办法,即政治学的课题应从“应由谁来统治”的问题,转变为“如何才能使坏的或无能的统治者不造成更大的损害”的问题(《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

进一步讲,对于这种权力的防御姿态,还要求以如下的性恶论人性观作为政治学的前提。根据休谟的观点,无论任何政治组织在考虑权力的限制机制时,都必须假定人都是无节操的、追逐利益的恶人,他们的一切活动除了私利以外别无目的(《论市民国家》)。

关于上述权力论、人性论与过去的社会主义观点有多大差异,我想就无需多说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不能将权力问题和与之

相关的人性问题仅仅归结为伦理问题(个人的态度问题);而将其作为现实问题,也就是以社会科学的观点进行讨论时,休谟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三、新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1.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检验

第二章关于议会制度本质的考察,对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方案将会产生影响。但这个问题已脱离本文主题,因此另找机会再讨论,下面我们把话题转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

我认为社会主义剩下的希望只存在于市场社会主义之中,但这方面只有南斯拉夫一国进行了不完全的实践,此外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影响很大,所以可以说它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构成体的变体,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具有同等理论价值,关于它的可能性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研究。

琢磨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还得从检验南斯拉夫的实践开始。在南斯拉夫,由于对基于苏联式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造成生产者实质上被排除在生产资料之外的反省,在给予企业自主权,确认其商品交换主体地位的同时,在企业经营方面也采取了以工人评议会为主的自主管理方式。

与此相关,国家的中央计划职能被压缩到最小程度,甚至失去了实质作用,同时尝试缩小官僚机构。自主管理方式不仅限于企业,而且向各社会组织扩展,直至唤起广大国民参加到自治中来。

可以说南斯拉夫的实验,是反对以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共产党政权作为社会主义基本条件的僵化的社会主义论,探索人民成为实质上的主人的一次尝试,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也不能否认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通货膨胀率较高,存在大量失业者,此外还有造成近年来各共和国间民族冲突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等。

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缺乏民主的计划管理。仅有自主管理,并不能使一切顺利运转。在南斯拉夫,存在着缺乏向学校、医院等非生产性公共机构投资和分配财富的现象,这种矛盾,有必要以更高层次的计划职能予以矫正。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民主的计划管理,也可能通过像自治体这样的国家层次的自主管理来实现。但是这样的工作要求高度的专业性,与其由一般国民来做,不如由专家即官僚来承担。在这种意义上,即使市场社会主义也需要适当规模的、直接承担民主计划管理的官僚机构。

2. 新型社会主义的主题词——市场、计划、自主管理、官僚机构、议会制民主主义

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为我们构想新型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不只南斯拉夫,我们现在还可以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一般来说,构想社会主义模式往往具有脱离现实的、把社会主义理想化的倾向。马克思之所以不愿将社会主义模式化,是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解决现实各种矛盾的形态。

但是,我们生活在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即社会主义作为现实的体制存在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从现实社会主义的成功及失败中学到东西,由此构想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模式。

在现实社会主义崩溃、反共宣传甚嚣尘上的今天,这样做具有

积极意义。可惜在此受篇幅限制,我们只能在回顾上述讨论的同时做一极简单的概括。

我相信,未来社会主义的合理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5个关键词如何组合。它们是市场、计划、自主管理、官僚机构和议会制民主主义。这些关键词相互有机地联系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社会主义都不能顺利运行。

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实践可以看出,前者存在计划(它也是以被歪曲的形式存在着)和官僚机构,但缺乏市场、自主管理和议会制民主主义。后者存在市场和自主管理,但计划和官僚机构仅以十分不健全的形式存在,而且可以说也不存在议会制民主主义。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南斯拉夫是由共产主义者同盟一党统治的。但由于存在自主管理制度,南斯拉夫一党专政的弊害不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明显。

为了便于理解5个关键词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两组:

{ 市场——自主管理
 计划——官僚机构——议会制民主主义

由此可见,市场与计划、自主管理与官僚机构彼此构成相对应的概念,市场与自主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同样,计划与官僚机构及议会制民主主义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关于5个概念的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还有几个应予考察的重要论题。拿市场与自主管理的关系来看,市场并不必然形成自主管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不如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当中,毕竟也遗留下同样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企业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其说是依赖于市场的逻辑,不如说更主要地是依赖于人们的自觉意识。

此外,就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来看,作为社会主义计划的前提,必须实现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但是,与市场经济并立的生产资料

社会所有,究竟应达到何种范围?这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论题。进一步来讲,自主管理应在何种程度上把事务委托给官僚机构或议会处理?如何防止自主管理中出现精英统治?由政党代行政治活动,是否会助长人们的被动态度,使自主管理就整体来看空洞化呢?

这些是从5个关键词中必然产生的问题,未来社会主义将不得不同这些问题交锋。回过头来想,现实社会主义体制崩溃的原因,就在于根本没有把这些社会主义本来存在的问题作为问题提出来。

说到底,只有扭住现实问题不放的,丰富而有弹性的感悟,才是新型社会主义迫切需要的最重要的条件。

(载日本唯物论研究协会1992年编辑出版的
论文集《社会主义哲学化》
冯雷 译)

明天的社会主义

[法 托·安德烈阿尼

如果说左派士气低落,那么这不仅是因为社会运动已处于低点,东方的革命使其陷入迷茫境地,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已不再有任何设想,不再明了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现在,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们过去所持的论点。

公用事业吗?它过去一直体现为一种建立在满足社会需要、用户平等、专营、成本较低原则基础上的非资本主义必然性。在市场衰弱或不能顾及各种“外在条件”的情况下,有关公用事业的这一概念一直很有说服力,甚至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它的必然性。但是这一概念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人们不能无限地扩展公用福利事业的领域,而不造成在需求方面“尤其是在这些需求是由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管理的少数领导者确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被束缚”的局面。而且,缺少竞争以及行会主义的影响,都构成成本管理的障碍。

托尼·安德烈阿尼: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政治、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国有化吗？它一直被认为是从私营的卖方市场中抽出存在于经济之中或经济之上的“由银行和资本”的国家行使的权力，使其归属于国家，赋予工人代表表决权，限制利润的作用并使股息属于集体。但是，不管愿意与否，朝着庞大的国际市场方向发展的公营企业不得不服从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民主化在基本上保持着国家干涉主义的设想中则显得非常暧昧，以致工人们看不出它的不同之处，并一点点丧失了他们所拥有的某些利益。另外，国家曾把股息看作自己的私有财富。而法律上的障碍也限制了资本的流动性和组织结构上的各种重新组合。在这方面，私有化遇到的阻力则较少，并似乎更易于与变成多分支的和多国的资本相适应。

计划化吗？它应以对经济的有意识的控制取代商品之间关系的不透明性和无秩序状态，或至少应根据民主的选择，确定它们的方向。但是，苏联式的计划化，由于它的核算方式和以等级关系代替商品交换，因而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少透明度、更不合理和浪费更大。至于法国式的计划化，在被跨国化取代和受到它的约束前，更多表现出的是官僚作风而不是民主性。

自治管理吗？长时间以来，带有过多国家干涉主义色彩的法国左派不相信它，即使曾对它表示过认真的关注，也只是在它已显得过时的时候，即：它所追求的目的受到劳动者所拥有的财产的限制，由于各种原因而投资不足（我们认为这种投资不足不利于超出一定规模的民主），总之，它即使不被政治上的官僚主义所扼杀（南斯拉夫），也会被迫处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只表现为一种经过改进的国有化形式。

新的管理标准吗？这肯定令人感兴趣，但它并不适合竞争的各种要求。只有大的国营企业会大胆尝试它，但国际上的竞争很快就会使它们哑口无言。

最后，我不会停留在凯恩斯主义国家上。因为仅仅由于具有上述这些概念，它才显示出好像在向社会主义发展。过去它仅是

社会管理和资本主义调节的手段。而在今天,由于同社会妥协决裂以及经济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它的基础受到损害。然而那些想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探索实现新的进步主义思想的人要恢复的正是这样的国家。基于刚刚提到的某些理由和尚未提到的其他理由,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看来是行不通的。

那么怎么办呢?任务是不能回避的。应该对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思考,设想出一定数量的精确的“模式”,看一看以折衷办法替代注重实际的资本主义是否是可能的。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个:首先,它将促使我们寻求现行体制中能够保持的东西(通过改造),而不是全盘否定它(它犹如一个不可打破的整体),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完全接收它,只想对它进行无关痛痒的改动。其次,如果这一意愿得以实现,那么它将使人们所追求的短期改革目标具有意义和方向。最后,它将使被统治者对斗争重新树立信心和充满希望。

我很清楚对有关应把社会主义问题提上日程的思想提出或将提出的各种异议,现在就对这些异议给予回答。

首先,人们可能会说,未来不是颁布的政令。但是,马克思难道没有告诫过我们:“共产主义……不是应被建立的一种状态,也不是解决现实问题所依据的一种典范”,而是“打破现时状态的实际运动”吗?这绝不是陷入空想,不管这种空想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我反复说过,我们应该思考的就是具有极大可行性的一次(或多次)具体的替代问题。虽然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得到相反的评价,但它们是符合历史发展和必然性的。可是,也绝不能认为,实际的运动将会自动导致“高级”的社会,或这样的社会是通过生产力发展的恩赐,或是通过人们能够预见其演变过程的阶级斗争的力量实现的。总之,没有意识、设想和一种世界观作为产钳,任何新的社会都不会诞生。而直接有关的唯一问题就是要搞清,如果社会改革是明确的、精确的、可信的和应实行的,那么是否存在着可动

员的社会力量去实现它。

但是,难道应该等待“社会运动”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知识,等待计划从日常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战斗中自然形成吗?难道因此而怀疑任何带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思考吗?

让我来谈一谈对苏联发生的悲剧的思考。这是一个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的社会。在一些年里,人民的生活不算太好,但却是稳定的。尽管受到“共产主义”制度带给他们的精神枷锁的桎梏和思想僵化的束缚,但由于他们拥有世界上少有的有文凭者的比例并且继承了过去伟大的文化遗产,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有修养。而现在,这里的人民突然失去了他们的全部价值、所有基点、一切生活习惯,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极度的贫困、为了生存的个人争斗中,陷入罪过的社会中……而在彻底的绝望中,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谁能用社会运动、阶级斗争等语言给这种如同灾难而不是转变(对于其他东欧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极其严峻的方式转变的过程)的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呢?谁能够识别“真正的运动”?难道我们不应该记住恩格斯的话,即一个社会如不控制其力量对比,就可能“日趋衰竭”吗?而我认为,苏联的垮台不仅是因为从一种制度转变成另一种制度是很困难的,而且也是因为它和人民不知道向何处去,这也可以说是不知道或不能够给人民照亮道路的“改革”的政治领袖们的巨大失败。

我要说的意思是,从事分析研究工作和提出建议是“知识分子”(从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指所有那些有时间和手段阅读、思考和写作的人)的责任,而不应由专注于每日所关心的事情的劳动者来代替他们做这些工作。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密切关注实际的形势和社会斗争,而不能像列宁过去所主张的那样,从

外部把科学带给被压迫者。但我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工具。他们特别应该摆脱与过去大概应归咎于他们的盲目性、教条主义和错误的理论有关的犯罪感和内疚(谁因怀有犯罪感和内疚而得到了宽恕呢?)。之所以应抛弃任何设想实现社会替代的愿望,并非是因为我们曾错误地赞成苏联的、中国的、古巴的、社会民主党的等等这样或那样的模式,而仅仅是涉及用启发式的和实验性的语言进行不同的思考;并非是因为我们曾陷入无论如何不应再去想象的“伟大的故事”,而仅仅是涉及区分对重大原则(它们是复杂的并且经常是矛盾的)的思考和可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设想之间的不同。这一可实现的社会主义不管可能会多么令人不满意,但只要显示出向道德原则方向发展的迹象,并且至少标志着反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开始就行了。

最后,人们会说,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的时间尚未到来,因为它离人们所关心的内容和对社会主义的可能理解太远了,而且“革命的”知识分子太少、太孤立并同战斗着的基层人员隔绝。第一个理由使我想到了想通过收视率调查以适应电视观众要求的电视节目编排者的理由。难道我们真的以为人们始终会把目光盯在工资单、失业(受其威胁或已失业)、孩子无出路的学习和要存入银行的积蓄等等问题上,而不知道这些问题已不再能够一个一个地解决,因为危机是普遍的,它要求新的全面的回答吗?“可转变的”知识分子的数量不多吗?可能是这样(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也未被新闻媒体了解)。但是如果他们拥有一些明确的观点和少许富有理性的信念,那么,他们的队伍难道不会扩大吗?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应通过社会活动而同社会组织建立起联系。最后,尽管工会处境困难,但它并没有一蹶不振,而且联合的运动充满着活力。

现在我要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问题上来,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很快从有点技术性的角度提出某种思想,以对替代问题进行思考。我将以已出版的一些著作作为依据。不管人们如何评论这些著

作,它们的功绩就是展开了这场争论(这里的参考书目限定为1993年10月出版的第13期《当代马克思》杂志的文章汇编中的参考书目)。

社会主义问题的核心当然是所有制,因为它包含着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分配和管理权,特别是包含着劳动的分配和管理权。而过去的社会主义思考却始终错误地停留在,或者说被局限在选择私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的左右为难的取舍上。

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掌握了效率的奥秘,因而具有很大优势。资本的占有者和管理者为了提取剩余价值(首先以利润形式)并将其据为己有,而把劳动者看作资源的一部分,并为此毫无顾忌地在招募、解雇、工资和劳动方面制定了最苛刻的条件。而我们知道,这些在今天造成的后果是:大规模“裁减”、强制性调整、职业的暂时性或不稳定性、劳动时间过长、意识受到操纵等等,我所列举的还不完全。换句话说,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所付出的代价是对大多数工人的压迫、剥削与奴役。问题是人们能够通过其他结构和手段达到同样的经济效率(完全同这一发展缓慢无力的时代有关)或更高的经济效率吗?因为否则就会陷入苏联集团国家过去的困境,就要闭关锁国、隔断同世界市场的联系、剥夺人民的消费利益(真正的或虚假的)等等。我在这里绝不是为唯生产力论辩护。尽管人们非常希望既能限制商品同时又能改变生存方式(这是我的许多同胞相信能够做到的),但这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经济体制和社会的深渊中,个人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因而不能更快地和更好地进行生产。

而资本主义制度也远非它所说的那样有效率。甚至无需探讨这一效率明显或不明显的代价(仅在力图修复一些“被损坏的东西”的社会保障领域就无法计算),就能很容易地看出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各种解决办法是丝毫不容乐观的:“不参加董事会”的小股

东是企业管理非常不称职的评判者;有势力的产权拥有者(大股东、投资管理机构、银行)虽然更富有经验,但由于对企业的运行太外行,以致不能对其长期的能力作出最好的判断;而企业经理,除了依赖于这些目光短浅的产权拥有者这一事实外,不管他们的管理能力如何,由于缺乏真正民主的构成,因而对他们从最高地位领导的复杂的机构所发生的情况了解得非常不全面;另外,产权拥有者付给其代理人的工资和职务上的优惠过多,大大加重了已确定的开支的负担;最后,银行不仅只贷款给富人,而且这样做所依据的标准是:借贷者的循规蹈矩、影响、社会等级等,借贷者的上述品质可改变这样的观点,即人们认为法国最大的几家银行近几年实行了不动产抵押贷款的灾难性政策。

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能够拥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效率。大量的研究表明,参与管理的工人数量增加、工资等级减少、工作有更大的安全保障、合法权利得到更大保护以及对利润进行分配,这些都会使生产获得巨大收益,或者说使被判死刑的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拯救。但这要以私有制结构和权力结构或多或少地重大改变为前提。

而完全相反,国家所有制则什么也解决不了。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国家像管理公用事业部门一样管理企业,但当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不是社会财富而是私人财富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谬误;或者国家像资本主义股东那样对企业进行监督,但是不管它是根据不适宜这一领域的政治理由和政治上的共识来行事,还是根据更多是财政上而不是生产上的逻辑和比资本主义的组织更多随意性的逻辑,把全部竞争的公营部门看作是一种庞大的组织(在这里抽取利润以弥补赤字,并经常向纳税人要钱),都不会把事情干好。过去左派思考中的一个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人们能够借助于经济部和工业部对国家企业的干预推行一种经济政策。另外,我还提到过阻碍资本流通的法律上的障碍问题。而且,在这种从上面进行

的管理中,各种社会关系基本上没有改变。人们今天还会清楚地看到,这种管理仍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技术,它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地不同于资本企业的生产效率。

那么,应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形式呢?正如人们在上述那期杂志中所能看到的,所有作者都在这里产生分歧。弗雷德·布洛赫赞成私有制,但资本的权力不占优势。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被推到它以往未曾超越过的界限之外的德国模式。这一混合的解决办法即使有幸问世,也可能会导致一种长期的不稳定。巴尔丹和罗默(第一种方式)赞成国家所有制。而在这种解决办法中,由于财产所有权通过工人交叉参与管理而在同一公立组织的各个企业间进行分配,因而国家所能发挥的作用只是任命经理。罗默(第二种方式)曾提出建立公众所有制。在这一方式中,由于每个公民拥有唯一可转让的票证(相对于其他票证),因而可对股票市场进行限制。这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追求的是对国营企业更有效的管理和对利润更平均的分配。对此,我在这里不做详细的技术上的讨论。而人们对这些模式的最大异议(始终在效率方面)就是由于企业中的各种关系所发生的变化非常小,因而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不会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效率。另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在企业民主基础上,更确切地说,它不涉及工人自治问题。这一解决办法是由许多作者(其中包括马克·费雷和我)提出来的,我想在这里作些阐述的正是它的不同版本之一。而就所有制这个术语而言,它的内容是如何展现的呢?

确切地说,它关系到要把所有制的权力(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不是绝对的)分解成一组相互分开但互为补充的权力。因而,

见我们的著作《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论述,替代的思考》1993年阿尔马塔出版社版第9章。

对生产和资本的管理将是拥有民主决策机构的企业中“联合的工人”的行为。相反,企业间金融资本的调拨将由一些本身实行了自治的银行来完成。人们实际上看不出其他什么样的组织能够根据严格的经济标准在企业间分配贷款。迪亚内·埃尔森也只在他的解决办法中强调,管理部门如不关心它们自身的“赢利”(我将改变这个词)或缺乏竞争性,那么它们的效率肯定不会高。而差不多所有的作者都认为银行应在涉及选择投资对象和认可企业的管理形式的非统治性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发挥中坚作用(他们在这里受日本的榜样的启发和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借鉴了德国的榜样,但是应该看到,在这两个不同于美国的国家里,从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开始起步的金融场所具有的重要性已被缩小)。甚至弗雷德·布洛赫也主张在他的私有经济体制中建立半私半公银行,这种银行以公用事业思想为指导,实行严格的责任管理制,并有专门人员负责保持同客户的经常性联系以改进对企业的投资。使投资向长期性方向发展(这将会对私营银行造成一种竞争压力)。而罗默则考虑的是银行是否能对经理实行同对金融市场一样有力的监督。而当一切都使人们想到银行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种怀疑是多么令人奇怪。但是,银行不会发挥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的作用吗?我认为不会。因为它们的管理方式不同,并且银行不参与分红。

至于确定投资总额的权力,我认为,它应该由国家 and 家庭共同分享。施韦卡特曾提出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国家通过向公营企业用作资本的资产征税,而拨给不同级别的银行(从中央到地方)投资款(根据银行所辖范围的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已发放给企业的投资的赢利状况及在创造新的就业方面所取得的

我在1994年春天在《共产主义批判》上发表的题为《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文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

成就)。这个解决办法由于使个人得不到任何利益,因而存在一些弊端。它将通过强制性征税完全取代自发储蓄机制,并将导致恶劣的后果(例如:当国家为重新进行总体水平上的投资而增加税收的时候,它将使因税率提高而负担加重的企业丧失勇气。因而,尽管企业无需偿还“本金”,但可能会不太节省地使用它们的经费)。相反的解决办法是仅仅求助于家庭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市场就会自动平衡家庭的供给和生产体系的需求二者之间的比例。但这样一来,就较难实行一种同民主的选择(完全不同于一个一个被争取的家庭的选择)相适应的唯意志论政策。这一政策只能通过计划化(特别是确定所得税率)来实行。因而,更确切地说,我将赞同一种家庭储蓄和公家储蓄相结合的混合体制,在这个体制内,国家通过根据需要确定利率来进行干预,甚至可求助于建立特别税以实现最终的调节。

人们将会看到这一“混合的”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的重大特征是什么,并且,同右派传统的解决办法相比,这些特征有了哪些改进。正是劳动者管理着企业(可能会结成合作的组织),这如同他们在合作社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掌握的不是资本而是借贷资本。这将会表明,它不仅使唯一的劳动者跨过了占有资本这一屏障,使资本充分流通并根据人们的希望重新积累,而且还消除了工人管理企业经常受到的有关投资不足的谴责所依据的许多理由(禁止自筹资金是这一模式的关键组成部分)。贷出资本者(如国家、家庭)对企业没有任何管理权。银行拥有分配贷款的权力,但它们所发挥的仅是中介作用。因而,人们不能再把企业说成是公营的或私营的,而应确切地称之为社会化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企业里的收入分配问题。劳动者将自己确定他们的固定报酬(我们不再说工资,因为劳动者本身是他们自己的雇主),自行分配所有剩余。这些剩余不再是或者说可能不再是利润,而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所以说,尽管我们保留赢利这一概念,

但它的含义已全然不同)。这样,劳动者将直接受到有力的激励,使企业得以充分发展。这是效率的保证。我们在这里应该看到,在这些条件下比在资本主义经济充满冲突的条件下,更容易实现一定的灵活性(在收入和工作上)。

我曾有意识地把争论放在效率问题上。但是,主要点当然不在于此,而在发展经济民主、减少不平等现象、充分就业等方面,简言之,是要使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在这一方面,我将很快概括指出它的其他主要特征。

如果对劳动力市场没有专门的规定,这一市场社会主义就会让大量不平等的现象存在。当然,在每个企业中,收入的等级会被减少(在蒙德拉贡合作社中,原先分为1—3个收入等级,后由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原因,分为1—6个等级),但是,根据企业竞争力强弱,企业间的收入可能会很不平等。人们可通过保证最低收入的义务性保险制度的办法,或通过全面谈判而制定全国性的工资等级表对报酬等级加以限定的办法(因为每种办法都有它的利弊)对此进行纠正。因为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问题,而且也涉及有助于劳动者实现某种流动性的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就会看到一些反对调整,甚至反对现代化的行为。

如果混合的社会主义不在遗产继承和教育方面采取一些适当措施,那么它就不能阻止在全部财产(包括权利和义务)和社会的组织构成方面存在大量不平等现象。为此,应对已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进行认真研究,因为它们完全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相反的后果。

对于计划化的概论,我将以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其他基本方面的见解予以补充。这一计划化符合很多要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即它是使人民的社会选择得以实现的工具。社会主义不仅是基层的经济民主,也是社会民主。它不同于各项重大决策由一些

相互独立的经济角色(实际上这些角色通常是一些拥有重大权力——有时这些权力高于许多国家的权力——的私人团体)来制定的资本主义,它要使公民的总体意志发挥作用。这一总体意志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集中表现,而且也是集体协商的体现。在这一集体协商中,每个人的观点通过与其他人的观点的接触而受到提炼,因而将会趋于超越个人的或私人的利益,例如:当公民的利益——至少暂时地——要求保护本地产品的时候,消费者所关心的则是买到不太贵但却是进口的商品。重大的社会选择主要涉及:劳动时间、收入等级、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比例、社会财产与私人财产之间的界线、优先发展的部门、生存范围的确定和重视环境保护。其次,计划化将使发展更连贯、更协调(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方面,由于重视各种有利的外在因素)、更和谐(追求互补性和协同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更均衡(特别在领土整治方面)、更重视生存环境(确定合理的发展方向)。总之,计划化将要求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为协调发展的宏观经济。尽管资本主义在企业或区域范围内效率可能是高的,但在总体水平上则是特别低效的(如在失业方面)。

但是,正如罗默曾明确指出的,如果说带有强制性的计划化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经济考虑和代替商品交换机制,那么间接的和带有鼓励性的计划化则更容易发挥而不是损害市场的调配功能。如果有步骤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技术,如利率和不同的税法,那么计划化就将会异常有力。

根据迪亚内·埃尔森提出的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能够确保在效率上优于资本主义、使经济生活具有透明度、同时有助于民主决策的制定和计划化的功效的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借助于“公共信息网络”,使信息公有和交流(至少在已实现社会化的领域)。它将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竞争关系,掌握价格形成机制,作出一些比金融市场(它只掌握比较贫乏的信息并表现出一些

人们非常熟悉的带有操纵性的和一哄而上的现象) 更具理性的预测。更笼统地说, 它是对市场一些“缺陷”的回答。

最后, 我想简单谈一下这种社会主义同经济的世界化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经常出现反对意见并且不乏论据。因为经济的世界化使左派传统的解决办法(国有化、计划或公用事业) 变得很困难, 并破坏了凯恩斯主义国家的基础。要想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探讨, 至少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在这里仅作一些基本概念的回答。

世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人所共知的经济上的紧密联系。难道应该或者能够再把这种联系局部地割裂开吗? 这样做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要恢复贸易保护主义。我认为, 这里存在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协调性问题。“比较利益”和“专业化分工”政策, 除了在莫里斯·阿莱等经济学家中招致的批评外, 还可能会导致——甚至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经济和工艺上的依赖现象以及与知识的相互作用、融会贯通联系在一起的潜力的相对失效。只有计划化(如同今天欧共体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的情况一样) 似乎能够适合实现经济协调性的迫切需要。它同时有利于整个国家, 使其有足够的调动生产和工艺上的各种潜力, 同时拥有使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形式的抵制其产品的行为的经济实力。然而, 甚至在一定数量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家中, 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识, 即认为应该保护经济组织的稳固性。另外, 一种更多是反对世界化而不是为其做准备的倾向已经存在, 如无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款, 在国家间建立旨在加强内贸和出口以及确定一些外贸的共同准则(有时是以伪装的方式) 的地区一体化。社会主义变革将会在这一倾向中发现有利的因素, 并使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强。

人们将提出反对意见说, 世界化也就是不再有边界, 并存在完

全 不受局部地方的限制”(这在实际上使任何——甚至以各种有限的形式——欲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变得不可能)的跨国公司。这样,一些不按同样章程行事的企业就难以承受同它们的竞争。对此,我的回答是,什么也不能阻止这些企业把全部力量转向国外,而这也是适宜的,只要它们在完全可能的情况(掌握资本或拥有令人满意的合作者,同时遵守外国法律,加入地方劳动市场等)下,依照同国内一样的管理规定去做。而这一政策绝不会导致统治的后果,相反,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将有利于输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但是,当它涉及到提供典型的资本主义金融服务的企业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我们只有保留资本主义区域,这些企业才能存在。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能性极大的假设。至于在国家领土上的外国企业,它将建立在经济上的这一资本主义区域内,也就是说,它将在与其他国家提供的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建立。

我认为,全球化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就是资本的流通问题。15年来,不管是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投机的资本的流通指数都有了增长。面对金融市场经济和国际投机经济(一直较重视发展能使其代理人风险规避同时得到最高收入的“金融衍生产品”),银行起中介作用的借贷经济全都有些后退(但在像德国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这种现象则很少出现,这应引起人们的思考)。所有旁观者都承认,这些对任何人甚至对投资者都不负责任的金融市场,对政府进行控制,并大大缩小了政府运用货币政策和预算政策的余地。很多人,甚至许多最热诚拥护自由主义的人都对此表示担心。我在这里对此不做详述。但我要说的是,这里存在一种选择:或是让潮流带走,这样,任何社会主义变革都将在理论上是难以想象的,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采取向某些投机资本征税的措施,至多也只是使这一潮流合法化);或者同这种全球化方式决裂。关于这一方面,为了对付资本流失现象——它会对社会变革倾向或者

也许仅会对损害资本利益的并多少有些唯意志论的政策构成威胁——弗雷德·布洛赫所阐述的观点是幼稚的或者说是乐观主义的。

已提出的有利于资本流通自由化的重要论据——实际上是唯一有份量的论据——就是快速调动大量储蓄的可能性。而我认为，发达的国家或这样的一些国家在政治上联合成的一个整体拥有完全充足的储蓄手段，无需求助于退休基金、就业基金和保险基金。只要为家庭提供在收入和保险方面同国外一样令人感兴趣的就业条件，那么就会在它们那里发现大量储蓄的可能性（我们的储蓄银行已或多或少地这么做了）。如果建立由企业贷款所付利息为财源的国家投资基金，那么就更有把握看到这种可能性。反对意见认为，只有存在一些敢于冒险者，经济才会有活力。而正如我曾明确说过的，在我们的混合的社会主义中，正是银行将进行冒险活动，并将比金融市场更富理性地这样去做。因为它们同企业有着紧密联系（在这方面，德国的例子可提供证明）。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不管怎么说，应该将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资本的国际流通分开（这对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来说比较困难，虽然它们那里的储蓄量经常很可观，但却很难将其引向投资），否则，正如已出现的情况一样，世界市场的大风会掀起任何人都不能控制的风暴。

以上所说的就是当我们明确意识到不能使社会民主主义政策重新复活（其失败原因有待详细分析），所有防御性斗争、保全性措施或限制性规定都不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的时候，我们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975年6月人民出版社版第189页）中，引用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中对一个吹嘘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的人讲的话。转义是就在这里证明你有什么本领吧！——译者注

应把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放在什么方向上。同对模式的设想不能截然分开的转变的性质问题,及其所需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问题,将集中放在另一篇章中研究。

(载《国际马克思大会论文集——马克思主义100 年》
1996 年4 月法国大学出版社版 陈双苑 译)

经济民主——一种真正的和 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

[美 戴·施韦卡特

我将介绍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及地处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的合作社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不是其中任何一种的翻版,并在几个关键点上与后三者相异。后三者的成功和失败为我将要捍卫的命题提供了相对应的经验材料。

我称这种模式为“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是为了指出这种模式的特征)包含比公民对经济的普遍监督更广泛的意义。它还与南斯拉夫体制和蒙德拉贡体制所共有的劳动者对企业的民主监督有所区别。这后一个特征,将是经济民

戴维·施韦卡特: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教授。

在我以前的一部著作《资本主义还是工人监督?》(1980年纽约普莱吉出版社出版)里,我用“工人监督”这类术语来表示这种基础模式。在这儿我决定再用一些其他方面的术语,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这种模式的民主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识到这种模式突出了每个人需要扮演的三种角色,即劳动者、消费者以及公民的角色。

主”的一个基本特征,我称之为“工人自治”。这就是说,“经济民主”是一种除其他内容之外还包括“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

“经济民主”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一样,是一种工人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而与1989年以前的南斯拉夫形式不同的是,它以政治民主为前提。我将撇开它的政治特点而设定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通过中央、省、市选举产生各级民主机构来保障公民的自由。

我提出的这种模式的经济结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 每个企业由其劳动者进行民主管理;2) 日常经济是市场经济:原材料和消费资料按照供求机制确定的价格进行买卖;3) 新投资由社会监督:投资基金通过征税获得,并根据市场导向的民主计划来发放。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三个基本特征:

1. 每个企业由其劳动者管理。这些劳动者负责日常决策:工作岗位的组织、纪律、生产技术、产品性质和种类、净利润的分配方

在此我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但没受到应有注意的问题。马克思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教育结构、文化结构及其他社会结构是与这个社会的经济紧密相连的(假如说它们不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话,至少它们必须与经济相适应)。因此一个与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也必须有其相应的不同的政治、文化形式。我提出的这种模式并不是与我们已知的那些政治结构(或教育结构或文化结构)完全不同的,而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完善模式,这种模式应该包括以“经济民主”所要求的平等价值、民主价值为基础的改革。

式。这些决策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民主地作出。毋庸置疑,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里,一个代表权力的集团是必需的。一个劳动者委员会或一名总经理有(或二者均有)资格作出某些类型的决策。但这些领导都是劳动者选出来的。他们既不要国家支付工资,也不是由地方行政单位挑选的。

虽然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但是他们本身并不占有生产资料。企业的生产资料是社会的集体财产。公有制表现为保护企业存量资本价值完好无损的义务(由法律来规定)。提取折旧基金应为了以下目的:这个基金里的钱只能用于企业认为有益的各种资本更新或改良,而不能用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如果一个企业遇到了困难,劳动者可以自由进行结构重组或离开企业到别处工作。

人们可以——在集体、地区或国家对收入的分配加以限制。可以规定所有企业内部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间的差别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在蒙德拉贡,这个比例多年来一直是3:1,最近提到6:1——其目的是阻止最优秀的劳动者被资本主义企业吸引过去)。还应该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最好再设置一个官方的工资等级表,使劳动熟练程度相当的劳动者享受同等工资待遇,并根据企业效益发给额外收入(这一条与蒙德拉贡的合作社的相近之处是,在合作社里,工资发放参照的比例与该地区的资本主义企业实行的比例相当,并根据个人投资的多少来分配企业利润;与日本作法的相近之处是,在日本,人们根据企业的赢利情况发给劳动者半年度奖。)

蒙德拉贡现行的间接选举制度大概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都是最合适的——一个选举产生的劳动者委员会协助领导。应该被优化的是请示与权威之间的平衡。领导者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去进行切实有效的领导,但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去剥削劳动力。(这里的每一个因素都是很重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应该降低使经营管理人才施展才华的某些结构、某些关系的重要性。人们害怕出现管理精英主义,但也应看到由于过分限制管理特权而造成的无人管理和效率低下。)

但在没有用同等价值替代他们的存量资本以前——至少在企业的托管机构（简单地讲就是企业加盟的银行）没有明确同意以前，不得擅自出售其存量资本。如果一个企业无力支付每个人的最低工资，就应宣布破产。其流动资本应该卖掉用来偿还债务。剩余资本返还投资基金，而固定资本则回归集体——这两个过程均由银行作中介来进行。劳动者应该去别处应聘。

2.“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至少在涉及到资本和现有消费资料的配置方面是市场经济。与市场配置不同的是中央计划，这种计划（如理论所预见和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同时导致权力独断集中和效率低下。

十几年前，关于中央计划从根本上就不完善的断言，是社会主义者们的一大争论主题，现在这一争论有所平息。其中大部分人（但不是全部）承认，如果没有一个由供求调节的价格机制，生产者或制定计划者将很难知道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哪些品种以及什么是最有效的生产手段。他们还普遍承认，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除非极度依赖于利他主义动机，否则将很难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市场以既不专断又不官僚的方式（尽管并不完善）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是市场的一个重要优势。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企业从别的企业购得原材料和设备，又将自己的产品卖给其他企业或消费者。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实行价格监督和价格补贴（在垄断集中部门实行价格监督，在农业部门实行价格补贴——为了减小因气候变化引起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可能是为了一种不保护就会消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信奉“听之任之”的理论。如同现代自由主义，当市场运转不灵时，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允许国家干预。它没有将市场绝对化，使之成为个人间相互自由作用的范例，而倾向于把市场看作是达到某些社会目的的有用工具。当然这个工具既有优点，也不乏缺点。重

要的是有区别地使用这一工具。

因为处于我们这种经济中的企业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所以它们也追求“利润”。但这种利润与资本主义的利润有本质的不同,它所追求的是产品的价值与扣除工资成本后的生产费用即非劳动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在“经济民主”中,劳动不同于一般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或资金)。劳动完全不是商品,因为当一个劳动者加入一个企业后,他将在企业里获取选举权和分享净收入的权利。

每个人所得的净收入(按净收入的百分比分配,不是一个绝对数量)不必相等。劳动者们自己决定收入的分配方式,他们可以选择平均分配,也可以规定工作难度越大,所得收入越多;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可以给予稀缺的人才以必要的奖励。诸如此类的决定均以民主方式作出。

3.“经济民主”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即对新投资的监督,与日本的资本主义、蒙德拉贡的合作社和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更接近。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特征。企业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扬弃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异化。市场是治疗过度集中与官僚主义的良药。社会对新投资的监督是平衡市场的力量,可以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参见豪沃特的《南斯拉夫经济体制》第218页及以下各页。回顾多年来在南斯拉夫试行的不同投资政策,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过渡的第一阶段,南斯拉夫政府对投资进行监督,但在普遍反对一切国家干预的背景下,这一政策被放弃。70年代初,可以这样说:“在几个重要方面……南斯拉夫经济表现出与亚当·斯密提倡的自由经济类型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与任何一个西欧国家的差异增大。”(戴维·格拉尼克《东欧企业指导》197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25页)相反,在日本,大部分投资均由政府机构作中介,尤其是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而在蒙德拉贡,投资由劳动人民银行细致地计划和监督。在这两种情况下,优先考虑的是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有两个功能:配置资源和现有财富;决定增长率和增长进程。在我们的模式里,这两个功能是分离的。不存在使私人储蓄者和私人投资者相遇从而决定利息率的“货币市场”。

投资基金的产生和发放均按照民主监督的程序进行。筹集资金不是靠用利息吸引储户,而是通过征收资本税的方式。征收资本税有两个目的:1.可以促进资金的有效利用(既然企业要支付资本税,它们就会努力做到经济地使用资本),2.可以为新投资提供基金。这种资本税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息,并具有与利息同样的双重功能。事实上,因为资本税是投资基金的来源,所以完全没有理由再支付个人储蓄的利息,同样也不需支付个人贷款的利息。“经济民主”重新实行对高利贷的禁令。

投资基金来源于资本税。那么这些基金又是如何发放的呢?虽然社会是民主的,但是让人民对每一项投资计划都进行投票的方法是不现实的。不仅因为计划的数目庞大使这一民主程序不可行,而且这一民主程序还可能使社会化投资丧失其主要优势:社会自觉地认可给予一个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投资优先权。

那么投资计划是如何制定并实施的呢?在此重要的是认识到

“确切地说,最令人憎恶的发财惯用方法就是放高利贷,这是一种利用钱生钱而不是通过实物来发财的方式。因为钱是用于交换的,不应用于生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经济民主”赞成这一观点。可以设置一些机构为个人储蓄保值,即根据通货膨胀率来确定价值的指数,同时这些机构也发放贷款(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佣金,贷款利率也同样指数化)。但在储蓄与投资相分离的情况下,利息将变得没有意义。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民主”中,支付个人微薄的利息不可能成为造成不平等的重要源泉,而伦理道德主要反对的正是平等。

存在着一系列的可能性,也许不会有一种可能性适合于所有国家、所有时期。在这个系列的一端,是一整套受日本模式启发组建的机构:一批幕僚精英制定计划,达成共识,使之得到国家立法机构批准,然后严格地执行——不是用强制手段,而是切断某些企业的资金渠道,而为另一些企业打开资金渠道,使之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在这个系列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一个模仿市场进程但又同时避免以资本主义为中介的计划,一种“听之任之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基金将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银行网络内进行分配,这些银行完全按照与资本主义银行相同的标准发放贷款。议会确定利息率并每年加以调整,以协调投资基金的供需状况。银行自己对利息率进行结算,可以对所发放贷款征收更高的税,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完全以与资本主义银行相同的方式估计它们可获利润相对承担的风险。在这样一种听之任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投资质量的计划,没有鼓励或不鼓励某个生产企业的意愿,也没有更多的对投资数量的有意识的监督。

最优化的机制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个或多或少有些中介性质的机制。这个机制比日本模式更民主,更分权;社会拥有比“听之任之的”社会主义更大的监督权。

应注意的是我所建议的“计划”不涉及经济的总体运作:这个“计划”只考虑新投资,即非折旧资本投资。国家虽然投入大笔资金,但也仅是它的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部分(在1960—1984年间,美国的固定资本增长达到每年17.9%,其中1/4用于住房)。不必担心社会对纯生产性投资的补贴占去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大部分,尽管这很自然地是很大一部分。还需注意的是,只要生产中的企

业不打算依靠非折旧资本投资 来改变其生产经营活动,就不会受这个“计划”的影响。

对每个企业征收统一的资产税形成了投资基金。社会对这些基金进行适度民主化和分散化的调控,通过一些相关计划和银行来实现。我们先从银行说起。

我们区分三种社会可以进行的投资:1) 合作社内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的自发投资;2) 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这种投资由于给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带来积极的外在的效果,给予社会的价值超过了赢利的价值;3) 与公益事业有关的投资,如基础设施建设、学校、医院、城市交通、基础研究经费等,后两种投资与“计划”支持的创意是相符合的。

这两种创意提出两个问题:决定支持哪些计划,并给其拨款。这些决定应由相应的代表机关民主地作出。应像审计预算那样审计这些投资;还应听取专家和人民的意见。然后代表们要决定用

在这个模式里,折旧基金由法律决定,但由企业监督,可以用于企业期望的一切资本优化,当它以这种方式使用时,就被看作是“日常”投资。这种投资应与“新”投资区分开来,新投资由银行提供——因此要服从所有可以协商的条件。区分“日常”投资和新投资是一种监督企业投资政策的颇为武断的方式,但不至于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那些消极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不成为问题,而且也是大家熟悉的。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或一个地方行政部门)希望禁止或阻止这种或那种产品的生产与使用,如果它们想就一些技术的使用作出规定,这些适当的措施提案将提交相应的立法机关,进行审议和投票。如果这个立法机关没有满足人们的期待,还可以求助于全民公决。显而易见,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利用它的全部政治机制,并改革和完善这些机制,使政治程序更符合人民的意愿。

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资本性质及其总额,并决定打算鼓励合作部门的哪个分支。公用基金应转给相应的社会组织;对于作为“鼓励基金”用于合作部门的基金应规定它们的总额和发放条件(如可以只在一段时间里征收低于国家税率的使用税)。

投资基金的发放遵照下列程序:首先国家立法机关根据上述民主程序决定向一些对国家有利的项目投资,如铁路交通的改善。这些项目的投资基金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即交通部提供。剩余投资基金按人头拨给地区(州、省)——如一个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它将获得 $\%$ 的投资基金。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决定鼓励某些类型的项目,然后规定投入基金总额及这类项目的税率。

地区代表机关作出类似的决定:关于公共开支和需要支持的项目。基金转给相应的地区机关,剩余基金按人头拨给地方行政部门,这些地方行政部门再作出有关地方公共投资和地方鼓励贷款的决定。

我在这里建议一种平等分配。另一种不太平等的分配是归还每个地区那份来源于该地区的投资基金(减去国家扣除部分),这种分配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差距。另一种分配,可能在经济上和道德上更加诱人,即“按需”分配,这些需要是综合考虑收入水平、企业需要和国家重点后裁定的。在我的模式里选择平等分配,主要是因为这种分配十分简单。我想在实际操作中民主的分配可能不如我所设想的分配平等,但比根据贡献来分配平等些。

如果政府完全掌握了需求状况,就可以只规定一个适当的税率,希望获得的投资总额就会由此产生(参见约翰·罗默、伊尼西奥·奥图诺·奥丹和若阿香·西尔弗斯特合著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以比较现实的方式假设政府在某项计划中投入的资金总额并不确定,以至于政府满足于规定一个对投资总额的限制,并刺激企业进行这样的投资,再根据上年结果对下一年投资总额和激励工具进行调整。

确定国家、地区和地方重点后,各级行政部门将钱拨给该级银行。我建议按照蒙德拉贡劳动人民银行的模式组建各级银行。每个企业在相应范围内加盟其选中的银行,该银行管理企业的折旧资金帐目、销售收入帐目,给企业提供生产资本和其他技术、金融服务。一般来说,企业向这家银行提出新投资的要求,虽然企业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取得投资。每家银行都像“二级合作社”那样进行管理——在蒙德拉贡,“二级合作社”是指其管理委员会代表不全是本社职工的合作社。隶属于一个集体的一家银行的管理委员会应包括来自该集体制定计划部门的代表、银行的职工代表和来自加盟该银行的企业 的代表。每家银行从这个集体得到一部分该集体所获得的投资基金。这个部分的大小取决于:1) 加盟该银行的企业规模与数量,2) 银行以前取得的在发放贷款(包括低利率的鼓励贷款)赢利方面的业绩,3) 银行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方面的业绩。银行收入来源于收入调节税(因为银行劳动者是公共职员),这笔收入按照将银行效益(即银行在贷款赢利和创造新就业机会方面的业绩)直接与个人收入挂钩的原则,分配给银行职工。

如果一个集体无法找到投资机会充分吸收拨给它的基金,多

蒙德拉贡劳动人民银行有一个12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4个职工代表,8个来自该行一百多个加盟企业的代表。因为银行基金不是依靠征税获得,所以没必要让地方行政部门的代表参加。

此处不是建议在地区内创造一些无效益的劳动机会。如果银行分配贷款不当,它将受到惩罚。利润最大化也不是唯一标准。如果两个申请新资本计划投入相等,那么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计划将被优先考虑。从建立开始,劳动人民银行就以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它的中心目标之一。

余部分应归还中央,再重新拨给投资需求最强烈的地方。这样就会刺激这些集体去努力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保留拨给它们的基金。银行也以同样的方式受到激励。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料:这些集体和银行会设置一些激励部门以寻找可以利用的良机,为伺机以待的企业和希望建立合作社的个人提供技术、金融咨询,帮助它们进行市场研究和制定投资计划,等等。这些部门可以为新建企业招聘领导和劳动者(蒙德拉贡的劳动人民银行就有一个这样的部门,这也是该银行的另一个成功的革新)。

这就是社会对投资进行监督的大致情况。简言之,中央政府收取资产税,然后通过地方银行网络将其向下分配,这些银行将这些基金分配给它们的加盟企业和一些新企业,使这些企业的利润和人员得以优化。蒙德拉贡的合作社网络(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小型企业系列)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这些合作社从公共投资基金中获取用于新投资的基金。每个银行可以任意发放贷款,在多数时候执行标准税率,对于鼓励性计划执行低税率。这些贷款一经发放便不需返还,但要加在企业资本上,因而企业支付税款的基数增加。大部分银行设有激励部门,促进企业的扩展或创建(“经济民主”呼唤甚至要求“社会主义企业主”,即渴望革新的集体或个人,他们为了创造新的财富和服务,或为了用新的方式去创造

达到既定结果的简单激励方法是向集体征收拨给它的基金的使用税,从使用税中要扣除这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税收入。如果一个集体私存它拥有的基金或将贷款用于非生产活动,它将受到惩罚。

从经济角度来看,使用税和利息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两者的社会心理学含义是绝对不同的。在我看来,作为投资基金使用税而不是作为利息来支付的概念可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付钱是为了获取他人创造的财富,以此类推,别的人付钱又是为了获得另外的人创造的财富。除了这种考虑之外——事实上这种考虑也是无足轻重的——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原则上的理由不能称使用税为利息。

而敢于冒险。批评家们有理由指出这样的人对于社会利益是重要的,在现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他们未受到足够的鼓励。

我已较为详细地陈述了一种我认为经济上可行的极为令人向往的社会主义模式。重要的是,尤其在今天,社会主义者有能力研究并提出一个这样的结构。我们或者其他的人应该清楚,问题不在于选择计划或选择市场,而在于将计划和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另外还应该清楚,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还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经济民主”不仅比资本主义民主更民主,而且还具有比后者更高的效率。

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一论断,因为正是在效率这一点上,今日社会主义受到最猛烈的攻击。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我不能全面地论证,但我想至少列出基本论据和几个重要事实。

我们可以把经济低效区分为资源配置低效、凯恩斯型低效和组织低效(低效)三种不同形式。

资源配置低效是指由于市场缺陷造成的总体利益减少,这些缺陷使价格偏离完全竞争制度下的价格,任何一个懂得经济基础理论的人都熟悉这种类型的低效——尤其是与垄断和“外部效应”相联系的资源配置低效。为了阐明这些经济低效形式,人们习惯上假设:1) 技术条件已定;2)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3) 每个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毫无困难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内部”浪费。“凯恩斯型低效”与最佳效率有一段差距,这个差距是因为人力、物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造成的,也就是说第二个条件没有得到实现。低效是第

有关此问题的更加深入的阐述和有关这个模式的一系列其他问题的分析,参看戴维·施韦卡特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反对资本主义:伦理经济学比较系统批判》。

三个条件被排除所造成的,即由于企业自身结构 造成的内部效率不高。

这三种低效形式并不处于同一数量级。瓦奈克将它们分别比作“苍蝇、兔子和大象”。莱本斯坦从一些经验性著作中得到的统计表明,资源配置低效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而企业内部效率不高常常超过50%。莱本斯坦虽然认为这些比较是属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也指出,资源配置低效实际上只能占很小的比例,因为——在既定条件下——某个经济部门的价格高出“正常”价格的部分必然会被其他部门的低价所抵消。如果再考虑到持续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失业的显而易见的严重性,瓦奈克的比喻就显得合理了。

人们可能会预期,我们这种模式也使用几张资本主义在效率方面的王牌。“经济民主”本身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与它的资本主义先行者一样,工人自治企业也追求利润,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节约地利用原材料和技术。但认真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矛盾:“经济民主”里的“利润”与资本主义的利润是不同的,资本主义把劳动作为成本来计算,而后者则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会给整个经济在效率方面带来什么影响呢?

“低效”提法最早出现在哈维·莱本斯坦的一篇经常被引证的文章:《资源配置低效率和低效》,载于《美国经济回顾》杂志1966年6月第56期第392—415页。他的观点又在他的另外两本书中得到阐述:《超越经济人:微观经济的新基础》(197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版)和《在企业里:等级低效》(198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版)。杰若斯拉夫·瓦奈克的《危机和改革:东方和西方》1989年版第93页。

这种差异对配置效率不高的影响是近年来有关工人自治模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瓦奈克、莱本斯坦和豪沃特相对丰富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讨论本身是小题大作,因此我在这里就略去不谈了。不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有多么重要(假如是这样的话),它对经济的影响都是很微弱的。

凯恩斯型低效的问题要严重些,但应指出,由于“经济民主”的投资机制包含对创造新就业机会的特殊激励,所以它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马克思很早就提出、后来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一个观点更证实了这一结论。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从基本上讲,需要一个用来约束工人阶级的控制失业的

使用新古典主义范畴的工人自治模式在近十几年中得到迅速发展(有关的广泛的统计,参看约翰·鲍宁和路易·布特南合写的文章《合作经济和劳动者管理经济》,载于雅克·勒索尔纳和 . 索南生合编的《纯应用经济学基础》一书)。杰若斯拉夫·瓦奈克在他回答华德和多玛的分析的宏篇巨著《劳动者管理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1970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版)中详细论证了这个命题。根据他的论证,在适当的假设条件下,工人自治经济在帕累托意义上是最优的。从这部著作发表以来,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试图证明这种经济是低效的,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建立一些模式来证明工人自治经济效率很高。在抽象意义上,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雅克·德雷兹在他的著作《劳动者管理,契约和资本市场》中分析了使工人自治与经济效益兼容的一般均衡条件(1989年牛津,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出版社版第25页)。

最初的关于工人自治的批评强调指出了几个重要的、不能草率对待的问题。有充分理由认为(即使这并不完全是那些批评所涉及到的)在某些情况下,工人自治企业的行为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更确切地说,在正常情况下,自治企业没有自发扩展的倾向。但这个差异,并不与“经济民主”相对立,而是“经济民主”比资本主义优越之处。我的著作《反对资本主义》广泛讨论了这个问题。

方向盘。在“经济民主”里这样的约束是不必要的(我只简单地谈谈这个重要问题)。

我想更多地谈谈内部原因造成的低效问题。我们研究的这个经济模式扩大了工作场所实行的民主。我坚信,一个在市场环境下民主管理的企业会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受到激励,去满足客户要求,并有效地利用它的资源和技术。

但人们经常会提出异议,一个自治企业能做得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好吗?劳动者是否有足够能力作出一些复杂的技术和金融决策?劳动者是否有足够能力选出代表来负责招聘有竞争力的领导?我不能否认这的确是一些问题,但我也不能不注意到,在一个以其民主保障而自豪的社会里,突然冒出这些问题(像我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是多么令人惊异。通常我们看到人们有足够的的能力选举市长、省长甚至总统,我们还看到人们有足够的的能力选举决定赋税、投票通过法律的代表,人们一旦违法将被送进监狱。这些代表甚至可以送人们去打仗或进天堂。我们是否还需严肃地问自己,人们有足够的的能力选出他们的老板吗?

但是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吗?修辞方面的话语不能当作如此关键问题的论据。总之,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里劳动者并不选举他们的老板。为什么不呢?也许他们能力太低,这样做会引起经济混乱,或至少引起效率的陡然下降。

普通人有足够的的能力选举他们的老板,参与企业管理吗?这个问题应该被提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回答得十分清楚明白,尽管这个问题广泛而复杂。很难想象还有哪个更重大的伦理经济学问题曾经得到过如此决定性的回答。这些事实的明确性是罕见的。

这里我们应谨慎行事,因为赌注下得很大。不必尝试将工人自治的不同要素在内部效率方面的作用孤立看待:民主选举领导,利润的分配,参与的形式,等等……需要我们做的是证明这些要

素的结合必然导致企业内部效率的提高。

好几个作者都提到了有关工人自治的内部效率问题,尤其强调以下几点:当管理者要和劳动者分享利润时,他们在工作中就不会完全投入;选举产生的管理者对劳动者进行适当的约束时会优柔寡断;作出决定的民主程序会造成时间和人力的浪费。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一些经验材料有力地证明劳动者参与管理和分享利润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劳动者管理的企业比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率更高。1973年进行的一项关于劳动者更广泛地参与管理对效率的影响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我们调查的例子中,没有一例由于劳动者更广泛地参与管理而导致生产率下降的情况。”9年后,琼斯和斯维吉纳在对经验材料研究进行统计之后,这样写道:“看来有充足的理由肯定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会引起生产力的提高,这个结果是借助好几个时期的大量事实,通过不同的方法论证的。”1990年,经济学家普林斯顿·阿兰·布兰德统计了已发表的文章,极大地拓宽了经验材料的范围,但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比如说,勒维纳和迪逊这样归纳他们对大约43种不同研究的分析:“我们对经济、工业关系、组织行为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经验文献作了总体回顾,得出如下结论:劳动者参与管理通常会带来一些小而迅速的成绩改善,有时会带来具有长远意义的改善,尤其是它从来没有负作用。”他们还得出另一个结论,即当劳动者参与管理与下列几个要素相结合时会引起生产力的提高:1) 利润的分配;2)

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编写的《在美国工作》1973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版第112页。

德里克·琼斯和简·斯维吉纳合编的《工人参与和自治企业:经济效益评估》1982年...希斯出版社版第11页。

戴维·勒维纳和劳拉·德安德列阿·迪逊合著的《参与,生产率和企业环境》,载于阿兰·布兰德编《生产力的代价:事实一瞥》1990年布鲁金斯学院出版社版第203—204页。

长期就业的保证;3) 相对紧密的工资等级;4) 劳动者受保障的权利(如限制辞退的原因)。实行“经济民主”的企业趋向于符合上述所有条件。

至于在劳动场所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我们可以指出,西北太平洋胶合板合作社从40年代起就开始选举产生领导,而蒙德拉贡的合作社是从60年代开始选举产生领导的。还可以指出,在接近1980年时意大利拥有两万家生产合作社,包括在最活跃的经济部门之一里建立的合作社。当然或许有必要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的合作社都成功了,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经验材料研究表明劳动者选举产生的领导不如他们的资本主义同行能干。大部分的比较研究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工人自治企业比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率更高。我们已列举了蒙德拉贡的合作社的事实。下面是贝尔曼关于胶合板合作社的一段话:“合作社成功和微利的资本化设备得以继续使用的主要原因是较高的生产率。按立方米计算的比较研究表明产量一直在以小时递增,其他研究表明产品具有更高的质量及物质资料使用更节约。”另一个近期的例子是威尔顿钢铁厂,即美国最大的合作企业。1982年,经历了一年的低潮之后,面对更加令人悲观的前景,国家钢铁公司提出将威尔顿在西部

有关胶合板合作社参见卡特琳娜·贝尔曼的文章《一个工人管理的合作模式》,载于弗兰·斯蒂芬编《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效益》1982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版第74—98页。有关意大利的合作社,参见索尔·艾斯特林、德里克·琼斯和简·斯维吉纳合写的文章《西方经济中生产合作社的工人参与和生产效力效应》,载于《比较经济学报》1987年第40—60页。

贝尔曼《一个工人管理的合作模式》第80页。关于进行这些比较的困难,参见亨利·列文的文章《工人自治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力比较评估结果》,载于琼斯和斯维吉纳编《参与和自治企业》第45—64页。

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卖给本厂职工,1984 年达成了协议。在随后的 18 个季度里——这是大部分钢铁工业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的时期(威尔顿的两个竞争对手破产),威尔顿钢厂开始赢利。“威尔顿的经历是钢铁公司中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奥本海默—西公司的分析家约翰·图马佐斯说,“在生产和价格上,威尔顿击败了它的竞争对手。”

然而南斯拉夫是不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呢?甚至连哈德·利达尔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南斯拉夫经济体制下最严厉的亲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也不同意劳动者在选举领导中的无能是问题之所在的说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达尔承认,在 1950—1979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南斯拉夫不仅维持了现有水平,而且有所繁荣发展。在 80 年代,情况向恶劣的方向发生变化。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迅速衰退呢?“可以肯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斯拉夫的党和政府拒绝执行与微观经济政策相联系的宏观经济限制政策——特别是限制货币供应的政策,这个微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扩大机遇,加强对创新和有效工作的激励。政府应该给予处于自由市场内部的真正自治的企业更多的决策自主权,这个权力应和对家庭财政的严格

斯蒂芬·格林豪斯的文章《工人们使威尔顿得到发展》(《纽约时报》1985 年 6 月 6 日)和威廉·西兰的文章《钢铁城里的成功故事:分享利润》(《纽约时报》1986 年 3 月 15 日),并参见丁·欧内斯特·比兹雷的文章《职工所有的威尔顿钢铁厂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搅乱社会股票出售》(《华尔街报》1988 年 6 月 23 日第 43 页)。

监督相配合。”南斯拉夫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在劳动场所实行过度民主造成的。根据贝尔格莱德的一家报纸的看法(由利达尔归纳)：“对当前社会危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劳动者自治权力的缩小”。

如果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不会奇怪自治企业的效率更高。因为劳动者的收入与企业的财政健康直接挂钩,大家在优秀管理者的指挥下工作都会受益;因为身临其境,劳动者很容易发觉管理不善(他们在近处观察因而能很快感觉到),所以他们不会长期容忍管理不善。此外,每个劳动者都会关心自己的合作者是否工作卖力(而不像一个懒鬼),以致于无需那么多的监督。下面是亨利·列文对此进行7年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一些既刺激个人又刺激集体的激励方法有充分机会引起生产力的提高。这些激励方法的特定作用是使劳动者愿意从事更艰巨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比资本主义企业更灵活;他们的换班率和缺勤率更低;他们更爱护机器设备。此外,生产合作社中不熟练工人和中层干部相对较少,生产薄弱环节更少,而培训计划比资本主义企业效率更高。”

我并不想说工作场所实行民主是治疗一切经济疾病的万应灵药,它也不是总能获得辉煌的效率。不是所有的合作社都会成功。

哈罗德·利达尔的著作《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89年牛津克拉林顿出版社版第69页。利达尔认为70年代中期的改革是削弱管理者权力而加强党内政治家权力的反改革。在南斯拉夫,80年代末期,官方的教条是劳动者选出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再由代表选出管理者,而实际上大部分企业领导,尤其是大中型企业领导是由地方政客选出来的(出处同上,第112页)。

出处同上,第96页。

亨利·列文的文章《生产合作社的劳动力雇用和生产力》,载于罗伯特·杰克尔和亨利·列文合编的《美国工人合作社》198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版第28页。

失败往往是惨痛的,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失败一样不仅仅影响雇主们。但我认为,事实表明从内部来讲,自治企业至少与资本主义企业具有同等效率。事实上,上面列举的经验材料证明自治企业效率更高。我想任何一个浏览过这方面著作的人都不会怀疑在同等条件下,工人自治企业在内部运作方面会比资本主义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

我详细描绘了“经济民主”这种经济增长的一般形式,它是一种高效的社会主义模式,事实上,比资本主义的效率更高。但高效率远不是它唯一的力量。一个细致、公正的分析表明,“经济民主”不像资本主义那样片面追求增长——因而更适应于面临生态界限挑战的社会,比资本主义更加民主,更加平等。我认为人们还可以证明,我在这里就不打算再谈了,“经济民主”比现存的或拟议中的其他社会主义模式都更符合马克思的解放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隐含价值。此外,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如马克思要求我们的那样)新的机构将在旧的社会体制内部逐渐形成,那么我想“经济民主”正是属于这样一些机构。如果社会主义必然是人类的未来(这绝不是武断的结论),那么我们就能够为这个未来制定出现实的计划,并为实现这个计划昂首战斗。

(载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

廖淑涵 译 李其庆 校